

# 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

**A European School of Marxist Semiotics**

张碧、唐小林主编  
胡易容、周劲松翻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年7月

# 目录

## 引论

苏珊·佩特里利：一个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欧洲学派 /2

## PART I 亚当·沙夫专辑

苏珊·佩特里利与奥古斯托·庞齐奥：亚当·沙夫的语义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19

亚当·沙夫：普通语义学——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观点 /48

亚当·沙夫：话语套路的语用功能 /61

## PART II 费鲁齐奥·罗西-兰迪专辑

苏珊·佩特里利：罗西-兰迪的大众传媒与意识形态理论 /74

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符号系统与社会再生产 /85

费鲁齐奥·罗西-兰迪：面向马克思主义应用的维特根斯坦 /100

## PART III 杰夫·伯纳德专辑

苏珊·佩特里利与奥古斯托·庞齐奥：杰夫·伯纳德与费鲁齐奥·罗西-兰迪：一份基于研究视野相互欣赏的友谊 /125

杰夫·伯纳德：从工作方面探讨感知的十个论点：一种罗西-兰迪式/维特根斯坦式观点 /141

杰夫·伯纳德：内部 / 外部，意识形态和文化 /152

## PART IV 奥古斯托·庞齐奥专辑

苏珊·佩特里利：奥古斯托·庞齐奥的符号学与语言哲学 /168

奥古斯托·庞齐奥：对等价交换符号学的批判 /198

奥古斯托·庞齐奥：关于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笔记 /207

## 讨论：

保罗·科布利：符号伦理学、意志论、反人本论 /216

参考书目 /232

# 引论

## 一个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欧洲学派

苏珊·佩特里利著

彭佳译

### 一、关于奥古斯托·庞齐奥和菲鲁齐奥·罗西-兰迪

包括笔者自己在内的、本书所收录的诸位论文作者，都是通过有意识地相互合作关系而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一定要说到“学派”，那么，他们就是以观念的名义而形成的学派。大部分学者们都在不同的国家居住和生活，故此，这一“学派”并不因为共同的地理位置而形成：他们之中，包括波兰的亚当·沙夫（Adam Schaff, 1933-2006），奥地利的杰夫·伯纳德（Jeff Bernard, 1943-2010），意大利的费鲁齐奥·罗西-兰迪（Ferruccio Rossi-Landi, 1921-1985）、奥古斯托·庞齐奥（Augusto Ponzio, 1942），以及笔者本人（1954）。同样，这一学派并没有领袖，但学者们通过分享他们的观点、视野、计划、项目和目的，形成了共同的网络，并在将来也会如此，由此，可将我们视为一个“圈子”，大家志趣相投、彼此鼓励，共同协作参与各种项目、讨论以及各式各样的会议。“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称号对我们所有人都恰如其分：事实上，我们所提出的，是符号研究及其与价值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必然关联，以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证，包括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符号研究和符号研究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即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彼此阐发与理解。

在上文所提及的诸位学者中，有一位中枢人物，即使在今天，他仍然是这一群体的联结之所在：他就是奥古斯托·庞齐奥。从这一学派形成伊始，到维持其群体内部的关系，庞齐奥在其间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遑论他对于笔者与其他学者之间的关系建立所起到的作用。自罗西-兰迪、沙夫和伯纳德先后于 1985 年、2006 年和 2010 年去世之后，我们继续研究他们的著述，以出版他们的著作和组织相关会议、研讨会的方式，推进其相关研究。学界持续进行着关于他们观点的讨论、对话和争辩，相关的论文、专著、译著和会议记录，也得以源源不断地涌现。其中，庞齐奥对他们的著作的翻译工作的推进，对于这些学者思想的流传是功不可没的，尤其是将沙夫的波兰文、德文和西班牙文著作译为意大利文<sup>①</sup>；或是将他们的著述进行重新编辑和出版。事实上，多亏了庞齐奥，在罗西-兰迪去世之后，他的著作

---

<sup>①</sup>多得庞齐奥之力，自 1975 年起，沙夫的大部分著作都被译成了意大利文，包括沙夫在去世之前的最后一部著作《人的哲学：沙夫自传》。

很快得到了系列地出版；对于沙夫，也是同样如此。

我们致力于使罗西-兰迪的著作得以流传，这使得另一位符号学大师的著述在意大利被重新发掘和阅读。查里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符号理论基础》是由罗西-兰迪译为意大利文并于1954年出版的，在罗西-兰迪去世之后，该书于1999年重新出版，并由笔者加写了导言；2009年，该书再次并重印出版。<sup>①</sup>1992年，国际符号学会的会刊《符号学》（*Semiotica*）推出专题，出版了这两位伟大的符号学家之间的通信，笔者和当时《符号学》的主编托马斯·A·西比奥科（Thomas A Sebeok, 1920-2001）共同为这一期专题撰写了导言（自《符号学》于1969年创刊起，直至2001年西比奥科去世为止，他都是这一期刊的主编）。

在此之前，在西比奥克的帮助下，罗西-兰迪的专著《语言学与经济学》已经于1975年作为“语言入门”系列中的一本，在德古意特出版社得以出版；再往前，罗西-兰迪的另一部专著《语言学相对性的意识形态》，也被收录在西比奥克主持的著名的、为时甚长的“符号学方法”丛书中，由德古意特出版。而现在，多亏了庞齐奥的提议，罗西-兰迪以符号学方法研究语言与符号的《语言学与经济学》一书的意大利文版本终于在2016年得以问世。

此外，庞齐奥也推进了将这些学者们在世时未经发表的著述加以出版的工作，这里，尤其要提到罗西-兰迪的文集《在符号与非符号之间》，该书由笔者编著并加写导言，出版于1992年。这不过是庞齐奥推动的无数编著工作中的一例而已，在此，笔者非常高兴地将其首推给中国的读者们，他们普遍具有英文的阅读能力。当然，罗西-兰迪的其他许多著作则是以意大利文写成的。

20世纪70年代，庞齐奥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曾为奥古斯托·古佐（Augusto Guzzo）主持的重要意大利期刊《哲学》，撰写过罗西-兰迪于1968年出版的《作为工作和交易的语言》（该书的英文版出版于1983年）一书的书评。随后，庞齐奥联系了罗西-兰迪，为其创立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期刊《意识形态》提出了论文计划，该文题为《语言学反常性之意识形态》。该文获得了发表，加之由著名的精神病学家赛尔吉奥·皮罗（Sergio Piro）的著作《精神失调的语言》亦在1967年出版——彼时，皮罗正致力于对精神病院的制度结构的批判，这就引发了《意识形态》在后来几期中对语言反常性的讨论。

庞齐奥在论文中记录了罗西-兰迪给他的所有批评建议，这些意见罗西-兰迪在回复给庞

---

<sup>①</sup>在罗西-兰迪之后，笔者将莫里斯的其他著作也编译为意大利文的论文集，并于1988年出版，该论文集包括《符号与价值》、《表意与意味》里的章节，以及莫里斯在符号学、伦理学和美学方面的其他论文。其后，在2000年，他于1964年出版的著作《表意与意味：符号与价值的关系》也出版了意大利文的译本，而他于1948年出版的《开放的自我》一书的意大利文译本也于2002年得以出版。

齐奥的长信中提出的。该文发表于《意识形态》1971年第15期，这样的交流开启了庞齐奥和罗西-兰迪长达一生的学术合作和友情，皮罗也参与其间。《意识形态》及其编辑活动以此为中心，它于1972年停刊以后，庞齐奥和罗西-兰迪共同建立了一份每四个月出版一期的期刊，《人文科学》。由于该刊的出版商是位于巴里（庞齐奥在巴里大学任教职，并生活于此）的德达罗出版社，整个编辑团队是在巴里、在庞齐奥的指导下工作的。该刊的第一期出版于1979年4月，但不幸的是，当起看和德达罗出版社的合作终止之后，因为没能找到其他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了第6期、也就是最后一期之后，该刊很快就停刊了。

《意识形态》是由罗西-兰迪和马里奥·萨巴蒂尼（Mario Sabbatini）于1967年春创立的、反对专门化的非学术季刊，由罗西-兰迪担任主编，其首发期收录了罗西-兰迪的论文《作为社会规划的意识形态》，该文后来收录在1968年出版的《作为工作和交易的语言》一书中，此书是罗西-兰迪的“邦皮亚尼三书”中的第一部，其后两部则分别是1972年出版的《符号与意识形态》，以及1985年出版的《哲学方法与符号科学》。《意识形态》在罗马得以出版，引发了系列的重要编撰工作，以及对“意识形态论”丛书的编写，该丛书和期刊都是以意识形态理论为视角进行编写的。

通过从不同方面对社会历史现实进行批判，以及对不同意识形态、包括以专门化和专业化之名的科学分离主义的去魅<sup>①</sup>，《意识形态》旨在在创新、革命和去异化方面确立社会规划。这一计划是为了恢复对社会历史现实之无偏见的、非常规的视域，在其副标题“当代历史笔记”中，就可以窥见这种重建与转变。它为历史地理学的阐释留下了足够的空间。除了刊发的无数单篇文章之外，它曾组织了这方面的专号：1968年的第7、8期为“古巴革命的历史根源”，而1970年长达600余页的第14、15期为“中国革命研究”，该期收录了对中国革命时期（1945-1970）的意大利研究文献的书目，在这两期期刊的尾段列出，长达300页。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庞齐奥于1972年在《意识形态》上发表了《转换语法和政治意识形态》一文，他在文中用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理论对语言学理论进行了批判。这多亏了罗西-兰迪的妻子吉纳维夫·沃恩（Genevieve Vaughan, 1939年出生），这位如今移居美国的符号学家、和平活动家和女权主义者，她在礼物经济和母系文化研究方面的观点和著

---

<sup>①</sup>关于对科学中的分离主义的批评，可参见笔者在2008年10月17日成为美国符号学会第七位“西比奥克学者”时，在美国符号学会的第33届年会上的大会发言《伦理符号学和责任：超越分离主义、普遍主义和人本主义》。此文连同笔者的其他论文发表于《美国符号学期刊》2008年推出的专号中，之后作为第一章收录在笔者2010年出版的《总体视野中的符号十字路口：伦理符号学与责任》一书中，该书经改写后，其中文译本由周劲松翻译，由四川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题目为《符号疆界：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

作对学术活动影响甚大——是她向庞齐奥提议，应该将乔姆斯基的某些表述，和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和其他书写中的表述，记忆美国宪法的《人权宣言》法案的社会政治和语言秩序进行比较，以辩明乔姆斯基的“语言创造性”理论中深藏的意识形态倾向。

同年，此文法文译本在期刊《人与社会》的专号《语言学、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和亨利·皮埃尔·热迪（Henri Pierre Jeudy）、瑟奇·拉图什（Serge Latouche）、罗西-兰迪和沙夫的论文共同发表，而这期专号的葡萄牙文版也在 1975 年得以出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视野出版社出版的该专号的缩减版（长度为 120 页）中，也收录了庞齐奥的这篇文章。1973 年，当庞齐奥出版专著《语言学生产和社会意识形态》时，他将此文作为该书的第一部分；而该书于 1974 年被译为西班牙文，1978 年被译为塞尔维亚文，1992 年，它的重编和扩充版被译为了法文。

关于此书的西班牙文版，在坎皮纳斯大学 2010 年 11 月 8 日举行的研讨会上，来自巴西的西里奥·波森蒂（Sirio Possenti）教授如是说：

当我年轻时，带着极大的‘意识形态愉悦’阅读了庞齐奥教授的这一著作。当时，巴西还处于独裁统治之下，坚持派别认同的左派们拒绝乔姆斯基的观点，认为他是资产阶级，尽管事实上，他的某些态度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反美’的。他提出的‘理想的说与听者’、固有观念说等，都受到排斥。当我在庞齐奥的书中读到对乔姆斯基作品的某些方面和美国《独立宣言》的片段的比较，以论证他的观点‘乔姆斯基与托马斯·潘恩和杰弗逊的立场相去不远’时，我想，我找到了不喜欢乔姆斯基的绝妙理由。

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庞齐奥和笔者与乔姆斯基之间的关系，可用庞齐奥在为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著作的评论来总结，此话在庞齐奥 1973 年的著作中可以寻见：

对于‘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而不是‘政治学家乔姆斯基’——对我们的一些‘请求’（比如，关于 1991 年的‘海湾战争’）和合作阿塔那丛书的邀请（我相信有两位从不交谈的乔姆斯基，一位完全不管意识形态，只谈语言；而另一位只谈意识形态，对其与语言、符号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不置一词）——他总是慷慨地加以回应。我要如是描述我和他的关系：除了零星的信件往来之外，我们之间的对话是单向的，至今仍然如此。

庞齐奥此书的西班牙文版出版时，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其中之一就是我们 2010 年

11 月在巴西圣卡洛斯参加巴赫金思想研究大会时遇到的卡洛斯·法拉科（Carlos Faraco）。随后，在 2012 年，法拉科将庞齐奥此书 2006 年的新版本译为了葡萄牙文。

该书在马德里出版的西班牙文版，立即促成了庞齐奥与赫那罗·塔伦斯（Jenaro Talens）之间的合作关系和友谊，并使得庞齐奥的论文集《文学与哲学之游戏》作为塔伦斯主编的“认识论”丛书中的一本于 1995 年出版，以及庞齐奥关于巴赫金的专著《巴赫金的革命：对巴赫金与当代思想的讨论》于 1998 年由卡提拉出版社在马德里出版。

让我们的话题回到罗西-兰迪上来。就如他在论著中所清楚指出的（如，在 2016 年重新出版的意大利文版《语言学与经济学》的导言所写到的），尽管经济学和语言学看似两个独立学科，但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有待探讨的。他从不认为由专业化的文献所呈现出来的经济学或语言学是简单的，这两者的研究对象，即，作为语言学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语言，和作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交换，都是他所关注的焦点，而这两者迄今为止都可能是被单独加以讨论的。从符号学的视角出发，罗西-兰迪对着两个社会过程都进行了检视，将其暂定为商品方式的货物生产和流通，和语言信息方式的言语生产和流通，这两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模态。尽管它们长期以来是两个独立学科的关注对象，罗西-兰迪却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它们是相同的，这种“相同性”至少是像一棵树的两处分枝那样。换言之，他认为，当货物以商品形式流通时，它们就是信息；而当言语以语言信息流通时，它们就是商品。

罗西-兰迪于 1985 年 5 月 5 日的早逝是令人震惊而痛惜的，在那之前不久，他还在同年 4 月在巴里举行的研讨会上见到我们，并介绍了《哲学方法与符号科学》一书。此次研讨会题名为“符号、作者与社会生产”，由罗西-兰迪和庞齐奥共同组织，是对罗西-兰迪此书的第八章《在再生产和超出之间的文本群》的讨论，该文曾以《对一位作者的意识形态研究之标准》为题于 1976 年发表在期刊《拉美笔记》上。

罗西-兰迪将“社会再生产”描述为人类符号活动，即，历史社会的符号活动作为“所有一切的开始”，哲学思考起源的原型。“总体符号学”的提出者西比奥克将从“生物符号活动”方面来对“符号活动”加以描述，并声称符号活动和生命是一致的，因此，任何生命、包括我们自己，都不可能脱离宏观的符号网络，我们的生命域；与此相似的是，罗西-兰迪所说的“人类符号活动”，或者更具体地说，“人类社会符号活动”，是不可能脱离社会再生产这一符号活动的社会历史维度的。将这二者的研究并置则可知，人类符号域属于更大的生命域，是后者的一部分。

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非文学文本的作者，涉及到“作者”的问题，便是如此：作者是社

会历史语境的一部分，其中心问题在于作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退出”他所属的历史情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对自身的社会历史语境的“超出”。要研究作者的意识形态问题，就会不可避免地提及具体语境下的社会再生产，而这需要精确标准之上的识别、描述和判断。在此之上，另一个问题是，要理解在何种条件下，作者在何种程度上对自身的社会历史语境有所助益，并能最终超越其边界，或者说至少能展望超越边界，准确地说，是跨越社会历史语境局限的可能。

在对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对“共识”这一问题进行的讨论中，罗西-兰迪提到了意大利哲学家、语言学家和政治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著作，他是意大利共产党 1921 年的创立者之一。对共识的生产是一个符号学现象，换言之，共识是通过我们对语言和非语言的符号系统的使用而达成的，这些符号系统是文明社会的特征。在这里，罗西-兰迪对作者的分析变得尤为重要，符号的生产作者和作者与社会再生产之广泛共识的生产，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变得尤为重要。

1987 年，在庞齐奥的指导下，我被委以为布鲁诺·韦德马克（Bruno Widmar）著名的哲学和文化期刊《普罗泰戈拉》编辑罗西-兰迪的纪念专号的重任。这期专号的题名《为了罗西-兰迪》非常简单，所发出的征稿通知吸引了来自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投稿者们。按作者名字的字母顺序排列，这些作者包括费利切·阿卡梅（Felice Accame）、马西莫·邦凡蒂尼（Massimo Bonfantini）、西尔维奥·切卡托（Silvio Ceccato）、翁伯托·艾柯（Umberto Eco）、亚诺什·克莱门（Janos Kelemen）、罗马诺·卢佩里尼（Romano Luperini）、罗兰·波斯纳（Roland Posner）、西比奥克·朱赛佩·塞梅拉里（Giuseppe Semerari）、塔季扬娜·萨拉马-卡扎库（Tatiana Slama-Cazacu）、维托里奥·索门齐（Vittorio Somenzi）、瓦尔特·施密茨（Walter Schmitz）、图里奥·滕托里（Tullio Tentori）、特里·斯瑞德加德（Terry Threadgold），当然，还有庞齐奥和笔者自己。

罗西-兰迪的研究，不仅在意大利产生了公认的影响，对于广义的符号和语言研究起到的作用也是辐射状的，这不仅要归功于他的论文的专著，还得归功于他的翻译工作，他所翻译的作者们为二十世纪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贡献，这其中包括莫里斯·维特根斯坦、吉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古斯塔夫·克林姆（Gustav Bridgman）等等。

罗西-兰迪不仅为现今所呈现出来的符号科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创造、选择和定义了这门学科的关键术语，这两者在科学的发展史中往往是携手而至的。事实上，就如艾柯所说的，即使是在被忽视之处，也能发现罗西-兰迪研究的痕迹。在 1985 年 5 月 10 日发表于《共和国》的文章里，艾柯表达了呼吁那些因为没有阅读过他的著作而自认为不知道他



的读者们认识他的期望，并写道：“我想要告诉他们，即使他们不研究以往的语言哲学，而只对像从新闻业到政治、文学作品和视觉语言等日常生活话语这样的话题感兴趣，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远在 50 年代，罗西-兰迪就已经作为先锋，为他们争论过所有相关的基本问题了。”

《普罗泰戈拉》的专号推出之后，发生了几件事情，使得罗西-兰迪的观点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继续得以流传。其中，在笔者记忆中特别鲜明的有两件事，因为我们对其有密切的参与：其一是由庞齐奥和我共同主持、2002 年 11 月 14 至 16 日在巴里大学召开的，名为“罗西-兰迪的符号学在今天”的国际会议，该会议由国际符号学会发起，由罗西-兰迪的国际网站、奥地利和匈牙利符号学会、巴里大学的语言学实践和文本分析系共同组织），会议记录于 2003 年结集为《无形的著作》一书出版，是阿塔那“符号学、哲学和艺术”丛书中的一本，其主题覆盖了罗西-兰迪研究的所有中心议题：信息和商品、语言工作者、交流-生产、语言生产和异化、符号材料工作、语言工作的分配、机器和语言、主流阶层和对交流的控制、符号资本、意识形态和无形的工作、语言，生产和战争、作为礼物和市场的语言。维也纳的伯纳德不仅前来参会，还积极的参与了整个组织工作，而这个会议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事件。

2005 年，也就是罗西-兰迪逝世二十周年之后，伯纳德联合组织了纪念他的两个国际会议。2005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日，在维也纳召开的“文化与社会的革新与再生产”国际会议中，举行了纪念罗西-兰迪的、名为“社会再生产与文化革新：符号学视角”的专场讨论，这次会议由奥地利与国际文学文化研究所、维也纳社会符号学研究所和罗西-兰迪的国际网站共同组织，讨论在 13 至 15 日举行于布达佩斯的“语言、文学和符号学：罗西-兰迪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圆桌暨研讨会”上得以继续，这一研讨会的组织方包括布达佩斯的意大利研究所、罗兰大学哲学研究所、匈牙利社会科学院、维也纳社会符号学研究所和罗西-兰迪的国际网站。

要补充说明的是，罗西-兰迪的国际网站作为国际符号学会相关活动的一部分，在 1999 年得以建立，直至 2004 年，都是由笔者和克莱门共同指导的，其后则由庞齐奥组织和指导，他还创建了相关的网站（对此，伯纳德发表于该国际网站的《罗西-兰迪和罗西-兰迪网站简史》一文有所说明）。

## 二、关于巴赫金及其圈子

对这一点，笔者将接续上文所说的、庞齐奥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加以推进之事，并提到伟大的俄国哲学家巴赫金（Mikhail M. Bakhtin, 1895-1975）及其圈子，尤其是帕维尔·N·梅德

维德夫(Pavel N. Medvedev,1891-1938)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作者瓦伦丁·N·沃罗希洛夫 (Valentin N. Volosinov,1885-1937),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对符号学界的影响,这种影响要归功于庞齐奥。除了推进他们的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外,庞齐奥对巴赫金及其合作者的兴趣驱使他写出了第一本享誉全球的巴赫金专论,也就是 1980 年出版的《巴赫金:苏联符号学之起源》一书;第二年,也就是 1981 年,庞齐奥出版了《符号与矛盾:马克思与巴赫金》;第三本专著《符号学与文学之间:巴赫金引论》,作为艾柯主编“符号领域”丛书中(该丛书于 2016 年得以再版)的一本于 1992 年出版;而第四本专著、上文提到的《巴赫金革命》一书,则是于 1997 年出版的。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后期开始,庞齐奥对巴赫金哲学的关注推动了不少成果的产生:由瓦尔迪米尔·米奥特罗 (Valdemir Miotello) 发起的对庞齐奥 1997 年的《巴赫金革命》一书的巴西文译本于 2008 年得以出版,并于 2012 年再版;此外,《巴赫金及其圈子 1919 至 1930 年作品集》一书,也作为乔万尼·雷亚莱 (Giovanni Reale) 主持的著名邦皮亚尼“西方思想”丛书中的一本,于 2014 年出版。该书为俄文和意大利文双语,由庞齐奥和他的儿子卢西亚洛共同策划,如题所示,它收录了巴赫金、沃罗希洛夫和梅德维德夫从 1919 年至 1930 年的作品。在笔者 2012 年出版的专著《别处及或然》中,也提到了庞齐奥领导的、对巴赫金及其圈子的研究工作,该书同样由米奥特罗于 2013 年译为巴西文并出版。

在庞齐奥的影响下和与他的对话中,罗西-兰迪也对巴赫金产生了兴趣,并特别提到了巴赫金对意识形态的观点。事实上,在他出版于 1982 年的、有所增补的第二版《意识形态》一书(该书的第一版出版于 1978 年,第三版由庞齐奥于 2005 年推出)中,罗西-兰迪在对意识形态的质疑之上讨论了巴赫金、沃罗希洛夫的论著,以及他们对“符号”、“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创造性”等概念的解释,为 1978 年的旧版本增加了一个新的视角。对于以符号学来讨论意识形态问题,在庞齐奥 1993 年出版的论文集《符号、对话和意识形态》中也有所体现,该书由笔者从意大利文译成英文,庞齐奥在书中强调了巴赫金和罗西-兰迪的立场。

庞齐奥对巴赫金及其圈子的兴趣始于 1973 年出版的、沃罗希洛夫《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英文译本,这位学者是所谓的“巴赫金圈”相当重要的一员。该书最先于 1926 年在其时的列宁格勒,也就是圣彼得堡出版。在庞齐奥的推动下,该书从英文转译而成的意大利文版于 1976 年出版。庞齐奥进行巴赫金研究的另一起点是马捷卡 (L.Matejka) 和蒂图尼克 (I.R.Titunik) 的论文,这些论文从英文转译为意大利文,发表于庞齐奥主编并为其撰写导言,并于 1977 年出版的论文集《巴赫金、符号学、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该书还收录了伊万诺夫 (V.V.Ivanov) 1973 年的论文《巴赫金的符号、言语和对话概念对当代符号学

的意义》一文，巴赫金于 1960 年至 1961 年间所著的《文本问题》一文，和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69 年写成的《词语、对话与小说》一文。

其后，在庞齐奥的推动下，沃罗希洛夫出版于 1927 年的《弗洛伊德主义：批评概要》的意大利文在 1977 年出版，2005 年，庞齐奥的儿子卢西亚洛重译了此书；梅德维德夫 1928 年出版的《文学科学的形式问题》一书，其意大利文译本作为庞齐奥所组织和主编的“语言和文学理论”系列丛书的一本也得以出版。1980 年，《作为社会实践的语言》一书的意大利文译本也被收入了该丛书，此书收录了沃罗希洛夫 1926 年至 1930 年之间的俄文论文，包括非常重要的《生活与诗歌中的话语》一文。2003 年，此书被卢西亚洛重译后，以《语言和书写》为名得以再版。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一书的第三部分题名为《论语言建构中的言语形式史》，此文于 1995 年收入了由庞齐奥、米希尔（M.De Michiel）和亚基亚（P. Jachia）主编的《巴赫金及其面具》一书，该书是巴赫金圈的主要成员们的论著之意大利文译稿合集。此文最近的意大利文译稿，则是以《言语句法学中自我和他人的词语》为题，作为独立的一卷，于 2010 年被收入了庞齐奥、科西莫·卡普托（Cosimo Caputo）和笔者共同主编的“符号及符号学大师”丛书系列。在此前一年，也就是 2009 年，卢西亚洛所主编的《行为哲学论》批评集则收入了巴赫金 1920 年至 1924 年间写作的文章，并在附录中收入了巴赫金 1924 年所写的《艺术活动中的作者与英雄》一书第一章的片段。

语言哲学的实践是由巴里-莱切符号学派（the Bari-Lecce school of semiotics）进行的，我们建议将其称为倾听哲学（philosophy of listening），即，倾听他者说话，对其进行接收和反应性理解的哲学。本书收录了到目前为止提到的、激发了这一研究的作者们的文章，包括巴赫金、沃罗希洛夫、罗西-兰迪和沙夫等的论著。至于这些学者的影响在何种程度上被巴里-莱切符号学派的研究所呈现出来，在以下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窥见：庞齐奥 2006 年的著作《符号的对话本质》；1994 年出版的、他重新加写导言的《语言哲学基础》一书的巴西文版，该书的另一作者是帕特里齐亚·卡莱法托（Patrizia Calefato）；除了上文所列出的笔者的相关著作之外，笔者以英文和意大利文写出的系列专著，它们并非彼此的译本，而是独立的著作（详见参考文献）；以及更为晚近的，笔者和庞齐奥合著的《符号学与语言哲学基础》，该书于 2008 年初版，2016 年再版，收入了 1994 年巴西文版著作的导言，将其改写为第一章：在这一章里，明确地从“倾听艺术”出发讨论了语言哲学问题。

巴赫金圈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和那时公认的“正统马克思主义”（orthodox Marxism）不同，也并非帕特里克·塞里奥（Patrick Seriot）所定义的“学术马克思主义”。塞里奥认为，沃罗希

洛夫的马克思主义是“人文科学的元理论”，并声称沃罗希洛夫从未引用过马克思的著作。他的这一论断缺乏依据，仅凭沃罗希洛夫 1927 年研究弗洛伊德及弗洛伊德主义的著作中的一段章节前引文就足以证明：该段引用了马克思论费尔巴哈的第六点，在其英文译本中（很不寻常地）被抹去了。全文如下：“人类—或者说人的本质—并非每个单独的个体所固有的。事实上，它是人类关系的体系。”

在人的个体存在的意义上，这一段中的“Menschliche Wesen”翻译为“人”和“人类”时，这句话听起来完全不同。这也是沙夫和卢西恩·塞夫（Luciene Seve）在期刊《人与社会》中的整个辩论的起点，他们的文章被庞齐奥译为意大利文并结集为两人的文选《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一书，于 1975 年出版。在庞齐奥写的导言《〈马克思论费尔巴哈〉的翻译与意义和人之个体问题》中，可以看到他的评论。

沃罗希洛夫和巴赫金、梅德维德夫、以及巴赫金圈的其他成员一样，并不习惯于援引马克思来证明自己论述的权威性，这种做法与维果茨基（Lev Vygotsky）类似，而不同于当时的普遍实践。换言之，他们并没有通过援引他人来获得权威性的习惯。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一书的引言（该书的英文版没有这一部分）中，沃罗希洛夫的开篇可谓极具勇气：

迄今为止，并没有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著作，也无法在谈论过相似主题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寻见可谓清晰或成熟的对语言的思考。……我们必须补充的是，对于在所有领域都已经牢固建立起来的机械论分类，它们的建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却仅是简略提及，或者说是完全忽视的；而这些领域基本上尚处于前辩证法的机械论物质主义阶段。

至于巴赫金，他对马克思的引用都是非常准确的，除此之外，在他 1965 年的专著《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他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论题，即，只有必然性的统治终结时，人类才能够完全发展，获得自由。在巴赫金的所有作品中，这个观点是中心性的，这和主流的、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还原论解释形成了鲜明对比。

### 三、关于伯纳德和沙夫

和在他之前去世的罗西-兰迪一样，伯纳德于 2000 年 2 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不仅是研究罗西-兰迪的专家，也是后者的挚友。

我们初见伯纳德时，他是国际符号学会的秘书长，彼时，波斯纳任会长，而格洛里亚·维

塔尔姆 (Gloria Withalm) 任学会司库。从 1994 年至 2004 年间, 伯纳德非常积极地进行着他的工作。我们相识是在第四届世界符号学大会“人类的符号”上, 是笔者参加的首次大会, 于 1989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6 日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和法国的举行。之后, 我们在其他届符号学大会上都遇到了伯纳德, 他也受邀参加了我们系主办的系列研讨会。此外, 他和维塔尔姆也受到庞齐奥和笔者的邀请, 在巴里大学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授社会语言学课程, 长达数年之久。

1992 年 2 月, 在罗马的匈牙利学院, 伯纳德的好友克莱门组织了关于罗西-兰迪的一次重要会议, 伯纳德也参加了这次会议。1994 年, 会议论文集为《阅读罗西-兰迪: 作为社会实践的符号学》出版, 由伯纳德、邦凡蒂尼、克莱门和庞齐奥共同主编。

作为期刊《符号学报告》的主编, 伯纳德为庞齐奥和笔者以《符号研究之符号》为名发表了一本文集专号。这本专号包括了该期刊 1998 年的第 22、23、24 期。此外, 伯纳德还促进了另一本文集《巴里符号学研究》的出版, 该文集由笔者主编, 是他所主编的《欧洲符号学研究期刊》的专号, 于 1999 年出版。

关于伯纳德对罗西-兰迪的《作品》一书的解释, 以及该书对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之关联的重要性, 可参见本书中的两篇论文和我们关于伯纳德的文章。

至于沙夫, 庞齐奥以及笔者本人和他的友情缘起于庞齐奥的《转换语法和政治意识形态》一文, 连同其他文章发表于《人与社会》1973 年第 8 期专号, 即上文提到的《语言学、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这使得庞齐奥和沙夫开始密集地通信, 并对沙夫的研究产生了兴趣。庞齐奥由此写出了关于沙夫的第一部专著《沙夫思想中的人、语言和知识》, 该书于 1974 年出版, 于 2002 年出版了增补和评论版《沙夫哲学中的人类个体、语言和全球化》。

此书的第二版得益于沙夫的直接加入——他非常愿意积极参与这个过程: 2000 年 1 月 24 日, 他来到巴里, 并在这里呆到了 29 日。其间, 他为新版本提供了不少信息、反思、记忆和相关事件。我们是在笔者家中会面的, 离巴里大学仅有两三个街区, 在这里, 笔器的学生和同事们和沙夫面谈了几次。沙夫已经 87 岁高龄, 仍然坚持爬楼来到笔器的书房; 一旦安顿好, 他就立刻谈起种种吸引人的、关于科学和个人的故事, 获取我们的注意。在这个独一无二的时刻, 笔者是如此有幸能够这位伟大的学者的谈话, 欣赏他的热情、他的话语中的科学性和缜密性, 以及他与庞齐奥的对话中所提到的种种问题, 并将其一一记录下来。

在《语义学引论》(该书的波兰原文版出版于 1960 年, 于 1962 年译为英文) 中, 沙夫对“符号拜物教”(sign fetishism)进行了批判, 认为这是语言解释中不断复现的局限所在。沙夫认为, 符号拜物教将符号与情境的关系简化为符号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 简化为符号与对

象之间、符号与思想之间、符号与对象和思想之间的关系。他推进了马克思对商品的讨论，在经济学的价值交换批评和语言价值批评中找到了相似之处。正如他在该书引言中所指出的，在与他所说的“符号拜物教”的抗争中，他借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概念，并以此为他认为相似的问题创造了术语。

沙夫致力于对“意义”的寻求，而马克思则致力于解释“价值”的意义。后者在研究过程中很快意识到，人们对市场上的商品价值的研究，受到了这一观点的影响：商品能够相互交换，因此，经济价值的关系被认为是商品之间的关系。他由是揭示出，在现实中存在着商品生产者的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因此，我们最终所要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沙夫解释说，社会工作是由商品具化的，并成为了衡量商品交换的基础和标准，即我们所说的“价值”。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观点的发现，引起了在经济关系解释上真正的、正确的革命。沙夫指出了在意义和符号与情境关系上的一个相似现象：“符号拜物教”的存在，它极大地阻碍了理解和对问题的解决。

在罗西-兰迪自己，以及他和庞齐奥讨论语言社会生产问题时，都采用并推进了沙夫对符号拜物教的批判。

一旦我们承认语言是工作，它就具有了工作的性质，从《马克思：语言》（索绪尔式的观点）中对“人”的理解而言，语言系统的确有效地成为了人的表现之一。这种观点认为“人”是并非为了活动本身的行为的结果，在这种行为中，需求必须被满足，但不是即刻被满足；换言之，语言(*langue*)就是工作—语言工作—的产物。这就意味着，要理解语言(*language*)的作用和衡量它的价值、程序，以及它作为媒介所传递的意识形态，仅仅停留在“语言市场”的层面是不够的；而应当从这一层面跨越至“语言生产”的层面。

对于沙夫的“语言工作”这一概念，罗西-兰迪称其为“无形的工作”，它是当今世界中的工作之变形。和“物质工作”不同，所谓的“无形的工作”被视为现今生产层面的主要资源（关于这一点，参见沙夫著作《基督教人本主义》、《我的十九世纪》、《沉思录》，以及阿塔那丛书中的《无形的工作》一书）。

说话者使用语言进行表达，并非是从语言学角度将非语言之物组构而成；相反，他所表达的在进入语言过程之前，其材料和工具就已然存在。因此，就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语言实际上是为他人存在的、真实的、实际的意识，因此也是为我而存在的唯一意识。

在罗西-兰迪的研究中，“语言工作”的概念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他1968年出版的专著《作为工作和交易的语言》中的主题。事实上，这本书已经在“语言工作”、“语言市场”和“语言

资本”方面对语言进行了讨论，证明了他所说的、联接这些社会过程的“语言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对应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罗西-兰迪应当是资本主义还未能发展到现今阶段时就从这些方面来推进他的交流和社会批评理论的，当时，交流和所谓“无形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尚不明显。罗西-兰迪所预见到的，是当今这个时代的现实。他用“语言工作”的概念，联结了物质生产和语言生产，以及语言学和经济学，而彼时这样的做法还显得颇为陌生，或者说至少只是比喻意义上的。罗西-兰迪的“语言工作”概念和现今的“知识社会”概念在对诸如“无形资源”、“无形资本”和“无形投资”等概念的描述中融合，并被视为在发展、竞争和职业（雇佣）中的重要因素。物质生产和语言生产最终得以结合，尽管在不久之前，它们还各自表现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形式。工作（或者说劳动）和物质产品之间的相互关联，在我们亲眼所见以前已经在电脑硬件和软件的组合中具体化了，其中，“语言工作”，也就是“无形的工作”首当其冲，这是相当明显的。

沙夫和罗西-兰迪一样，可被视为符号研究领域的大师。这是因为他著作甚多，远不止世界闻名的《符义学导论》，他还有许多其他的重要著作，它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接下来笔者将会提到这些著作中的一部分，从我们所讲述的历史和不同声音汇聚而成的视角而言，笔者所论及的是他的作品意大利文版而非波兰文的原版。

沙夫在语言哲学和符号学方面的著作包括《概念和词语》（1946）、《语言 and 知识》（1964）、《语言哲学基础》（1967）、《普通语法与固有观念论》（1972）、《马克思主义之人本主义、语言哲学和知识论》（1973）、《社会语言学》（1976）、《刻板印象与人类行为》（1980）。沙夫还有许多其他的论述与知识论、逻辑学、认识论和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研究相关。

沙夫和塞夫都是 1971 至 1972 年间的国际学界之间争论的中心人物，他直接用以第一人称写成的文章进行辩论。前文已经提到，这场辩论是在期刊《人与社会》上发表的，其讨论的直接对象是围绕马克思的《论费尔巴哈》的翻译，并且和马克思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紧密相关。

除了出版论著之外，从 1984 年开始，沙夫还在整个欧洲的许多城市都推动了系列会议的召开。这些会议都和同一个问题相关，“对赫尔辛基会议 1975 年最终法案的符号学解释”，欧洲的发展和彼此协作<sup>①</sup>。

---

<sup>①</sup>沙夫组织的会议在欧洲的不同城市举行。当时，他是位于维也纳的欧洲协作中心的荣誉主席。罗西-兰迪和庞齐奥在布达佩斯共同参加了会议。在这一项目所取得的成果中，我们希望提到的是，由欧洲协作中心发起的、为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记录的“赫尔辛基最终法案”的新的德文版和法文版，以及由维纶—甘多瑟（Ch. Villain-Gandossi）等人编撰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审查中的“欧洲”观》。

但是，沙夫之所以是符号研究的大师，原因不全在于此。沙夫是当代欧洲文化的中心人物，并且，在本文目前所描述的理论层面上，他对我们这个时代如何阅读符号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9年，沙夫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稿中总结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一法案的批评，事实上，这和我们所有人都休戚相关，不管是学者、职业政客还是普通人：而这一协议还远远不够，可以说甚至还未踏出第一步。在庞齐奥 2002 年出版的关于沙夫的专著《争论、结构性雇佣和大转型》中，这篇文章被译为意大利文，并被收入）。

在国家与国际层面上的剥削、经济压迫和社会异化面前，沙夫表达了对全球性和全球视野中的本质性的相互关系的人文关怀，并对未来做出了普世的、预言式的展望。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除此之外，他们还是他们所属的群体生活的表达和结果，这个群体和更大的群体彼此相连，在当代性的组合轴和历史的聚合轴上以同心圆的形式螺旋式地递进。

多亏了他参与性的感受力、理解力和他在语言学与符号学、政治与意识形态、心思学与社会学之间持续对话的跨学科能力，沙夫能够以不同寻常的普世视角来分析当今世界的问题，特别是聚焦在政治与社会的维度上。他是一位积极参与政治的学者，对社会实践深感兴趣，并且关注人权——包括每一个个体的权利和生活质量。他对科学方法问题特别关注，在他的描述中，他在经济学研究之后继续学习哲学，这为他的志趣提供了很大支持。

庞齐奥曾问沙夫：“在以劳动薪酬为特征的历史阶段结束之后，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意味着什么？”对此，沙夫认为，这主要是一个历史问题，“历史决定着回应。”随着劳动薪酬的标准终结，无产阶级不复存在，依靠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也将不复存在，其后果就是沙夫所说的，“港口”式的新型社会组织出现。然而，沙夫也指出，这个社会新世界不会不经规划和努力就自动到来。他确实相信，若不如此，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再生产系统的衰退和不可持续将无法避免。因此，现今的问题是找到对“大转型”的新的、足够的回应，找到社会化的新形式，并由此创造出国家的、全球的欢宴之新形式。

沙夫从这一视角出发，独立于任何派别——不管是“社会主义”、“后资本主义”等等，作为新的社会规划的一部分，他已经在 20 世纪将要终结时提出，为了共同生活的新形式，为了抵抗越来越紧迫和危险的全球人类的宿命，所有的人本主义主张必须联合和协作起来。沙夫以“四位骑士的天启”这一隐喻指出了四大问题：生态危机，结构性的失业，移民，和战争。他将涉及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主题化，并用“普世人本主义”一词来强调融合不同人本主义的需要。他强调，如今在此方面有很多误用，例如“人道主义武装干涉”和“人道主义战争”中的“人道主义”概念，这样的表达都需要重新商榷。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庞齐奥推动了沙夫著作的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其中包括 1985 年出版的《哲学论文》，1993 年出版的《我的 20 世纪》和 1994 出版的《普世人文主义》，以及 2001 年出版的《沉思录》。

在 2007 年 6 月 11 日至 17 日由赫尔辛基大学和芬兰伊马特拉符号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名为“交流：理解和误解”的第九届世界符号学大会上，庞齐奥和笔者共同主持了“向沙夫致敬”的专场讨论，与会者的论文，包括我们的引言《亚当·沙夫：从符义学到政治符号学》，都在相关的会议文集中得以出版。

在为这篇引言撰写结论之前，我们希望能够再次提到之前提到过的一位人物：西比奥克，他为推进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一学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尽管他不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庞齐奥和笔者为西比奥克撰写了《语言的概念：罗西-兰迪和西比奥克》一文，并收入了《无形的的工作》一书。我们对西比奥克感念太多，但在这里，我们只想再次提到罗西-兰迪的专著《语言学 and 经济学》的出版，以及其后庞齐奥的论文《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

在此之前，庞齐奥已经出版了《语言生产和社会意识形态》、《辩证法和真理：科学和历史辩证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与人的问题》、《巴赫金：苏联符号学之起源》、《符号与矛盾：马克思与巴赫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比奥克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委托庞齐奥对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撰写专书，将其收录在他素有声誉的系列丛书“符号网络”中。

索绪尔的符号模式深受洛桑学派（School of Lausanne）的边际理论影响，同样，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的批评也和符号与符号价值问题相关，因此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作为信息的商品和作为商品的信息之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社会关系。如庞齐奥所显明的，通过对社会符号的符号学分析和对商品的马克思主义讨论，我们从符号交换和符号市场的层面，推进到交流和表意之社会工作的相对层面。最终，符号结构得以呈现出它们之所是，即，人类关系的结构。

正因为人的社会行为、社会意识和科学理论都是由符号、语言和意识形态建构的，世界在我们脑海中的形象也是由符号、语言和意识形态构成的。它是语言和非语言的符号行为的直接结构，这些符号影响着社会实践，又被社会实践和被符号及语言模塑的社会关系所影响（关于符号活动和模塑，请参见西比奥克 1986 年和 1994 年的论述）。只有考虑到这些因素，才能充分理解作为其结果的人类的选择能力和行为能力。

就如英国哲学家莫里斯·康福斯（Maurice Cornforth）在 1965 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一书中指出的，选择是人类独一无二的 ability，这让我们认为，能够自由地、特意

地、理性地或是道德地进行选择的只有具有语言（这里所说的是文字语言）能力这一社会习得的人类，而非其他动物，而且语言为我们呈现了其他可供备选的世界。如今，鉴于西比奥克引领的生物符号学研究的最新发现，我们将补充说，是的，人类不同于其他的生命形式，能够在不同的世界中做出选择。有了语言，人类甚至能够创造出无数的新世界。然而，就如西比奥克所教导的，“语言”与其说是文字语言，不如说是一个符形的模塑工具，是人类独有的模塑能力和创造力，因为在人类运用文字语言进行交流之前，创新已经出现。

马克思主义经典从未低估过文字和非文字的语言与思想现实相融合，并且影响了人类意识形成的作用。然而，就如乔治·克劳斯（George Klaus）所说的——在庞齐奥的推动下，他于1964年出版的德文专著《词语的力量》被译为意大利文，并作为庞齐奥、卡莱法托和笔者共同主编的“工具”丛书系列中的一本于2006年出版——语言不止是社会再生产中的首要因素，而且是其推动力。如今，关于马克思主义知识论和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以及文化和社会之符号本质的研究已经表明，在符号活动、模式和我们对世界的想象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相互联接，因此，在符号、语言、意识形态和人类行为之间，也有着这种相互联接。

本篇导言并不旨在毫无遗漏地一一列举出马克思主义的在欧洲所有主要参与者，而是希望读者注意到从马克思主义出发致力于符号和语言研究、或是从符号学出发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或是以这两种方法指出理论或实践道路的一个欧洲学者群。纵然如此，由于其探索的领域是如此丰富，所提及的人物和著作未免挂一漏万。故事的脉络是无穷无尽、永无休止、开放发展，由庞齐奥穷尽一生开启的、围绕着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展开的人物与问题的故事亦是如此。

## 致谢

在此，笔者向赵毅衡教授及其同事，以及使得我们参与其间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这一项目圆满完成的译者们致谢，并特别感谢庞齐奥教授对本文做出的宝贵贡献。



（意大利巴里大学 Susan Petrilli 教授）

## PART I 亚当·沙夫专辑

亚当·沙夫（Adam Schaff, 1913—2006），波兰犹太裔哲学家，出生于利沃夫。青年时代求学于巴黎政治经济学院，后在华沙大学专攻认识论。1945年莫斯科大学哲学专业毕业。任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多年。曾任华沙大学教授、波兰科学院院士。作为“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沙夫将符号学运用于人本主义理论表述之中，开启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范式。一生著作等身，其中被译为英文的包括：

《语义学导论》（1962）

《历史与真理》（1971）

《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78）



（亚当·沙夫）

# 亚当·沙夫的语义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苏珊·佩特里利，奥古斯都·蓬齐奥

周劲松译

亚当·沙夫（Adam Schaff）（1913.3.10 生于利沃夫——2006.11.12 卒于华沙）是一名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兴趣领域包括语言哲学、符号学、知识理论、政治经济学。他的研究集中于有关语义学、意识形态理论、语言与现实关系、形式逻辑以及辩证法等方面，但又强烈关注关于人类个体问题的伦理学和人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他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阐释和马克思术语之间的关联关系，展现了意识形态在翻译实践中的影响。作为一名波兰哲学家，沙夫在符号学意义上定位自己的分析，尤其对当今社会的一系列政治病征进行了考察。20 世纪 80 年代，他在整个东欧和西欧诸多国家中举办了一系列会议，并从符号学角度出发，对以不同语言出现的、不同版本的“1975 年赫尔辛基最终法案”（Helsinki Final Act of 1975）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我们确信，沙夫在符号学方面的工作具有某些关联性，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对沙夫所关注的一系列核心问题进行了考察，这些问题包括：对人类个体的认识、语言 and 知识之间的关系、语言和辩证法、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影响、语言拜物教和固有规范、对乔姆斯基语言理论的批判，以及对“结构”、“结构主义”等概念的具体阐述（hypostatization）。

## 一、引子

2000 年 1 月 24 日到 29 日，波兰哲学家和符号学家亚当·沙夫和奥古斯都·蓬齐奥一道，在意大利巴里审定他的著作《亚当·沙夫哲学中的人类个体、语言和全球化》（*Individuo umano, linguaggio e globalizzazione nella filosofia di Adam Schaff*, 2002）的意大利译文稿。该书收录了沙夫和蓬齐奥的两次对话，一次在 1976 年 10 月，另一次在 2000 年。后一次是用法语进行的，沙夫回答了如下问题：

——您的研究分哪几个阶段？

——您的研究分期和二十世纪历史事件之间是什么关系？

——您怎么把自己的研究记得这么清楚？我相信那是早在八十年代初的事情了。什么个人事件和历史事件决定了您的研究之路？

——我们肯定可以发现，您六十年代的著作（《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Humanisme et existentialisme*]、《马克思主义和人类个体》[*Le marxisme et l'individu humaine*]和《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L'alienation comme phénomène social*]与您这个时期的生活是相关的。

但它们所采用的解释和观点有什么不同？

——我们可以说您的整个研究都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展开的吗？我们可以说您的整个工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吗？

——我相信，您研究内里的改变并非“肤浅改变”，而是由于科学需要和被分析对象的变化而导致的根本性改变。您同意这种解释吗？

沙夫的回答发表在庞齐奥 2002 年那本关于沙夫的意大利语专著第七章，本文要讨论的是和所提问题相关的其他一些话题。

除了《亚当·沙夫哲学中的人类个体、语言和全球化》，庞齐奥还发表了许多关于沙夫的著述，其中包括他早期的专著《亚当·沙夫的人学、语言学 and 经济学》（*Persona umana, linguaggio e econoscenza in Adam Schaff*）（1974b），此外还包括他关于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的一些著作中的某些章节（譬如 Ponzio 1977, 1990, 1992b, 1993, 1999, 2003a, 2004, 2006, 2007）。另外，庞齐奥还和我一道撰写了由沙夫本人工作延伸出来的、有关人类个体和当下全球化的多种著述（参看 Ponzio, Petrilli, and Calefato 1999; Ponzio and Petrilli 1998, 2005a, 2009）。亚当·沙夫是我们的研究中一位关键学者，是一位能够与米哈伊·巴赫金（Mikhail M. Bakhtin）、埃玛纽埃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费卢齐奥·罗西-兰迪（Ferruccio Rossi-Landi）和托马斯·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比肩的杰出学者，作为编辑、阐释者、译者、研究他们的专著的作者，我们所致力传播的，正是这些符号学大师的思想（参看 Ponzio and Petrilli 2000b, 2001b, 2002, 2005a, 2005b; Ponzio 1980, 1989, 1992a, 1995a, 1995c, 2003b）。无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我们对他们共有的思想要素进行了发展，即，处在其具体的单一性中的人类个体的生活，无论研究对象是什么，无论分析多么专业化，无法用任何借口逃避与其他人的命运关联。

本文中，我们将涉及沙夫对政治符号学的哲学兴趣，尤其是对当下生产系统中的经济、政治和国际社会关系的“病征学”（*symptomatology*）或“符号学”（*semeiotics*）的兴趣。他的著作，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到他去世为止，特别关注的是我们时代的个人病征和社会浮躁。

## 二、关于亚当·沙夫的生活和工作

亚当·沙夫是著名波兰犹太裔哲学家，1913年3月10日出生在利沃夫一个律师家庭（利沃夫1918年前属于奥地利，之后归入波兰），2006年10月12日卒于华沙。他的诸多著作中，有几部是专门研究语义学、语言哲学、逻辑学、知识论、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的。在语言哲学、符号学、社会科学、政治学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阐释等领域中的理解和误解问题，沙夫做出了让人难忘的贡献。

在利沃夫读完中学和大学后（他获得了法律和经济两个学位），沙夫继续在巴黎的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他对方法论问题的兴趣使他进入（波兰和苏联的）哲学研究界。1941年，他在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获得了哲学候选人学位和博士学位。

在德国占领波兰时期，沙夫移居苏联。波兰解放之后，他回到波兰，自1945年起在不同大学任教（到1948年为止在洛兹任哲学助理教授，之后在华沙大学任正教授）。1952年，他当选波兰科学院院士，成为波兰科学院哲学与社会学研究所主任。1969年，他到了维也纳，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主席，他领导该机构20年之久，同时，他还是维也纳大学的哲学荣誉教授。

沙夫在这些年里的社会活动主要集中在参与国际哲学研究所、国际哲学联合会联盟（在两个机构中都担任执委委员）以及罗马俱乐部（担任执委委员直到1990年）。从1931年起直到1989年解散为止，他一直是波兰共产党党员（后来变成了联合工人党），而且从1955年到1968年，他一直是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

在其一生中，沙夫大约出版了20本关于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和手册，及300篇文章。他的许多著作被翻译成不同外语，并获得了美国安阿伯大学（1967）、巴黎索邦大学（1975）和法国南锡大学（1982）的荣誉学位，是波兰科学院、保加利亚科学院（1952）、西班牙皇家政治与道德科学院（1987）院士。

作为哲学家，亚当·沙夫的专长是认识论、逻辑学和语言哲学，著有《概念与语词》（*Pojęcie i słowo*, 1946）、《马克思主义真理理论若干问题》（*Z zagadnień marksistowskiej teorii prawdy*, 1951）、《语义学引论》（*Wstęp do semantyki*, 1962 [1960]）、《语言与认知》（*Jezyk a poznanie*）以及《语言哲学论集》（*Szkice z filozofii jezyka*, 1967）。

按照沙夫的观点，语言既是社会产物又是生成性现象（genetic phenomenon），对人类实践具有功能性。无论在认知过程还是实践行动中，语言都是主体发挥“积极作用”（active role）的基础。语言不仅是表达意义的工具，而且是意义从中得以形成的材料，没有它意义就无法存在（Petrilli 2003, 2010, 2012）。所以，沙夫对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和生物学家埃里克·H. 伦尼伯格 (Eric H. Lenneberg) 提出的语言阐释做出批判, 他认为这些阐释具有还原性的、天生论的和生物性的特征。根据沙夫的看法, 我们必须摆脱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 (fetishism of commodities) 相呼应的、他称之为“符号拜物教” (fetishism of signs) 的东西。符号拜物教反映在关于符号之间关系、关于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物象化了的观念中。相反, 符号关系应该被看成特定社会条件下使用和生产符号的人之间的关系。

按照沙夫的看法, 与那些幼稚唯物主义所采取的方法不同, 我们必须承认语言理论的优先性, 它们能够证实认知过程中、在语言和世界观 (Weltanschauung) 之间以及语言和“现实形象” (image of reality) 之间, 语言发挥着积极作用。人和语言无法与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分开 (参看 Ponzio 1974a, 1981, 1988)。这种方法使得我们能够用新的方式看待人类世界中与符号和语言有关的那些话题: 语言和知识之间的联系、语言与意识、语言、意识形态和固有规范。知识理论需要来自对语言所做研究的支持。此外, 语言理论和知识理论之间的关联关系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有关“选择”、“责任”、“个人自由”、“语词独裁”、“语言异化”等等概念 (参看 Petrilli 1986, 1996, 2007a)。

沙夫研究的另一个方面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有关。他在这个领域中尤为重要的著作包括: 《马克思主义引论》 (*Wstęp do teorii marksizmu*, 1947)、《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起与发展》 (*Narodziny i rozwój filozofii marksistowskiej*, 1949)、《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质》 (*Obiektywny charakter praw historii*, 1955)、《历史与真理》 (*History and Truth*, 1970), 以及《人本主义、语言哲学和知识理论》 (*Umanismus, Sprachphilosophie, Erkenntnistheorie des Marxismus*, 1975b)。

他研究的第三个方面, 将人类个体、社会以及社会运动问题为核心。在这一领域, 沙夫的主要著作包括: 《人的哲学》 (*Filosofia człowieka*, 1961a)、《马克思主义和人类个体》 (*Marismus und das menschliche Individuum*, 1965)、《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 (*Entfremdung als soziales Phänomen*, 1977)、《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Strukturalismus und marxismus*, 1974, 同年并以法语和德语出版)、《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 (*Die kommunistische Bewegung am Scheideweg*, 1982), 以及《现代社会主义的观点》 (*Perspektiven des modernen Sozialismus*, 1988)。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与文献欧洲协调中心 (维也纳) 的主席, 沙夫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整个欧洲的不同国家举办过一系列会议, 在符号学框架中对《赫尔辛基最终法案》进行分析: 1985 年 1 月于布达佩斯; 1985 年 11 月于布拉格、1986 年 5 月于的里雅斯特、1986 年

11 月于莫斯科、1987 年 5 月于佩奇；1987 年 10 月于杜布罗夫尼克、1988 年于莱比锡；1988 年 11 月于索菲亚、1989 年 1 月于鹿特丹。

1984 年于杜布罗夫尼克的一次会议上发起了一个名为：“比较研究中的符号学：国际关系术语：赫尔辛基大会的最终法案”的项目（*La sémiotique dans la recherche comparative: Le vocabula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l'acte Final de la Conférence d'Helsinki*）。有来自十二个不同国家的学者参与了这次会议，其中包括：欧洲协调中心荣誉主席亚当·沙夫、欧洲协调中心主任助理克里斯蒂安·韦伦-甘多西（Christiane Villain-Gandossi）、保罗·法西（Paolo Facchi）、克劳斯·波齐曼（Klaus Bochman）、莫米尔·米罗耶维奇（Momir Milojevic）、亚洛斯·克勒门（János Kelemen）、克里斯蒂娜·沙夫纳（Christina Schäffner），以及奥古斯都·蓬齐奥。

这一项目取得了以下成果：1）名为《赫尔辛基最终法案：文本与分析》（*L'Acte Final d'Helsinki: Texte et Analyse*）的 1975 赫尔辛基最终法案新版本（社会科学研究与文献欧洲协调中心 1990 出版），里边加入了对其中所提出概念和观点的符号学分析结果；2）《欧洲的概念》（*The Concept of Europe*）1 册（Villain-Gandossi et al. 1990）。

沙夫将自己的后期工作奉献给了对结构性失业、移民和作为工作—商品来理解的工作的终结等问题做出分析的政治符号学。著作和文章有：

- 《普世的人本主义》（*Ökumenischer Humanismus*），德语版 1992；西班牙语版 1991；意大利语版 1994；
- 《我的 20 世纪：写给自己的信》（*Mi Siglo Veinte: Cartas escritas a mí mismo*），西班牙语版 1993；德语版 1997；意大利语版 1995a；
- 《一个充满问题的人的笔记》（*Notatnik kloptnika*），波兰语版 1995a；西班牙语版 1997；
- 《沉思》（*Medytacje*），波兰语版 1997；西班牙语版 1998；意大利语版 2001b；
- “结构性失业”（*Strukturelle Arbeitslosigkeit – das soziale Grundproblem unserer Epoche*），1999，未发表；意大利语版，2000；参看 Ponizo 2002: 253-266；
- 《写给我的妻子：充满问题的自传》（*Ksiazka dla mojej zony: Autobiografia problemowa*），波兰语版，2001a。

### 三、当下社会政治的病征学

在《我的 20 世纪：写给自己的信》中，沙夫说：



一场灭顶之灾可能来临，并呈现出诸多不祥之兆：我们对于地球上的生命有可能发生总体性的大灾难。来自世界灭绝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想起圣约翰的启示）。福音书里的四个骑士，今天我们已经能够非常清楚地分辨出他们的身形。

第一个是核战的危险，结果是地球上生命的毁灭。

第二个灭绝骑士是生态灾难的威胁，它正笼罩在世界之上。（Schaff 1993: 131-145）

人类的“污染”不只和地球、大气、河水、海洋息息相关，而且和整个宇宙息息相关：“人类污染了世界。地球现在被真正的人工产品和无用武器的‘水泥’所覆盖”（Schaff 1993: 131-145）。

第三个其实代表的是人口爆炸。对这个重大问题，沙夫强调：

到二十世纪末，工业国家的人工只会上升到地球人口的15%。剩下的 85%会沦为贫穷和痛苦。如果当下各种原因不发生变化，两个群体之间的不成比例会产生恶化，贫穷者将会更多。（Schaff 1993: 131-145）

在 1993 年的这本书中，沙夫预见了与恐怖主义新形式相关的景象，抨击了诸如纽约双子塔之类大型都市以及反恐战争。

第四个灭绝骑士代表“结构性失业”，因而有了作为今日工业革命后果的工作的终结，全球劳动力的衰落，以及诸如安德烈·戈尔兹（André Gorz）和杰里米·理夫金（Jeremy Rifkin）等人所检讨的各种后资本主义（post-capitalism）问题。

沙夫改造了灭绝四骑士的形象：<sup>\*</sup>

每种情况中都要记住——这是我个人对圣约翰所传递观点的贡献——灭绝骑士从来都不只身行事，总是与代表产生世界灭绝的人际关系那个人结伴同行，在这一意义上说，是这些人际关系创造了他们、指引着他们的方向、控制着他们的节奏。（Schaff 1993: 131-145）

时下的失业，并不是生产循环中一个转换阶段的表现，而是对其而言具有结构性特质。在其所有后期著述中，尤其是 1999 年的文章《结构性失业：时代的社会剧痛》中，沙夫分析说，他相信结构性失业所标举的是工作——即，今天商品化了的工作——的终结。作为全球生产

系统中的一个结构性要素，失业代表的是社会生产关系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结构性失业是“自由劳动”（free-labor）终结的开始，是劳动与薪水之间交换终结的开始。自动化削弱了人类劳动，产生出人的过剩和系统性的失业。要理解这个现象，就必须将工人和机器之间的关系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关系语境中来审视，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中，而不是将其与其他因素隔离开来。利润最大化始终是资本主义的动机，但一旦将交流活动作为生产过程本身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则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暴露出其对最大利润的无穷欲望（参看 Ponzio 1995b）。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活的、可变的资本为了固定资本而被牺牲。换言之，公司里的人工数量随着机器升级和逐渐取代人而减少，即使是在智力工作方面也是如此。

随着与智能机械之间互动关系的发展，需要操作机器运作的人的数量变少。对工人技能和服务的要求是复杂的，然而“质”层面上的复杂性要求的却是“量”层面上的简化，要求生产过程必须在人员数量上有所减少。与体力工作方面的自动化类似，对许许多多的人而言，智力工作方面的自动化也会导致人类劳动的减少甚至消失。“这个过程的社会性后果之一就是，如上所述，所有‘多余的人’需要服从新的工作形式，‘过剩’……为他们找到相对的‘就业’机遇，被社会所组织、终结”（Schaff 1999: 16）。

沙夫说，无论谁承诺了传统意义上的就业，回到以传统工作为基础的就业，要么是不理解经济—社会状况，要么就是有意识地把自已的政治生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之上。

今天的社会状况急切盼望一场全世界范围的大变革。实际上，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新的工业革命。由于自动化和机器人化，工作（在这个词的传统意义上）将会终结，进一步的后果是，不仅工人阶级会消失，资本家也会消失。（Schaff 1999: 17）

商品化劳动的终结迫在眉睫。那些并非左翼的理论家们（譬如杰里米·理夫金，还有更早的安德烈·戈尔兹）也会承认，后资本主义已经出现，而且与之一道，市场后经济（market post-economy）也已经出现。新工业革命和机器的岗位杀手（job-killer machines）给工作带来的当下的质变，让人们只有在陷入“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Festinger 1957）或者“思想封闭”（closed mind）（M. Rockeach）的境地时才会视而不见。我们的世界只有提出合理的人性的理由，才能引导从工作文明指向职业文明的转型。新职业包括了个人终生

---

\*《新约·启示录》是约翰所记基督给予他的默示，其中写到，会出现骑着白色、红色、黑色和灰色马匹，代表征服、战争、饥荒和死亡的四个骑士，由他们来执行末日审判前的神圣灭绝。——译者注

教育，它和劳务市场活动无关（后者正在终结），却对个人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充满悖论的是，资本的发展产生出摆脱商品化劳动——即摆脱异化劳动——的必要条件，然而在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系统中，采用的却是失业这种消极形式。当务之急是设想出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形式和新的职业形式，其中，社会财富并不等同于劳动时间，或等于同对利润起作用的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等同自由时间，等同人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的发展：“我想表示……职业技能……在未来无疑会起到巨大的作用：我指的是持续的、终身的教育”（Schaff 1999: 17）。

#### 四、马克思主义翻译中的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主义和人类个体》（1965）这本著作中，沙夫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有关如何翻译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s on Feuerbach*），或者更确切地说，翻译包括“Wesen”这个德语单词的关键概念——譬如“menschliche Wesen”——所进行的讨论中，对人类个体这个问题的阐释。“menschliche Wesen”应该被翻译成“人的本质”还是“人的存在”？

德语原文中，马克思的文本是这样的：“Feuerbach lost das religiöse Wesen in das menschliche Wesen auf. Aber das menschliche Wesen ist kein dem einzelnen Individuum innenwohnendes Abstraktum. In seiner Wirklichkeit ist das Ensembl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存在归结于人的本质/存在。但是，人的存在/本质并非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①</sup>）（Marx 1978: 533-535）。

大多数官方的《论费尔巴哈》译本都是以俄语译本作为基础的。奇怪的是，1982年，俄罗斯译者普列汉诺夫（Plechanov）用的是没有歧义的俄语“suchtschnost”（即，“存在”，相当于德语中的 *Wesenheit*）来翻译“Wesen”这个有歧义的德语术语，而没有用“suchtschestwo”。和波兰语中的“istota”一词相似，德语原词“Wesen”和俄语的“suchtschestwo”一词也具有多重含义。普列汉诺夫被认为是该领域中的权威，他的这个特别用词选择，沙夫观察到，决定了这一文本后来哲学和政治阐释的条件。

在法语中，与英语和意大利语一样，不同于德语的“Wesen”、波兰语的“istota”或俄语的“suchtschestwo”，同一个单词在被使用时，无法只呈现出一个意义。受最初俄语译本的影响，

---

<sup>①</sup>中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18卷。本文作者在引用这段话时，同时使用了“本质”和“存在”的译法。——译者注。

“Wesen”普遍地被翻译成“存在”这个意思，在法语中成了 être，在英语中成了“being”，在意大利语中成了“essere”。

1971 到 1972 年间，亚当·沙夫与卢西恩·舍武（Lucien Sève）在《人与社会》（L’Homme et la société）这本杂志中，就正确翻译这篇文章发生了一场辩论（Schaff 1975a）。这场辩论以这篇文章的法语官方译本为焦点，直接或间接地卷进了众多法国知识分子（包括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奥古斯都·科尔努[Auguste Cornu]和罗杰·加洛迪[Roger Garaudy]等人）。不过，也涉及波兰语、俄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官方译本，所以，除了上述学者之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感兴趣的国际社会总体上也被卷了进来。

这个问题看上去很专业，而且很窄，但在决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球阐释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即便由于其隐晦和有时带有暗指的特点，《论费尔巴哈》常常引起不同的解释/误解，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这些解释/误解是打开马克思思想体系的钥匙。此外，这场论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它证明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参看 Petrilli 1992, 2007b, 2010: ch. 8; Ponzio and Petrilli 2006）：用这种方式或者那种方式去翻译，是充满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内涵的，正如马克思这篇文章中的情形一样。实际上，这场论辩的解决，在语文学的、哲学的和政治的层面意义重大，在确立舍武对马克思主义阐释的合理性、对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批判，以及阿尔都塞反人本主义<sup>①</sup>的批判方面等等，在当时尤为关键。

舍武相信，沙夫对马克思第六条论点的翻译是错误的，来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来自以一种人本主义观点去阅读马克思，这在政治层面也引发了某些反响。最终，整个论辩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关系：对这篇文章的解释，反映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科学、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与成熟时期著作之间各种关系的诸多解释。所有这些，都和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与价值有这样那样广泛的关系。如沙夫所看到的那样，尽管它围绕的仅仅是这些论纲中几个表达的翻译与解释，但这场论辩早已超越了“文字”，只有通过“鞭辟入里”，通过考察左翼政治运动的历史，通过把这场论辩的结果和关于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内容的争论、和关于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何克服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和后果关联起来，才能够充分理解这场论辩。

沙夫争辩说，遵循固陋的传统观念，用“人的本质”去翻译“menschliche Wesen”，是错误的。德语“Wesen”是多义的，共有 11 个不同意义群，而且每一个在语义方面都有无数微妙差别。与这场论辩相关的是其中两个意义，与之对应的，有拉丁语中的“ens”和“essential”、英语中的“being”和“essence”、法语中的“être”和“essence”、意大利语中的“essere”和“essenza”，

---

<sup>①</sup>一般译为“人道主义”，本文译为“人本主义”。——译者注。

一个意指“生命的存在”（living being），另一个则与偶发性相对，意指“事物的本质”（essence of things）、“本质性的东西”（that which is essential）。上述语言中，都不存在单独对应德语“Wesen”的多义术语，尽管它在俄语和波兰语中的确存在具有同样多义性的术语（俄语中有“suchtchestwo”，波兰语中有“istota”）。因此，与有着同样多义术语的俄语和波兰语等语言相比，法语、英语或意大利语的翻译中必须这样处理：对“Wesen”的意义的翻译，必须在每个具体的语境中加以确定。

沙夫拒绝用“essentia”来翻译“Wesen”，而选择使用“ens”的各种不同对等词。他通过联系语法分析的结果和哲学语境以及“Wesen”一词与德语句法规则相符来做出决定。

如果“das Wesen”这个表达后边跟一个属格名词，它就是“本质”的意思。所以，“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这也是费尔巴哈一部著作的标题——就是“基督教的本质”的意思。相应地，“das Wesen des Religion”意思是“宗教的本质”，“das Wesen des Menschen”意思是“人的本质”。“Wesen”后边跟“某物”或“某人”便用“本质”这个意义。相反，如果“Wesen”之前有品质形容词，它就是“存在”的意思。所以，“das christliche Wesen”意思是“基督教的存在”，“das religiose Wesen”意思是“宗教的存在”，“das menschliche Wesen”意思是“人的存在”。在所有这些情形中，如句法所表明的那样，我们所面对的分别是基督教的、宗教的、人的“存在”。所以，沙夫是凭借自己作为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的功力解决了这个问题。

## 五、人类个体、语言和知识

亚当·沙夫在其哲学研究中主要关注三个领域：a) 语言哲学；b) 人类个体哲学；c) 知识理论，在其最新出版的著作中，他将三者结合起来。一方面，他批判了孤立论（separatism）的倾向，另一方面，他批判了压制其独立性的倾向。在他自己的著述中，有关“语言”、“人类个体”和“知识”的问题构成的是一个有机整体，反映了联系这三个话题那种真实而客观的关系，即使它们在特定领域中不仅是孤立的，而且进一步地，在特别兴趣基础上，它们甚至是零碎的：我们将在这里探索它们的相互关系。

在 1977 年和 2002 年的访谈中，当回答有关自己研究的统一性元素的问题时，沙夫表示，人类个体问题涉及到语言哲学、知识理论和人的哲学，即，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科学。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话题通常就是在这些领域中来处理。相反，尽管在历史、政治、语言、认知和经济过程中无比重要，说明如此众多理论具有抽象的性质，但这个话题常常受到忽略。按照沙夫的看法，人类个体问题对于理论的科学根基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并因此而对分析和解释特定现象的理论能力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哲学人类学以及人类个体哲学中的研究，如果不

用于各种人类科学，那么仍然是孤立的：相反，不同领域中所得到的结论能够用作反馈，彼此相互丰富——只要研究者不把自己限制在单纯的观察和形而上学中。

沙夫如此重视人类个体问题，这一事实尤其和“在今天，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相关。沙夫相信，人类个体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是特别相关的，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说出的东西，而且因为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不打算说、于是就能否定其合法性的东西。某些哲学家甚至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者“真正的马克思”（即，相对早期马克思的晚期马克思）的名义，把这个问题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残余而抛开。人类个体这个概念及其相关论题（异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及其他此类论题）被用于区分“正统”和“修正主义”，并且针对诸如“异化”、“人类个体”、“人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等等概念先验地做出否定判断。

此处援引一个例子。如上所述，沙夫和舍武曾就杂志《人与社会》中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译文的翻译—解释展开论辩（1971-1972）。以极为模糊的方式来思考“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是肤浅的，尤其是在被当作修正主义证据，乃至把一个可以说更为模糊的“反人本主义”作为真正马克思主义标志提出来，以“保证”其科学性之时，尤其显得肤浅。

“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Marxist humanism）这个表达对于沙夫和舍武两人的方法都可以用到。实际上，两位哲学家都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科学的人本主义，并且都反对阿尔都塞的“反人本主义”。尽管如此，他们的观点则全然不同。他们在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解释方面有分歧，因此，尽管他们都用“人”和“人类个体”来捍卫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方面是有分歧的。

人类个体和诸如异化、社会主义人本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之类相关概念应该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进行研究，绝对不能低估，且不能在马克思主义自身范畴之外来思考。如沙夫所证明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个经受不断变革、讨论和调适的科学体系，而不是要求绝对忠诚或教条式接受的一套僵化原则。马克思主义并非一套一劳永逸的原则，没有任何被诘难的危险：相反，“危险”对于以科学为宗旨的体系而言是无比重要的。

马克思的一些早期著述，他对某些有关人类个体问题的研究工作，包括异化问题在内，常常被打上修正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标签。这导致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拒绝面对这些问题，并且接受“早期和晚期马克思”这种区别：前者被认为是一个空想家和人本主义者，后者被认为是一个科学家和反人本主义者。基于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作品指责马克思立场是“修正主义”，这是十分荒谬的，就像区分“意识形态”和“科学”一样。这反映了赋予“意识形态”、“人本主义”、“修正主义”和“科学”等词语以驱邪功能和神秘力量那种倾向。

“人本主义”这个词，考虑到传统上与之相关的所有不同意义，无疑是充满歧义的：一旦将其用于马克思主义，常常会产生修正主义的、思辨性的解释。然而，同样是事实的是：误解和意识形态错误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常常被按照通行的反人本主义观点来解释，而不是对其加以批判（参看 Petrilli 2004a, 2004b, 2007a）。

舍武表示，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人本主义问题，可以按照与“唯物主义”、“辩证法”、“哲学”和“社会主义”——即，所有那些被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相同的方式来处理。不管对唯物主义的前马克思主义（pre-Marxist）解释如何，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自己是唯物主义、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建立“高度发达的唯物主义”（highly-developed materialism），并对某种唯物主义类型做出批判。然而，批判并不意味着绝对拒绝唯物主义，就像列宁批判俄罗斯马赫主义者，批判“低级唯心主义”（low idealism）的理想主义的、主观主义的立场。尽管受到黑格尔唯心主义削弱，但“辩证法”这个术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延续并被赋予了新义。此外，马克思主义终结了传统哲学。但是，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本身视为一种哲学，而是相信哲学一劳永逸地被消除了，就是最坏的一种哲学；这种态度暗示的是，如恩格斯所说的，如“最坏哲学之最庸俗残余的奴隶”（slaves to the worst vulgar residues of the worst philosophies）一般行事。同理，仅仅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乌托邦形式的社会主义，便做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方面反社会主义这样的结论来，也是一种武断的做法。正如马克思主义把乌托邦社会主义改造成了科学社会主义，把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改造成了科学唯物主义，它也把思辨性人本主义改造成了科学人本主义。

如沙夫所观察到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性质（某些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在阿尔都塞之前，在 1947 年的波兰就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关系所发生的一场论辩中就是如此），就是强化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对立，把人本主义用作区分要素来分化无产阶级。我们现在理解了，为什么沙夫认为人类个体问题如此重要，为什么将它置于自己语言 and 知识理论的核心地位。在 1976 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声称：

忽视人类个体这一问题，会导致在理论层面削弱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层面扭曲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错误之中深深埋着的是斯大林主义的秘密。这就是为什么“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鼓吹者——在单个个体缺席的情况下——如此危险的原因。我指的不仅是那些把斯大林主义用于实践的人，而且指其理论家们，他们的种种政治苦心和理论错误都归结在马克思主义是反人本主义这个要点中了。如果情况如此，我们必须与之战斗。但它是个

纯粹的谎言：马克思主义是人本主义，而且，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心的，是以它所坦白的人本主义这一名义进行战斗。这是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直以来的坚定信仰，这也解释了我整个哲学著作中所选择的核心动机。（见 Ponzio 2002:74-75）

沙夫从 1947 年以来一直与有关人类个体和社会主义人本主义的话题打交道。他这个阶段的著述证实，存在主义对于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有影响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相反，这些著述见证了，即使在存在主义得到传播前，在波兰马克思主义者中也有人类学方面的话题存在。事实上，早在 1947 年我们就已经有过一场关于两种倾向的论辩，尽管看上去它们彼此对立，它们都预设了马克思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的分隔。以此假定作为基础，第一种倾向提出要“整合”马克思主义和人本主义；第二种倾向则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人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与这两种主要倾向相比，沙夫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时代的人本主义。实际上，与其他形式的人本主义不同，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展示了通往不平等和剥削关系激进变革的道路。

## 六、人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从 1947 年的论文开始，沙夫就用后来用在《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74）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这个问题进行阐述。这部著作处理的是同一个问题，只不过时间已经过去了 27 年。沙夫批判了阿尔都塞的反人本主义，揭示出如果不在历史和社会语境中明确“人本主义”（以及“反人本主义”）的涵义，将会如何误导对一系列术语的理解，诸如“自由”、“民主”、“正义”、“平等”和“贫穷”等词语，只有和特定历史及社会条件关联才能恰当地表意，而“人本主义”是又一个唯有加以历史—社会明确界定，方能避免道德方面的言外之意的表述方式。如果说少了什么的话，那么只有从以社会变化和资本主义系统改造为核心的事业这个观点看，才会让这个词变得不知所云。为了消除歧义，消除用来维系主导秩序和传播反共产主义宣传的陈腐话语，对“人本主义”这个术语的历史描述是必须的。在其 1947 年的论文中，沙夫写到：“人本主义并不独立地存在，正如不存在自足自利的人一样。只有具体的人存在于世，他是特定时代中的人，生活在特定国家的人，属于特定社会阶级的人，代表着特定的传统和特定的个人理想。”



在《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一书中<sup>①</sup>，在对阿尔都塞的批判中，沙夫坚持认为，之所以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原因之一是“人本主义”这个术语的歧义性。阿尔都塞使用这个术语时，将其视为单义词，因此不需要做什么界定。然而沙夫表示，真正的谬误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之间。沙夫坚持认为，反人本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反人本主义是一种神秘化的做法：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人本主义”意味着对人的本质的一种唯心的、思辨性的看法，但是，他的“反人本主义”并未对作为具有历史作用的人类个体之间关系的生产关系进行理论阐述。同时，他还是似是而非地把这个观点归结到马克思那里（与早期马克思相对的晚期马克思）。

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异化》（*Enfremdung als soziales Phänomen*）中，沙夫（1977）详细分析了诸如异化、拜物教、革命、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概念。他研究了和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以及人类个体相关的诸多问题，关注核心集中在两个主要方面：a) 对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密切相关的“历史规定”（historical specification）；b) 对语言学加以分析的诉求，这重诉求是重中之重，而不只是在专门探讨语言问题的时候才需要它（实际上，沙夫的书充满了“语义方面的偏差”[semantic digressions]）。

最有趣的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异化》的最后一章（该章是专门为此书的意大利语版所写），这一章讨论到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共产党所采用的研究社会主义的特别方法。沙夫拒绝承认暴力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他坚持认为，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概念是一件事，如何实现它则是另外一件事。

“社会革命”（social revolution）这一表述，意味着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种质的变革，通过或暴力、或和平的改革方式来完成。如何改革，不能基于抽象理论来选择，而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固定的公式，即使某些学者信服的是反面，翻检马克思主义经典以寻求一种推翻资本主义体系的方法。实际上，随着条件变化，可能性也会变化，并以不同方式展现自身，无论是司法的、宪法的方式还是通过贸易联盟等方式。

让马克思主义裹足不前，会背叛它最本质的一项特征——“历史规定”。诉诸于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也不意味着通过使工人阶级获取权力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维系和再造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对其革命和变革，为了如此目的而引入的改革是适合“改良主义”这个词的。以和平方式通向社会主义（特别是针对西欧共产党，在历史条件允许的

---

<sup>①</sup>书名应为《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系原作者笔误。——译者注。

时候)并不意味着“背叛马克思主义”,但的确意味着拒绝“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即,与社会实践和具体历史语境辩证关系相隔绝的马克思主义。

二十世纪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初期,存在主义(尤其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曾深刻影响到某些波兰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这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crisis of Stalinism)以及波兰和匈牙利的十月事件有关。在那段时期,沙夫发现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深刻的“不可兼容性”(incompatibility)。历史唯物主义按照社会条件来解释人类行为,把人类描述成社会关系的产物(详见马克思论费尔巴哈论纲的第 4 条)。相反,存在主义则把社会现象解释成个体自由的结果,而个体自由则是一个绝对的、自然的、非历史的事实。在对存在主义的批判中,沙夫强调语义定义的重要性,指责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Sartre 1960)中所用的概念和论辩含糊不清。

不过,同样的思考使得沙夫把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加以并置,他不仅发动论辩,指责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如莱斯切克[Leszek]、柯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等人)接受了存在主义的人类个体观,他的思考还促使自己去驳斥以过于简单化的方式批判存在主义的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后者实际上是简单地以指责存在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修正主义”和“唯心主义”来结束论辩,他指出这种批判罕有用处,只是把存在主义所探讨的问题和其用以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混为一谈。

沙夫所支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存在主义进路,但对于和人类个体相关的同样一些问题有着共同的兴趣。尽管这些问题大都为马克思主义所忽略,但它们在理论层面上根本就不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相反,它们实际上与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范畴属于同一范畴,甚至使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分析变得更为重要。某些批评家肤浅地混淆了对存在主义的一种公开的、建设性的批判与一种存在主义式马克思主义。沙夫 1961 年著作的德语标题“马克思还是萨特”(Marx oder Sartre),实际上表明了他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关联关系(Schaff 1961b)。

在《马克思主义与人的个体》(*Marksizm a jednostka ludzka*, 1965)这部完整的政治和哲学研究著作中,人被作为直接分析对象。“贡献”(Beitrag)(波兰《哲学研究》[*Studia Filoficzne*]杂志所组织的一次辩论中一个单元的名字)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的个体》作为其出发点,在论辩中,沙夫宣称,人类学话题不应该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被忽视。把人类个体在理论层面上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焦点,这一重要性是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首先,反马克思主义利用了马克思主义忽略这些问题这一事实,因而坚持认为个体和社会是相互关联的,并把关注重点放在诸如自由、个人幸福等等话题上;其次,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尤其明显——

除非我们对之视而不见或者持有糟糕的信念。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异化都是一个重大论题。承认异化的存在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是无比重要的。然而，一些学者发现了一组矛盾：一方面努力消除异化，一方面却同时宣称既然异化以不同形式出现，异化无法永久性地被消除。在《新方法》（*Nowe Drogi*）所组织的有关沙夫《马克思主义与人的个体》一书的论辩中，沙夫坚持认为，这一矛盾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解释。他在异化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真理理论之间所做的比较，尤为令人信服（参看 Ponzio 1981, 1984）。尽管认知过程永无止境，但它无法排除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它也无法阻止我们去追求真理。同样地，与异化无休止的斗争并不排斥通过改造既定社会关系来征服异化的可能性，“斗争是无休止的”这一事实也不能被用作让事物发展停滞不前的借口。

在《马克思主义与人的个体》中，沙夫分析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异化现象的不同方面。他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异化》中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更为仔细，尤其是在名为“社会主义与异化”以及“关于革命的异化”（该章系专为意大利语版所写）的章节中。我们可以问问那些关注社会主义中异化问题的人这个暗藏机锋的问题：是谁从这种关注中受益？在（前已提及的）《新方法》所组织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的论辩中，这个问题就曾被提出。沙夫回答说，证实和分析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以及不同形式的异化，最终是为了支持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维护反对共产主义的那些宣传。这意味着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能力，以便有能力应对通常被反共产主义宣传所垄断的那些问题，同时也间接地，意味着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和塑造如此社会中的人做出贡献。

尽管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用“不科学”（non-scientific）和“非马克思主义”（non-Marxist）的标签“驱离”（exorcising）异化这个问题，但“异化”对于某些社会现象而言是个合适的标签，这些社会现象的解决是通过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来尝试做出的。马克思主义关系到针对不同历史形式社会异化的斗争，这些不同形式使得个体不会变成自身历史的有意识的倡导者。按照沙夫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是激进的、积极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也就是说，打下历史社会现实烙印的人本主义，在此之中，人性的历史是人。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被特定国家所特有的生产关系历史地规定了的人类个体，因此反对用“人的本质”（human essence）、“人类天性”（human nature）这些抽象术语来解释异化。

## 七、语言与现实

语言与现实的关系这个问题，既与知识理论、又与对人类个体的认识密切相关。语言创造了我们的现实形象吗？或者，语言反映和复制了现实吗？语言在认知过程中起着积极的、创造的作用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意味着在认知理论的三种如下基本模式中选择一个立场：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后二者用反映论来看待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三者都涉及认知过程中的主体，并因而涉及与人类个体相关的诸问题。

主观的——唯心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辩证的模式彼此不同，在于它们对积极作用的解释，与机械唯物主义不同，二者都认为是主体、并由此认为是语言在认知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按照沙夫的看法，与幼稚唯物主义不同，唯物主义的——辩证的理论承认语言理论的优先性，这些语言理论强调语言在认知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即使是从唯心主义的观点而论的），强调语言和“世界观”（Weltanschauung）、语言和“现实形象”（image of reality）的关联（想想洪堡特[Humboldt]、萨丕尔[Sapir]和沃尔夫[Whorf]吧）。但是，从马克思主义阐释的观点看，人类应该被看作社会关系的结果，语言应该被看作社会实践的产物。这一阐释承认认知主体的积极作用，认知主体被描述成社会影响和认知过程的结果——而且是一种复杂的结果——而不是起点。根据这种方法，主体可以被看作来自认知过程的一种建构。“反映”（reflection）这个概念和“人的个体”概念是密切相关的，对此类概念的解释标志着与认知理论相关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在《语言与认知》（*Jezy a poznanie*）中，沙夫（1964）宣称，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反映理论的解释，是与对人类个体概念的解释相关的。

如果我们承认，语言和思想相互作用，意义和概念不可分割，那么，语言理论和知识理论之间便明显具有关联。在《语言哲学论文集》（*Szkice z filozofii jezyka*）中，沙夫回顾了列宁的“辩证法”（On Dialectics），这篇文章从语言史方面描绘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他主张：

.....在遵循唯物主义方式对认知过程进行分析时，思想和人类意识都被认为是语言性的思想，由语言所形成的思想（马克思认为语言既是我本人的意识，也是他人的意识），显然，对认知过程的分析，也是对语言过程的分析，没有它，思想根本就不可能存在（Schaff 1967）

思想与语言的统一彰显了语言在反映现实和个体思想的社会特质——即其作为社会产物的地位——之中的积极作用。

在符号学、或语义学中，在总体性上、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符号时，不能把知识理论抛在一旁。譬如，从符号学的观点把指称物与物质对象看作彼此不相干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把符号学和知识理论分割开来，也不意味着主张符号学对知识理论而言是中性的，就像某些作者所以为的那样。相反，这意味着采用一种与知识理论相关的特定立场，考虑到就物质现实而言坚持符码和信息的自主性质，可以将其描述成一种传统的唯心立场。

无论我们何时问出下列问题：“什么是意义？”“意义与符号载体之间是什么关系？”“意义和对象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说意义存在之时指的是何种存在？”诸如此类，都涉及语义学和知识理论。

任何情况下，既然与语言相关，那么知识理论所处理的所有问题都指向语义学。这并不意味着知识理论被排斥在语义分析之外，也不意味着像语义哲学（Semantic Philosophy）所主张的那样，语言应该成为单一的哲学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清晰地证明了语义学和知识理论之间的潜在联系，同时摒弃具有传统的和唯心的相对主义方法典型性的任何形式的图示。某些哲学潮流，如卡西尔的新康德主义、新实证主义、罗素的逻辑原子论、和维特根斯坦后期著作相关的牛津学派语言哲学、华沙学派的语义分析等等，它们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们主张并揭示：语言不仅是工具，而且是哲学研究的对象。

知识理论并不是要求得到语言研究支持的唯一理论。有关人类个体的哲学处理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功用，处理传统伦理学的问题（并不意味着道德主义），必定不可避免地认为个体行为主要是通过语言影响而被社会所决定的（Ponzio and Petrilli 2003）。这使得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与语言有关的问题：语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概念与话语套路，语言与社会实践。要充分理解诸如“选择”、“责任”和“个体自由”等等概念，还必须把“语词保证”（tyranny of words）和“语言异化”（linguistic alienation）问题考虑在内。我们还要思考，唯心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方法错误地把矛盾和个体异化归结到纯粹的语义源头，而其他方法，与青年黑格尔派类似，坚持认为通过简单地划分语词的意义、用正确观念取代错误观念，人类就能“得到解放”。

## 八、形式的矛盾与辩证的矛盾

如沙夫所揭示的，要正确理解“矛盾”（见 Petrilli 的概念，2004b），区分形式逻辑中的矛盾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矛盾便十分重要，这与知识理论和语言分析有关。所以，沙夫表示，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观点为根据，“矛盾”一词分别有两个不同的意义；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不排斥非矛盾的逻辑原则。从形式逻辑的观点看，“矛盾”这个

术语表示的是两个句子之间、或话语（utterance）之间的关系，其中之一认为某物与某个对象在特定时刻处在某种特定关系中，而另一个则否认这一点。相反，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看，“矛盾”意味着“对立统一”（unity of antithesis），即，对立倾向、两个方面和力量的统一，而辩证法被视为每个现象的构成性要素。

马克思主张，在某个发展水平上，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与现有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矛盾”这个概念涉及到的并非（像在形式逻辑中那样）积极和消极判断之间的关系，而是关乎对立而又互补的倾向，这些倾向构成了某个系统的统一，同时又是该系统发生变革的动力。这种情形下，“矛盾”这个词汇（不管会产生什么误解来）在被理解为对非矛盾逻辑原则的客观驳斥时，是以一种合乎其使用的方式来表达意义的。在这一特定情形中，“矛盾”一词强调的是以不满足和不协调为特征的对立，从而对社会机制的功用实施干预，直到使之崩溃。

在分析辩证法和非矛盾原则之间的关系时，沙夫表示，基于运动概念来驳斥非矛盾逻辑原则，是没有道理的。恩格斯本人就曾落入这个陷阱。按照普列汉诺夫的看法，我们必须面对下面这个两难困境：要么我们承认形式逻辑基本规律的存在而否定运动，要么，反过来，我们承认运动的存在而否定这些规律。沙夫看到，这是一个虚假的困境。它来自于把运动解释成对非矛盾逻辑原则的客观驳斥，解释成既是又不是处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某种东西。马克思主义经典从黑格尔那里引出了这个解释，但这个解释其实来自古代埃利亚学派哲学家：“埃利亚派主张矛盾原则，并由此否认运动的客观性。相反，黑格尔采取运动观，由此反对矛盾原则在对运动的描述中的有效性”（Schaff 1975b: 26）。

黑格尔的运动式解释（既是又不是处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某种东西）以及当时的数学发展水平，尤其是微分学，牛顿和莱布尼兹的极微实体（一个相当于但又不同于零的量），增强了埃利亚—黑格尔关于运动的原则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

今天，我们对马克思的数学兴趣有所了解，知道他的数学手稿对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之间关系的思考带来了新的启迪。由于马克思《数学手稿》（*Mathematical Manuscripts*, 1968）的出版，我们现在熟悉了马克思对牛顿和莱布尼兹的“神秘的”微分、对达朗贝尔（D'Alembert）和欧拉（Euler）的理性主义方法以及对拉格朗日（Lagrange）纯代数方法的批判性分析。在对牛顿和莱布尼兹微分的批判中，马克思突出了他们理论中、以及运演过程中的形而上学观念，而这些观念与数学规律相矛盾。尽管利用了拉格朗日的研究成果，但通过这样的批判，马克思达到了诸如柯西（Cauchy）和维尔斯特拉斯（Weierstrass）等 19 世纪数学家所达到的高度，他凭借一己之力，实现了从较简单到更深奥的、科学的微积分水准过渡。无疑，沙夫的思考适合于恩格斯，却不适合于马克思。在《反杜林论》（*Anti-Duhring*,

1962 [1878]) 中, 从沙夫对不同关系的界定来看, 恩格斯似乎接受了马克思所界定的“神秘的”微分知识。马克思认为, 微分是神秘的, 它使用例外规律 (exceptional laws), 以代数上不准确的过程作为基础来取得准确的结果: 它把对立的特性赋予所用术语, 诉诸于缺乏数学严谨性的手段, 即“戏法” (conjuring tricks)。相反,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微积分必须用严格的数学方式来处理, 而且, 从这一观点看, 他关注拉格朗日是为了把微积分建立在纯粹的代数基础之上。如果微分中使用到了并非建立在验证基础上的手段, 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是非辩证的, 如恩格斯似乎认为的那样: 恩格斯坚持认为, 当代数学家之所以不能理解莱布尼兹的微分, 是因为不可能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理解微积分原则。相反, 这是由于这一事实: 微分是以形而上学的、非辩证的定义作为基础的。

### 九、从符号学观点看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就沙夫对结构主义概念的研究方法着眼, 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看作既是未亮明身份的符号学 (crypto-semiotic), 也是“元结构主义” (protostructuralist) 性质的 (Ponzio 1984, 1989)。

谈到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必讨论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 (路易·阿尔都塞, 卢西安·戈德里 [Lucien Godelier]——列维-施特劳斯的追随者卢西安·塞巴格 [Lucien Sebag] 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是又一个话题), 我们来直接谈论马克思, 因为他的方法具有典型的符号学性质, 或者更恰当地说, 是未亮明身份的符号学。

对交流活动的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中具有首屈一指的地位。马克思把商品当作信息来分析, 并且特别关注对“商品语言” (language of commodities) 和“商品的秘密” (commodity's arcanum) 做出解释 (Marx, *Capital*, I)。遵循这一路径, 他的政治经济批判克服了看待事物的拜物教观, 按照后者的看法, 商品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事物之间的自然关系, 而不是如其真实所是的, 是一种特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看来, 马克思的批判实际上是一种符号学的分析, 它不仅是在交换层面, 而且是在生产层面, 对被描述成信息的货物的结构进行研究。商品成为商品, 并不是在产品被生产同时其使用价值中被消费之时, 而是在它被生产和作为交换价值——即, 作为信息——被消费之时。所有这一切使得经济学成了符号学的一个分支。

市场的结构是作为人类关系的一种结构出现的——确切地说, 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从这个观点看, 马克思主义结构研究方法可以作为符号学的典范。它表明马克思在其商品和资本分析中所获得的成果, 必然也能在人类符号学中获得: 必须指明的是, 这里所说的是人

的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不单单是事物之间和沦为物品地步的个体之间的关系。

反之亦然，符号学方法允许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中适当使用结构和上层建筑的概念。结构和上层建筑研究中反复出现的困难，是由缺乏一种居间要素造成的。这个居间要素由符号系统的整体性提供，具有语词的和非语词的性质，在所有人类社会中都起作用。游戏中的棋子不是两个，而是三个：在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表述之外，必须加上符号系统。

从符号学的观点看，非语词交流活动（即商品流通）的结构，以及语词交流活动（即信息流通）的结构，似乎是同一社会过程（即交流过程）的不同结构。这意味着所有文化现象都可以被看作基于符号结构和系统的交流现象，人类非语词交流活动必须与语词交流活动等量齐观。所以，普遍性社会理论是普通符号学的组成部分（参看 Ponzio and Petrilli 2000a）。

当我们考虑到，无论是关于语词的还是非语词的信息问题，符号学所处理的是同样的那些问题——产生它们并使得交换和交流变得可能的工作是什么，这一点就变得更加清楚了。譬如，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1958）把语言范畴用于他关于婚姻和亲属系统规则的研究，在运用相关语词交流和非语词交流加以表述的概念性框架方面，提供了一个极为让人惊讶的例子。

不过，列维-施特劳斯的论证，在他以“对人性的反复礼赞”（*recurrent hymns to the esprit humain*）的名义，合理地把语言专有的范畴用于他关于非语词交流活动的研究之时，仍然是值得质疑的。这意味着与普遍的无意识活动和普遍的人性结构有关。

沙夫批判了本体论结构这一概念：相反，他相信，结构主义与解释性方法有关，与人类理解不可分割（参看 Petrilli 2005）。任何宣称具有科学性的方法都会把世界、现实描述成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革之中，并在将事物这种状态考虑在内的情况下构想出自己的假设和规律。但是，之所以能够构想出规律，是因为运动和变革呈现出恒定的东西、平衡的状态、系统和本质方面，这些也是“现实”和“世界”的组成部分。

现象之中的和现实的（属于有机或无机性质，处于在文化中的）各要素之中的平衡或者稳定，以及相对独立和隔绝的要素系统，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成为知识的潜在对象。这意味着，不仅我们需要明确支配运动动力机制的规律和现实中的发展，而且需要明确相对均衡状态下相对孤立系统的结构规律。我们需要研究动力机制的结构和结构的动力机制。不仅要建立关于两种规律的研究的基础，而且要求这种互补研究有助于关于现实的总体观。如果我们要研究事物发展的（生成、因果）规律，我们必须确立该“事物”究竟是什么；所以，必须知道关于其结构（共存的、形态方面的结构）的规律。这种有关结构的渐进性知识，与关于所研究对象生成和发展的知识一样，是必不可少的。



正因如此，关于共同存在、形态方面规律的知识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知识之一：它可以回溯到当人类学会区别此植物与彼植物、此动物与彼动物的时候，也就是说，可以回溯到当我们学会辨识符号和在分辨各种实体中共同存在而又相互区分的特征这种能力、并借此来表述现实的时候。在这一意义上，作为“符号动物”（semiotic animal）的人类，如沙夫（1976年与庞齐奥的谈话中，载 Ponzio 2002）所说，也是“结构主义动物”（structuralist animal）（关于“符号动物”这一概念，参看 Deely, Petrilli, and Ponzio 2005）。结构主义不仅是符号学家中的一种思潮，而且是赋予人以人的性质那种东西。

沙夫批判本体论的结构主义，证实结构与历史之间、共时性与历时性之间有着互补关系，并达成人是“结构主义动物”这一结论：

要理解共时性方法和历时性方法是互补的，听听这个简单的理由就够了。关于对象结构的知识，由于（结构方面的）共同存在规律的发现，使得成功从事关于事物生成的研究变得可能，反之亦然——关于系统开创和历史的知识，使得在结构研究中取得进步变得可能（Schaff 1974: 30）。

## 十、语言拜物教，意识形态与话语套路

按照沙夫的观点，语言理论必须建立在对人性和人际关系的解释基础上，不存在相对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科学方法的任何自然主义倾向。从马克思的观点看，社会关系以生产关系为特征：它们代表了一种特别的生产形式，是历史的、非自然的关系。

为了摆脱“符号拜物教”（sign fetishism），如沙夫在论及马克思主义“货物拜物教”（fetishism of goods）概念时所说的那样，符号和符号类型必定与人类个体和社会关系相关。批判对符号间关系的具象化认识，批判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必须把社会交流过程当作分析的起点，把符号关系视为在特定社会条件中使用和生产符号的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所有分析都应该从“个体的社会条件”开始，从作为社会产品的个体开始。这种方法避免了把交流看作主体间一系列关系、而这些主体在起源上便彼此分隔和抽象的观点，由此去除了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对交流活动的解释。

这种方法在语言分析中至关重要。实际上，语言分析在研究人类个体的历史社会结构方面特别有用，因为个体内在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在塑型过程中，尤其要通过语言才变得可能。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它构成了思维和意识的社会背景。语言是一种社会产品，也是一种生成性现象，它对人类实践起着重要作用。这种方法指向认知过程和实践行动层面的主体“积

极作用”(active role)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和辩证的特征。个体能够作用于先于他而存在、并从一开始就通过语言(也是社会产物)对他进行限制的历史社会境遇。语言不仅是表达意义的工具,而且是形成意义的材料,没有语言,意义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所谓“主观性”并不意味着抽象的个体或绝对的自主,而应该是具体的、受制约的个体,即,被当作具有社会功能的社会产品的个体:“主观性具有客观的、社会—历史的特质”。

与语言分析和知识社会学相关联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为展现思维的社会性质,并由此展现其社会和意识形态性质做出了贡献。概念和意义是同一现象的两面:这个现象就是思维—语言。意义并不在自然语言之外存在,也不独立于语言符号而存在。但是,语词符号不仅和概念相关,而且和被沙夫称为话语套路(stereotype)的东西有关。语词符号涉及到信念、业已确立的观点、群体和阶级利益,如此等等。话语套路是对与特定语言符号相关的现实的特定反映;但是,因为它涉及到情感、意愿、评价等要素,因此它不仅在认知过程中,而且在实践中,扮演着特别的角色。话语套路不仅是一个逻辑思维范畴,而且是一个语用学范畴。从语言那里,我们接受了作为历史进程之中某个特定社会产物的概念;同样地,我们接受了携带特定倾向、行为模式和反应的话语套路。这里的暗含意义是,语言或多或少地始终具有意识形态性,因为它是与社会实践相关联的。

根据沙夫的看法,话语套路的特点表现为以情感、意愿和评价要素形式出现的、高度的“主观因素侵扰”(intrusion of the subjective factor)。然而,这种“主观因素”是社会的,而非本性中的个体的,它与社会群体(社会阶级、说同一语言的种族群体,等等)的利益相关。从这些方式来看,“主观因素”出现在对现实的任何反映形式中,不下于出现在科学知识中。如沙夫在《语言哲学论文集》中所说,科学与意识形态是彼此密切相关的<sup>①</sup>,不管学问们如何想要分离它们,而且,它们在形成上就是如此,因为产生和促进语言发展的社会实践,是关于世界相对客观的知识和评价的共同基础(Schaff 1967; 1969: 127)。

沙夫坚持认为,话语套路并不等于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无法脱离话语套路而存在。和意识形态有关的问题还应该按照人类知识的“主观因素”来考察——其中,从知识社会学的观点看,主体被看作社会的而非个体的产物,或者更确切地说,被看作被社会生产和制约的个体。如沙夫所说,知识社会学源自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从结构和上层建筑理论而来,并与认识论和知识理论有关。

为了避免歧义和误解,沙夫对意识形态概念做了三组区分:a)生成方面的定义,它考察的是意识形态发展的条件;b)结构方面的定义,它界定意识形态的特别属性,并且从逻

---

<sup>①</sup>沙夫对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探讨,是其批判阿尔都塞“断裂论”的基础之一。——译者注。

辑的观点，区分意识形态话语结构与科学话语结构之间的差别；c) 功能方面的定义，它强调意识形态在与社会、群体和阶级利益等方面的关系中如何施展其功能。此外，沙夫还区分了意识形态的定义问题、以及与客观真理相关的意识形态价值问题。尽管彼此相关，但这些问题毕竟不同，不应该被混淆：意识形态的定义是一件事，它与客观知识问题相关关系中的价值是另一件事。

所以，“意识形态是虚假的意识”这句话，尽管表面上看是个定义，事实上却并非一个定义，而是对意识形态价值问题的回答。曼海姆（Mannheim）在其意识形态理论中，以及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所犯的主要错误，在于误将“意识形态是虚假的意识”当成了意识形态的定义。

沙夫坚持认为，必须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赋予“意识形态”这个词的意义，与其在（尤其是列宁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意义。诸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科学”这样的表达，屡见不鲜，它们在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个基础上表现意识形态的特征。沙夫给出了一个功能性的意识形态定义：与社会发展目标相关、并建立于价值系统之上的信念体系；这些信念指向不同客观条件中的特定态度和行为模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一个狭窄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的，即，指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阶级的意识形态旨在维护一个含有多个阶级的社会。因此，对那些可能暴露出当下生产关系结构中需要变革的矛盾之处，意识形态竭力将其掩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相比于客观的意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点是其虚假属性。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是从狭义上理解的意识形态，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不是指“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科学的意识形态”等等广义上的意识形态。曼海姆说，如果意识形态一般是虚假的意识，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是虚假的，其实是犯了把狭义的意识形态和广义的意识形态相互等同的错误。（参看 Schaff, 1970）

现在，我们把迄今所观察到的东西总结为以下几点：1) “意识形态是虚假的意识”这句话并不是定义；2) 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指对社会阶级进行再生产的、和社会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3) 诸如“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些表达会反复出现。按照沙夫的看法，这些要点表明，一方面，需要对意识形态这个词进行定义，并解释其不同意义；另一方面，要以适合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方式进行定义。在这一意义上，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成特定阶级利益影响下所形成的那些观念（生成方面的定义）；或者对捍卫特定阶级有用的那些观念（功能方面的定义）。关联其生成和功能来思考意识形态，有助于更为妥当地处理那些与现实的客观科学知识有关的意识形态价值问题。

因此，按照沙夫的看法，这个问题不能在一种“语言—结构”的定义基础上来处理。意识形态话语并没有一种将它与科学话语区分开来的特定结构。认为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在于其主张的结构之中，是错误的。按照这样一种观点，意识形态话语会主要存在于种种价值方面和规范方面的主张之中。但是，沙夫严厉批判了新实证主义对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以将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相互隔离的形式，也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中。

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并不存在于这个事实中：“主观因素”（社会的而非个人的）在科学中在场，而在意识形态中缺场。应该说，它存在于既在科学中，又在意识形态中的“主观因素”所起到的不同作用中。

科学分析和知识社会学为摧毁科学主张的“纯粹客观性”这一神话做出了重大贡献。科学与意识形态都受社会制约，在这个意义上，二者都是主观的（至少是因为没有人类思维，语言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时，语言把主观要素引入到每一种人类知识形式中）。所以，按照沙夫的看法，不应当采取将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的观点，而应采取另一种观点，不仅科学主张和意识形态彼此关联，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是同一的，以至于可以使用“意识形态科学”和“科学意识形态”的说法。沙夫还指出，承认因为社会和历史制约，因此任何话语都或多或少是意识形态的，并不意味着所有意识形态都是被歪曲的，都要被放在同一层面上。必须区分真正的意识形态和作为歪曲现实的意识形态，区分科学意识形态和各种虚假意识。这种区分是由意识形态不同的生成过程和不同的功能所决定的。

## 十一、对乔姆斯基语言理论的批判

语言科学在理解语言的社会—历史性质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只有通过历史—辩证唯物论框架中反思人类个体，才能够一方面让自身摆脱生物主义的、天性论的、规约的偏见，另一方面，让自身摆脱相关的机械的、唯心主义的认识。因此，语言既不完全是自然的，也不是完全非自然的和规约性的。和任何人类现象一样，语言也是社会—历史的，也就是说，它是被历史所决定的种种需要的结果，在需要和满足那些需要之间起着沟通作用。

对语言的天性的和生物主义式的解释，如乔姆斯基（Chomsky）和伦尼伯格所做出的那样，只有在把人类贬低为纯粹的自然进化产物，仿佛生物历史不受社会历史影响一般时，才能得到认可。从这个观点看，人类被视为“一般性的人”（the human being in general），被视为抽象的人，而不是历史和社会的具体的人，不是以诸如社会系统、劳动分工、阶级和生产力水平作为基础的一种为历史所规定的存在（参看 Ponzio 1974c; Ponzio and Petrilli 2008）。

此外，许多作者同意，语言内部固有的东西仅仅是一种学会如何说话的能力（取决于大脑、发音器官等遗传结构），而语言具体的实现则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这种解释尽管正确，但并不完善，因为它并未从根本上清除对语言的生物学解释的危险：譬如，在伦尼伯格的著述中，社会关系和同一物种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是被放在同一水平上的，它们被认为与动物王国中普遍存在的关系是一样的。

从一开始，马克思对个体的认识，就对关于人类行为的自然主义的、天性论的、生物学的解释做出批判。在参考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情况下，沙夫揭示了为什么自然主义（*naturalism*）是唯物主义，尽管它是以一种有限形式出现的唯物主义。人类被贬低到生物样本的地位，人类关系仅仅被视为同一物种的个体之间的关系。人类肯定是生物的，是智人（*homo sapiens*）物种的样本，但是，在其作为人的特定现实中，他是历史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的产物。把人类描述成生物样本并没有抓住其本质特征，因为人类不仅是由生物条件决定的，也是由社会条件决定的。从根本上说，人类是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存在。所谓“自然”属性，是社会和历史条件下进化发展的结果。

对人类做简化的生物学解释，是在分子生物学的基础上得出的（尤其是在关于基因符号的研究中），无法得到科学的证明。尽管如此，他们仍宣称要对内在的社会—人类学现象进行解释，就像对语言那样（它与物质性事物一道，构成了人类和文化世界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分子生物学的成果解释了乔姆斯基本人为什么相信天性观念、以及伦尼伯格将这些观念转化为生物学术语的原因。

在《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沙夫（1974）分析了乔姆斯基对语言的认识，探讨了接收或摒弃天性和普遍语法结构存在的可能性。沙夫为关于新形式的天性论所发起的论辩做出了贡献，他认识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哲学家还是语言学家，都无法解决，而只能把它交给自然科学专家，尤其是分子生物学专家。按照沙夫的观点，既然科学研究在其当前状况无法提供一个合理的答案，那么，天性的或非天性的观点便无法得到科学的证明。沙夫本人并不打算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以正确的方式对其做出描述；他要做的，是揭开相关各方所提出的语焉不详的假说和论辩逻辑。

在对转换生成语法的分析中，沙夫举证了这种理论与所谓“笛卡尔式语言学”（*Cartesian Linguistics*，即从笛卡尔到洪堡特的哲学传统）的关系，及其与当代数学逻辑，尤其是语言的逻辑分析的关联关系（特别提到维也纳学术界和利沃夫—华沙学派）。按照这种观点，转换生成语法的两个重要先行者卡尔纳普（*Carnap*）和艾杜凯维（*Ajdukiewicz*）。卡尔纳普的《语言的逻辑句法》（*Logische Syntax der Sprache*, 1968[1934]）、以及艾杜凯维 1930 年发

表在《实现》（*Erkenntnis*）上的文章提供了有关对转换生成语法的“观念衍伸”（*filiation of ideas*）的理解。语言理论的规则（意义和句法的规则）在传统结构主义中（如乔姆斯基所指出的）是缺失的，但对于生成语法的认识工具而言却是最根本的，在这些规则的发展过程中，以艾杜凯维为主要代表的新实证主义所做的贡献堪称最多。因此，转换语法的语义构成要素（其他构成要素是句法方面的和音系方面的）赋予深层结构以语义意义，并通过与艾杜凯维的意义规则相同的方式起作用。

生成语法理论旨在成为一种对语言创造性也能做出解释的普遍性模式。换言之，它把自身表现成一种能够在无限要素和有限语言经验的基础上生成和理解无数句子的模式。所以，指向语言行为和语言工具的内在结构这个概念，对于生成语法而言是根本性的。在这一要点上，语法和深层结构的普遍性必须得到坚持。按照沙夫的看法，“语言普遍要素”（*linguistic universals*）这个要点对生成语法十分重要，一如“语言差异要素”（*linguistic differentials*）这个要点对萨丕尔和沃尔夫所认识的语言相对性理论十分重要一样。

内在的、普遍的结构构成了乔姆斯基生成语法中最初的公理，后来以假说—演绎模式出现。这条公理不仅有着一个有待证实的论点——即，假说——的价值，而且看上去像是一个已经得到验证的、基于事实的论点，然而情况并非如此。

按照沙夫的看法，乔姆斯基对内在结构的认识——在他 1957 年对斯金纳（*Skinner*）《语言行为》（*Verbal Behavior*）一书的评论中只是作为一个假设提出，一个审慎提出的假说——在其后期著述中表现得愈加显著。这在论文《内在观念理论的新贡献》（*Recent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innate ideas, 1967*）这篇文章和著作《语言与思维》（*Language and Mind, 1968*）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沙夫想强调的是，这种发展并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与某种哲学传统密切相关。实际上，乔姆斯基把生成语法当成了对回归理性主义和“笛卡尔式语言学”的回归。

沙夫对语言天性论的一个主要批判对象，是乔姆斯基、卡茨（*Katz*）、伦尼伯格等人宣称他们的论点具有经过实践验证的性质这一说法，而事实上，自然科学（尤其是分子生物学，这应该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最终源头）却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无法在经验层面得到解决，对此，沙夫借鉴了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çois Jacob*）和雅克·莫诺（*Jaques Monod*）这两位现代生物学中最重要代表人物的成果，通过对它们的分析，从而做出了相应阐述。

雅各布观察到，动物神经系统越发达，其遗传性就越活跃。参照基因符码，可以区分出固定成分和开放成分，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可以在个体发育过程中对一个个体和另一个

个体做出区分，雅各布认为，语言由遗传决定，但同时，也关系到第二种开放成分。换言之，学会任何一种语言的能力是一种可能性，一种潜在能力。这与像乔姆斯基那样，认为每个人都赋予了内在生成语法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此外，雅各布相信，人类行为的特点体现为基因符码上的僵化限制的缺失，因此在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象征系统能够作为过滤器来沟通和行动。文化被看作与生物遗传重叠的第二个基因系统；所以，人类世界——历史和社会现实——不能单独用生物学的方式来解释。雅各布对内在结构的概念并没有给出清晰解释，但他的确同意，科学还没有做好给出答案的准备。相反，雅克·莫诺同意乔姆斯基的看法。不过，沙夫指出，莫诺并没有科学证据来支撑这种看法，其观点更像是一个假说，而非一种科学理论。

如果，一方面，内在观念这种看法是合理的，不应由于上述见解而被抛弃，那么，另一方面，它无法获得科学地位，因为它尚未获得经验层面的证实。所以，按照沙夫的看法，既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任何关于乔姆斯基天性论的评价都应该被限制在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上，限制在用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标准上。沙夫认为，内在语言结构这个假说无法被接受，仅仅是因为找不到某种能够反驳和颠覆它的科学理论。此外，萨丕尔和沃尔夫提出了一个相反的假说，即，“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sm），却从来没有在经验层次上被驳倒。要确认乔姆斯基的论点，不仅必须证明内在学习机制的存在，而且要证明这种机制的普遍性，换言之，语言结构同样存在于整个智人物种之中。

乔姆斯基语言理论最弱的一个方面是，尽管一方面坚持天性论、语言科学、尤其是社会语言学和人种语言学，却在另一方面证实了语言的历史和社会性质。语言不应被当作自然性的或者非自然性的，而应该被归纳为一种社会和历史现象。乔姆斯基和伦尼伯格无法否认，学会和使用语言会受到社会的影响，但是他们把社会关系贬低为同一物种的个体之间关系。社会环境应被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加以审视，而自然环境必然与具有独特属性的物种的发展息息相关。按照这种看法，社会因素无非是从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人所说出的句子注入而成的。它启动了内在的语言学习机制，创造了主体所接触的那种语言中内在的语言能力。关于对社会影响的这种解释，沙夫相信注入（即我们在儿童时代所接触的大量句子）不影响输出（即产生口头语言）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首先，如果一个孩子接触的是错误的语言，相对标准语法而言，他就会说得不正确；其次，社会因素并不仅仅包括说话人所听到的句子，还涉及语言和社会实践的关系，语言是根据特定社会和历史结构而在社会实践中发展的。语言本身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通过语言这种方式，个体得以接受历史向他的传承。个体从属于特定的社会系统，只有遵循哪些（作为分成若干阶级的社会的组成部分而）具有阶级属性的特定

社会价值观和动机，他才能够说话、思考、行动。

本文原题为“Semiotics an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Adam Shaff”，原刊载于 *Semiotica*, Vol.189, No.9, 2012, pp133-168.

### 作者简介：

苏珊·佩特里利（1954——），意大利巴里大学副教授（susan.petrilli@gmail.com）。研究兴趣包括符号理论、主体理论、意义理论和语言。出版有《今日符号学：从总体符号学到符号伦理学，一种对话式回答》（*Semiotics today: From global semiotics to semioethics, a dialogic response*, 2007）（与蓬齐奥合著）、《符号学与语言哲学透视》（*Lineamenti di semiotica e di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2008）（与蓬齐奥合著）、《表意与理解》（*Sign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2009）、《全球视野中的符号转折点》（*Sign crossroads in global perspective*, 2010）等著作。

奥古斯都·蓬齐奥（1942——）意大利巴里大学教授（augustoponzio@libero.it）。研究兴趣包括语言哲学、普通语言学、符号学、文学理论。出版有《错位》（*Fuori luogo*, 2007）、《倾听他者》（*L'écoute de l'autre*, 2008）、《从哪里到哪里》（*Da dove verso dove*, 2009）、《换言之》（*In alter parole*, 2011）等著作。



（沙夫与佩特丽莉）



（沙夫与庞齐奥）



# 普通语义学——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观点

亚当·沙夫著

贾佳译

在《语义概念的真理性和语义学基础》一文中，阿尔弗雷德·塔斯基（Alfred Tarski）对语义学的基础做了精准的阐释：

正如在这篇论文（以及作者之前的论文）中所设想的那样，语义学是一个清醒而谦逊的学科，它不会将自身装扮成某种被广泛应用的“成药”，用以治疗人类想象出、或是实际存在的各种病症。在语义学中，你找不到任何解决龋齿、谵妄，以及化解等级冲突的方法。语义学并非一种一劳永逸的良药，它认定，除了说者及其朋友外，任何人的言论都可能都是有意义的。<sup>①</sup>

不难猜想，谁会是以下报纸公告中辛辣言辞的接受者：“我对丈夫的债务和行为不负任何责任。”再比如，下面来自阿尔弗雷德·柯尔齐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著作中的文章，虽然该文被国外研究文献广泛引用，但在波兰却鲜为人知：

新的方法能够消除或者缓解不同的语义障碍，减弱一些神经或精神疾病的“情绪干扰”，排除不同的学习、阅读和语言障碍等，并调整工作和个人生活中的一般性失调状况。这些障碍，使本该获得恰当评价的“智力”得不到的充分的施展。

众所周知，有许多由身心失调引发的疾病，比如心脏病、消化或呼吸系统疾病、以及“性”病，慢性关节疾病、关节炎、龋齿、偏头疼、皮肤病、酗酒等等，不胜枚举。

---

沙夫，华沙大学哲学教授，波兰科学院成员，撰写论著过百，包括论文、文章以及专业书籍等。其中最著名并被广泛翻译成多种语言的两本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Marxist Theories of Truth*）（1951），《语义学简介》（*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1960）。他于1961年应福特基金会（见《时代》（*Time*），1961.6.2）的邀请访问美国。沙夫自儿时起，就加入了波兰共产党，同时也是中央委员会的一员。所引的文章是他《语义学简介》中的第四章，它被华沙大学 Olgierd Vojtasiewicz 教授翻译为英文。

<sup>①</sup>Alfred Korzybski, “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in *Seman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d. L.Linsky(Urbana, Ill., 1952), p. 17.

这些疾病是由语义障碍产生的后果，同时，神经语义学和神经语言学的建立，正是为了研究这些问题。通常的语义学训练，并不是从医学角度进行的。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在消除产生语义障碍的不利因素后，相应的症状也会随之消失，比如学生可以通过自学而完成自我改进。<sup>①</sup>

据我所了解的波兰语义学代表学者的观点和态度，我可以轻易地想象阿尔弗雷德·塔斯基在读“菜单”似的各种疾病的症状时所产生的“恐惧”（是的，这正是那一时刻的感受），因为他们都涉及一个足可敬畏的术语——“语义学”。

平心而论，塔斯基太过强调早期语义学和他本人所谓的语义学之间的差异性。

在旧“语义学”（semantics）和“一般语义学”（general semantics）之间，总是存在对基本概念发生混淆的问题。旧语义学与语词“意义”理论相关，而且词语被其他词语所定义；而“一般语义学”理论的产生，仅在于研究神经语义和神经语言的生命反应（living reactions），例如对  $Smith_1$ 、 $Smith_2$  的反应等，他们将神经语义和神经语言环境看作环境本身的反应。（SES, p.x）

我们还必须同意安纳托尔·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在《什么是语义学？》（*What Is Semantics?*）<sup>②</sup>中所提出的观点。拉波波特在这篇著名且令人受益匪浅的文章中，面对学术界和柯尔齐布斯基的后继者，合理地驳斥了阶级语义学、以及同一思潮中柯尔齐布斯基所谓的普通语义学观点。无论如何，我们很可能无法有效地界定语义学本身，因为它与逻辑学、认识论、普通语义学息息相关。其中，普通语义学可以被视为一种精神疗法，在语义学的阐释工作中最具代表性。

在某些方面，语义学和普通语义学具有渊源上的联系，但是与所产生的主要影响相比，这些联系却显得肤浅而固陋。事实上，对于这两种语义学类型，我们总是需要处理它们各自的趋势及所持观点的问题，它们不仅彼此不同，一旦将它们各自代表人的态度考虑进来，甚至会使得两者变得截然相反。这就是语义学和普通语义学概念的混淆会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大行其道的原因，即便是最严谨的作家莫里斯·康福斯（Maurice Cornforth），也曾将两者混

---

<sup>①</sup> Alfred Korzybski, *Science and Sanity*, 2d ed. (Lancaster, Pa., 1941), p. vii (下文中简称为 SES).

<sup>②</sup> Anatol Rapoport, in *Language, Meaning, and Maturity*, ed. S.I. Hayakawa (New York, 1954), pp. 3-18.

为一谈（例如在其《科学 VS 理想》[*Science Versus Idealism*]一书中）。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评一味追求其轻浮的胜利果实，才造成了目前的状况。在此状况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评往往盯着那些错误的、荒谬的、薄弱的环节，而对那些正确而充满智性的见解却视而不见，尤其是对那些不符合“黑白两判”模式的著作。用这样的理论，自然可以对付任何异议者，更不用说像普通语义学这样充满晦涩、矛盾陈述的学科。然而，从这种轻率而荒谬的批评方式中，我们可以获得什么启示呢？在我看来，毫无裨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批评的观点所持有的否定态度，仅仅是表面的。

关于思想体系问题，对其“不闻不问”绝非明智之举，作为预先抵御外来思想体系<sup>①</sup>影响的一项措施，思想体系却往往在关键时刻一筹莫展。另一方面，一旦采取这种措施，那么我们遭受的损失将是显而易见且无可挽回的：我们将损失数量可观的人类知识，而这些知识在激发创造性的分析思维方面，在某些时候依旧是十分重要的。阅读通常有两种方式：将书中寻得的错误和愚笨的观点作为批评的“猎物”，这也是那些不懂得利用科学成就的人所惯用的一种典型的阅读方式。但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阅读：从书中所涉及的大量案例中，寻找那些对科学来说是新颖的、启发性的和创造性的知识，这便是那些深谙如何利用科学的人所青睐的读书方式。在一部科学著作中，即便仅仅包含一个新颖而富有创新性的观点，也足以推动科学创造性的发展，而这样的观点绝不应湮没于浩如烟海的错误认识之中。

在依据这种方式检审自己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定地摒弃在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批评视域中进行了多年的实践活动。我已经谈到了这些实践，但当我们讨论普通语义学的时候，我们的反思却获得了双倍的反响力。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在与他们的联系中，能够以清醒的头脑审视在批评中犯下的全部错误和缺点。诚然，有些时候我们无法摆脱尴尬的感觉，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尴尬感产生于我们在批评过程中忽视了太多东西。毕竟多年以来，只有从忽视的角度，才能解释如何认定普通语义学背景下的语义学本身，才能认定斯图亚特·切斯（Stuart Chase）（柯尔齐布斯基观点的追随者）在继承卡尔纳普（Carnap）和塔斯基言论之后所发表的观点。进一步说，只有从忽视的角度，才能解释无法发现真正问题的原因，而只有有效把握这些问题，才能为普通语义学夯实基础。人们往往会留下这样的印象：我们文献中出现的任何一个讨论过柯尔齐布斯基的人，都没有通读过他的所有著作。我这么说，倒不是为那本书做辩护，恰恰相反，除了所有其他缺陷外，我更是认为此书夹杂着病态的偏执特性。但是，我们的文献对它所做的批评却未能击中要害：未能揭露出它本质的错误，而且

---

<sup>①</sup>原文中的这两处，分别使用了 *ideology*、*ideological* 两个词，一般译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但此处意指某种一般性思想、知识体系，因此译为“思想体系”。——译者注。

无法直面它所讨论的问题本身。不难发现，柯尔齐布斯基的《科学与卫生》（*Science and Sanity*）是一部浅尝辄止的晦涩著作。在书中，模棱两可、东拼西凑的概念比比皆是，而且经常随意化用他人的观点。中肯地讲，书中的正确观点不过是些老生常谈，而其新观点却错不忍读。同时，人们会轻易发现，该书沿袭了巴甫洛夫（Pavlov）的某些观点，而且其中某些概念，与认识论上的实在论（epistemological realism）、认知过程的辩证法（dialectics of the cognitive process）观念极为接近。作者曾声明，书中的很多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契合，而这恰恰证明了他忽略了很多东西。截止目前，我们的文献对这本书的忽略程度，与柯尔齐布斯基书中略去的内容相差无几。那么，对普通语义学派中的其他人，比如拉波波特、早川（S.I. Hayakawa）、欧文·J·李（Irving J. Lee）、和温德尔·约翰逊（Wendell Johnson）等，该怎么看他们的著作呢？

毫无疑问，普通语义学与通常的科学标准相距甚远。在研究《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这么个怪里怪气的混合物时，我们应当牢记，这样一个特殊的美国式产物，与其说是个宗派（sect），倒不如说是个学派（school）。关于这个问题，某些清醒的观察者早已有所觉察，而即便在普通语义学的众多信徒中，那些较为清醒的学者们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以下是拉波波特在上文提及的那篇文章中的话：

柯尔齐布斯基的追随者，对他表现出宗教崇拜般的狂热，那么，对他们的指责便显得有理有据。在美国，有一大群人标榜要追求真理，却又如蜻蜓点水般浅尝辄止。他们中的很多人缺乏追求知识和智慧所必需的坚韧毅力；而另一些人却没有批评和评估的能力，从而无法分辨问题的真实与虚假；更有甚者，总是表现得毛毛躁躁，直到找到能使自己信服的灵丹妙药。对形形色色的“运动”（movements），他们趋之若鹜；对五花八门的教派，他们如影随形。他们似乎“拥护”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ce）作为技术统治，将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看作神智学（theosophy），将伟大的图书工程（the Great Books program）看作智力学（dianetics）。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普通语义学颇感兴趣，也便不足为奇……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便很难界定他们究竟是受到了普通语义学的、还是其他因素的影响。然而，他们我行我素地四处鼓吹自己的信念，却给“运动”增添了一抹迷信的色彩。（p.6）

普通语义学具备一般宗派运动的所有特点，当然，它拥有属于自己的追随者。前文引述的作者自己即可证实，这个“宗派”具有清醒和现实性的批评特点。拉波波特认为柯尔齐布斯基

基的作品是一部蜻蜓点水、晦涩不堪的读物，并且与其所宣扬的观点相抵牾，根本不是经验性研究的结果。之后他总结道：

如果不能说柯尔齐布斯基建立了一门经验科学，那么他做了些什么呢？他指明了建立这样一门科学的具体方法。可以说他是**引发了一场思想革命的先驱，虽然这场革命刚刚兴起，但它必将与文艺复兴相媲美**。如果将柯尔齐布斯基看作先驱，那么对其独创性和学养的质疑就变得无足轻重。在某种意义上，他也许只能算个业余人士，但他却竭力假装自己具备充分的学识。他的很多观点，都可以在其他人的著作中找到，而这些著作的作者们却都是谦逊而严谨的人。当然，这些并不重要。柯尔齐布斯基是个有先见之明的信徒，在我们这专业化的时代，这样的人才实在屈指可数。

由此来看，一位理智的思想者，变成了一个盲从的宗派人士！如果我们想了解什么是普通语义学，以及它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获得社会性成功的原因，那么有一个有益的现象值得思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公众舆论的宣传作用，更加注重人与人之间态度和行为的交流影响，而这种关注的结果导致了纳粹主义的诞生。这些具体状况，使身在美国的柯尔齐布斯基开辟了一个生气勃勃、迅速发展的领域。我在此特意提到柯尔齐布斯基的观点，是希望将他至少和他的追随者们的观点清晰地区别开来。对于后者，我不仅觉得他们的观点十分富有价值，而且对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他们的诸多观点和活动，解释了普通语义学不应被视为假模假式和萨满教的原因：在全力批评它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忽略由它所呈现出来的真正问题。

现在，我尝试向读者简明扼要地介绍柯尔齐布斯基的基本观点。

他自己将普通语义学定义为研究神经语义(neuro-semantic)和神经语言(neuro-linguistic)反应的科学，这种反应源于人类个体对语义“环境”影响的表现。拉波波特用一种更便于理解的方式来定义普通语义学，将其看作一种“人们如何使用文字，文字反过来就如何影响人”(p.4)的科学。这其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被莫里斯(Morris)称作“语用学”的符号学支系。

对于柯尔齐布斯基来说，普通语义学是涵盖一切问题的心理治疗法(psychotherapeutic technique)，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从胃痛、龋齿到社会冲突，普通语义学足以涵盖任何问题。从这种思路来看，柯尔齐布斯基受到了弗洛伊德思想模式的指引，他观点的理论构想可以被概括如下。

柯尔齐布斯基的兴趣和分析的起始点，是一种关于人与文化的普通理论，这也是他第一

本著作《人性的气概》（*Manhood of Humanity*）（1921）的主要观点。从这个思想角度看，他探讨了符号在人的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或者更严格地说，探讨了症候的病理学（*pathology of signs*）问题。

不幸的是，如果我们删繁就简地审视这些事实的本质，那么它们看起来要比事实上更加理性和重要。柯尔齐布斯基的观点是从不同学科中抽取而来的理论的混合物。在他全部的解释工作中，有个主要的观点十分夺人耳目：所有机体病理学和社会病理学都是语义性的：“听我便得救！”

解决方法十分简单：摒弃已经过时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语言体系（二价模式）（*two-valued*），转而支持非亚里士多德体系，亦即反对传统逻辑的二价原则，而造成所有不幸之源的语义障碍将会马上消失。当然，他的这种想法和表述有点言过其实。

柯尔齐布斯基在不同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号在社会生活中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这些理论资源，首先包括行为主义（*behaviorism*）和巴甫洛夫的理论（*Pavlovian theory*）（柯尔齐布斯基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对条件反射理论的发展）。弗洛伊德学说，为他明确提出关于符号病理学的观点提供了思路，而这也是非弗洛伊德语言和相关心理治疗理论的立论点。

让我们把非亚里士多德语言体系（*non-aristotelian language system*）的普遍认识作为着眼点。现有的语言系统，亦即柯尔齐布斯基所说的亚里士多德语言体系（谈到印欧语言体系，他有一些理性的追捧者，比如早川），被认为采用了二价模式的评价系统，并被视为导致一些神经性疾病的诱因。相反，非亚里士多德体系据称实现了与当代科学的联姻（在他的论证中，柯尔齐布斯基经常毫无根据地滥用诸如“胶状的”“量子”等科学词汇），评价的涉及面非常广泛。卢卡西维茨（*Lukasiewicz*）的思想以及他的多价逻辑（*many-valued logic*）理论可以很清晰地被把握（参考文献中已提及此人），但是这些观点被使用的途径，却与最初概念毫无关系，而且这种途径丝毫不能证明他们新的应用方式的合理性。

但是问题仅仅由此开始，现在我们学习了关于非亚里士多德语言体系的新的具体知识。

首先，把“系词”（*copula*）用作认同（*identification*）手段是不可取的。柯尔齐布斯基说，“词汇并非它所指称的事物”。在“非语词层面”（*nonverbal level*），我们只能指点事物，当我们说“这是一张桌子”时，我们辨识出词语和客体的关系，从而提出了重要的语义病理学（*semantogenic pathology*）。我们再次认识到“非语词阶段”这个概念源于新实证主义者。但在柯尔齐布斯基这里，它却变得十分滑稽，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以他所建议的方式来认同词汇及其客体。柯尔齐布斯基所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就是在心理不断重复、暗示“这不是一张桌子”，换言之，就是根据“差异构造”（*structural differential*），执行恰当的机械操作指

令，使这种方案带上了一丝萨满教气息。

第二个主要的原则指出，“地图(map)不是领土(territory)”，也就是说，一个符号无法充分代表客体。亚里士多德语言体系被认为是“元素主义”(elementalistic)，它将对事物的认知看作由诸多基本元素所构成的完整性和必然性。非亚里士多德体系被称为“非元素主义”(non-elementalistic)，而且它意识到整个认知过程的重要性，这很明显回到了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的路径。

最后，第三个原则论述了象征(symbols)的“多创性”(multiordinality)。地图不仅不是领土，“地图<sub>1</sub>”的“地图”也不能代表“地图<sub>1</sub>”本身。换句话说：我们用以表达另一种语言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是语言对象本身。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语言的层级，将词语放置到清晰的语境中，来避免模棱两可的情况，以此得知抽象概念所在的层次。我们能够轻松地辨识出罗素所提出的关于类属、以及语言层级相关概念的理论。

从这些理论假设开始，柯尔齐布斯基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一个关于语言结构的分析，内容遍及研究精神错乱者的语言、及研究高等数学的语言。他的目的是创建一种心理治疗法，这种治疗法可以使他确定语言的新结构，从而建立它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也被认为有利于整体提高社会心理健康水平，因此，他为此书取名为《科学与卫生》。

柯尔齐布斯基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建议，目的在于通过运用“非亚里士多德”结构来修正语言的使用方式。

首先，指示符(indices)应当与普通名词相联系，这样可以将容易让人产生困惑且不同类的对象概念加以简化，以此强调个体的明确性和独特性特点。根据柯尔齐布斯基的理论，如果我们不说通常意义上的“黑人(Negro)”，而是说具体的“黑人<sub>1</sub>(Negro<sub>1</sub>)”“黑人<sub>2</sub>(Negro<sub>2</sub>)”等等，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消除引起种族仇恨的根源。

第二，时间也应当被考虑进去，以此来区分现象的多面性影响，以此避免产生误解。因此，我们最好不说“威廉·莎士比亚”，而是说“威廉·莎士比亚<sub>1600年1月的</sub>”“威廉·莎士比亚<sub>1601年2月的</sub>”等等。

第三，所有特征都需要辅以“等等”(etc.)一词，用以提醒我们这个“地图”并不代表整个“领土”，或者换个说法，我们从来不会达到完全认知的程度。(这便解释了为什么普通语义学主要期刊 *ETC* 的名称如此怪异的原因。)

最后，柯尔齐布斯基建议使用双引号来标示意义，以此将我们自身剥离于词汇的本质意义之外。

作为一种有效方法，柯尔齐布斯基建议在练习时使用一种被他称为“差异构造”

(structural differential) 的方法；这些练习应该让病人意识到，首先，这个词并不是它所指代的对象，其次，这个词拥有不同层次的抽象涵义。

这个简明的报告是否证明了这样一个论点：柯尔齐布斯基正确的理论是众所周知的旧真理，而其中新的观点却又是错误的？

我不愿对“语义学”方法的治疗手段发表评论。毫无疑问，心理性的小病症是医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它也没有排除在某些情况下“差异构造”也会起到与众不同的作用。但这是个完全不相干的议题。

难道柯尔齐布斯基的普通语义学只是应被丢入垃圾桶的无稽之谈吗？难道它仅仅是些根据阶级立场而随意炮制出的理想主义把戏，一如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所宣称的那样？对此，我毫无把握。

柯尔齐布斯基观点包括一些不应被轻易忽略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奇异，而且简单疯狂。柯尔齐布斯基所使用的例子涉及面十分广泛，因此有些观点可能是从他人那里借来的。但是准确地说，“这些观点”足以建立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普通语义学学派，这个学派与那些在科学上拥有发言权的宗派似的学派，尤其语言学方面的学派，并不一样。同时，“这些观点”也指引了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包括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P.W. 布里吉曼（P. W. Bridgman）、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等人，他们在附言中提及了柯尔齐布斯基的著作，并对他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表达了他观点的赞同。我也希望告诉那些孜孜不倦于简单评论的人，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柯尔齐布斯基的思想有时对于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而言，同样难以轻易把握。

毫无疑问，柯尔齐布斯基的全部灵感来自于为语言功能赋予绝对的价值。当涉及社会问题、尤其牵涉到信念问题时，这个事实便突显出来，柯尔齐布斯基将这个问题简化为语义干扰。比如说，他在努力处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时，依据神经语义的反应情况来给信号（signals）下定义（SES, pp. xxiii-xxiv）。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种方式受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猛烈攻击，同时，却在斯图亚特·切斯的著作《语言暴政》（*The Tyranny of Words*）（1938）中获得了一丝不苟的继承。同样在柯尔齐布斯基的著作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事实：只有在语言反映事实本身时，它才能正确地发挥其功用，柯尔齐布斯基学术活动倾向于调整语言结构，而这个观念正是引导他开展活动的主导原则，也被他的后继者们所汲取。（比如，斯图亚特·切斯、欧文·J·李、早川、温德尔·约翰逊）。以下是柯尔齐布斯基就这个话题所发表的观点：



由于词语并不是其所代表的对象本身，因此结构与结构自身 (*structure and structure alone*) 成为连接经验数据和我们语词过程的唯一链条。为了获得调整，开发心智，并把握语词所涉及的不同内涵，我们必须首先探讨世界结构性质的特点，之后，建立语言的相似结构，而不是习惯性地根据最初的语言结构来认知世界。……再者，那些推动语言发展的人，认为每一种语言都具有其结构，并天然地将世界反映在语言之中。换句话说，在阅读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进入所使用的语言结构世界中。对空想的猜测、归因，大部分源于对世界结构的呈现，而这恰恰是“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研究领域。与此相反，科学所致力的工作，是通过经验方式探索世界结构，以及构筑起新的语言(理论)、一种必然或相似的结构。任何思考语言结构独特性的人，都不能忽视科学手段，在语义学看来，唯有它才能正确使用语言方法。它依据自然秩序 (*natural order*) 而发展，然而对形而上学却执行的是与自然秩序相反的、绝对的、病理学顺序。(SES,pp.59-60)

这些想法是否正确呢？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他们不仅是正确的（阐述过程本身的重要性居于其次），而且对唯心主义和语义哲学批评有重要意义。所以，它们不适合传统模式和陈旧的形式。对于柯尔齐布斯基来说，这些观点并不是偶然的想法，而是他潜心研究的结果，也是他思想的根基。同时，这些观点也已经被他的追随者们从普通语义学学派中所继承。正如温德尔·约翰逊所说：

在研究语言行为时，最关键、且必须考虑的方面，是语言和现实、词语和非词语之间的关系。除了需要认识这些关系外，我们还要尽力把握词语和事实间微妙的联系，大胆地发挥词汇多义性的作用，以此来激发我们想象和幻想的虚构性。<sup>①</sup>

斯图亚特·切斯下决心要创作出一部“畅销书”，他也是这么说的：

语义学学科所做出的贡献在于，将虚构的鬼怪从图画中抹去，同时创作出一幅更逼真、且任何人都能领会的新画作。人们不再被教条的、情绪化的“对”与“错”所纠结，而是谦逊、谨慎地意识到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他的新地图或许是错误的，他的判断或许是不准确的，但是做出正确判断的可能性却得到了提升，因为他现在开始根据外面世界发生

---

<sup>①</sup>*People in Quandaries*(New York,1946), p. 113.

的事来进行判断，而不是依靠头脑中既存的信息。（《语言暴政》,p.361）

仅凭好的语言并不能拯救人类，但是发掘事物名称背后的东西，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结构。好的语言有利于我们与他人交流我们周围的事实，而现在我们却在以我们的拙嘴笨舌，发出含糊其辞的言语。（《话语无情》, p. 361）

看在上帝的份上，这很有道理！与期望相反，这些人确实理解新实证主义者和激进的传统派所不能理解的某些观念。这些观念不应被随便地弃置，而且也不能彻底否定符合“非黑即白”模式的全部评价。

柯尔齐布斯基宣称，自己提倡以动态——而非静止的眼光来阐释现实，在这一点上，有时至少与某些辩证法支持者的著名观点十分接近。这其实并非巧合，在反对“亚里士多德”语言结构的同时，柯尔齐布斯基也反对所谓思维规律的传统论述。他说：

我们不可能充分地修正这个“逻辑”概念，而建构一个非亚里士多德的、拥有无限价值的非元素主义语义学，它将会在结构上与世界系统、及我们的神经系统相似；但是，不得不提，“身份规律”(law of identity)从来不适用于过程中。“排中律”(the law of excluded, 有时也写作 excluded third) 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概念增添了“二价”(two-valued) 的特征，它的存在成为呈现有限事物的一个普遍原则，而这并不能让人满意。(SES, p. 405)

然而，“最糟的”事情仍然横亘在我们面前。现在，柯尔齐布斯基把明文(expressis verbis)看作是巴甫洛夫理论和他的观点间思想上的“亲属关系”，而在我看来，他的这个观点很可能是对的。我甚至越来越相信，柯尔齐布斯基是在巴甫洛夫的影响下才形成了自己的想法。然而，谈到与自己观点的不谋而合，柯尔齐布斯基却声称，他是在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非亚里士多德体系之后，才熟悉了巴甫洛夫的观点。(SES, pp. 315-316)

我的修订本从语言学的、结构的、非元素主义的理论角度出发，为人们研究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实验理论提供了新的重要补充材料。事实上，这些独到理论的发现为彼此提供了理论支撑，而这恰恰是理论研究实用性的突出例证。(SES, p. 326)

我不太清楚柯尔齐布斯基是否了解巴甫洛夫理论的信号二次体系(the secondary system of signals)，但他展现出的目的(e.g., pp.331-332)却与这个理论非常相似，连使用的术语

都很像。如果两者真的具有同质性，那么事实将是令人震惊的。可是，即便柯尔齐布斯基是在巴甫洛夫的影响下提出自己的理论，问题却依然十分复杂。人类行为所表现出的语义障碍完全契合条件反射理论，甚至也符合信号二次体系理论。神经官能症产生于刺激和压力作用下形成的冲突机制，而针对这种症状，巴甫洛夫给出了准确的解释。岌岌可危的不仅仅是引起条件反射的信号，同时也是代表信号的信号，这就是词汇。即使我们拒绝讨论柯尔齐布斯基作品中这种奇怪版本的信号病理学，那么语义紊乱问题却依然客观地存在。再者，那个问题不仅仅涉及精神病学层次：正如上文所提，拉波波特曾指出：“人们如何使用文字，文字反过来就如何影响人。”（早川在他的著作《语言与人生》（*Language in Thought and Action*）的封皮上写过一句标语似的话：“人怎样使用词语，词语就怎样使用人。”）由此可见，柯尔齐布斯基的观点真真切切地涉及很多研究论题。

在普通语义学学派中，柯尔齐布斯基后继者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

这个十分理性的观点，是语言实用主义（pragmatic）研究的一部分，也就是从语言符号制造者的视角出发进行的语言研究。拉波波特用以下方式明确地阐释了这个问题：语法用以考察词语之间的关系；逻辑用以研究命题之间的联系；而语义学则探讨词语与主旨及其指称物之间的联系，并在这个基础上，确立了它们的意义和真理性。普通语义学比其他学派发展得都要快，因为它还研究词语和命题对人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对于一个普通语义学家来说，交流不是简单地将词语的起承转合用于正确的位置（如语法学家），也不是断言词语之间的确切关系（如逻辑学家），更不是肯定词语和特定指称物之间的联系（如语义学家），而是以“事实—神经系统—语言—神经系统—行动”<sup>①</sup>的逻辑线索为研究宗旨，对上述工作进行整合。

实用主义的影响由此彰显出来，而它的研究是通过符号学来进行的。尽管如此，但普通语义学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取得了进展，却绝非巧合。虽然研究方式不同，但正如莫里斯的符号学一样，普通语义学的发展也具有同样的影响趋势，其涉及面甚至变得比普通符指理论（general theory of signs）更为广泛。

在其理性形式中，普通语义学从以下学科的角度，对人类行为中“神经语义”因素探讨的兴趣愈加浓厚：如心理学、精神病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等等。由此，普通语义学的拥护者们宣称，这些学科以其论据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在环境刺激物的作用下积累经验，

---

<sup>①</sup> Anatol Rapoport, *op. Cit.*, p. 14.

同时，通过逐步积累的组织经验，使自身的行为逐渐形成某种恒定的模式。这两种功能，都是在语言的特定方式、结构，以及语言习惯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这样，对具体语言的研究的重要性、及其研究方式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无论我们对此类研究持有怎样的态度，做出怎样的判定，都绝对无法否认其重要性。以下是关于这一问题的详尽陈述。

首先要讨论的，与人类交际有关。我们已经知道，普通语义学的最初成功，是由于它对上个世纪 30 年代纳粹主义的骤然得势所引发的兴趣，这便从语义扰动 (semantic perturbation) 的角度解释了导致社会冲突的原因。这个研究视角是柯尔齐布斯基首先开创的，斯图亚特·切斯、早川、温德尔·约翰逊等人延续了这一方式。1949 年，早川在其新版《语言与人生》的序言中，坦承自己的早期著作在讨论社会问题时所具有的“过分简单化”的倾向，而对这些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们早已研究得十分透彻。然而，不少问题还是被遗留下来，它们貌似无足轻重，但在实践中却至关重要：比如，要获得成功，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这一问题备受热议）；在人类交际过程中，会遇到怎样的阻碍或便利，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它们都以普通语义学原则为基础，深入探讨了语言在矫正思考方式、以及在研究社会群体行为和个体行为方面的意义。教育和精神病学涉及的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柯尔齐布斯基最初对语言符号病理学的研究正是从这个领域中发展出来的。

语言病理学问题的实践性比较明显，却与普通语义学中某些理论性更强的问题相关，例如符号 (sign) 和象征 (symbol) 的作用问题，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在被我称为应用语义学 (applied semantics) 的领域中，所讨论的表达的奇异性和模糊性问题。

最后，从文化人类学意义上讲，语言对文化的塑型过程具有重要影响，普通语义学则致力于对这种影响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囊括了一系列比较文化研究，且都与对语言发展的探讨有关，例如 B.马林诺夫斯基的《原始语言中的意义问题》（见奥格登[C. K. Ogden]）和瑞恰慈 (I. A. Richards) 《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一书的附录部分，[1930]），本杰明·沃尔夫(B. L. Whorf)的《语言、思维和现实》(*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1956]）。

普通语义学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然而，我不愿夸大其词地说什么“普通语义学可以与口腔外科相媲美”，而只是想心平气和地描述它对文学和艺术的影响、以及它与控制论的姻缘关系。这些话题无不颇具争议，我也为此深感踌躇。事实上，普通语义学早已研究过这些问题，发表过实实在在的观点，也拥有了自己的文献。许多普通语义学家，都做出过堪称一流的贡献。虽然前文已经有所提及，但我这里要再强调一遍：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应被轻易地

抹煞。我赞同麦克斯·布莱克（Max Black）的观点。在自己的著作中，他根据柯尔齐布斯基的语义学观点，得出这样的结论：普通语义学的理论基础在逻辑上是难以成立的；但他又补充道：“混乱不堪的理论体系，却往往催生出有用、有趣的成果，这在科学史上屡见不鲜。”<sup>①</sup>补充一句，如果研究的是真正的科学问题，那的确会催生这些成果。

普通语义学的问题属于哲学吗？这是个可以单独对待的问题。普通语义学家们自然不承认自己是哲学家。事实上，他们首先是社会技术人员，他们的理论研究更多地涉及到与逻辑学和认知论相关的语义问题，因此与**狭义上**（*sensu stricto*<sup>②</sup>）的哲学相去甚远。然而，普通语义学多多少少会散发些哲学的味道。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便曾鲜明地指出，普通语义学中**含有某些唯心主义论调**。当然，普通语义学中也含有其他学派的因子，而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却忽略了这一事实，原因在于他们过分依赖大纲模式（*schematic pattern*），而模糊了“纯粹”唯心主义的范畴。任何对事实的扭曲都是无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其他思想因子的忽略同样欠妥。这里，我以相同的理由，对此前已经出版的某些著作提出质疑，例如比考夫斯基（B.Bykhovsky）为康福斯的书所写的文章；同时，我也以此质疑那些最近出版的著作。

所有对普通语义学的误解都是有害的，它们与作者们的初衷截然相反，并将因此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尽管鲍里斯·比考夫斯基论语义学的那篇声名狼藉的文章（发表于《布尔什维克》[*The Bolshevik*]杂志 1947 年 8 月号）得以重新发表出版，但《普通语义学评论》（*ETC.*）杂志的评论专栏（1948 年第 5 期，第 1 至 15 页）中，却看不到评论此文的只字片语；他为《简明哲学词典》（*Concise Philosophical Dictionary*）（俄文版，罗森塔尔·尤金[Rozental Yudin]主编，莫斯科，1951）撰写的词条“语义哲学”（*Semantic Philosophy*）也获得了重印，但在早川的《语言、意义和成熟》（*Language, Meaning and Maturity*）（1945）中，通篇也找不到对它的任何评论。这样看来，对语义学的批判性讨论，与《简明哲学词典》中其他词条的命运如出一辙，这个词典没有经过任何评论就获得再版，并被作为独立刊物，由反共产主义期刊《见证》（*Preuves*）所收录。这样，我们那些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手便认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即将消失的意识形态批评”这一论断，将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反击性宣传品和最有力的武器。那么，这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会引发人们犀利的谴责吗？

---

<sup>①</sup>Max Black, *op. Cit.*, p. 246.

<sup>②</sup>原著为“*stricte*”应为“*stricto*”与“*sensu*”同为拉丁词，“*sensu stricto*”意为“狭义的”。——译者注

本文原题为 *General Semiotics, A Marxist Philosopher's View*, 原刊载于 *ETC.: A Review of General Semiotics*, Vol. XVII, No.4, 1965, pp. 401-408.

# 话语套路的语用功能

亚当·沙夫著

周子恒、张碧译

人类行为通常建立于某种动机的基础上。这种说法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但这里我们所关注的东西，使我们忽视了主体（agent）处于病理学状态（广义上的）时的行为。因此，我们不仅对那些严格意义上的疾病患者（例如精神病患者）的行为视而不见，同时，对于那些其精神意识饱受滥用酒精、毒品扰乱之苦的人、那些处于催眠状态的人等等而言，关于他们的行为，我们同样漠然视之。

当然，不同类型的动机，可能在特征、潜在认知因素(我们这里不考虑真实性[truth]价值)和情感因素方面迥然相异，而这些因素通常会共同参与这种动机结构的构建。这种结构非常复杂，原因在于：它们都建基于人类在有意或无意的状况下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以及随之而来的行为准则体系，其中，后者包含了社会所公认的人类义务和禁忌。这里，我们不妨忽略所有这些细节和微妙之处（尽管这在行为理论学者眼中非常有趣），而将我们自己限定于某种一般性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即便在做出每个决定前，都早已经过意识层面的深思熟虑，但人类行为的动机依然受制于诸多认知和情感因素。行动个体通常无法完全意识到这些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他形成于内心的价值体系，以及经由社会途径而传达的心理图式及话语套路，等等，都会影响他的情感偏见、恐惧和偏好。个体对这些因素的认识越薄弱，它们对理性化的接受程度就越高，并伪装成有客观认知价值的元素，同时，它们对个体的影响力就越强。这正是话语套路的语用功能、及其在语用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力量的来源。

话语套路是一种特定的认知结构，这种特定性结合了认知、情感等诸多因素，因此，也是一个特定的语用结构，换言之，是人类活动的基本要素，并因此贯穿于整个人类行为理论中。我们不妨换个说法：话语套路有其认知、情感和语用方面的价值。但我们这里并不在意这些以及其他观点，而是想阐述这样一个事实：话语套路对人类活动具有某种影响，同时，这个事实也可以揭示它们的起源问题。话语套路的社會功能与它们的起源互有联系：社会功能影响它们的起源，反之，话语套路的社會起源也会决定它们在人类社会行为中的功能。下面的分析，首先会阐述话语套路的语用功能问题，如上所述，这种功能与话语套路的起源相比，出现得较早。

众所周知，话语套路必须通过社会途径才能实现向个体的传达，这些途径，主要包括来

自家庭的、童年时周遭环境的，以及此后学校、同学、同事等多方面的影响。在童年时代的早期阶段，这种影响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与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是并行的。在牙牙学语的过程中，孩子接受了社会向他们传达的一系列观念，并由此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这些反应恰恰具有话语套路的属性。需要强调的是情绪与话语套路的关联过程。年轻个体的心智在形成过程中，与上面提及的一系列观念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他便通过模糊自己天性的方式，极大地强化了话语套路的作用。这种情况，便决定了话语套路对人的社会角色所形成的影响。

我们所使用的**社会角色**这一概念，是由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所设想的。尽管其他作者也曾以别的称谓方式提及这个概念，但在我看来，正是埃里希·弗洛姆为其赋予了最成熟的形式。弗洛姆将人的社会角色阐释为某种总体性态度，这种态度一方面通过社会途径传达给这个人，同时，也控制他对外部刺激做出某种类本能（quasi-instinctive）的反应。这种认识建立在以下的推理基础上：动物的心智结构中存在某种机制，它通过激发动物求生欲的方式，对外界刺激产生相应的反应，这种机制就是本能。对于智人（*Homo sapiens*）的发展水平而言，为了赋予那些能够做出合理决定的行为以更多空间，在人类生活的某些领域，本能的作用已逐渐减弱，乃至完全消失。这种情况可能带来灭顶之灾，原因在于，人类将不得不面对一些处境，在这些处境中，他们没有充分的时间来应对各种状况，并且被迫做出迅速的反应。这种取代了消失的本能反应的机制，具有一种类本能的反应特征，但这种反应并不听命于遗传密码（genetic code），而是受作用于心理上的文化符码（culture code）控制。这种态度建立在上述机制的基础上，自身就具备了为进行活动所做的铺垫（readiness），从而使人类有可能不通过反应神经（reflection）即做出反应，并表现出类本能反应。这种类本能反应比纯粹的本能反应更灵活，因为它们在适应给定环境方面，总是游刃有余。这种态度与他们的特征融为一体，形成社会角色。

尽管事情远远不够清晰明朗，但很明显，话语套路在塑造人类的社会角色方面，发挥了不可小视的作用。如前所述，话语套路与态度不同，态度是信念（conviction）的基础，为行为的进行做好铺垫，然而，话语套路在态度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话语套路具有相应的稳固、恒定性特征，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具备了某种先验性质。它在人类形成社会角色信念的过程中注定起到基础作用，而这种基础作用同时具有类认知和情感属性。人的社会角色，能够保证他的反应具有自动性、相对稳定性、对经验的超越性，同时也能够以某种方式适应现实。话语套路能够完美地满足这些要求，并使人做出类本能活动；但是，在某些不利条件下，或者在某种限制作用下，话语套路同样无法满足这些要求，而社会活动也将随之陷入危险之



中。关于自动行为（*automatism*）与灵活性相契合的形式与机制，依然需要深入探讨，并且从社会心理学领域入手。

在这种机制中，话语套路和价值体系的联系成为了一个开放性论题，而相应的评价标准与准则正是建立在价值体系的基础上。一方面，一个给定的价值体系为行为的铺垫（*readiness*）奠定基础，这是人的社会角色的本质；同时，这种价值体系也为信念奠定基础，这种信念制约着行为的铺垫，并且是由通过社会性传递的话语套路来提供的。然而另一方面，社会价值体系的形成过程（一个最复杂、且最不为人所知的社会过程）也需要分享以话语套路为属性的信念。这是否意味着，两者之间能够相互作用？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主导因素又是什么？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个问题并无定论，仍需研究。话语套路问题要想获取一个成熟的答案，并以此来应对由它引发的诸多问题，还为时尚早。

如上所述，话语套路的根源受到社会状况的制约，但与此同时，在遵循反馈的基础上，话语套路发挥着塑造和调整这种制约条件的社会功能。由此，话语套路便成为社会整合活动的重要因素，成为社会活动的动机、意识形态的结构、政治活动和政治宣传的形式、社会偏见、人类社会角色，等等。这样，它们将在社会活动领域中发挥重要功能，这种功能通常被分析工作所忽视，这必须归咎于工作中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研究者从根本上忽视这种功能，主要是因为他们懒得理它。试图从对手的角度出发，来证明话语套路的功​​能，这种方式诚然是一种批评利器；然而，这种批评也可能转而对利器的使用者自身发出攻击，原因在于，没人能逃脱话语套路的影响。但事实上，话语套路的功​​能总是被忽视，却是由于话语套路一项相对较新的理论的提出。因此，让我们大致回顾一下，不同形式的话语套路在社会生活中是如何发挥功能的。

首先，我们必须关注话语套路的社​​会整合功能。我们往往将一个群体划分为“我们的人”（*our people*）和“外​​乡人”（*alien*）<sup>①</sup>，这种一刀两断的分法，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其基础在于“我们的人”这一群体的凝聚力。反过来看，特定的社​​会确保了这种凝聚力，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契约和基本价值观的准则，早已扎根于社​​会成员的内心深处。

在某些条件下，这种划分可能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我们的人”可以指基督教、穆斯林、犹太教等不同宗教环境中的人。那些不承认本教信仰的人，就成了“异教徒”。语言同样是一种辨别身份的工具，那些不会讲“我们的”语言的人会被视为“异族人”，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与哑巴无异（波兰词 *Niemcy* 在语源上来自于德语 *niemy*，即“哑巴”）。但这些标准、以及与之类似的标准通常都太过广泛，因为它们将不同社群一并囊括在内，这些社群

---

<sup>①</sup> 根据具体语境，后文将该词分别译为“局外人”、“异教徒”及“异族人”。——译者注。

在主要标准（宗教、语言等等）方面能够和其他社群区分开来，但在其他方面，却很难从内化的角度对之加以区分。

如果将界限进一步窄化，就必须考虑许多附加的标准。其中一些标准，每当我们提到它们时，便会不禁豪情万丈，比如我们的祖国；但提及另外一些标准时，即使我们默默无语、小心翼翼地轻轻掠过这个词，在心理分析的意义上，却依然被它压抑得心神不宁。这种情况，体现于诸如“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之类的表述，它们用来指代那些沉迷于烈酒的人，并且在某些社群内部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被这些群体所采纳。从此，话语套路开始发挥其功能，一旦满足以下条件：认知和情感因素的混合物、缺乏精准性、心理影响的特殊机制，它们就非常适合去完成指定给它们的社会任务。

个体往往以社会性的方式，将某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礼仪习惯、行为约束内化于心，这个过程主要完成于其童年的早期阶段。当然，社会化教育的过程贯穿了他的一生：周围的环境影响着他的生活，所在群体及个人旨趣激发着他的精神，等等。但很明显，人在童年时期最容易受某方面的影响。孩子通过语言的习得来吸收社会的精神遗产，但面对这些遗产，尚不具备辨别“哪些是客观认知、哪些是主观情感”的能力。在这一时期，孩子的大脑与他的语言能力共同发展，同时，大脑将相应的情感反应固定于语言之中。最终，这个孩子便会在不加反思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接受外界观念。社会角色对于人性而言，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孩子的例子，恰恰说明了人性被自然发生论（autogenesis）或系统发生论（phylogenesis）视为社会产物的原因。

在成年时期，一个人可以学习一门外语，但是，与他用童年早期时便开始接受的母语所习得的知识相比，后天习得的外语知识总还是有所差别，即使这些知识在形式上已经非常完备。有这么个颇有见地的说法：对外语过分完美的运用，往往暴露出外语学习者的特征。但即使是一个成年人在学习一门外语，他也无法以那样的年纪获得外国人的社会角色，无法真正将外国的社会价值体系、举止和行为/指导准则内化于心。当然，人可以吸收并尝试运用他们的智慧，有时运用得会非常成功，但可以模仿的痕迹通常会很明显。一个新近入教的教徒，通常因其表现出过度的宗教热情而冒犯他人；一个人在其成年阶段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后，往往因过分计较对外语的正确使用方式而暴露自己的身份；人通常抱着功利性目，刻意地接受另一个社会群体的社会角色、行为指导准则及礼仪规范。当然，在这方面，作为一个新手，他不仅会因举止夸张而冒犯别人，会显得滑稽可笑。这些东西，新手无法学到，主要是因为缺乏一个重要因素，即话语套路。唯有切实地参与到某个社会中去，特别是在童年时期，才能通过社会途径获得话语套路。话语套路很难丢失，却也无法被学到。当然，通过日

常生活中的悉心观察，一个人可以在行为准则上或好或差地假扮另外一个人，但就算是在舞台上，出色的演员也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即便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也不过是些演员，而不是他们所假扮的真实的人。

对于文学主题而言，话语套路的社会整合功能常常被强调。这是一种近乎宗教的功能，它能够在特定群体内发挥凝聚作用。儿童在学习母语的过程中，会无意识地意识到这种功能，成人之后，当他渴望（通常是在意识的层面，尽管有时是无意识的）融入自己的社会或一些社会群体时，这种功能便得以稳定下来。经验性研究往往关注诸如“祖国”、“爱国主义”等概念的内容，更不必说对沙文主义根基的研究。因此，经验性研究能够揭示作为概念和态度基础的话语套路（连同相关的恐惧症、复合体等）。对话语套路的研究，以及对它们认知的分析，尤其是对情感等方面的探讨，对某些貌似高贵而骄傲的陈词滥调而言，是件危险的事。这就是刻意启用防御机制来抵制这种研究的原因，这种机制就像心理烟幕一样，遮掩住令人不快的现实。这首先适用于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的机制。虽然这种机制旨在保护话语套路不受好奇和制造麻烦的分析的影响，但反过来，话语套路在形成这种机制效应的过程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问题是由埃莫里·波加都斯（Emory S. Bogardus）在其论文中提出的，该文前面已有引用。

在其认知失调理论中，莱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提出了一个对理解社会生活有着重要意义的想法，这个想法仍将（可能不是出于偶然）在相关分析中被默默地继承。我指的是在冲突的情况下一个经过实验验证的事实，如果考虑到某些问题（一般是社会问题）中人类的意见（opinion）和态度（在行为铺垫的意义上），和他在实际生活中的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如果前面所说的意见、或者被修改的意见，在不破坏其意识形态载体的前提下，都不符合实际生活的情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为了在思想上避免接受不合适的信息，便会建立起心理防御机制。这就导致了一个虽然矛盾，但现实中的确经常发生的情况，比如，某种在智力上明显已经被接受了的知识，在感情上却遭到排斥，而且几乎从潜意识中消失，只是因为这个知识未能带来便利。这些情况带有一些精神分裂症的色彩：在同一时刻，一个人既知道、又不知道一件时常发生于现实中的事——尽管这听起来让人莫名其妙。由此，这种情况会逐渐形成某种具体形式的教条主义以及“封闭心灵”现象，亦即对所有争论充耳不闻的状态，正如米尔顿·罗基克（Milton Rokeach）所描述的那样。

所有这些，都形成了理解话语套路的方法的最合适基础，而关于这种话语套路的情形，上文已经阐明。但与此同时，在操作各种有利于认知失调理论、维持“封闭心灵”状态的行为方面，话语套路又是一种出色的工具。这是因为，在回避诸如人生中艰难的现实等尴尬信息

时，人的心灵必然依赖于某种其他事物。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比基于准先验性知识（由话语套路提供，具有稳定性、对干预性经验的超越性）的防御态度更适合的东西了。

在某种意义上，话语套路如此精确的防御功能，是其整合功能的一个延伸，这种功能前文有所提及。从某种程度上讲，将这两个功能彼此区分开来，是一个抽象的过程，因为它们实际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但做这种区分，是为了呈现出话语套路功能的两个不同方面，从而有可能把握住它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中的角色。

意识形态——就这个词诸多意义中的一个而言——指在某种特定的价值体系基础上，诸多观念及其相关态度的集合。意识形态往往勾勒出一幅无与伦比的社会架构，并指出实现这一社会架构的路径。在这种意义上，意识形态永远是对阶级利益的明确表达，以及为完成获得利益的任务而引发的斗争。因此，任何意识形态，都会号召人们为某个积极目标（在实现某些理想的意义上）发起斗争，同时，也可能为消极的目标（从竞争对手的理想出发、并防止这种理想实现）进行斗争。

**任何**意识形态都具有——而且必须具备的——是它的进攻性和防御性，这也是**任何**意识形态都必然包括信仰元素的原因：如果它主要是为呼吁人类情感和超验主义启示，就属于宗教性质；如果它主要是为呼吁由建基于严谨的科学方法的科学实验所推导出的论点和动机，就具有科学性质。在后一种情况中，如果为了推进科学活动的发展，把一个明确观点中的代表性思想总结出来，而且事实证明，这种为了达到特定社会目标而采取的行动呈现出极高的效率，那么即便如此，感情因素同样是不能被忽略的。这样，如果竞争对手的论点被接受，具有认知失调性质的阻力性（resistance）将发挥作用，这便会削弱一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这也从“封闭心灵”角度为教条主义奠定了基础，同时，甚至与由某个特定群体所制定的教条准则格格不入，该群体是诸多群体中的一个，尽管其成员自诩具有彻底的“科学精神”，却是个带有准宗教色彩的集体（从涂尔干[Durkheim]的角度来讲）。这种事情早已发生过很多次，时至今日，却依然可以看到。它们不仅在宗教的、保守的意识形态氛围中发生，甚至在革命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也时有发生，而这种革命意识形态居然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我们可以举出不少西欧的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团体的例子。在四、五十年前的经典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即便如此，这种现象同样会发生于当下，不论是在整个政党、还是在很多政党所谓的正统（即独断而保守）派别中。接着，我们要处理一些在认知失调情况下产生的、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症状。努力的工作，却往往使某些人明明了解某件事，却对它的重要性视而不见。

在每一种意识形态中，都存在比例不断变动着的非理性和自我献身的（voluntarism）情

绪因素，因为如果不结合这些因素，意识形态将无法对其追随者施加影响。在这里，我们必须研究一下意识形态和某些话语套路的结合关系。这两者的作用是互相影响的：处于话语套路影响下的思维，能够强化意识形态的防御功能；在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思维，有助于思维中话语套路的萌生和定型。这是因为，除了处于话语套路影响下的思维，没有其它东西更能够使一个人的思想免受其他意识形态观念的浸染。话语套路是如此的超脱于经验数据，同时，又具有如此的稳定性，以至于使一个人的思维封闭到对反对者的意见充耳不闻的程度，这样，这种意识形态便占据了整个意识。另一方面，任何意识形态，都通过设置灵活的认知失调机制的方式，强化某个人从话语套路的角度进行思维的倾向。如果我们考虑到意识形态和话语套路之间的相互结合关系，我们会立即意识到，话语套路是政治冲突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政治功能，是它们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学界关于政治语言的研究尚未完成。话语套路在这种语言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与政治学相关、尤其是与某些政治语言相关的研究文献日渐增多，但它们只是研究了这个领域的某些表面现象，与经验性研究相比，它们更加倾向于推理性的理论思考。需要完成的，是从经验的角度，对当代重大政治事件中的政治宣传语言进行研究，并借此发掘宣传语言中话语套路的功用。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纳粹领导人的著作中找到难以想象的宝贵数据，其中，希特勒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甚至以理论专章的形式讨论了政治宣传语言的功用。这一章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情绪，作者对心理学知识的透彻理解，以及大众宣传机构通过大肆宣扬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话语套路而营造的效应，都使得这一章极为撼动人心，当然，希特勒并没有按那些话语套路的名称称呼它们，而是以一种非常清晰的表述加以称呼。在政治天平的另一端，我们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材料中也找到了宝贵的资料。从政治领导人的著作，到各式各样的政治小册子，里面充满着大量话语套路，其内容遍及阶级斗争、阶级敌人的形象等诸多领域。从民族话语套路中，同样可以发掘出不少内容，尤其在涉及到那些受历史影响的敌对情绪时。

经验性研究包括两个途径：首先，分析政治语言的来源；其次，在当前特定环境下，分析不同人群对以话语套路为形式的刺激的反应。经验性研究将这两方面的分析结合起来，必将为我们的学科增添许多新的知识。然而，在对政治的本质、及其务实性目的进行理论反思的基础上，问题的实质清晰地暴露了出来。如果政治指的是那种旨在通过影响行政的运作，来塑造社会生活的人类活动，那么以下情况便是可以理解的：政治意味着为争取这种影响力而发起的斗争，同时，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反映不同阶级的利益、志向的政治理念。表面上，这种斗争的形式，往往体现为个人或政党之间为权力斗争（为议会席位、公

共行政工作的职位、组阁权利等等)而产生的冲突。但从更深层次——也是最重要的方面讲，斗争，是为了明确的概念和观念赢取胜利，因为通过提供人类选择的政治动机，正是为了获取不同目的、决定性的政治胜利。显然，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领域的斗争，因为对现实的干预性、实际性思考，总是可以证实或证伪某些观点，但是这些观点仍然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起决定性作用。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尤其是当他们的提倡者通过扩大一个主张不合理信念和观点的心理机构，由此使其成功避开理性观点、和可能存在的证伪时。话语套路正是在这个关节点开始发挥其效果的。

对于政治首脑(无论是一个个体还是一个政党)而言，都应当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不论是无心插柳、还是有意为之，一旦他的对手成功地化用了真理，那么这位首脑便离被击败不远了。一个人投身于政治斗争，为了使群众信服于他的观点正确性，他首先必须使人们相信，为了成功捍卫大家的利益，他将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其次，向大家做出担保，自己的倾向、态度至死不渝，这意味着使人民免于接受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自己在专业人士、知识分子的精英圈子、以及普通大众中的政治影响得到扩大，他必须寻求一条途径，不仅能直通人的思想，还能打动人心，控制他们的感情；一旦取得民众的信任，便总能控制民众的感情。从知识的角度讲，这个过程并没有模式化；但从务实的角度看，这却是投身政治最有效的途径。当人民群众普遍处在沮丧的氛围时，法西斯主义、尤其是纳粹主义便打着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旗帜，巧妙地操控着民众的情绪。只需看看这个例子，便可知道这种途径是多么行之有效。在前纳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未能获得民众的拥戴，并由此展示出当一个人不理解某些东西的时候，他便即将失去的这些东西。如果要使用一个具体的专用名词，重点在于巧妙地处理话语套路，也就是说，去构想(或建构)它们，并通过宣传手段，让它们为民众所熟知，然后，在拥护者中间建立一种特殊的纽带，借此去利用他们，好像在营造一种宗教氛围一般，并通过封闭他们的思想，使其无法接受来自反对者的观念。这些做法，既不优雅，也不迷人，但一个人必须认识到这一切，唯有如此，才能至少具备一点基本的应对和预防能力，以此巧妙地应对宣传的思想浸染。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和反宣传都呈现出有意操纵行动走向的特征，这便涉及对形势的科学性审视。这也是政治在实施的过程中，应当将以科学为基础——或者说依赖于科学方法——作为必需因素之一的原因。

现在，我们已经单独列举出了话语套路的四种语用功能：社会整合，防御，意识形态的构建、以及服务政治。它们之间互有关联，同时又保留了各自的独立特征。**遮蔽社会事实**，是这些功能能够发挥的共同作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将为我们对话语套路语用功能的思考

做个总结。

问题已经被简化为这样一个话题：人类的行为动机，尤其在政治政策的范畴中，总是合理的吗？谈到“理性”这个概念，我们这里用它指代一种动机。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反思人们朝着既定目标而奋斗的过程，同时，这种反思还伴随着一个附加条件，亦即事实必须建立在经验性基础上。我们所说的动机，正是由这种反思派生而来。谈到“非理性”，我们这里指的是那种由情感因素导致的动机，在考察人们朝着既定目标而奋斗的过程时，它不考虑逻辑的因果关系，它根据事实所总结出来的认识，不以经验性的、而是以超验性的资源为基础，由此得出的结论，可能会与从经验出发而得到的结论相距甚远。这种超验性资源体现为宗教信仰与神秘主义启示，同时，也包括各种教条主义中的“老顽固”和“狂热信徒”，他们往往对实际情况置若罔闻，通过认知失调的防御机制，将自己封闭在虚构的意识形态世界中。

这也足以反映出——与那些大行其道的、将这些问题神话化的做法相反——人类行为的动机，尤其对于带有社交目的大众运动而言，不但并不总是合理，而且恰恰经常不合理，仅仅是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产生于一种由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共同构成的特殊混合体。通过群体心理学，以及通过对那些故意挑起、控制群体运动的行为（尤其是政治性行为）的观察，都可以证明这一明显事实。因此，我们指的不仅是歇斯底里的大众示威活动，这种活动基于非理性的动机，而这种动机则源于宗教信仰，同时，也源于自然灾害时期由社会解体所导致的精神恐惧症，如抓捕女巫时期的群体性歇斯底里、儿童十字军东征期间的精神病、大瘟疫年代道德原则所遭受的无情破坏、以及当下伊朗穆斯林的宗教狂热，等等。同时，我们也指那些显然不道德的群体运动，带着愤世嫉俗的情绪，它们故意唤起、煽动、控制民众，例如希特勒建立在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纳粹主义。不幸的是，即使在那些以科学理性思维为指导的群众运动中，这种现象依然存在：我这里指的是当代极左运动，有时指马克思主义，甚至指经典共产主义运动的飞地宗派主义（enclaves of sectarianism）和教条主义，以及更糟糕的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这些活动通过将非理性主义引入社会运动的动机基础的方式，一味模拟那些被正式接受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必须研究这些危害甚广的现象，它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同样十分危险。

在上文我们提到的例子中，我们将重点放在了具有非宗教特征（根据它们十分明显的环境）的运动上，同时，在基于科学基础的理性思维和规划的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将对非宗教运动的研究提升到对政治运动的探讨。在这些例子中，造成偏差的原因是什么？采纳非理性动机的原因是什么？它的运作机制是什么？其认知和心理的途径又是什么？

在分析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借这样一个类比问题来加以解决：什么是客观性

认知，什么是主观性认知。人们往往认为——特别是在他们希望借助科学思维时——他们的认知是纯粹客观的，他们并不打算简单地拒绝那些彻头彻底的主观主义认知，而是准备将这种认识方式完全消灭。然而，一个对此问题的更加深刻的分析表明：一旦考虑到人的认知装置（apparatus）的本性、特别是认知过程的社会条件时，那么，所有认知都同时具备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双重特征，只有在我们认识到事物的实际状况时，才能消除主观因素。

在人类行为的理性动机中，同样含有非理性因素。它们的起源各有不同，视情况而定，但都与人类生活的情感方面息息相关：从包括潜意识在内的独立心理状态（不同类型的情结、与恐惧相关的个体创伤，等等），到社会心理学，尤其是由作为偏见形式的后者（种族、国家、宗教等等）所发起的各种示威、并以话语套路来思考的方式，都足以证明这一点。

我把偏见与话语套路分开来谈，因为我同意阿尔伯特（Allport）的看法：这两个现象相互联系，但彼此不同。话语套路总是在偏见的结构中出现，但它们并不总是具有负面特征，所以并不总是会导致偏见。然而，很难高估话语套路在人类行为动机中发挥的作用：意识到话语套路存在、并影响着人类行为的人越少，这些话语套路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例如人们常说，“爱我家园”、“爱国主义”、“我们民族永远的敌人”、“阶级敌人”、“我们神圣事业的最高价值”，等等；然而，他们不光使用这类表述，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做出相应的行动。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并且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消灭和杀死自己的敌人。催生这种行为的动机是什么？毫无疑问，这些设想（formulation）指涉极为重要而完全理性的认识，但同时，这些设想也指涉话语套路、及后者的所有负面属性：信仰基于情感，往往与事物的真实状态不尽一致，或者至少扭曲了事物的状态，自打诞生之日起，这种信仰便一成不变、刻板僵化，同时根据人类的情感诉求，而对人类心理施加强大的影响。一旦被心怀叵测的政治家所掌握，信仰无疑会堕落为恶劣的武器。激发庸众们的狂热情绪，怂恿他们做伤天害理之事，甚至致使他们犯下滔天罪行，这种事情并不鲜见。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这种事情都极易发生，因为所有这样的设想都同时包括客观性认知因素、以及情感因素，而它们在意识或无意识的层面都具有主观性特征，原因在于，这一设想既是一个概念、也是一个话语套路的名称，两者相互交织，彼此渗透，很难将两者一分为二。这就是一种话语套路可以寄生在一个概念中，在茁壮成长的同时，将自己伪装得天衣无缝的原因。这种话语套路固然危险，但也是在社会范围内化解危险的关键所在。

本文原题为“The Pragmatic Function of Stereotypes”，原刊载于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Language*, No. 45, 1984, pp. 89-100.





## PART II 费鲁齐奥·罗西-兰迪专辑

费鲁齐奥·罗西-兰迪（Ferruccio Rossi-Landi, 1921-1985），意大利符号学家，语言哲学符号学派的创建人。

1958 至 1962 年，任帕杜瓦（Paduva）大学哲学教授，1962 至 1970 任教于美国密歇根安阿伯大学与奥斯丁德克萨斯大学，后任职于意大利的里亚斯特大学。

一生著作极丰，以英语出版的著作包括：

《语言相对性的意识形态》（1973）

《语言学与经济学》（1977）

《符号与非符号之间》（1992）



（费鲁齐奥·罗西-兰迪）

# 罗西-兰迪的大众传媒与意识形态理论

苏珊·佩特里利著

王永祥译

## 一、与语言和非语言生产相关的人化过程

下面一段摘录除了揭示罗西-兰迪理论的总趋向以外，还为我们提供了批评性阅读本节关键问题的钥匙。这段话介绍了罗西-兰迪有关社会再生产符号过程的一般研究的基本概念，其中包括“人化”、“语言与非语言生产过程”、“社会规划”和“意识形态”：

随着资本有机结构朝着有利于其永恒方面的逐步改变，工人的价值已经下降；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变革都变得更为昂贵。这已逐渐证实了非人事物的结构，它仅仅是提及20世纪科技巨大发展的一种方式。但从资本的永恒这一面来看，人本身被压倒了：在生产中人被完全榨干。有必要从人归属的超人的结构去审视人本身。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或许会认为，在新资本主义被宣布生效之前不太可能研究支持非言语行为的无意识程序……人显然是根据所有经济、社会环境中的程序而行动，而不仅仅是在新资本主义环境里行动。如果资本有机结构的新资本主义变化使得证实这种程序成为可能，或者支持它，那么相关的意识能有助于制定新的和更人性化的程序设计。但是，如果规划这些程序的用途就是要具有自由的特征而不是更加精制的压迫，那我们显然必须诉诸于更为普遍性的人与社会的理论；如果要完成规划，就必须诉诸于革命实践。一切的基础都是政治性的。（1994 [1972]：201）

罗西-兰迪关于符号过程、社会再生产和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的两极，表现于他关于人类化和非人类化过程的研究之中——即一方面是成为人的过程，“人化”过程，这涉及人类逐渐出现于历史舞台时生物材料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演变；另一方面是“异化”过程，这首先是从语言-意识形态异化（因而是主体异化）视角考察的（参见Rossi-Landi, 1970; Ponzio, 1992b）。就前一情况而言，对人类的描述是：他们在具有历史和社会特征的符号材料中得

以形成；就后一情况而言，对异化的危险的描述是：人类被他们自己生产的符号所压倒，这些符号是他们在这一特别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中，在市场逻辑和“技术革命”的语境中所生产的。

人化的最早期符号出现于某些高级灵长类动物开始劳动和生产物品之时。劳动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具有两种不同而又相关的类型：语言劳动和非语言劳动。在人类世界里，若没有语言劳动，非语言劳动是不可想象的。反之亦然——语言劳动除非与非语言劳动联系在一起，否则也无法产生。罗西-兰迪在其早期作品（1998 [1961]）中就发现了非语言物质生产和语言物质生产之间的一种同源关系；这样，他为他理论化的同源法奠定了基础（Rossi-Landi, 1998 [1961], 1992b [1968], 1994 [1972], 1985a）。

劳动总是与符号系统相联系，这些符号系统依据某一社会规划而运行。劳动具有目的，并导致产品；同时，产品预设着劳动。活动是没有产品的输出；因此，它留下的仅仅是痕迹。劳动决定了预设着意向性、社会规划和意愿的变革，这种意愿调整着劳动的供应，尽管劳动者本人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即使劳动者没有意识到他生产产品的目的，但他的生产能力——往往是通过无意识学习过程获得的——却未必受到影响。有意识的生命和无意识的生命都是通过符号阐释工作而形成——即，通过人化过程中的劳动而形成。弗洛伊德曾提到过“梦幻的劳动”。但意识的程度是次要的，因为所有社会行为都是根据某一社会规划而进行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学习活动的结果。

人类、社会现实和劳动（包括语言和非语言劳动）同时出现，互相交织。我们必须以劳动开始：罗西-兰迪认为，正是劳动从一开始创造了社会维度，劳动立刻成为劳动与产品的混合物，劳动立刻以各种交换形式而出现。随着生产网络的扩展，劳动分工和交换——罗西-兰迪赋予其人类起源价值——变得更为复杂和清晰。一旦有了制定的各种预设着劳动规范的交换秩序，人类便开始出现了。人们已经识别出三种交换秩序：信息的交换、商品与劳务的交换、女人的交换，后两种也涉及信息的交换。罗西-兰迪说，人类个体就是这样通过劳动规范，通过渐趋机构化的交换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因此，通过语言劳动和非语言劳动的结合，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言语和非言语阐释性工作，人类获得了社会和历史的规定。

## 二、符号学视域下的语言与意识形态异化批判

罗西-兰迪关于符号过程、社会再生产和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的另一极，关系到异化问

题，因而关涉由资本现实和身份逻辑统治的世界里的非人化问题。劳动者也是语言劳动者，“完全沉浸于一个自然世界，过量生产的产品已经将这个世界转化为市场；在这里，操控大量的符号系统已经将他们从人类转变为消费者”（Rossi-Landi, 1982 [1978], 英译本：238）。人类原本是积极参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言语和非言语符号生产的主体，却转变为被自己生产的产品压垮和榨干的消费者。人类劳动忘却了自己的作品，忘却了劳动本身的意义。这便导致意识与实践的分离；其结果是社会和语言异化的情形，这涉及到“他性的牺牲”，这是资本和市场逻辑的核心特征（参见Ponzio and Petrilli, 1999: 35-52）。

关于这些过程，罗西-兰迪提出了主体性批判，建议恢复人类劳动与其产品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方法中包含了许多关于发展批判性哲学的建议，这种批判性哲学基于包含他性的人文主义中的马克思思想。他在阐释资本和市场逻辑的努力中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使意识“去异化”，恢复主体作为真正的人类主体的特征（参见1992b [1968], 英译本：83-106）。这涉及到恢复某些真正具有人性的价值，例如批判性意识、责任、创造性、自由——用巴赫金的术语，可以描述为“对话性应答”的条件，可以描述为“绝对他性”的主要条件（见第三章有关巴赫金的内容）。

在有关主体建构的研究中，尤其有趣的是罗西-兰迪的“一位作家的意识形态研究标准”（以意大利语写于1976年，现收录于Rossi-Landi, 1985: 第八章）。在这里，如同之前的巴赫金一样，他对文学文本进行分析，视其为真正人的价值形成的最可能的场所。他阐述了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是从强调作者/主体着手，在最初形成作者/主体的语境中恢复他；这有助于克服对作者/主体的盲目崇拜（参见同上：187）；相反，第二个方法强调作者/主体的历史-社会语境及其摆脱即时语境的能力。罗西-兰迪对影响主体/作者的因素与主体/作者获取超额的能力作了区分。超额存在于主体/作者为了建构一个不同于自己但好自己的社会而产生的新价值；这些新价值传递给了读者。我们对主体/作者及其作品的意识形态特征的评判可以通过重构主体、社会语境和超额之间的关系而进行，此时要记住一点：在使用“超额”这一概念时，罗西-兰迪——非常像巴赫金，但独立于巴赫金——是在研究外位的概念（巴赫金的局外人）。用罗西-兰迪的话来说：

文本可以看作发生在舞台上的活动，因而指向布景。所有的文本都包含或暗含舞台与布景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自己的研究中很大一部分是重构这种辩证关系。假如作者在他自己的社会再生产方面有一些超额，那就好比舞台灯光朝着舞台背景

延伸了一些；如果他将自己局限于重复获取的价值，那就好比舞台布景往前进了一些，从而把布景本身与舞台混在了一起。（Rossi-Landi, 1985a: 191）

罗西-兰迪指出了他的研究中两个主要参考领域：一方面是普通语言学、分析哲学和美国符号学，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外加精神病学和心理分析方面的读物（与恩佐·高利诺的会谈，1969，现收录于Rossi-Landi, 1994 [1972]: 210-94）。罗西-兰迪从这些领域借用了一些概念工具，构想了一个人类“全球科学”的项目。这种研究并未宣称无所不知；它只是确认已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全球性”并将其理论化。此外，全球性要求，研究世界的科学都要具有全球性。罗西-兰迪以其同源法揭示了相互关联对于整个符号宇宙和对于特定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要性。他描述了如何识别下述同源关系：语言与劳动之间、语言劳动与非语言劳动之间、我们今天所谓的非物质劳动与物质劳动之间、语言学与经济学之间（1992b [1968], 1975a, 1985a, 1992a）。

罗西-兰迪以非语言物质生产与语言生产之间的同源关系为先决条件，从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视角分析了社会再生产，商品被视为符号和信息，而不仅仅是单纯的脱离社会关系的商品。在这样的语境下，他引入了一系列新颖的概念（如今是非常相关的概念），例如“语言劳动”、“语言资本”、“语言货币”和“语言异化”。在努力恢复人类行为的普遍性、恢复意识与实践之间的关联时，他将商品解释为信息（受马克思《资本论》启发），将信息解释为商品：“人们从各个不同方面谈到信息转变为商品，”在一次会谈中他这样说着，并冲着本杰明、克劳斯、阿多诺、霍克海默尔、马尔库塞、戈德曼、列维-斯特劳斯、古尔维奇、列斐伏尔等等点头，因此“为什么不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呢？为什么不将信息即商品的解释和商品即信息的解释置于同一层级？为什么不尝试一种统一的解释？”（参见1994 [1972]: 214-15）。

在意欲建构一种具有历史取向和唯物主义取向的普通符号学的项目中，罗西-兰迪提出了如下假设：生产系统、符号系统和意识形态相互关联，同步发展。根据他的描述，语言与意识形态依据某一特定的社会规划彼此之间具有辩证的联系，两者根本区别在于：意识形态一定涉及符号——事实上，意识形态唯有通过符号而产生——但并非所有符号（信号甚至更少）都具意识形态。此外，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这种固有的相互联系恰是他阐述符号和意识形态、将主体从社会异化中解放出来的项目的先决条件。他的一个可行的假说内容如下：

恰是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或者以更为一般的术语来表述，是符号系统和异化之间）密切的相互联系蕴含了引入语言学上（符号学上）去异化（去意识形态化、去神秘化）的程序的可能，最终目的是将语言劳动者（即作为语言说话者的人类）从主导性的共识网络中解放出来，促成新的共识，实现建立新型社会的计划。

（Rossi-Landi, 1982 [1978]: 197）

符号不仅传递而且生成意识形态。这样，语言、意识形态和相关的主体概念唯有通过符号批判方可去神秘化，这种符号批判可以分析某一特定社会语境（即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某一流程）中的符号生产、符号交换和符号消费。罗西-兰迪意欲建立“新型的、更为人性化的程序”，作为他的项目的一部分，目的是发展一种新型的、更有意识的人文主义，它强调人类的符号维度，更为重要的是，它强调符号过程的人类维度。他要将符号学发展为解释性的、批判性的科学，对此作出了贡献；这样的科学就规范符号行为的社会规划随时采取自己的立场。这必然涉及到放弃被错误地等同于科学性的新实证主义的中立立场。根据去整体化的世界观来看，根据这样一种认识：人类行为是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而程序化——因此这种程序化具有历史和社会规定性，具有政治取向——符号学的位置就是批判文化符码，并制定替代性程序。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符号学、语言哲学之间的关联有助于突显人类的社会关系，在人类那里，以前仅仅存在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符号之间物化的关系。这一联系也指向意识形态与符号之间在理论层面上的互相蕴含关系。言语符号不仅是传递意识形态的手段与工具，而且是生成意识形态的场所，是创造意识形态的材料。意识形态现实是符号现实：哪里有人类的社会符号，哪里就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反之亦然：凡是意识形态的东西都被赋予了符号价值。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以隐喻的方式描述了意识的符号意识形态性，把意识描述为由社会符号材料构成的、连续不断的对话链。

这根意识形态的链条在单个意识之间伸展着，并将它们联系起来。毕竟，符号只产生于众多单个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单个意识本身就充满着符号。只有当意识充满意识形态的（符号的）内容，因而只有在社会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意识才能成其为意识（Voloshinov, 1929, 英译本：11）。

非常类似于“无限符号过程”（皮尔斯）的概念，非常类似于依据他性逻辑、在解释项符号与被解释项符号的对话互动中形成的“解释路径”理论（参见Ponzio, 1990a: 15-74; 1993a: 177-220），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将符号的意义置于它与解释它的符号之间的关系之中加以识别。无限延长的符号链永远不会被打断，形成了客观的和社会性的意识与意识形态材料。这些并非脱离于外部公众世界的内部心理过程的结果；因此，意识与意识形态材料绝不是个人的、绝不是主观的东西。与以单线因果关系机械地解释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相反，符号学与语言哲学，连同历史/辩证唯物主义，都告诉我们：个人的意识是社会意识；还有，普遍的社会现实——从社会性的生产关系层面到意识形态与知识的生产层面——就是符号现实。的确，知识和语言的获得只有在某一特定的符号意识形态语境（即：构成社会交际并成为社会交际特征的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以符号为中介的、对话性的、辩证的关系）中才有可能。

### 三、社会规划与多媒体传播

在本章开头引用于《符号学与意识形态》（Rossi-Landi, 1994 [1972]）的一段文字里，罗西-兰迪清楚地告诫我们，要谨防如下危险，即无意识地屈从于社会程序，屈从于看不见的“精制压迫”的形式，这种“精制压迫”形式带有神秘面罩，并被反常地误以为是解放实践。如今，大众传播工具的广泛影响，以及构成多媒体传播网络基础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广泛影响，代表了这种危险。

由于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这种多媒体传播网络正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这已经催生了一种社会文化现实，这是通过充斥于网络的信息构建的现实——这些信息从数量、即时性、速度和流通等方面来说都是史无前例。例如，电视正在提供无数的频道和服务。我们可以在不同的频道和节目之间遥控切换，并创造我们自己的互文本；我们甚至可以创造和传播自己的节目。

先进的科技（尤其是在过去30年左右时间里）已经在电子信息领域带来真正的“革命”，这不仅在专业领域，而且在日常生活（包括休闲时间）中，都产生了影响。由于大众媒体和电信的无所不在，由于电脑和其它高科技产品的广泛使用，通讯网络变得越来越强大，通过一种似乎具有自我再生能力的过程达到了庞大的比例。由于各种服务和链接——调制解调器、便携式传真机、移动和卫星电话、电子邮件、因特网（我们通过这些可以查阅卷宗、预订旅馆房间、甚至开办公司——“虚拟公司”现在已成为现实）——每个人获取通讯网络都不



再有时空障碍。

由于科技的进步促进语言劳动和非语言劳动的发展，人类的符号达到了越来越高的表意（表示复杂性和社会符号物质性）水平。表意过程中的符号活动越复杂，符号程度越高，那么，在人类符号过程中促进人化过程的社会要素和生物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的反馈机制的效果就越强。不妨考虑一下这样的情况：或许不久就有可能将人体与人造器官融为一体；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那半机械人将成为事实，而不是科幻。再考虑一下诸如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核事故，或是获得授权的、对不知名的人进行放射性影响测试的实验，所带来的广泛而又破坏性的影响。绝不可以让技术革命蒙蔽我们的眼睛，从而看不见负责任行为的必要；健康的符号过程，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符号过程，这个星球上的生命的未来，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负责任的行为。在这里，我们不可忘记，承担责任的能力是我们作为人类、作为“符号动物”（即：被赋予了叫做“语言”的独特的第一模拟装置的动物）的生物构成的一部分（见12.1.2）。

在大众传播和电信层面上，先进技术和符号信息量的增多带来的一个直接的负面影响便是信息超负荷和信息消费主义的产生。我们还得评估一下社会异化的危险程度，以及将市场上的产品（无论语言还是非语言产品）神秘化和物化的倾向。随着生产的信息冗余部分越来越多，作为主体的个人尽管积极参与了生产过程，却也越来越不堪重负——因为参与未必是有意识和有目的性的。人们以为语言劳动者会免于技术革命的负面影响；就连他们也以各种方式促成了世界范围的符号市场的蔓延，在这个市场中，意识与实践在一个生产周期里变得越来越分离，生产目的是生产本身，它基于实施市场价值却损害人的价值的理念。

至于作为使用者-消费者的主体的地位，很明显，传播网络不受控制的发展无法保证更高层次的批判思维、创新、负责任的参与和自由。相反，主体有屈从于看不见的、对应于资本和市场逻辑发展的意识形态形式的危险，因而有屈从于压迫和剥削形式的危险，这些压迫和剥削形式因为在整个全球性的社会再生产系统中“无形的”传播而未被人们意识到。这样一种状态要求我们反思这样的问题：获取自由流动的信息能否让我们控制思想和符号市场？电子设备与使用者-消费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主体究竟是自己创建自己的文本，还是作为体制中的、作为从特殊阶层利益考虑的社会经济生产过程中的、作为某一社会规划和意识形态中的没有自己思想的仆人，屈从于符号市场的产品？现在的情况是有利于批判意识的发展，抑或是滋生新形式的社会异化？是谁在控制调节信息的生产、交换和流通的传播渠道？其目的是什么？那种控制实际上捍卫了什么价值？

诸如此类的问题要求我们考虑信息传播、意识形态和社会规划之间的联系。如果我们希望其答案具有科学和伦理上的有效性，我们就必须超越符号市场的副现象层面去考察符号生

产过程以及为其定位的社会规划。罗西-兰迪将统治阶级定义为“对某一社团的言语与非言语信息的发布与传播实施控制的阶级”，他的这一定义得到了今天的社会现实的支持；他关于基础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具有符号中介性质的理论也是如此。

统治阶级决定哪些程序和意识形态可以调节某一社会的整体行为。意识形态就是社会规划，而主导某一社会的社会规划是由当权的阶级制定的（参见Rossi-Landi, 1994 [1972]: 203-4）。我们可以效仿罗西-兰迪，将统治阶级看作控制传播渠道，并为信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制定规则的阶级。这样，在西方的“民主”中，大众传媒是社会规划的主要场所。因此，大众传媒在全体大众毫无思想的支持下行使社会权力和控制。的确，大众传媒在构建共识的过程中已经显示其强权与无所不在的特征，在开始于1991年海湾战争的新世界秩序中，大众传媒就成功地传播了战争之“正确与必要”的意识形态（参见Ponzio, 1995a; Ponzio and Petrilli, 2000a）。

#### 四、文化资本与社会异化

在当今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社会再生产中，文化体系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这有几个重要的影响。第一，很难将意识形态利益与资本发展中的客观的物质利益分离开来。意识形态融入到生产过程的整体之中，并促进利润的生产。第二，鉴于文化是由符号构成的，意识形态不可能没有符号而传播——事实上，意识形态不可能没有符号而产生——文化体系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便涉及言语和非言语符号的生产——其作用在当今的社会再生产中越显重要。“文化资本”这一说法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它是当今现实的反应。语言和非语言劳动生产并发展着文化资本；如同所有生产资本的过程一样，在一个生产周期中，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反过来又增加文化资本。所有这一切的发生，主体都不一定意识到劳动最终的成品；更为重要的是，主体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之所为可以归类为劳动。罗西-兰迪说：

人付出了劳力，却没有意识到他为了某种目的而付出了劳力，因而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劳动。其目的如果是由一个未被意识到的社会程序强加的，那它或许就是超个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有别于意识冷漠或无意识地执行计划的活动。

（1967-72, 15/16/17 [1971]: 22）

如前所述，我们正在描述的这种状况直接的暗示就是：服务于资本发展的意识形态是看不见的，而且，在我们大多数行为中反应出来的剥削大多是难以觉察的。当今时代——即：全球化时代——是最难以批判意识形态的时代，因而也是最难以分析社会异化的时代。从这个视角看，跟大众传媒相关的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与审查制度有关，微妙（不是非常微妙）的审查形式在无人注意和没有争议的情况下渗透进入传播网络。在这样的网络中，审查制度促进了被异化主体形成的过程。全球性传播给我们呈现的往往是一个统一的、独白性的整体，它即使不会致使批判性思维完全不可能，也会使它非常困难。跟它形成对比的是一种基于他性逻辑，（因而）是非冷漠差异逻辑的多元对话性体系。

大众传媒技术的主体往往会屈从于符号市场的需求；这样，主体的他性，主体的独特性，服从于身份逻辑。获取传播网络给人以自由的假象，而此时主体实际上承受着充斥于市场的自由流动的符号和信息所带来的无形的剥削和压迫。多媒体资本的利益大幅度地调节文化现实。然而，当宣告意识形态“危机”抑或甚至于意识形态“末日”时，当“异化”、“阶级利益”、“社会剥削”等表述被宣布落伍时，这些问题很容易被忽略而不加追究。当今的文化体制实际上需要一种文化资本再生产循环的批判，这种批判应重点关注符号、意识形态和普通社会规划所发挥的作用（参见Rossi-Landi, 1992a）。

符号和意识形态正越来越多地涉入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结果，个体已经承担了一个必须重新审视的角色。主体会无意识地融入到该主体自己也不知道其目标的过程；“异化的主体”这一术语对此无法完全解释。“异化的主体”想当然地取了主体概念，而事实上，这个概念因其特别的意识形态特征需要受到质疑。就“有形的异化”而言，主体受到忽略、谴责、被社会宣称为反常、病态、“精神异化”，因而对整个体制毫无用处。“无形的异化”——即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如今关注的不仅仅是工厂里的生命；它延及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社会生活空间。不同于“有形的异化”，无形的异化服务于整个体制。于是，就“言说”主体而言，我们至少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异化：一是心理病理异化，它对应于我们所说的有形的异化；二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这种异化将异化的言说者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劳动者置于同一层次。

## 五、符号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

当罗西-兰迪正在发展其学术思想时，社会再生产过程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言语与非言语交际——即言语与非言语符号——在资本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资本主义宣布自己生效之前，还不可能研究构成言语和非言语行为之基础的社会规划。同样，在资本主义获得充分发展从而削弱资本的有机部分（即：劳动者的价值）之前，还不可能使资本主义经济去神秘化，并进一步揭示生产过程中主体被剥削和压迫的状况。在本章开头引用的一段文字里，罗西-兰迪宣称（Rossi-Landi, 1994 [1972]: 201），“人显然是根据所有经济、社会环境中的程序而行动，而不仅仅是在新资本主义环境里行动。”新资本主义对资本有机结构的变革使得这种程序的面纱有可能得以揭开。

当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再生产周期在技术上非常先进，以至于很难看到程序设计过程以及这些过程中的主体。“意识形态的终结”已经被宣告；对异化和剥削的批判已被斥为时代错误。社会再生产系统已经被神秘化，并装扮成人类历史的自然结果；这就给人造成这样一个总体印象：该系统是无法逃脱的；因此，批判或革命实践的项目被斥为不切合实际，被斥为乌托邦式的幻想。

在社会政治层面，意识形态的终结已经被宣告。然而，事实上，这个时代已经随着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及两者的影响而被深深地意识形态化了。但宣告意识形态的危机或终结就相当于根据虚假的意识、虚假的思想和虚假的实践（这些都具有“无形的异化”的特征）而采取强烈的意识形态立场。这样的立场是很难去神秘化的，除非将意识形态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符号批判结合起来。拒绝意识形态的概念就意味着认同既定秩序；这样的态度服务于这个体制，但对批判，因而对替换性社会规划的发展、对解放实践都是致命的。

在维持新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实践背景下，电信和大众媒介——这是表示基础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符号中介关系的绝好表述——的作用相当关键。被利用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电子革命是一回事，意识的革命则是另一回事，尽管这两者未必互相排斥。正如罗西-兰迪所说：

新的意识和新的心智的建构将会体现于所有的实践层次和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但若没有全新的社会实践制度，这样的建构也无法完成。它涉及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构，包括将所有主要的符号系统替换为更适宜的符号系统，从而为创造可以生活于新社会关系之中的新人类奠定基础。在相当一段长时间内，这项任务必须优先于其它所有事情。这项任务的最核心内容就是政治的首要地位。所有真正的革新家最深远永恒的职责就是慨然投身于这项任务，无论他们宣告自己为“革

命者”与否（革命者这个角色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在实践——理论——实践这样一个辩证的循环中的任何地方，只要他们的个人努力做出了贡献，他们就履行了自己的职责。（Rossi-Landi, 1982 [1978], 英译本：344）

在符号学的语言中，在解释项符号层次，当解释项符号与被解释项符号之间建立了对话性批评的关系时，革命就完成了。这个关系植根于他性逻辑和能指过度，而并非处于可产性的层面，或者为基于身份逻辑和一般差异的系统服务的层面。他性、对话性和创造性等价值构成了逃避生产逻辑的条件，因而也构成了批判主体性和社会、语言异化的条件。解释项之间基于他性、对话性和创造性的关系使得主体抵制消极融入一个原本自然的自我再生的系统。

假如人是符号，假如符号属于一个或多或少异化的环境——即罗西-兰迪（同上：242）所说的“虚假意识和实践的环境，它也是在话语层次上表达自己，因而变得真正意识形态化了，或者说，从我们谈论它那一刻起，它就是这样了”——那么，我们要想克服社会和语言异化，摆脱非人化过程，就要建立一个符号、语言和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我们所提倡的方法是基于对话性、他性和应答性理解的逻辑，基于外位逻辑。这样，它也许有助于打断生产、交换和消费周期的狂热节奏——这个周期是服务于维持现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这样，我们也许就能够维持创造性、差异、自由、非异化的自我和真正的人性。

本文原为From Susan Petrilli 与Augusto Ponzio合著的《Semiotics Undounded》一书中的第六章第三节，原题为：“Communication, Mass Media and Critique of Ideology”。根据此书后记，选载于此的第六章，原为Susan Petrilli所作。

# 符号系统与社会再生产

费鲁齐奥·罗西-兰迪著

周劲松译

## 一、作为一切事物原则的社会再生产

社会再生产是一整套过程，社群或社会因之而得以生存、发展，或至少因之而得以延续。这个概念具有强烈的经济内涵，因为每个人在最低水准上，都必须吃、喝，并保证自己不受恶劣天气侵扰。所以，社会再生产的核心在于对物品的生产，以供即时消费（在最初，是对大自然所提供的东西加以利用）。但是，即使是在原始水平上，生产这些东西的活动也绝对无法完全把社会再生产包括在内。即使是为了满足即时的物质需要，个人也必须结为群体，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启动了其他社会过程；同时，即使是在社会发展的基础阶段，物质性物品本身并不即刻被全部消费，而是在大多数时候，都被放置一旁（被累积起来）供未来的消费之用。这还涉及到同一群体中个体之间的组织形式。所有主要过程都是在社会中进行，并不仅仅是那些直接是生产方面的而已，它们从一开始便一起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 （一）社会再生产，社会实践，以及历史

我们该如何把社会再生产这个概念与其他或多或少指向同一领域的其他一般性概念联系起来呢？我们应该通过对以下两个概念的思考来回答这个问题：社会实践和历史。

如果我们考察某些常见的说法，例如，“人创造历史”<sup>①</sup>，“推动历史的诸种力量”之类，我们发现历史处在互补对象这个位置，是人类根据种种方式，并通过重复其自身的各个工具阶段所施行的工作的产物。社会实践这个概念似乎反而主要是指，人作为加入到社群中的成员所做的事情，所起的作用。社会实践被看成是人的实践，人被看作历史主体，看作作用于自然亦作用于自身的施为者。这类说法是（通过对其余部分进行辩证搁置而）单独地对人进行思考，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是脱离自然的。其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社会实践的一个根本性的方面，就是对自然资源滥用和剥削。甚至自然也不能被排斥在社会再生产这个概念之

---

<sup>①</sup> 显然，诸如此处的表述（指用 man[人，男人]来泛指人，人类。——译者注）可能会被认为有性别偏见。此非作者意图，之所以沿用，是给出其替换说法这种工作会碰到有待圆满解决的种种困难。——作者注

外，因为为了自我再生产，社会必须使用自然为其提供的东西。

根据这些思考（其他的在此且搁一旁），似乎有可能根据一种基于生产劳动基本框架的三分法，把这三个概念归入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现实方面：

**社会实践：**社会中人所从事的工作。它把人本身和已经被人所改造的自然（过去的历史）作为材料和工具。

**社会现实社会再生产：**一种巨型设备，即，人所创造和建构的一种工具性组织。该设备由人本身和自然构成，被用作材料和工具。

**历史：**社会实践产品，通过社会再生产而产生；历史，渐次地，把人和自然理解为产品。

要注意的是，这种三分法来自对社会再生产历史过程的直接切入。它以共时性的方式代表了这个过程中的每个特定瞬间。之前的产品始终已经作为材料和作为新工作的工具而已经在场。按照这种方式，有可能消除“创造历史的人”、“作为超个人力量工具的人”、“作为历史产物的人”以及诸如此类平常说法中明显存在的矛盾。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人通过使用自我来生产和再生产自我——*即使在总体上他们并不知道怎么做到*。如果生产劳动的基本框架得到辩证地运用，许多无用的纷争就可以避免。实际上，每种东西都可以是工作，或者工具、产品；而且可以是新工作发生于其上的材料。

可以用其他各种形式表述。众所周知，三个基本环节——阶级斗争、自然实践领域和科学研究——是在社会实践中得以区别的。社会再生产基本上被以生产、交换和消费来表述。我们后面会回到这一点上来。历史让自己落入过去、现在和未来这种即刻的三分法，其中，现在不断地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做出沟通。后一种三分法的作用之一，是让我们能够在保守与革新、真实与可能、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做出辨别。

就本文目的而言，我们最感兴趣的方面，是作为社会再生产而被表现在这个框架中的工具性方面，只要我们能够将其与社会实践和历史区分开来。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记住，这三个概念，单独地，常常被作为同义词使用，能够被用来囊括，或者至少通过内涵意义表示整个领域。显然，这一个无法脱离另一个而存在，同时，它们所总结的种种关系也始终是即刻性的，因此只有通过使用即刻的共时性切入才可能使之各具特色，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三个概念的确几乎是殚精竭虑地彼此覆盖。所以，采用“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这个组合表达，不仅有强调其工具性方面这一定义作用，而且有使其能够不遗余力地表现总体

性——它就是总体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定义作用。

## （二）关于社会再生产编目的想法

一旦我们把目光转向作为历史生产机制的社会再生产，试图按其根本脉络对其作总体了解，面对它那无穷的复杂性，我们会为之瞠目，难以呼吸。没有不属于社会再生产的東西。在描述的意义，在原则上，这都是事实。对社会再生产的描述性方法，有可能让我们编制出关于所有主要人类活动的某种巨型编目。这立刻就提出了区分主要活动与次要活动以及建立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要系统地着手这样一种编目，哪怕不限于本文也是不可能的，值得记住的是，这样的编目不得不至少包括以下各组一般性编目，以及对其关系的研究，还有，如果这些编目中这条或那条从所描述的总体性中抽出，那么，关于存在的那种社会类型又该做出何种假设？

1. 从食物开始的维系生存之物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模态。
2. 对社会成员能在其中满意生活的环境的选择、使用或建构。
3. 给孩子传递语言、非语词（non-verbal）及后语词（postverbal）的符号系统、礼仪、民俗、风尚、基本价值观，以及对于社会群体要么是有用、要么仅仅是为其所用到的每种其他符码。
4. 在所有可能的层面上、为所有可能目的的关系所组织的社会成员关系。
5. 关心处于特殊条件下的人群，无论其是否频频出现：婴儿、孕妇、老人、弱者以及非正常者（显然，后者根据关于正常和服从的统治性标准判定）。
6. 赞成、控制、促成或单纯地容忍诸如艺术、音乐、文学或口头传统、哲学或世界观、宗教、科学或准科学研究、不同技术等等其他社会活动的传播和发展。
7. （从事未被列入上表的其他事项。）

编目这一想法中内在的经验—描述因素，可以用作针对种种样式的抽象与偏见以及其他纯理论性建构的矫正器。这些样式和建构，在经历过对现实的完全描述所发起的冲击之后，剩下的那些，将会是真正普泛性的而非普适性的，是建构性的而非简单化的。

## （三）作为一切可能范畴所构成矩阵的社会再生产

这里，我们且来看看——哪怕是短短一瞥——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能肯定地断言：



一切，在原则上都属于社会再生产。这当然不是唯心主义意义上的。社会再生产不是意识、语言或思想，而是不同方式中的若干物质性过程所构成的总体，它真正发生在地球这个星球上，意识、思想和语言都不过是它的产出之物（这里可以参看 Trãn duc Thao 1973）。当然，我们并不是坚持认为岩石和树木也都不是“因其自身”、作为“外在之物”，或者——如有些人常说的——“独立于思想”而存在；也不是坚持认为地理的东西不先于生物进化，生物进化不先于社会的存在，按照这种方式，先来的在时间上完全独立于后到的，后来的在时间上完全独立于再后来的。思想与现实之间这一区别本身，根本就无须质疑，与之类似的那些传统的对立与区别，也根本无须质疑。相反，这里所坚持认为的是，任何对象，每个对象，无论其存在的顺序或类型，始终都是在社会再生产之中被个体化、被认定和被采纳。所有这些话，从其对象的构成开始，都是人类话语，并因此都是属于社会再生产的。关于自然在人之外，人在自身中发现从生到死自然都是一种真正的制约力量，这种相同的认识始终是一种认识，一种看待和解释现实的方式：简单地说，始终都是人在其思维中创造出来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自然不过是人的发明，没有社会，是无法想象的，并因而逐渐受到生产和制约人的一切的制约。这可以通过关于自然有并继续有多种不同认识这一事实得到说明。即使是在我们寻求“与自然直接的、自发的接触”之时，我们的思维加工，甚至我们的感觉和态度，也都遵循严格的意识形态路径，而这些路径，正是我们所从属的社会为我们建构的。任何理论，无论是关于自然的那些，还是关于人、社会、历史等等的那些，始终都是内在于、而非外在于社会再生产的。社会再生产绝非按照某种理论发生，而是社会再生产生产和使用为自身目的服务的理论。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再生产属于基本范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切可能范畴所构成的矩阵。在真实性上，在方法论性质上，这都是一切事物的原则。这条原则并不仅仅，像赛勒斯的水那样\*，是对象化了的现实的组成部分而已；它也不是被贬低为自然的整个现实，像种种形式的自然主义中那样；它也不是某种一劳永逸地超越自然的东西，像种种形式的有灵论和唯心主义中那样。“原则”（principle）就是现实本身，是自然和历史因素的综合：人一直以来在建构着的综合，人一直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有意识的形式在生产和再生产着自身。这种综合为时间和空间中不断的变化所影响。这些变化不仅对于所有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原则上是不可被否定的。要跳出以这种方式变化的该过程是不可能的。“从外部来描述事件”这种想法是没有意义上，这充其量是不折不扣的比喻说法。以一种形而上学的和神秘化了的形式，资产阶级思想——以黑格尔为集大成者，已经得出了这一结论。于是，让我们最感兴趣的，必然是每种特定情形中决定作为自然和历史因素综合的社会再生产

过程的那些真正力量。

即使是临时性的和非专门性的，所达成的结论也许允许我们用下面这个框架来替代上面那个三分法图表。简单表示如下：

作为工作的社会实践

社会再生产，既包括社会现实，又

包括自然

有着其内部表述的用于历史生产的设备：即，在其工具方面中来看待的社会再生产本身

作为产品的历史

## 二、对社会再生产的论述

出于对本文普及程度的考虑，显然，如果要对社会再生产说得更多些，采用简化了的标准是必须的。问题在于，在社会再生产的核心找到具有充足内容的某些区别，以免空洞无物，同时，又足够正式，能够独立于社会—历史内容的不断变化进行重新利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杰出贡献，体现于它发现了这种区别，并继续推动着这些区别的发展。通过采用适当的简化标准而获得的每个区分系统，为了进一步的研究，可以采取模式形式。这里，我们指出三种模式，它们各具特色又相互关联，可能对我们的目标是有用的。它们是：对生产、交换和消费的表述；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立；生产、符号系统与意识形态的三分法样式。头两种模式已经属于，并将继续完善于，已经存在的各个学科，第三种模式则是面向创新或集成的一种尝试。我们必须重申，这是一个关于三种模式的问题，它们绝非彼此排斥，而是通过以一种互补的方式投入同一现实的——或者，更应该说，现实本身的——各个方面而彼此协助。

### （一）生产、交换和消费

每个具体社会再生产事例的三个主要环节，就是生产、交换和消费。在个人的层面，在集体的层面，都可以把这三个环节彼此分辨出来。吃苹果的人既不买苹果，又不生产苹果。造汽车的人本人既不买汽车，也不用汽车。购买、交换或销售某东西者，须得不是同一货品的生产者或消费者。社会活动的不同复杂方面对应着个人的这些不同位置，个人是这些位置

---

\* 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公元前624?-546?）认为物质由水组成。——译者注

的建制性的发展，包括工厂和企业、分配网络和商店以及消费者。尽管消费最终是在个人行动中实现，但这并不改变以下事实：有专门的社会实现方式，只以公司的方式运作；受益者始终属于其消费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即使在最小的细节方面，由生产和交换所决定的社会群体。

生产、交换和消费不可分割地在一种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彼此关联，这一点，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的“引言”中就明确加以揭示。它们属于同一总体性；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在脱离另一个的情况下存在。它们的统一是辩证的，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相同的。有了这种强调现象方面多样化的统一性，于是，处理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实际上，就意味着处理其余的两个。因此，消费者促进了生产与交换，交换者促进了生产与消费，生产者促进了消费与交换。中介开始发挥作用，使得一个之中的行动波及另外两个。这些中介活动可能现实中是缓慢的，并且可能受到种种边沿削弱和现象性激增的影响。然而，这始终是一个关于物质中预先设定了的、不可避免的中介活动的问题。

必须强调，这三个环节并不单指所谓的物质性物品，注定是为人类个体体质的延续为服务的，而且也指所谓文化与精神货品，它们并不即刻地是物质的，譬如语言和每种其他社会建制，价值体系，以及对社会体系中个体的分配和组织。一切都被生产、交换和消费。无物能将自身从被生产、交换和消费中抽离。说得离题一点，按照半神学式的说法：即使世界和天使，也都是被生产出来的。的确，上帝也许能够被定义成不是被生产出来的唯一的存在，是绝对的生产者。神谱学是自相矛盾。自然而然地，所有众所周知的困难、以及众所周知的稀奇古怪，譬如关于上帝是最伟大、最严厉独裁者的看法，以及上帝因为不受任何节制而绝对“恣意妄为”的看法，都是由此而来。

交流的主根就在交换这个环节之中：这里的交流，即语词和非语词信息的交换。正如其他所有一样，信息必须被生产，被消费，以及被交换。因此，在交换的一般性维度中，我们就有了信息的消费、交换和消费（对此，参看“社会再生产的同源性”[“*Omologia della riproduzione sociale*”, Rossi-Landi 1972c]、“语词与物质性符号系统言论集”[“*Articulations in Verbal and Objectual Sign Systems*”, Rossi-Landi 1974e]以及《语言学与经济学》[*Linguistics and Economics*, Rossi-Landi 1975b]第二章）。为其他方面引入同一类型的二度分类是有可能的。在下面的第三种模式中，我们将重新引入符号系统这个概念，并回到信息交换这个环节。

## （二）结构与上层建筑

社会再生产中给出了一个根本性对立，它贯穿生产、交换与消费这个三分结构，把社

会再生产分成并存的两半。一方面，我们有生产方式，它们又可再分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切社会再生产事例中的基础或者结构。这一基础还包括马里奥·罗西（Mario Rossi）所谓的“共同生活的现有形式以及个人之间的生产协作（譬如家庭关系和工作关系）”（1974: 504；又参 Dhoquoi, 1971: 256；各种观点之间的关系也须得在众多物质关系层面上去发现）。另一方面，我们有所谓的上层建筑，即，一切不以直接方式看待生产方式的东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超然其外，具有相对独立性，“也是”（also）（即使从来不是“只是”[only]）按照自己的规律自我发展。上层建筑以意识形态因素为特色。它包括既非直接的经济—生产的，又非仅仅是存在而已的所有机构，以及所有艺术、文学、科学、宗教和政治活动。

社会生产的这两个一半之间，有着复杂而纠结的关系，不能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者们尽力将这些全都理清楚了。相反，尽管他们对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考察，他们对其如此这般的关系及其实际模态不过略有心得而已。尽管后来的研究者取得了很高水准（譬如 Lukács 1923），后继的阐释者们没有一个对这些关系做出深度厘析，甚至称不上是用充分具有的体系性的方法去研究它们。众所周知，葛兰西（Gramsci）把上层建筑再分为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以前者指学校、教会、协会、报刊、政治团体、观点市场，亦即意识形态领域，其中，生产出了建立在所谓民众“自由共识”（free consensus）基础上的领导权；以后者指政府、警察、军队、法庭：国家领域，其中，当缺乏“自由一致”之时，统治的直接实施就会发生。这种再分包括了让我们回到生产关系的元素，同时，似乎又把政治社会从意识形态中抽离出来了（虽然在此语境中，还须参看葛兰西在 1975 年版著作中第 433——434 页以及其他各处的别种论述）。换言之，正如博比奥（Bobbio 1968: 26）所观察到的，葛兰西用的是两种二分法——结构与上层建筑、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来讨论问题，但并未将其坚持到底，达到运用三分法体系的程度。我们将马上回到这一点上来。这里，有几个其他真正切中肯綮的分析例子（譬如 Williams 1973）；但问题还是悬而未决，仍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阐释，关键在于，人们可以大胆提出这样的假设：一个确定的社会对象，就其本身而言，绝不可能是结构或上层建筑，而只有根据思考它的方式，或者根据它被置于其中的那种话语，才有可能。

尽管如此，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立似乎无法被忽视。无疑，这触及到某种绝对根本性的东西。尽管有解释上的变化，但在几个一般性的要点上，学界是一致认可的。用一个有趣的悖论来说，确切地说，这是和几个最为重要的要点相关的一个问题，它们对于我们的讨论也最为重要。第一个要点是，每种生产方式都对其上层建筑实施着不断的影响，这种影响

有着首先的重要性。第二个要点，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并切实构成了其主要的共同要素。第三个要点，上层建筑反作用（或者至少可以说，能够反作用）于生产方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在一种持续的、彼此的作用中发展，但这种彼此作用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非对称特征。两个一半之间存在一个循环，但这个循环的节奏和效果并非始终相同。这三个共同认可要点的重要性，可以表示如下：生产方式对所有其他要素所产生的影响的首要性，根植于社会再生产的经济核心（参看上文），并且因此而为其自我延续提供动力。相对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使得革新和革命性意识形态投射成为可能，让把政治放在首位变得合理，并且把我们从历史的机械决定论中解放出来。

### （三）生产方式、符号系统与意识形态建制

为了对结构和上层建筑进行有意识的反思，在 1968 年，我觉得似乎引入第三个部分——或曰维度，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是符号系统。起初，这种想法忐忑不安，并带有尝试性，但后来它越来越多成为一种实践性工作。人们常说，交流是“通过”（by means of）符号系统而完成的。根据这一方法，交流和符号系统被当作了分离的实体。符号系统存在着，在那里等待着；交流插了进来，把它们用作了工具。对于插入过程中的零件，甚至给我们提供了某种罗列：发送者与接收者、符号系统、语境、信道，以及启动所有上述元素的交流本身。从我写《作为工作和市场的语言》（*Il linguaggio come lavoro e come mercato*, 1968h, 英语版 1983b）之时起，我已经在很多地方反驳过把一般的符号系统——尤其是语言——当作工具这种看法。这里，我仅仅指出，根据关于任何符号系统的一种经过现实性扩展的看法，这不仅包括符码，以及关于其使用的规则，即人们工作的材料本身就是之前工作的产物（包括作为产物的规则），而且包括被交换的所有信息，它们能够，从原则上在系统本身所启动的话语世界中得到交换。

此外，通过使用另一种现实性扩展，我们看到，每个符号系统还包括操控它的个体和社会群体。所以，也可以说，他们被它所操控。在这一意义上，一个符号系统就是一小片的现实，就是一种形式的社会规划。现在，如前所述，交流根植于交换方面，在生产与消费之间起中介作用。通过把这些思考汇聚在一起，用之前的两种模式来衡量，我们可以说，第三种模式是沟通和综合前两种模式的尝试。所以，社会再生产会在三个层面上发生：生产模式、符号系统和上层建筑。在包括了第二种模式的二分法和第一种模式的三分法的这一三元关系之间，就会有已经通过当前术语部分得到证实的一种密切对应关系，我们将试图在本文中将其揭示出来。

意识形态因素出现在所有三个层面，但它是自我展现，能够——主要是在上层建筑层面，即，人类建制和活动之中——被发现。任何活动，如果要有意义地发生，都需要已经建制化了的结构（作为以超个人符码形式出现的最小元素），这样来考虑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为社会建制概念所吸纳的人类活动这个概念。简单地说，于是我们能够谈起意识形态建制，无需对它们和非意识形态的其他建制做区分，只需强调它们有一种恒定的、的确基本的性质即可。换言之，“意识形态建制”（ideological institutions）这个组合词语是以一种一体性的方式描述现实。如此看来，意识形态建制无非是对上层建筑的种种表述而已。它们与消费方面对应，并证实人必须不断从它们汲取营养这个观点是合理的。被交换所允准的消费“生产”了生产。于是，这个循环得以闭合和自我更新，而其反作用也被认为是合理的。

符号系统，起源于交换方面，在生产模式和意识形态建制之间具有首屈一指的居间地位。不过，它们能够按照它们的顺序被中介。最常见的情形是上面描述过的那种，其中，符号系统通过意识形态建制对生产模式起中介作用，或者，通过前者对后者起中介作用；但是我们也可以假定，并且在现实中发现，所有其他理论上可能的中介情形。

### 三、社会再生产中的符号系统

现在，我们且来考察被三分为生产、符号系统与意识形态建制的社会再生产的某些方面，我们将特别关注符号系统这个新加入者，我们的考察将从它的在场这一简单事实开始。

#### （一）非语词符号系统的在场

每个社群的语词符号系统都是多个世纪以来，通过普通说话人和其他更专门的语言使用者（譬如巫师、神父、诗人、作家、技术人员和各种类型的组织者）而发展起来的。按照这种方式，专门的、甚至“理想的”语言得以形成，它们超然于普通言说之外，却受其滋养，与之产生交流。它们的总体性构成了对如此这般的说话人首先的和最为明显的社会—历史制约。不同使用者的特殊语言部分地对应从“子符码（sub-code）”这个术语所理解到的东西。尽管这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此刻我们却无须费神关注。

确切地说，我们的重点是，普通言说或各种特殊语言，它们自身都不足以决定其言说者的世界观，就像支持所谓“语言相对性”（linguistic relativity）流派那些唯心主义者以前所认定的那样（这里可以参看 Rossi-Landi 1968h）。相反，它们自得其乐，却连决定自身的用法都无能为力，因为它们的存在离不开社群中所运用的其他符号系统：与语词符号系统（即，前语词的[preverbal]、副语词的[paraverbal]和后语词的[postverbal]）相关、仅仅是在

严格意义上是非语词的那些,以及由于建立在与构成一个语词符号系统的所发声音无关的符码基础之上而根本算不上语词的那些,或者因为原本就不是声音系统而是其他对象系统而有别于这些的那些。

第二组是目前为止最复杂,也是最不为人知的。我们的整个生活,从其源头开始,就是与非语词符号系统相互交织的。因此,必须摒弃人类中心的、以及从本质上讲——传统上赋予语词符号系统的经典的特权,这样,非语词符号系统才能作为“新的”研究对象出现。即使是对非语词符号系统分类做一个概述,在这里也不是地方。我们将只强调:人们认为,客观性的(objectual)或工具性的(instrumental)非语词符号系统类型是有别于有机的(organic)非语词符号系统的,前者的符码包括在自然中发现的、或人类为了某个目的而生产的物体,而后者的符码,以身体位置和动作的形式、以及各种非语词行为作为形式,是在使用者这个有机体自身中发现的。第三个大类是建制性(institutional)的那类非语词符号系统,它的符码是由关于社会建制的表述构成的。此外,我们还可以在人、动物或其他自然类型的非语词符号系统之间进行区分,尽管显然,一个“唯一的自然的”(only natural)符号系统,这个概念本身马上就能引发其解释者的身份这个微妙问题。

## (二) 非语词方面对于语词方面产生的影响

从社会起源开始,在复杂性的所有层面上,都有着语词和非语词符号系统之间鲜明的不断而深入的相互影响。不必否认语词符号系统对非语词符号系统的影响,这里,揭示非语词符号系统如何影响到语词符号系统所达到的构成和抽象水平,是十分有用的。我在其他已出版作品中,已经以相当篇幅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这里,我只简单地使用几个其他作者提供的例子。

我们首先来看“任何东西,如果不首先在社会现实中存在,就无法在意识中存在”这条经典原则。这对作为真实社会关系反映的态度、观念和看法的形成而言是正确的,对之前非语词条件的语词表述来说也是正确的。安布洛吉奥·多尼尼(Ambrogio Donini)更多地关注这些方面的第一个而不是第二个。下面两段经典表述,来自他的著作《宗教史纲要》(*Lineamenti di storia delle religioni*):

思想—身体(mind-body)二元论……作为人生活方式中所产生分离的反映而出现。新的生产关系使少数人实施的统治变得可能,就此标准来考虑,于是诞生了统治和从属的阶级二元论,诞生了在另一界域、在另一世界以及最终在另一世中满足需求的要求,

这些需求是不公正社会条件在现有社会组织中不再答应每个人都能有所保证的……人必须首先经历新的社会结构强加于其日常生活之上的这些限制，阶级中的划分才能提出对精神元素的需要——“精神”（spiritual）是在神学化的和唯心主义哲学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上的，与自然、身体，与“物质的”（material）相对（1946: 42-43）。

超级存在（a superior being）这个观点，以及更少用到的人化神祇（personalized divinity）这个观点，在特权群体、主导阶层、社会阶级的优越性在人们之中得到明确之前，不会开始流布（ibid.: 53）。

因此，根据各种各样的反映模态，真正的社会关系会主要出于补偿的目的，以一种投射的方式产生出上层建筑关系和实体。这些上层建筑关系更容易被语词化，而不是成为结构性的东西，尽管后者也是完全意义上的符号关系。

运用相同的社会现实优先于意识原则，但至少是以不明显的方式对第二个方面而不是第一个方面做出强调（即，从非语词条件过渡到语词条件），乔治·汤普森（George Thompson）（1949, 1955）和阿尔弗雷德·索恩-雷舍尔（Alfred Sohn-Rethel）（1970, 1971）对货币经济（monetary economy）的形成给认识方面带来的结果进行了深入分析。巴门尼德\*对一体性存在的看法——此种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在那里”存在、与其内部的差异全然独立地存在，这些内部差异容易被感觉切断、被人力所改变——随这种经济的形成而首先出现于希腊。似乎相同的发展也同步发生在中国和印度。

货币经济在认识方面包含的暗示如下。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金币和银币的价值（value）并不变化，并不“流动”，只要它得到赋予它价值的政治权威保证。只可能发生有关钱币物理存在方面的疑惑：它有受损、磨蚀的可能性。但那时，政治威权会保证用“刚出炉的”新钱币来替代旧钱币。这样，无论钱币实体发生什么，其价值是得到源自威权的社会关系保证的。钱币，了不起的社会发明，是无需考虑其使用价值地使商品藉之以得到交换这个抽象过程中第一个出产物。第二个出产物是钱。金币和银币仍然保有其使用价值。社会支撑的是它们普泛化了的交换价值。每种可能的使用价值在这里都几乎消失殆尽（或者沦为用来擦鼻涕或写便签的支票）。社会支撑是必须施行的社会实践活动。最近几年，似乎瑞士就用贬了值的意大利 100 里拉的钱币来做手表的表盖：通过重新使用其实体而获得比其原有更高的交换价值，这在某种意义上，重新赋予了它们价值。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钱币从流通中消失的原因。

本质要点在于，商品的交换，和每种交换一样，已经是一个非语词符号系统，它随着



以开始由钱币、其后由钱构成的建制，变得越来越复杂，达到越来越高的抽象层次。这个非语词符号系统的结构反映在语言中。按照这种方式，超然体力劳动之外的知识可能性开始形成。抽象、空洞、形式性的概念开始在语言中成形，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有了像伽利略的物理学那样一种关于对象化了的自然的科学的构造。正如如果没有钱币在社会现实中的之前存在，一体性存在这个观念就不可能形成，没有在社会中之前存在的金钱在质上的统一性，其全然缺乏内部差异，也就没有统一的直线运动这种规范。在商品交换中，我们有实体在时空中的运动，物质方面没有变化，有的只是量的变异。简言之，我们有处于运动中的抽象之物。而这就是现代科学的基础。钱，了不起的社会发明，每种可能的交换都能被概括其中，使一种关于量化了的、客观化了的自然的物理科学成为可能（Sohn-Rethel 1971: 118-119; 1972: 98-115, 150-173）。如马克思所说，“见鬼！逻辑范畴竟然真正是从‘我们的商贸’（our commerce）而来！”（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

### （三）语言在结构—上层建筑循环中的地位

这里，我们能够发现语言在结构—上层建筑循环中的地位这个长期争论问题的阐述（打算），对于这个问题，在斯大林和马尔（Marr）的争辩中，谁都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将通过对众多相互关联要点的思考做出解答：

1. 语言在结构—上层建筑循环中的地位问题，不能脱离同一循环中所有符号系统的地位问题。让人惊奇的是，这么明显的一个观点并没有得到它应该得到的关注，或者说，要不是语言始终与其他符号系统保持分离这个事实，情况会让人惊奇；
2. 所有生产模式和所有意识形态建制也是符号系统。这是其性质的一个方面。这并未将其说尽，某种近期冒出来的资产阶级“符号泛理性主义”（semiotic panlogism）就是这么认为的，这种想法与其说是唯物主义的，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文学的。这种思路的结果，是采取描述形式，把资本抬高到综合一切可能的交换的程度，并且津津乐道脱离了可怕的、受鄙视的工作物质性来考虑的这些交换及其组织。生产模式和意识形态建制“是”（are）符号系统，但是，在辩证的意义上，可以说，生产和消费“是”（are）交换，正如在它们所属的社会总体性中交换“是”（is）生产和消费那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辩证统一并不意味着相同。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让不同方面在有组织的讨论中各具特色；

---

\*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公元前五世纪）以其存在论哲学闻名，他主张存在是一，思想与存在同一。——译者注

3.符号系统远远达不到拥有基础设施的或下层结构的优势（virtus）这个程度，而且无法简化为仅仅是生产模式或仅仅是意识形态建制。相反，它们一直受到社会再生产每一种影响的作用，从可以被称为人的一种生产开始，它们就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的确，这一生产在更高等动物层面上已经在场。作为旁白，我们必须补充说，这并不是说原始动物层面上，甚至植物世界中，就没有符号和交流；

4.同时，并不与上述要点相矛盾，我们可以肯定，符号系统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这使得它们也根据它们自身的规律，通过它们所构成的总体内部的脉冲和表达，进行发展。在这一意义上，它们和意识形态建制相关；

5.语词符号系统，或者严格意义上的语言，人的物种专属，很快达到如此复杂高度，以至于约束它的那些规律以更加独立于社会再生产其他方面来呈现自我。同样正确的是，语言是教育的主要工具，是产生共识、实施统治的工具。所有这一切会生成约束语言的规律完全独立于社会再生产这种幻象，这种幻象甚至在今天也很平常，在只关注语言的学者们那里尤其如此。因此人们对语言做着白日梦，仿佛现实的其余部分并不存在，并不影响它，或者语言只是用作材料，让这个神奇机器得以运作和展现。

#### （四）在一切行为的三个层面进行规划

从人群或个人行为的观点看，社会再生产发生在三个层面这一事实意味着行为本身是在同样的三个层面上被规划的。人群和个人学会在三个层面上开展他们的活动：生产模式、符号系统与意识形态建制。这可以按照从最清晰的自觉到最全然的不自觉，到“纯粹生物性的”（merely biological）门槛，在任何阶段发生。在这一点上，这个微妙问题——无意识的、非自愿的学习，人只是消极地服从于学习——就出现了。

行为规划，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对于规划者，被规划者，或者对于二者共同而言，始终而且仅仅发生在总体被决定了的情形中。没有任何其他情形。社会—历史情形使得不可避免地，决定始终是总体的。如果在某一点上，我们发现“还有另一个因素”，我们只能丰富同一种情形：这个新的因素（它新，只是因为我们之前对它不了解）也，而且不可避免地，对其做出贡献。从这一点看，于是，每个社会行动，原则上，处处发出回响。因此，在三个层面的每一个上，发现自身处在行动更高效的状态的那些社会力量，自我确认。我们称这些为主导力量。这就是，在每一层面上，权力对自身的延续做出规划的方式。

#### （五）符号系统和共识的生产

符号系统首先是作为共识的生产者和组织者来为权力服务的。葛兰西肯定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显然，他完全是以前符号学的方式对其进行理论思考的，但是，我们很难为此而受到苛责。他写作的时代和条件是那个样子。相反，他对语言的观察继续给我们带来启发（评注版的“主题索引”中，3217页整页罗列的是相关参考资料）。必须把各种因素牢记在心，才能把握符号系统作为生产模式和意识形态建制之间主要中介者、作为共识的组织者在社会规划中的重要性。我们将在这里涉及三个主要因素。

首先，有符号系统极为多样和复杂这个因素，不仅是语词的符号系统，而且是非语词的符号系统，这个因素的出现构成了一个新的事实，尤其是在当代，对此事实，无人可以事先考虑周全。

第二个因素是符号系统的无意识和超个人特征，尤其是非语词符号系统。这里，在这一意义上，“超个人”（superpersonal）是和“个人之下”（hypopersonal）相伴随的：如果个性在本质性部分中把自身等同于个人意识，那么，逃避个人思维把握——或者更应该说，个人种种思维——的那一切，必定把自身置于每个单个个体的意识层次之下。我们必须分辨这两种主要方式，其中，符号系统——尤其是非语词符号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只是知道我们在使用着某种符号系统，但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是如何起作用的。许多其他情况下，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在使用一个符号系统。两种情形，但尤其是后一种，强调的是上面所提及的观察：*是符号系统使用我们*。我们自己的共识于是可能在我们看来，不仅是“自发的”，而且是不折不扣“自然的”。仅仅是在几十年前，随着交流理论、新语言学，尤其是符号学的来临——渐次地，它们为全球水平上形成大众交流和日常交换所促进（此二者均为新资本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表现）——符号系统才开始受到学者们关注。如马克思所说，人继续“做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这一事实表明在无意识层面上研究作为规划形式的符号系统的重要性。把之前无意识做的事情带到意识这里，起到了消除神秘化的作用，并且因此而拥护新社会规划的形成。通过这种方式，新资本主义让毁灭其自身的合格工具得以显露、可以获及，就像经典资本主义已经做过的那样。

要记住的第三个因素，是当考察结构和上层建筑、生产模式和意识形态建制之间关系的时候经常会碰到的那些困难。我们的假设是，研究作为中介要素的符号系统，可能有助于解释诸如一种确定的意识形态——无论对某生产模式而言其建制化了的形式如何，无论其发展水平如何——共同在场这类复杂现象。社会从特定生产模式开始是以什么方式建构特定意识形态的？建构适宜的意识形态是以什么方式对生产模式起反作用的？使用社会大脑（a Social Mind）这个有用的抽象——社会大脑以一种超个人的方式对个人在自身中无意识接受

的事物进行规划，并试图只通过特定解放工作去发现——我们可以说，社会大脑建构符号系统并迫使它们接受自己，以这种方式在生产和意识形态建制两个层次之间起中介作用。三个层面中共通的东西使传输变得可能；它们之中特殊的东西使得它们每一个只在一个层面上运作，符号系统主要拥有的居间功能使得它们成为整个规划操作的最重要工具。

居间的符号系统通常是生产模式结构的运载者，凭借这些结构渗入意识形态建制，意识形态建制又用于证明这种生产模式是合理的。但是，时间计划周详的政治工作能够使用符号系统，凭借新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渗入主导的生产模式。



（罗西-兰迪与庞齐奥）

# 面向马克思主义应用的维特根斯坦

菲鲁齐奥·罗西-兰迪

胡易容 译

无须追问哲学家的意义，理解他的运用：哲学家的意义正是他在文化中的运用。

## 一、《哲学研究》（*Untersuchungen*）的主显节

1953年5月1日，我与来到牛津的很多人一样在期待中醒来，吃完早餐后我急不可耐地跑到巴兹尔·布莱克维尔出版社所在的大街上等它开门。正如此前公布的消息所言，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第一批《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正光彩熠熠地躺在橱窗里。暗蓝色的包裹布衬托着它们严谨朴素的内容，如我们期待的那样，隐藏在浅绿色书皮上仅有英译的简洁饰面，正是《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当天下午，我们都去聆听翻译者的第一场演讲，演讲者安斯科姆（G.E.M. Anscombe）小姐，也常被称呼为彼得·吉奇（Peter Geach）夫人，是维特根斯坦最喜欢的学生之一。集会在萨默维尔学院远郊的附属学院举行，要到那儿去，必须绕许多弯路。数以百计的学者，和不同年龄、精神面貌的猎奇者，沿着小路，步履匆匆，近乎奔跑，在角落到处乱窜，你推我搡，唯恐占不到座位，而比这更糟的则是错过演讲的开头。这样的场景实在令人印象深刻。彼得·赫布斯特（Peter Herbst）在我身边一边小跑，一边以他特有的机智说：“这可是在不折不扣地追求真理啊。”

安斯科姆小姐对书稿的翻译毫不满意，以至于不得不立即在《心灵》（*Mind*）发表了更正翻译错误的第一列表。在她看来，这些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在事实上“阻止了读者的理解”（Anscombe 1953: 521-2）。维特根斯坦在1951年逝世后，安斯科姆小姐聘请了多达七名翻译顾问（名字在卷首），其中一些专家不仅通晓德语，还熟悉奥地利的方言用法。那天下午，她的演说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翻译错误，这必须由专家集体修订委员会经过复杂的过程一点点纠正；另一个则是（这方面至少部分地解释了她曾遇到的困难）她个人的一丝不苟，绝不对书中的观点作随意的附会。在安斯科姆小姐看来，后者是翻译工作的首要优势。至今，我的耳边依然回响着她强调这些观点时铿锵有力的话语，“维特根斯坦在一个地方所说的东西，不应该被与他从另外角度所说的东西横加关联”，或者其他大意如此的话。将这种夸张的警告与胡腾（Hutten）同样夸大的断言做一个比较将会很有趣：同年11月，胡腾（Hutten）在《不列颠科学哲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上所发表

的一篇关于《哲学研究》的短评这样说道：“我们不需要在这些问题、及相关问题上无休无止地绕圈子。相反，我们倾向于自由联想，尽管这种方法不太符合科学原则，但在某些用不着过于严谨、同时充满智慧的层面，比如当代的文学创作，自由联想还是派得上用场的。”(Hutten 1953:258)

对于既非德语也非英语的读者而言，对两种文本加以比较，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多少会令人有些困惑。人们开始怀疑，这些神圣的命题在两种语言中是否真能以同一方式阐述，进而得出同样结果的命题。“原则上，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陈述相同的命题，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例如用两个不同的句子。但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并不知道它们是否真的被严格设置为相同的命题，于是对句子中的差异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有时会被证明：认为这种区别并不总是合法的。”要么是由尊重、钦佩与感恩构成植被的语文学之山已经成为一只卑微的文学耗子，要么是英语就不能表现原文的活力和魅力，也就无法成功地获得智慧。至少安斯科姆小姐的印象如此，不过她肯定知道如何应付她高度敏感的同事们。例如，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使用”(Gebrauch)和“应用”(Verwendung)作了非理论化的区别：术语的“使用”比其“应用”更为稳定，“使用”遵循规则，而“应用”根据条件。在英语中，这两个术语大多情况下都可以译作“使用”(use)，而“应用”(application)一词只是毫无根据地偶尔出现。或者毫无必要地介绍想法，如德语“so schweben mir nicht neben dem sprachlichen Ausdruck noch‘Bedeutungen’vor”被翻译成“除了语词表达外，没有‘意义’穿过我的心灵”(1958: 329)。更为严重的是某些结构性缺陷，例如，当“Befehlen, und nach Befehlen handeln”，显然应译为“命令与指令性行为”，如果被无端地描述式翻译为“发号施令和服从他们”，便失之牵强(1958:23)。

我的看法是，就口语而言，维特根斯坦的英语在教学中富于个人色彩，他成功地向听者传达了他的思想，不论他处理的问题多难，这种传达都是成功的；但是，当它写成书面形式时，这种思想的迷人与丰富程度就要逊色很多。它以母语写成的文章，都相对可理解并令人兴奋（也许意大利翻译也是如此，如果它足够出色）。但我的另一个看法是，维特根斯坦使用英语时，英语读者可能不太关心这些。关于安斯科姆小姐的犹豫和她此后的想法间产生了差异，读者应考虑这样两个奇怪的事实：1961年，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s)和麦吉尼斯(B. F. McGuinness)完成《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的翻译后，盎格鲁-撒克逊的哲学文化已经在奥格登(C.K.Ogden)1922年草率而有缺陷的翻译版本中经过了39年滋养。之后的《哲学研究》和《数学基础原理》(*Bemerkungen über die Grundlagentheorie der Mathematik*)（追溯到1937至1944年，以及1956年），似乎一直没

人有兴趣作进一步的翻译。1964年，布莱克威尔（Basil Blackwell）整理出了维特根斯坦三分之一未发表的作品，也仅以德文在《哲学评论》（*Philosophische Bemerkungen*）（可以追溯到1929-30年）发表。

在此，我觉得大卫·鲍尔（David Pole）的评论有所启示。鲍尔是后期维特根斯坦传记作者（他实际上几乎专攻《哲学研究》）。鲍尔首先复述了芬德利（J.N. Findlay）的观点，他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表达方式中始终保持着深切的黑格尔式的日耳曼共鸣。（芬德利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作者，成为维特根斯坦语言分析专家前，他从事黑格尔研究并卓有建树。）鲍尔补充说，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令人感受到强大力量和探索欲，促使我们用心去面对大量原始手稿……维特根斯坦困扰我们，他的思想令人不安”；然而，当我们将维特根斯坦思想通过约翰工作成果传递给打了折扣英文版时——我们应该引用他的一个经典文章来描述这种感觉——“我们终于再次发现自己回到了家里”（Pole, 1958:103-4）。

甚至，《哲学研究》和其他维特根斯坦的书籍的标题，连德语都很少用——无论这种效应的产生是否由于护封的排版方式导致（一个弗雷格的译本，其中译者名字比作者更显眼，这被认为具有标志性意义）。而当维特根斯坦被以德语引述时，几乎所有作者都因如下事实而抱怨——虽然他懂英语并以此在多年教学中取得巨大成功，但他固执地坚持以母语写作并留下大量手稿，它们现在必须被费力地翻译成可理解的英语。他为什么不直接用英文写作，从而避免这些额外的工作和误解。我不是讽刺，而是本着务实的态度。那时我的一位朋友表达他对维特根斯坦的激情和坚持正确的英语文化，是在“Unterzukúnghen”，或“Zukúnghen”的发音时，报以咯咯一笑或一个小媚眼的奖励。

无论如何，《哲学研究》的出现打破了此前原版《逻辑哲学论》（*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出版以来整整32年的沉寂（在这种情况下，G.E.摩尔建议采用中性的拉丁书名，可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实用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这个名字已为人熟知。事实上，即便有两个例外，评论家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第一个是，“关于逻辑形式的一些评论”，写于1929年发表在《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但维特根斯坦却没有向会议宣读这个已经准备好的讲稿，讲稿主是关于数学中的无限性问题。他原本是希望在会上以此讲稿一鸣惊人的；第二个是，1926年在维也纳出版的小学德语词汇表（虽然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编译这个词汇表的可能纯粹出于兴趣）。更为离奇的是，这些被称为《蓝皮书》和《棕皮书》的著名手册（最终在牛津由布莱克威尔于1958年出版）已经流传了多年却全然悄无声息，要知道学生和同事多年以来一直参加维

特根斯坦在剑桥的课程并与他讨论，如果他们想要发表任何文字的话，做注释时肯定无法避免用到这些材料。这当中包括摩尔（G.E.Moore）、石里克（MoritzSchlick）、魏斯曼（FriedrichWaismann）和其他许多花了不少时间听课的人。早在1914年，摩尔就已经在挪威获得了维特根斯坦的真传，现在他与其他人一起出版了这些笔记（维特根斯坦，1961a）。相比之下，约翰·韦斯顿（JohnWisdom）则被一些人视为维特根斯坦最直接的追随者（他继赖特之后接任了维特根斯坦在剑桥的讲席），说起来他没有任何笔记，或者至少没有特别重要的笔记。1952年，他在《心灵》（*Mind*）发表了他从1934年到1937年参加的活动简要列表。一方面，“开启”了他与维特根斯坦关系；另一方面，旨在向公众强调这个深不可测的说法：如果我被要求用一句话回答“维特根斯坦对的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什么？”我将作如下反问“能在没有女王的情况下下国际象棋吗？”（Wisdom,1952:259）。

赖尔（GilbertRyle）则不以维特根斯坦的名义命名他的主要著作。维特根斯坦去世后，他于1949年出版了《论心灵》（*TheConceptofMind*）以纪念他。在BBC的采访中赖尔解释说，判断一个被当代出版界忽略三十年的人是困难的，他的思想迫使他保持一种“感想和解释，而不是一味追求第一手材料”。（Ryle, 1951: 7）

这些师生之间的不寻常关系，在当时最活跃的英国哲学家中造成了一种神经质的局面。由于太过受维特根斯坦口传灌输的影响，他们甚至无法独立撰述自己的思想。严格说来，当他们想出版时，不得不在维特根斯坦思想元素和将这些影响作为自己的表达之间做出选择。通常，他们通过一批对导师进行深度解读的笔记来解决这个两难。但是，诺曼·马尔科姆（NormanMalcolm）和赖特（G.H.vonWright）于1958年出版的传记散篇中却提到，维特根斯坦很反感这种努力，他感到自己被不断地误解和背叛（Malcolm, 1958）。尽管篇幅简短，但这两部文献却成了研究维特根斯坦的智识形成过程的传记最重要的来源，且几乎是唯一来源，我后面也将不断提到它们。考虑到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特别是在《哲学研究》中）和他的智识文化生活的密切关系，我们可以探索他被神化的过程，并面向一个真实历史维度来重新发现他。这个过程并非对所有的思想家同样有效：这种方式确实对他们中很多人没什么用，相对于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智识文化生活显得不那么重要，或至多是在某些局部方面有所帮助。但对维特根斯坦而言，则是非常有用的，它们揭开了一些神秘面纱。因为，他令人迷惑的教学过程体现了欧洲文化最特殊的圈子之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及二战后的情况。而且，他迫使一整代哲学家失声无疑是另一种不小的成就。

但现在，这些文献就在这里。可以用导师本人的术语来检验或重述那些神圣的命题；并且，可以开始对他的影响进行回顾性分析。至少有两个方面是令许多学者失望的。首先，如



前所说，在几乎未接触德文原稿的情况下，所有评论的关键工作都建立在译文的基础之上；其次，那些有幸从导师口中得知新学说，或曾通过英语哲学界的各个分支吸收成果的人，比那些第一次接触维特根斯坦学说的人会读到研究中更多或不同的东西。弟子们觉得，最重要的是不为外界的评价左右，那些评价或认为弟子们会看到更多，或至少夸大其词。多年来，我一直相信，后者的态度可能是由于与学术派别或难以说清的感情因素，加上有些学者的势利和吹毛求疵（这是维特根斯坦最憎恶的缺点）综合导致的结果；但如果我们想想，读一则简短的警句，和可能耗上整年时间来阅读的混乱译文是完全不同的。考虑到原创者本人且对教学如此热情地投入，我们就必须承认他的弟子们确实应具有某些解释的优先权。

例如《哲学研究》核心概念之一，“使用语言”就发生过这种误解。在该书出版后第一时间读到的人，倾向于只看到以一种给定的语言，一种习惯了字词的语言。由于习惯和使用机制中的主题相对于各种自然语言来说是不断变化的，显然不能作为逻辑-哲学研究的基础。他们立即发现，激烈的批评将会令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学派苦心经营起来的术语系统轰然倒塌[.....]。与此相反，那些曾与维特根斯坦本人或他较为出色的学生讨论过这个问题的人，以及熟悉该份文献出现的主题范围的人，就会认识到在这种语言使用概念中，只有在特定语言中，某些东西与由来已久的用法的部分重合。此外，还要将语言学家们所说的语言共时性纳入最基础的一般层次上考虑。这是我们用来表达自己的方式，是我们根据不同情况、不同需求进行交流的技巧。维特根斯坦的“行为”概念是以逻辑-结构为目标的，而非一个以历史或社会学描述为目标的语言概念。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弟子们对此有充分的研究。我赞同批评他们将研究与文化彼此割裂开来的做法（主要是从哲学史、语言学，及其他尤其是德语的哲学文化等其他学科的角度）。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他们当中许多人仍在这样做。但是，即使从他们对概念的含糊、而不完备的使用来看，我们仍可以感受到他们对方法论过度或贫瘠的焦虑：害怕推进一些过度严苛的理论结构，就像一个早产儿那样，过早确立了其自身内部极其复杂的结构，最终会阻碍而非有助于进一步的研究。

## 二、“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维特根斯坦

就理论体系而言，柏拉图有三个或四个阶段，黑格尔有五、六个阶段，谢林则有多达六、七个阶段。就目前而言，维特根斯坦的情况没有这么复杂：通常得出的区别是以《逻辑哲学论》为标志的“第一阶段”（或称前期维特根斯坦阶段）；以及《哲学研究》和其他遗稿构成的“第二阶段”，或称后期维特根斯坦。除此外，至多可将 1929 到 1933 年之间作为一个未被完全研究的一个过渡时期（他返回剑桥大学从事哲学研究），根据冯·赖特的说法，在这期

间，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vonWright, inMalcolm, 1958)。

有必要对这一期间的变化做一个非常简要的回顾；通过比较《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就足够了，这两部作品代表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体系之大成。<sup>①</sup>

在“第一阶段”，维特根斯坦的第一个老师是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罗素曾是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利（Bradley）的学生。但罗素拒绝后者的形而上学一元论，而继承了他对经验主义心理学的反拨，并反对他们忽视研究判断，进而反对他们基于某种自然主义意义，在一种思想的碎片上建构自己的研究的做法。最初，遇到罗素时的维特根斯坦的立场，既不是完全唯心主义，也不是完全的经验主义，而是一种被唯心主义逻辑丰富了经验主义，它如同一个语言单元，伴随着一个完整的思想单位。休谟的遗产对哲学家的直接作用在于，对思想构成要素的分析，有人认为他的观念是一种原子论的观念。但是，与休谟及其后的经验主义者不同，哲学家们现在不得不应用分析加上形容词“逻辑的”指示来进行综合判断。罗素早在1914年提出了如下想法：问题在于到达“逻辑（而非物质材料）的原子”；但它们必须保持由判断构成的初始原子单元。并非所有的命题都是判断，它们本身在讨论下产生，从长远来看，这将导致注意力扩展到命题的所有层次，但一开始仍集中于命题中对科学最重要方面的那些陈述事实（陈述）。哲学领域的探索不同于语言学之于语言的建构。哲学关注言说结构本身，以及言说方式本身能够具有的意义。由此涌现出的一系列密切相关的差异走向了更深的层次，甚至超过了真理和谬误的区别：这种区别乃是意义有无之间的根本区别。

到目前为止，罗素已经做到了这一点。《逻辑哲学论》除了检验恒真命题和概率，还对形式逻辑的技术做出了贡献，可以令人信服地从历史的角度来概括罗素的结论。维特根斯坦使用严格的形式化工具来研究每一个符号必须满足的条件。他也从命题开始解释本质并检验命题构成。一个命题类似于代表事物的图表，它包含多重符号，并在某种程度上按一定方式排列其中层次。符号的排列必须以一一对应的方式来反映世界的元素和结构：一个语句能断言某种事物的状态，因为它与所代表的对象具有同构性。但无法表达是否有意义这一根本差异。如果试图这样做，意味着在意义之有无之间作比较，这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换言之，对第一阶段维特根斯坦来说，不能被陈述的恰是陈述的一般结构，而它代表的事实则使得自我再现成为可能。该结构只能“显示”。因此，陈述（aussagen）与表现（zeigen）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维特根斯坦将其发展成为神谕般的著名学说，给《逻辑哲学论》的最后一部分平添了一种神秘的品质。对于语言意义的给予或否定，哲学家-逻辑学家只能表现而非陈述。哲学并非一门科学，也不能提出理论；它只能集中于表示所述内容的逻辑结构。

---

<sup>①</sup> 很明显，讨论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演进过程，还需要研究他的遗作，包括那些还未公开的和各种笔记听课。

《逻辑哲学论》的陈述是实践性而非理论上的，在我看来，自然哲学虽然很多内容可能需要修正和放大，但必须在原则上接受这一说法。原因是，黑格尔体系解体后，否认哲学的现实性就意味着倒退至前康德时期的概念。然而，就其本体论基础而言，《逻辑哲学论》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同于前康德时代的内容。现实乃是不可化约的事实构成，静立于主观思想之外，如置身亚里士多德的镜前；“事实上，一个图片要素[Bild]与其他元素彼此关联的方式，是以确定的方式表示以相同方式关联的事物” (Wittgenstein, 1961 b: 2.15)。维特根斯坦的这些论断没有涉及任何概念的发展，尤其是，历史-社会维度完全阙场。《逻辑哲学论》的世界仿佛一个静止的逻辑天堂，其中的思想反映了结构，一言定鼎，无须解释。<sup>①</sup>

当我们将视角从《逻辑哲学论》转换到《哲学研究》时，第一件触动我们的事，是两者之间的生命延续性（尽管并非历史意义上的）在语言表达层次的中断，所有的形式主义术语如今都被弃用：

比较多种语言工具（Werkzeuge）以及他们的使用方法、各种词句与结构（Bau）的逻辑将会十分有趣。（包括《逻辑哲学论》的作者。）（1958:23）

这种拒绝已经成为一个程式化过程，从抛弃所有框架以展示和陈述的对比开始。现在，分析是单指语言“情境”（即语言的语义要素），由此引发了一些哲学上的困难。从这些意义要素出发，从语言分析出每一个可能的方向，无论第一眼看上去是如何被安排的。沿着“语言是路径的迷宫”（1958: 203）的思路，分析者力求发现语言使用上的一些相似性。并非因为他们还原了一些形而上学的“共同财富”，而是因为他们最富于变化的途径中彼此关联，并通过这些关系，构成了各种各样的“家族”类型(1958: 65–67 ff)。因此，一个表达的功能，可以通过与其他不同表达方式对比而被勾勒出来，语境赋予意义以重要性（1958: 583），一切都必须在语境中观察。同时我们须警惕，超越多样而模糊语境由某个表述本身来引申一个普遍性陈述的做法，这种方式忽略对语境澄清和理解。哲学研究必须通过具体的例子，哲学家可以使词特殊的、反常的用法返回到日常的用法（1958: 116）。这并不意味着从难到易，而是恰恰相反。因为对哲学的语词使用，必须提防使其从语言的财富变成随意的抽象；

---

<sup>①</sup>对《逻辑哲学论》完整而正确的口述，□在或多或少都可以在当代哲学指南中找到。一个“□典”是温伯格（Weinberg 1936），因□它可以追溯到 1936，因而未受第二□段□特根斯坦的影响。

虽然人们学说话时显然不需要学习全部词语之间的关系，但正是这些极其复杂的语词关系，构成了困扰哲学的迷障。

哲学问题与语言同样深奥和重要（1958：111）。当“语言去度假”时，或当语言问题“闲置”（*leerläuft*）而不“工作”时，哲学就获得了发展（*Wenn die Sprache feiert*）（1958：38，132）。我们让自己被形式化的外部相似性愚弄，就会忽略了不同语言的内部功能差异；我们解释语言系统的某个部分时，只是通过错误的与其他部分语言类比来实现（1958：90，91，109，132，304）；我们以单一类型的例子来滋养我们的思想，这种过于均匀的饮食是“哲学病的主要原因”（1958：593。真正的发现将是一种“使我在想研究哲学时能停止的控制能力”（1958：133；斜体字标出）。

我们必须将句子视为一种手段，并在此意义上处理其用法（1958：421）。一种语言是由许多部分构成的，相对于工具，每个部分都以其自身方式在所属的语境中运作（1958：11，23；Part II：224）。词语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1958：43）；语言总体则是被我们兴趣所引导的手段（1958：569，570）；“事物的表意背后是人”（1958：457）；“口语或书面语言是人与人互动的桥梁”（1958：7，9，23，25，etc.）；“语言在语境中获得意义”（1958：583），我们在公共语境中学习言说。“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1958：19）。

方法推进遇到困难时，一个有用的办法是对比简单和复杂性的语言游戏或模型（*Sprachspiele*）（1958：8 ff.），它们可被作为研究手段要素，例如：可以作为比较对象（*Vergleichsobjekte*）。这些模型通过语言要素间的相似和不同比对来澄清它们（1958：130）。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使用“游戏”（*Sprachspiel*）来处理任何语言应用，无论是人造的还是“自然的”，包括语言使用和超语言行为——（1958：7）。这意味着不仅要收集语言材料，而且要在适当的形势下安排这些材料以显示问题的结构；由此，仅仅有材料不足以发现真正语言使用情况下的例子，还需要造出其他要素（cf. *ingeneral*, 1958：109-33）。

一旦我们从汇集各种形态的词句的倾向中解放出来（1958：11，122，435，661），就能沿着这样的路径就能揭开那些无意义的伪装（1958：464）。困难也由此敞开，而我们则能够厘清问题所在。

维特根斯坦将哲学困难视为个人的难题或对个人的“心理的阻滞”，可以通过意义疗法来治愈（1958：123，255，309 *passim*）。但他对这一难题背后的个人因素或环境原因却并不感兴趣，对困难本身的分析以及它作为语言中的相对对象的体现也不感兴趣。这一过程不同于精确的心理分析过程，因为困难是非个人化的，且被视为一个人际间的交流结构（1958：109-129）。这可能是弗雷格逻辑主义遗产通过《逻辑哲学论》在《哲学研究》中留下

的影响。因此，判断后期维特根斯坦路径在何种程度上是否属于“心理学”是十分困难的。相反，它是一个典型的结构主义路径。通过模拟（如巴尔特所说）对象的途径建构，并在此过程中重建规则，对象的操作在其中得以显示(Barthes, 1964: 213–20)。维特根斯坦拒绝本质主义，他关心的是功能；他削减语言中的碎片，旨在寻求在变化无穷的口语中出现其他例子中可以测度的范例。他试着探索意义而非为对象指定意义，“他寻求发现意义如何可能，以及在何种代价、何种依据上可能”(Barthes, 1964: 218)。如果词句的表达意义在于其具体的使用中，则必然有一个规则控制这种使用(1958:199, 242)。这些规律必须符合公认标准，即行为的社会方式。这里，理解维特根斯坦拒绝本质主义的关键在于，言说者（或听者）特定的私人经验赋予了表达以意义(1958:243 ff., 398 ff)。这一原理源自本体二元论，出现于私人经验语言与公共对象语言以同一方式阐释的时候。实际上，对特定词汇，我们不能详述任何人的具身性行为。“我们所说的一种精神[geistige]活动与这些词汇相对应”(1958:36)。（注意：这里并未否定私人经验或思维本身，只是指出对它们一定程度上错误的解释方式（1958:304-8, 654-5））。

另一方面，将私人经验压缩到可观测行为当中，是一种总体上的行为主义，其并非从本体二元论的反思中得来，而是对这种二元论的隐蔽的延续。总体行为主义论者也是二元论者，他简单地拒绝讨论“内在”对象，因为他并不承认其存在，或由于他不能将它压缩为“外在”的语言对象。最初，他面对二元论的两个术语，从中选取看上去更为可行的一个，但恰恰却在重新审视这种局面时，却不关注其他术语(cf. 1958:308)。与此相对，我们应该尊重支配私人经验的语言规则：实际上，语言游戏是多方面的，它们不能彼此推演。然后我们会发现，在任何情况下，语言都不会是完全私有的。没有（单独）个人的专属语言，因为语言意味着参与规则支配的社会活动，这是私人的语言所不能实现的（1958: 153, 202, 243 ff.）。语言中并不存在个体的思想伴随或附着：“当我用语言思想时，没有额外的‘意义’通过心灵加诸语词的表达：语言是其自身的载体”(1958:§329)。“思想……只是将话语区别于无思想的话语而已”(1958:§330)，它们是在社会规则之上的区分。当然，也有可能通过行为来思考而无须诉诸语言；但对行动来说，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情况中包含的任何思想的构成都是“一些必须伴随着语词过程，除非无思想就不能说话”（ibid.）。实际上，“一个‘内在过程’恰恰需要相适应的外在标准”（1958:§580）。

本文将要提及《逻辑哲学论》中出现的其他要点。即是从这样的简述中，我们也能看到维特根斯坦如何从《逻辑哲学论》的本体实在论和逻辑主义转移到一种明显的唯物主义。一方面，体现在他拒绝将思想视为外在于语言、交流和行为的独立过程，同时，他注重将真实

的人类环境要素纳入意义生成的考虑范围。

可以审慎地说，维特根斯坦开始在一个更小的尺度上来操作概念，这让人想起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发展——之后在一种非常精细的方式中发展出明确的概念。相对于费尔巴哈的精细演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只是顺便提及。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要说维特根斯坦比马克思受费尔巴哈的影响更大：他在《逻辑哲学论》中，从固定结构的天堂出发，演绎出现实世界中千变万化的意义行为，并在严格的人类语言现实领域中探寻其迥异的形而上学源头。但是，他并未自问语言自身变异的根源，以及，为什么困扰与误解于是语言威胁的存在。这一点本文将最后将更清楚地说明。维特根斯坦的唯物主义是普遍的经验主义和生物学主义的，但绝不是已经检验的社会共同体的群体。在此，我们将看到对他工作未曾预计的阐释在此敞开。这并非偶然，本体论者伯格曼，曾是 20 世纪最后 20 年最有趣的哲学复古思潮代表之一（前维也纳学派成员，他现在自认为是恢复前康德形而上学的推动者），1961 他曾断言《逻辑哲学论》的“辉煌”和《哲学研究》的“拙劣”，其理由是后者是一种“荒谬的事实唯物主义”（Bergmann, 1964: 225–41）。

### 三、围绕维特根斯坦历史书写的真空

到底什么影响了维特根斯坦，让他的哲学体系与最初的《逻辑哲学论》如此不同，而且如此可接受和令人兴奋？在欧陆，这一问题听来相当合理。无论一个人曾经多么辉煌，也无论让他与世隔绝多久，肯定没人会相信有任何东西能代替自己头脑中的想法。维特根斯坦肯定也不倾向于夸大他所受到的影响，但他本人在《哲学研究》“序言”（*Vorwort*）（dated January 1945）中提到两个影响。此文值得重读：

当初沉迷哲学，而今再度回首，我被迫认识到 16 年前第一部书《逻辑哲学论》中写下的东西所犯下的重大错误。思想上经过与弗兰克·拉姆西（Ramsey）批评的遭遇，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到达了一个我自己几乎难以估计的程度——在他生命中最后两年，我与他曾无数次讨论问题。不仅如此，通过这些确定而有力的批评，我深深受惠于这所大学。例如，斯拉法先生，多年以来不停令我提升自己的思想，我受到此书中许多思想成果的激发。

(1958: x)

人们不禁会受到这些明确的线索的鼓励，人为应立即研究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形成，并为他的新思想在历史框架中的找到定位，以更完善的补充、界定其范围。不幸的是拉姆西

英年早逝，在 1930 年 1 月，他 27 岁生日前的一个月去世了。他留给我们的全部著作是十篇思想犀利的数理逻辑论文。其中，包括两篇经济数学（J. M. Keynes 盛赞其文）方面的论文，以及三篇富有深刻洞见的书评，分别是关于：奥格登和瑞恰慈（Ogden and Richards）的《意义的意义》、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书评写于 1923 年，与作者讨论该书之前）。关于拉姆西与斯拉法（Sraffa）的影响，冯·赖特不无保留地说，拉姆西的批评对早期维特根斯坦观念具有重要作用。鲍尔（Pole）也提到拉姆西曾“告诉维特根斯坦，逻辑是一种规范科学”（Pole, 1958: 38 and 56n），但并未提及斯拉法。赖特和马尔科姆在他们写的简要传记中（我常用的根据）都倾向于赋予这位意大利经济学家更重要的影响力。可能，这是从拉姆西以数理和形式逻辑作为主要技术的兴趣出发来理解的（尽管他确实如此，但在一个例子中他却尖锐批评维特根斯坦的学院主义倾向）。

首先，是斯拉法的尖锐有力的批评，迫使维特根斯坦放弃了他早期观点，并朝向新的道路出发。维特根斯坦曾说，他与斯拉法的讨论让他感到像一棵树的所有枝干都被砍掉了。这棵树要变绿，则有赖于其自身的生命力的重新焕发。

(von Wright, in Malcolm, 1958: 15 f.)

《逻辑哲学论》的中心思想，是一种图像论命题，正如赖特所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在一战的战壕里，看到杂志中一张代表车祸事件所有可能结果的图表时出现的想法。该图像成为一个命题：即作为事件状态的一种描述。它通过图像部分和真实的事件对应获得这一功能。图纸充当一个命题：那就是，作为一个事物的状态的描述。它通过图像的现实中的部分和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获得这样的功能。通过对这一过程的反推，人们可以说，以一个命题作为图像以其部件与现实世界之间建构起类比的对应：其中命题各部分联合的方式——结构——将代表一种现实世界元素组合的可能方式，即事物的可能状态。在以自己的方式陈述同一个情节之后，马尔科姆接着说，有一天，当维特根斯坦和斯拉法在火车上聊天之后，这个理论就“突然”破坏了。

当维特根斯坦坚持认为，一个命题与其所描述的对象必须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相同的“逻辑多样性”，斯拉法做了个手势，他用一只手的指尖扫过下巴，熟悉那不勒斯人的手势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厌恶或蔑视的意思。然后他问到：“那是什么样的逻辑形式？”

斯拉法的例子令维特根斯坦对他所坚持的命题及其对必须有相同的“形式”的描述产生了一种荒谬的感觉。这打破了他原有的观念——一个命题必须与它所描述的现实是一种确切地构成“图像”关系。(Malcolm, 1958: 7-8)

由于担心可能与其他历史发展有关，尤其是担心对从《逻辑哲学论》的观念世界到《哲学研究》转向的分析过于主观，马尔科姆又增加了一个脚注：

赖特教授告诉我，维特根斯坦与这个偶然事件的关系有点不同：问题争议在于，维特根斯坦主张，每一个命题必须有一个“语法”，而斯拉法反问维特根斯坦何谓“语法”。冯·赖特在描述这一事件时，维特根斯坦没有提及“逻辑形式”或“逻辑多样性”。

(Malcolm, 1958: 69n)<sup>①</sup>

另外，语言游戏概念还受到足球游戏的启发。一个晴朗的日子，维特根斯坦正沿着球场散步，他突然闪现了一个想法“我们与词汇玩游戏”。（为了表明当时的情况，马尔科姆附上了一个插曲。他通过物理学家弗里曼·德莱森得知的，而后者的信息来自维特根斯坦本人。ibid.: 65。）

忽视这些事件的重要性显然不妥。毕竟，它们展示出一个思想家通过观察日常生活构思新的想法的过程。当然，这是因为他掌握了分布在不同“领域”各类行为中的一般方法。这对那些除了照本宣科就无法思考的头脑是一个有益的矫正。然而，有时人们的印象是，无论他的头脑中想到了什么，维特根斯坦只是轻松愉快地与朋友学生们相处，没有掩藏的动机，而仅仅是关注一个玩笑的效果。基本上，他和他们一起发明了文字游戏理论，在他们对导师的崇拜从，接受了这一切。[...]

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融入了剑桥的环境，并通过剑桥进入了整个英语哲学文化圈，这绝非偶然。最初他去做罗素的学生，尽管反感英语，但他仍在英国找到了适合发展他的兴趣和想法的环境。当时，剑桥（牛津也是如此）完全是精英大学，淡泊欲望，并以斯多葛主义为主要传统。受此影响，他也准备以克制来面对琐碎的问题。

他的教学方式十分独特，从不组织讲座，而是穿插着长时间沉思的问答，还有他的那些古怪行为，正好契合了从伟大的 19 世纪自由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风格。这些风格又经过完

---

<sup>①</sup> 1965 年 4 月，我曾有机会和马尔科姆谈论斯拉法对维特根斯坦的可能影响；他对此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他只是回忆了火车上关于手势的这一幕插曲。



善的分层的社会机制混合了个人主义的特质，这种社会结构虽然不再是帝国的中心，但仍然是英联邦的核心。这种理论上的个人主义对他的语言理论造成了限制（后面会谈到）。剑桥和牛津的高校习俗是，任何人都可以在理论上挺身而出，但是如果他所说的不符合集团价值观，在实践中他就被视为不名誉的个体。事实上，当时的思想主张是：每个群体应是一个自由的个体的组合，从而形成独立个人的联合体。但是，这种主张也被用来遮蔽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被预先判定为这样的群体，才会被“承认”属于他本来就已经身处的这个群体。世界上可能没有其他大学像牛津这样，允许其成员 20 年间不发表任何作品。英国各种学术朝着专业化发展，哲学从历史和社会科学分离，这也让维特根斯坦保持、或至少使他更易于保持处理问题时与历史-社会学维度截然不同的方式，也不同于以前那些常用来作为参考的导师（康德，实际上还有许多其他名字，他吝于写出引文。）基于个人的才华和原创能力，这种态度还是可容忍的，但后来逐渐变得令人反感，尤其是数百年轻小伙子就像康德一样，对他的使用的所属文章写一个片段，（*der*）而不是自己投入对《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思想的研究。后来，曾任教于剑桥大学几十年的摩尔（G. E. Moore），在这里创建了语言分析学派。

在维特根斯坦死后，相关史料编撰显得不足，必须承认，这种英国社会和学术环境的同质化特性，阻止或至少延迟了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更现代和在社会意义上更有趣的使用。据我所知，还没有人从历史的观点研究过这些，甚至没有人将其与更广泛的问题联系起来看待，或试图在维特根斯坦设定圈子外面尝试应用。粗略来看，可以说他们仍然保持着逻辑学的观念，但逻辑学极具穿透力，可能已经超越了维特根斯坦自己设置的领域。我并不是影射赖尔（Gilbert Ryle）、韦斯顿和许多其他没有做过的原创性工作的人，他们没有提出维特根斯坦的口头或书面教义之外的想法。但他们无疑继续了学术的“外部”历史，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将社会环境纳入考虑，他们也从来没有回到这些思想出现指出的伟大文化源流中来从事研究。最主要的观点在于：减少“第二阶段”维特根斯坦对现实历史维度的贡献，转而把它投入到建设性的使用中。这并不足以重建他本人心智发展历程以及与周围环境的个人关系。

我们还必须在欧洲文化的架构内作一个回溯，首先是系统有效地阐述后来属于他的观点、学说和技术，再独立地追踪它们对他个人的影响。他的学说自身已经完成前一个工作，不过只是偶尔的引用，而缺乏深入。（在一个晴朗日子，拉姆西对维特根斯坦说，“你知道吗？逻辑是规范科学！”），他们似乎不知道，后者的可能。[...] 他们可能高估了洛克传统所说的精神意识的相对于无意识的重要性，也高估了意识作为个体行动中心的位置。

实际上，即使作者并不知道之前界定，这一界定——如果它被证明是有效的——引起了

进一步的研究，这一界定通过接触其他界定而被放大并接受批评。所有这些材料，都有助于在一个框架内所定位作者所说的内容，并检验它。以一些发展的缺席开始，代之以其他作者的相似想法。尽管存在直接影响的时候，这一切都更真实，但它永远也不能像许多盎格鲁-撒克逊哲学家们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乏味的材料和优先性的愚蠢主张。[.....]

[...][对这一切的忽略意味着]第二阶段维特根斯坦的活动不断被抛回第一阶段，这也削弱了对《逻辑哲学论》相比《哲学研究》的理论创新的评价。这加剧暴露了他的学生和追随者的缺点，他们热衷肤浅而舒适的偶像崇拜，以日常语言舒适但不负责任地宣泄其崇拜狂热。这最后导致各种不同倾向的学者对他变得反感。比如，造成了提倡某些“先验逻辑的理性表达”主张，从他工作中某观点（所有观点都源于“语言作为蛊惑我们的心智的手段”——1958: 109）提出了一些荒谬批评，他自己已经有效地表明它们是荒谬的。此外，它使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客观地看待他的哲学批评，作为语言病理学可以很好地在意识形态的一般批评中找到自己应有的地位。这种复杂的局面的形成明显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史学真空和文化分离主义气氛中盎格鲁-撒克逊特殊而精细的品位；二是在欧洲各国滞后而肤浅的学院派哲学理论，加上某些众所周知的狭隘教条倾向，即使马克思主义者也长期以来深受祸害。

通过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新资本主义工具运用”，我们必须尝试从不同的方向接近维特根斯坦，坦承两个基本思路的局限，并通过他思想核心来还原思想的原貌，这比惯用的细枝末节的老生常谈和典型的官方化的“维特根斯坦”讲座要更接近他本意。

我感觉，我们必须自问，维特根斯坦和他的传记中被认为是最重要，和最富有成效的外部“刺激”是什么？我认为是斯拉法的刺激。斯拉法同样是一个天才，是一个经济学家，并碰巧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 四、一个关于斯拉法影响的假说

为了说明斯拉法的现代性思想特质和他的工作性质，我想谈谈两位专家及其著作。一位是克劳迪奥·纳波莱奥尼（Claudio Napoleoni）和他的《新世纪经济思想》（*Pensiero economicodelnovecento* 1963），其中结论部分讨论了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ProductionofCommoditiesbyMeansofCommodities*）。他提出这是“第一次尝试，明确以现代方法的深刻不足之处为假设，自觉地阐述一种经济分析”（例如，主流的做法，是反对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所谓古典经济学，并从杰文斯、瓦尔拉斯和维克塞尔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主义和新资本主义的当代理论家出发展开分析），他对它的评价是一种“明确回归古典传统，回到李嘉图-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但实质上与利润、工资和消费等上世

纪那些主导的类别有所不同。斯拉法从事劳动价值理论以外的分析，从而使自己克服经典理论形式上的困难；他不从任何既定的社会结构出发，而是从“商品”的世界和“它的技术连接”入手，他发展了一种剩余理论，纳波莱奥尼认为，“它们必须带来回报，在经济学中也是如此，对剥削的整体问题，是古典传统中的基本问题”。

事实上，要处理……消费与生产关系的问题，势必要重新思考人的条件如何对应于一个剥削组织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异化的条件，这是马克思第一个看到的现代经济社会的相关知识。(Napoleoni, 1963: 194, 198, 201)

文森佐·维泰洛(Vincenzo Vitello)在他的《现代经济思想》(*Pensiero economico moderno*)结尾部分也对比了斯拉法的方法与“现代”理论的相似之处。在后者看来，“我们从原初生产要素开始，通过随着这种方向运动，最终到达商品消费阶段”(沃尔拉的模型即是此种典型)；“以商品生产商品”是指社会生产的一个循环过程，其中同一商品既作为产品出现又在自身的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生产的手段。尽管斯拉法本人不发展劳动价值理论，他提供了一个回归剩余价值的概念，该概念已经完全迷失在边际生产力理论中(Vitello, 1963: 124)。

我曾在1960年11月跟斯拉法讨论，当时他相当回避我的访谈主题。他倾向于尽量减少自己对“第二阶段”维特根斯坦智识的影响，他仅仅将两人之间的关系描述为沿剑桥一起散步的善意而愉快的记忆。最后，他承认或者有些观念上的东西，并提到有可能自己写出来，我不知道他是否确实这样做了。需要在头脑中清楚《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之间的差异，并记住，斯拉法理论的主要命题早在1930年已经制定。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一个新李嘉图和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逻辑学家施加的影响略带形而上的专制主义色彩，同时神秘地开放了如下形式（或可能采取的形式）的衔接：

1.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构成一个给定的总体性，回归到语境的关系中来，这是循环而非线性思维。具体而言，即回归到真实的环境中——包括构成语言的特定“事物”——获得它们的意义。真实语境之外的事物毫无意义，或让自己在先入为主且不属于他们的图式中被同化、贬值。这是《逻辑哲学论》的情况，其中每个命题都反映了一个由双方共同构成的事实。在今天，任何意义方式下都不可能谈论这个结构，我倾向于认为这种学说之间存在一种密切相似性：每一种商品基于自有的属性，以不可约的方式有一个值，也可解释为利润是资本的固有属性。在《哲学研究》中，句子的内部结构是通过比较与其他句子而揭示的：即通过一个对句子增加外部结构的方式，组成由至少两个句子之间构成的关系。当维特根斯坦表明，单

个词语的意义构成他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他制造了一个由内到外的类比过程。马克思分析商品与维特根斯坦分析词语至少具有如下共通点：都拒绝价值是对象内在属性的可能，而将它们置于特定语境中。

2. 回溯语境和真实情境中的词汇意义（更确切地说是：将它们变成话语），进一步回归到人类作为意义演绎者的存在。这种存在不仅是生物个体，更是公共社会生活的存在；相比较而言，主观的私人经验就是次要的。正如主观经济价值理论建立在一种近乎唯我论心理原子主义基础之上，所以也是一个主观的意义理论。毕竟，这一观点出现于《逻辑哲学论》Wittgenstein, 1961 b: 5. 6 ff.)<sup>①</sup>。商品“自身并不能无缘由的进入市场”，语词也是如此。这是商品和语词有共同的；这种价值是由人类在协作中授予他们；私人语言，如同私人市场，是一个有冲突的术语。但是这也有可能令个人既拥有的商品同时也能获得讯息。

3. 另一方面，商品或词汇可以回到现场承担人们赋予它的价值；因此，正如马克思在他对商品拜物教的知名的文章中所说，它反映人类自身劳动的社会性质，也反映了它作为一种客观的特性附加到劳动产品本身，还反映了它作为这些东西的社会固有属性（Marx, 196 5: 71-8 3）。在斯拉法的认识影响维特根斯坦的马克思主义因素时，他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些命题也适用于单词、句子和讯息。

4. 范例研究模型是古典经济思想的特点。这些模型通达抽象的途径，体现为丢弃次要特征，而不是汇集在一起的共同属性。这是一种抽象的方法，它决定了自己与对象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从它们所属的整体中切割出某些部分，而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的工作路径。他不仅拒绝通过共同的属性归纳获得的任何模型，他建构的“语言游戏”即是通过丢弃无关或次要的内容形成独立全体。通过这种方式，他避免了危险，并通过“逐步细化类比”（莫里斯·多布的表述）对一般属性的进行概括，对具体问题的理解和接受检验中，原本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变得不再不可或缺，因而在失去深度的同时获得了广度。<sup>②</sup>从一个与他自己不同观点出发，我们或许可以批评维特根斯坦自限于一个很小的模型（就像我们可以批评他的后继者没有系统地工作，以回到同样模型的基本观念中来）；但是，维特根斯坦的论证目标正是我所提到的那些；语言期待找到语言理论中的李嘉图和马克思（甚至可能是其亚当史密斯）。

除了我们规模的差异，斯拉法和维特根斯坦在他们的作品开始和接近问题时，有一个

---

<sup>①</sup> 在维特根斯坦许多讨论的语言唯我论的篇章中，这一观点是出现在《逻辑哲学论》中是在 Hintikka(1958:88-91)和 Keyt(1963:3-15)篇章中。

<sup>②</sup> 在道博的《经济科学的现代潮流》（Dobb1937）的第五章中，有对建构和使用模型富有启发的片段。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道博本人也曾经是圣三一学院的教员。另请参阅斯威齐“抽象的用途”（Sweezy 1940）的章节。

明显相似的程序。《以商品生产商品》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模型之上的。首先，有一个封闭的生产过程模型，其中商品具有生产手段和产品两种功能，每一种商品的数量生产相应数量的生产手段。另一个模式，是一个经济过程中盈余的出现，生产和复杂的生产手段令商品本身继续，但技术如今允许生产的商品数量等于或大于其作为生产手段的数量。斯拉法在他的论文开头评论到：

让我们考虑一个只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原始社会。商品是由独立的行业生产，或丰收后在市场中交换。让我们首先假设，只产生了两种商品——粮食和铁。两者都被使用了，一部分用以维持工作，其他用以作为生产手段——粮食种子和工具的形式铁。

(Sraffa, 1960: 1)

接着斯拉法谈到了他的第二个模型；随后从其他生产手段独立出来的劳动，从其他价格中建立工资。在《哲学研究》的第一页，维特根斯坦先介绍和批评了圣奥古斯丁的语言理论作为教条化的例子，紧接着他写道：

让我们想象一个语言，假设奥古斯丁给出的描述是正确的。语言是作为一个建造者 A 和助手之间的交流手段。A 是以石头来建造：有块、柱、梁和板。B 递给他石头，这其中 A 需要提供一个顺序。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使用的词语包含“块”、“柱”、“板”和“梁”的语言。A 叫出他们的称谓：而 B 将遵照他听到的指令行事。假设这是一种**完全原始的语言**[1958:2; italicsaremine].....它驱散原始语种[Arten]语言学习和应用现象应用的迷雾，从中人们能命令一个清晰的目标视野并将词汇功能化。

(1958: 5)

再看一个更为深入的案例：让我们来看一个扩展的语言案例 (2)。除了“块”、“柱”等四个词汇之外，还可以让它包含一系列词汇作为店主在 (1) 中使用的数字符号，[在 (1) 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这样一个应用语言向某人发送包含购物信息指令的例子，给他一张写有“五个红苹果”的纸，然后看着纸描述店主的行为：奥古斯丁的理论不能解释这种行为。] 进而，让此处有两个单词，比如“有”或“这”（因为这大致表明了他们的意图），用一个指示性举动来建立联系。最后是一定数量的颜色的示例。A 给出命令如：“d-有-板子”。同时，他向助手展示了一个颜色示例，当他说“有”时，他指向建筑工地的场所。

(1958:8)

我不打算进一步阐述这些类比，但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我得谈到更多关于维特根斯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其他关系。

## 五、后期维特根斯坦的马克思主义应用

除了对符号逻辑的技术贡献（这里不作讨论）和他的哲学思考的实践性方法论之外，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具有实践哲学的应用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维特根斯坦彻底地批判和拒绝仅仅作为一个思想家。无论他的思想多么艰巨和深刻的，他依然会有“错误”。相比之下，我觉得后期维特根斯坦给我们上了迄今仍让令人充满兴趣的一课。这里，首先需要做好马克思主义可能影响的分析，包括在经典文本中直接影响。但即使研究可能表明并没有这样的影响，或者不是一个有意识的影响。我们仍然需要考虑到他们之间的明显相似，以及各种类似想法在不同方向的发展。比如，私人语言的想法曾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Deutsche Ideologie*）的猛烈抨击，说它足以令人记住他们关于黑格尔的意识-语言-思想三元论的评论。具体是在此书开始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涉及历史和意识的形成两段：

语言与意识一样古老；语言是意识的实践，为他人而存在，因此这也是语言对我个人而言真正开始存在的原因；语言与意识产生于与其他人交往(Verkehr)的实际需要。在这个非凡的著作中还有许多其他的页面，我想维特根斯坦都会热情地阅读[...]<sup>①</sup> 我指的是，那些“成为”真正问题的有关哲学段落的页面，以及对这些操作的现有的“对世界存在思想的独立表达——作为存在世界的基础”，或资产阶级对“财富”在商业和个人意义的使用，即“商业关系和个人相互关系等的特征。(ibid.: 42, 53, 61)

但我更多的是指是题为“约翰启示录或‘新智慧的逻辑’”，以及“辩解的评论”这些篇章。前者包含对作者所称的并置和同义的批评。并置存在于将各种语言技巧的使用，为其设置一个等同化的中间术语，之后被放弃了——“私下欺骗性的思想是一个很值得推荐的方法。同义在于考虑到“如果两个词语源上相关或相似的声音”然后他们“互相负责”，或用一个词不同

---

<sup>①</sup> 或者他是否确实读过？《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个完整版本于 1932 年在柏林出版，当维特根斯坦即将经历冯赖特所描述的“深刻的改变”；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不大可能完全没有讨论它们；值得提醒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饶有兴致地访问后维特根斯坦在此期间计划转移到苏联；但是，无所不能的冯赖特告诉我们，“部分原因是在俄罗斯 30 年代中期的严苛条件”，使得维特根斯坦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

的含义“根据需要首先在某种意义上，然后在考虑其他意义”。这种技术的应用也在其他事项之中。

通过使用其出现在生活实践或哲学思辨中的思辨性的含义，能将经验转化成为思辨关系，说出该思辨性段落的含义，然后表述出来。因此，他批评生活实践关系也用同一个词表示。(ibid.: 304)

我提到的另一章中，有两个段落值得注意：

对于哲学家来说，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就是从思维的世界落实到现实生活中。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而当哲学家赋予思想以独立存在的位置时，他们就不得不使语言也成为独立王国。这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其中思想以文字的形式获得内容。从思想到现实世界的问题转而成为从(其)语言落实为生活的问题……哲学家将只有将他们的语言溶入日常语言，从中抽象，并承认它作为现实世界扭曲的语言，进而认识到，无论思想还是语言在其自身均不形成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ibid.: 503 and 503-4)

读者可以看看对这些概念的批评：如“自我和逻辑把戏在进步中的使用，从“不是我的财富”到“我的非财富”，与所有可能从它产生的形而上学的后果，在本章中关于“新神学”，以及在其他章的内容，如：寻找具有“魔法般优点”的词汇重新建立语言思想与现实生活的连接。马克思和(或)恩格斯这些篇章以及许多其他的篇章，对那些研究过维特根斯坦的人而言，成为一个巨大的惊喜。一般来说，现代语言分析潮流代表他们最先进的范例。在《哲学研究》中，一些观念及其表达方式都来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某些地方，人们几乎有这种印象——维特根斯坦正是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思辨哲学传统态度移植到另一个智慧星球，还包括和其逻辑技巧、它的术语使用以及对“实用”语言的脱离。当然，这并非维特根斯坦唯一可追溯的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指明其他的一些关系，能有助于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向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变。所以，后来的追溯可以说是在同一条路的反向行进，我们最终会发现，自己与维特根斯坦思想一道重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在这里，我必须有条件地顺便回忆一下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贡献，他将意义定义为“生活中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始于“意义从最简单的例子中出现”，这是一种对命题

的理解方式(Dilthey, 1927: 232-6)。贯穿狄尔泰对待“生活的类别”的许多段落，有点维特根斯坦的味道，即是说，维特根斯坦文本中的许多段落有狄尔泰的味道。马尔科姆告诉我们，维特根斯坦的格言“表达仅生命之流中才具有意义”“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其中总结了很多他的哲学思想”。(Malcolm, 1958: 93) <sup>①</sup>

这里唤起了另一个明显汇聚点。根据缪勒(Max Müller)创建的比较神话学派(他 1868 年至 1875 年任牛津大学教授，并在世纪末直接用英语出版著作)，必须诉诸于语言比较来把握自发表达的神话，这种自发表达是语言对自然现象普遍的个人幻化。当形容词应用于这种现象，它就从原来的含义中挣脱，并被设想为个人名义的神灵。令人惊奇的结果是，神话来自于被视为病态的语言。对于维特根斯坦，我们可以说，在同一个圈子里，他散布了哲学作为病态语言的学说：这种可能是因为思辨哲学被否定了：即，在一定意义上，哲学已经被削弱为神话。但是，我们必须强调如下步骤，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德国古典哲学的结论迷失于在这个叙述到行动削减过程中；并且在这种“损失”形成了新的保守思想。

当然，更多的篇幅应该用来讨论维特根斯坦与语言学的可能关系，以及与他之前某些对利希滕贝格有兴趣的哲学家的关系上；对赫尔德和洪堡我们没有任何线索。葛森韦勒倒是指出，维特根斯坦和弗里茨毛特纳(Weiler, 1958: 80-7)有一定的关联，在他的《语言批判的贡献》(*Beiträge zu einer Kritik der Sprache*) (1901-2, 再版数次)，以及多处其他作品中，看到了语言的批判对哲学的解放和治疗作用；他反对理想语言的使用，提倡代之以多样性语言研究。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明确将自己的哲学与毛特纳(Mauthner)的语言批判哲学(Wittgenstein, 1961b: 4.0031)相区别，但《逻辑哲学论》之后，他的方向一定程度上回到了毛特纳语言批判的位置。除了毛特纳和从事语言研究的其他哲学家，在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 30 甚至 40 年代的哲学家，都忍受从“第二阶段”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出发，通过寻找或交换重要支持元素来看待他。<sup>②</sup>例如，他们欣赏“意义作为使用”理论的解析能力，但感觉它不够充分，进而会发现比较这一理论与所谓“分析”理论非常有用，它试图通过进入其构成要素来解析意义，而这种理论仍被大多数语言学家高度重视。

我们无疑能感觉到，维特根斯坦的语境之间具有某种(他推崇的)家族像似特性。相

---

<sup>①</sup> “表达仅生命之流中才具有意义”，马尔科姆说，就他所知，没有在维特根斯坦的任何篇章中看到这样的格言。但维特根斯坦却宣称在某处写到过。[...]几乎同样的格言表述经常出现在《哲学研究》中。

<sup>②</sup> 近年来，一些哲学家表达了对语言学的浓厚兴趣；语言学检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各种哈里斯或乔姆斯基的各种形式模仿。参看威尔斯和阿尔斯通的篇章(Rulon Wells and William P. Alston 1962: 697 - 708 and 709 - 20)。



关的观点如，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曾说，语言学价值在于语言作为一个系统，在于语言博弈游戏提供的模型种类及其使用。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论语言的多语言研究，和“由魏斯格贝尔（LeoWeisgerber）、特里尔（JostTrier）和其他人在1930年左右开启的“语义场”研究，这种研究战后由恩斯特·罗西-兰迪逐渐发展起来(Rossi-Landi, 1972: 273, n. 35)。

再回到马克思主义，是时候对前面几页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给一个形式更明确边界限制了。最后，看看究竟在那里他做了他最富洞见的贡献。我将负面观点出发——以四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批评。为了便于陈述，我分开来说。

第一点，维特根斯坦具有“公共性”而不具有“社会性”。他的语言游戏需要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发生。他正确地批评了从一个人“当中”发生的神话的错误观点：语言必须是公开的，也即是主体间可控的；它甚至要求在“一个与自己交谈”时，都需要的“外部规则”。不过，这在公众场合发生时并未被视为社会性存在。维特根斯坦的立场与商品研究者相似，都将自己限于描述各类交易，而他承认同类型交换总是可以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其他人群中重复实现。我们知道所有这些人的存在，但他把他们作为已经形成的个人加以研究时，他们开始互相交谈会发生什么。当他描述我们作为孩子牙牙学语的方式（幼儿园作为不可替代的语言学校这一广为人知的想法，饱含着维特根斯坦的热情），他通过孩子来向我们说明，孩子们是作为已经充分发展的个体来传达他们已经具有的语言技巧。

总之，维特根斯坦的想法似乎从来没有抓住，或者至少没有把握住的问题根本，是个人在社会性形成他们作为具体的个人。除其他事项外，他们已经开始彼此交谈。正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Okonomie*）1857-8（但大约1950年进入公众的视野，因此，在维特根斯坦之后）中，马克思写道，个人与语言的明显关系——

——是其作为一个人类社群的自然成员。语言作为个人的产品是荒谬的，[*isteinUnding*]。但也是一种属性——语言本身就像一种社群的产品，就像社群中存在的其他方面一样——因为它不言而喻地代表着公共的存在。(Marx, 1953: 390)<sup>①</sup>

第二点，语言使用概念关注已经存在的东西；例如，我们使用既定的词语，这是它的意义。儿童学会了一个新词，并第一次使用它，这一行为中有些东西已经超出了这个孩子自身的认知（因此，这一行为将迫使他以某种方式“看到一片世界”）。但是，这个词最初是如

---

<sup>①</sup> 不久前的英语版本中：一个孤立个体在土地上再也没有什么比他能说话之外的什么财富，当然，他也可以就像动物那样，仅依靠物质而活着(Marx, 1973:485)。

何生产的？不回答这个问题类似于不问刀是如何产生的，将词的含义等同于它的使用就好比解释刀的使用（这是它的意义）而不考虑刀匠（可怜的东西），也不考虑从我们的手中切开东西这一真实的社会过程。总之，为了陈述另一种观点，我要说，维特根斯坦缺乏劳动力-价值的观念：即价值的特定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指语言对象——作为给定的语言劳动力的产物。从语言的对象出发，他只是向前而从来不会后退。因此，他认为交流的手段是既定和“自然”的；它们是一种免费提供的财富。他以重农主义者的角度来应用语言（后来赖尔在一系列论文对语言使用的角度转向重商主义）(Ryle, 1931-2; 1937-8; 1953; 1961; 1962)。需要顺便注意一个有趣的地方，在斯拉法的《以商品生产商品》中，劳动价值理论同样未充分展开。

第三点，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作为语言的疾病和缺陷，他坚持认为“去度假”和“空转的齿轮”造成了“心智的阻滞”和“困惑”。无疑这提出了令人吃惊的方面，如果它未在社会和劳动的使用中适应，那也将是失败的。维特根斯坦从来自问的是，为什么语言去度假而空闲出来的齿轮会造成这些阻滞和困惑，以及它们是否有历史-社会的根源？维特根斯坦不断从语言的角度谴责哲学异化的各个方面，并通过详细步骤加以描述。对戏，我毫不犹豫地概括为语言的异化。但是，他并没有对他审查并抨击的现象做反复推敲，他也完全忽略了异化的一般原则。他的研究缺乏一种社会和历史理论根基。（我的这种批评与那些 19 世纪式的陈旧批判毫无共同点，他们批评维特根斯坦只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一种焦虑，因为维特根斯坦声称的“专门的哲学语言游戏中”存在病理特征。维特根斯坦和这写批评者，这种游戏的想法是现在看来都是过时的，语言的病理特征也可能是悲剧性的，但那是另一回事；对它的补救措施肯定不是另一种“特殊的哲学语言游戏”。）

第四点，作为这一切的结果，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传统正在变得日益贫瘠。这是因为，拒绝可能唤起各种传统的理论建构，而只剩下脱离现实的残留。除了令人恼火的琐碎风格，温和的节奏与日常用语仍然反映了维特根斯坦学术传统与其他文化的孤立，与其他方式智识追求的哲学孤立，与博学的牛津剑桥之外世界的孤立。关于维特根斯坦每的讨论，听起来熟悉的气氛仍然是一群漠不关心实际问题的专家，而只是特定的术语的发言在主导，发言者看过某些深奥的书，且只属于一个特殊的小群体，在这个群体中语言以典型的维特根斯坦式检验去度假和闲置。他接着说：“我们说……”，“我们倾向于……”，“我们没有意识到……”，等等。为什么从来没有人为诘难他“我们”只能依据这些孤立分子解释，而他们默认接受成为“我们”代表着以种“所有的人”可能的借口，这是真是一团糟！英语读者感觉他们的语言是自然的（毕竟维特根斯坦曾用它教学和交谈），缺乏对语言相对论的认识无

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辅助作用。

总之，从这一点上并不难看出，维特根斯坦积极地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的显著性。维特根斯坦的立场是非机械唯物主义的，他不断地回到一个基本的观念——人作为表演所有的意义和沟通的演员。在这些过程的研究，他构建了准形式化模型：即，在低层次上构建模型，而不过分具体描述发生的内容，并在充分抽象的情况下避免陷入经验主义困境。这些模型与整个分析理念一起，我称为“结构性的”，其纠正了历史泛理性主义的某些偏颇，因为它们坚持的立场，意味着拒绝所有面对实际事物时不充分的模型。因此，我们在一个非形而上的维特根斯坦概念中重新评估“常量”——它代表一个可识别的结构，即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改变速度比其他可认知结构慢得多。我将尽可能展现其积极方面，比如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为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建立起了某种调解。如上面提到的，年轻时罗素曾以他的工作为基础。实际上，无论从古典（或“新古典”）经验主义的观点，还是从经典（或“新古典”）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逻辑哲学论》中包含的分析都难以想象。

但是，维特根斯坦的最重要的贡献仍然是他在语言异化方面，尤其是对语言哲学异化的批判。对于他的理论局限总体的严肃保留意见并不能遮蔽我们认识这一事实——即他确实开启了语言“异化”，虽然他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也许从来没有想过在此事的一般形式，但他确实在语言特定焦点的异化形式与语言学表现方面积累了大量精细的工作。当处置那些草率概括的牺牲品时，我们永远无法有足够的坚持，在语义阐述和严谨性方面达到维特根斯坦审阅大量细微难辨案例的水准。一个理解维特根斯坦的人不会再被大话糊弄，不会被逻辑的把戏和哲学家建构的伪科学结构愚弄，也不会被共通话语面临的阻滞、缺陷或本质的局限等困难所阻碍。

维特根斯坦提供了对异化语言的现象学批判卓越而不可替代的工具。无疑他的哲学由一些局限：比如，他的“公共”并非“社会的”；他的“(语言)使用未与劳动重新建立关联”，以及他的“分离主义让语言脱离历史现实”。一旦人们认识到他观念中的这些局限，那么他的哲学理论活动就是可接受并可以通过实践哲学加以精确地扩展，但这种活动不应再局限于个人，而是应直接进入社会。再如，维特根斯坦持续攻击的混乱和心智阻滞问题。其实，这些问题不仅出现在他某些同事的头上，而是全世界的普遍问题。它们是极为重要的社会事实，而不是单独个体的紊乱；他们植根于历史，植根于我们的体制中并关涉具体利益，而不仅是不明“诱惑”或个体言说者的“倾向”。

因此，当我们比目前更深入一步，进入史料允许的维度，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么说——卡尔·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可能具有某方面的互补性。具体来说，马克思给出了不可或

缺的理论框架，而维特根斯坦精于语言阐述的应用。如果它的根本重要性不停留在语言“去度假”的具体事实，而是继承寻问背后的原因，那么任何想要让语言回到工作状态的人，都会发现，知其所以然与知其然同等重要。

本文原题为“Towards a Marxian Use of Wittgenstein”，最初于 1966 年末发表在意大利期刊《新评论》（*Nuovi Argumenti*）上，之后收录于罗西-兰迪 1968 年的专著《语言作为劳动与贸易的传统》（*linguaggio como lavoro e come mercato*）第一版中。以该版本为基础，作者自己作了英文翻译，1981 年发表于尼日（J. Nyiri）主编的《奥地利哲学：研究与文本》（*Austrian Philosophy: Studies and Texts*）。



（罗西-兰迪与庞齐奥）

## PART III 杰夫·伯纳德专辑

杰夫·伯纳德（Jeff Bernard, 1943-2010），奥地利社会符号学家，维也纳社会符号学学院院长，奥地利社会符号学会秘书长，《S-欧洲符号学杂志》主编，1994至2004年任国际符号学会秘书长。



（杰夫·伯纳德）

# 杰夫·伯纳德与费鲁齐奥·罗西-兰迪

## ——一份基于研究视野相互欣赏的友谊

苏珊·佩特里利，奥古斯托·庞其奥著

任伟译

1992年2月21日，罗马的匈牙利学术院举行了一场纪念意大利杰出符号学大师费鲁齐奥·罗西-兰迪（1921-1985）的国际会议。此次活动由雅诺什·凯莱门组织（Janos Keleman），吸引了奥地利符号学协会积极参与。杰夫·伯纳德出席了这次活动，他的身份是罗西-兰迪的朋友、罗西-兰迪及其工作的伟大崇拜者和促进者。

杰夫·伯纳德当时49岁，正是最富工作激情的年龄，他的热情常常感染到周围的人。无论在研究还是各种会议的组织方面，他都有很多思想。他既是社会学家、也是符号学家，同时还担任维也纳社会符号学研究所所长、奥地利符号学协会秘书长、《S-欧洲符号学研究》（*S-European Journal of Semiotic Studies*）主编、《符号学报告》（*Semiotische Berichte*）杂志联合主编。他策划的会议为大家提供了聚在一起分享研究心得的机会；他之所以如此投入，是因为他的理想，因为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有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一种查尔斯·莫里斯所谓“开放社群”（open community）意义上的群体的群体意识。

1992年，他和雅诺什·凯莱门、格洛里亚·维塔尔姆一起，编辑了一期《S-欧洲符号学研究》特辑，题为《辩证法、符号学、唯物主义——纪念费鲁齐奥·罗西-兰迪》。

其实早在1985年，他就和格洛莉娅·维塔尔姆（Gloria Withalm）一起在《符号学报告》上发表过对罗西-兰迪所著《哲学方法与符号科学》的评论文章，1986年又发表了两篇关于罗西-兰迪的文章：

- 1) “费鲁齐奥·罗西-兰迪辩证唯物主义符号学，分类—概览—图解”，见：《历史和符号学的历史描写——个案研究》，1985年10月2日至3日符号学明斯特分会第8次工作会议档案，克劳斯 D. 达茨（Klaus D. Dutz）与彼得·施密特（Peter Schmitter）编，明斯特：马科斯出版社，第329到366页。
- 2) “辩证法研究工作/社会历史调和：对罗西-兰迪社会进程符号学理论的见解”，见：《历史的符号——符号历史学论文集》，乔治·施密德（Georg Schmid）编，维也纳、科隆博拉出版社，第173-202页

1991年，伯纳德和格洛莉娅·维塔尔姆发表了“一个关键的世界（思想、人物与事件），费鲁齐奥·罗西-兰迪”，刊登在《南欧符号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论文专辑上，1991年第三卷（1、2期合刊），第367-390页。

1992年罗马会议上，杰夫·伯纳德和马西莫A. 邦凡蒂尼（Maassimo A. Bonfantini）、雅诺什·凯莱门、奥古斯托·庞其奥一起，推进了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网站的建立，并提议由研究罗西-兰迪的另一位重要学者、罗西-兰迪工作的另外一位推进者庞其奥担任该网站主席。

1994年到2004年，伯纳德担任了国际符号学协会秘书长（时任主席罗兰·波斯纳[Roland Posen]，来自德国柏林；财务主任格洛莉娅·维塔尔姆，来自奥地利维也纳）。整整10年，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而这只是他所做贡献的冰山一角。无论是任职期间还是任职前后，伯纳德还在很多其他方面为推进符号学发展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当然，毫无疑问，杰夫·伯纳德担任秘书长的这十年，对符号学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来说是成就非凡的十年。杰夫·伯纳德和格洛莉娅·维塔尔姆是非常出色的夫妇搭档，他们不遗余力地推进符号学在世界的传播，乐此不疲。

在维也纳，伯纳德和维塔尔姆组织了很多学术研讨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奥地利符号学协会第十届国际研讨会暨第七届奥地利-匈牙利符号学哲学研讨会（奥地利维也纳，2000年12月8日9日，及11日），大会的论文集定名《神话、仪式、幻象与符号学观点》，收录于《应用符号学》（*Angerwandte Semiotik*）18/19,共两卷，2001年由奥地利符号学协会组织出版。担任这个两卷本的论文集编辑工作的，正是J.伯纳德和G. 维塔尔姆。奥古斯托·庞其奥在《符号》（*De Signis*）杂志由何塞·恩里克·菲诺尔（José Enrique Finol）编辑、2006年9月出版的特辑《当代社会中的神话和仪式》（*Mitos y Ritos en la Sociedades Contemporánea*）中，专门针对该论文集发表了书评（见291到296页）。

符号学视角下的神话主题涉及文化、艺术、结构、意识形态、建模、叙述、想象等等，历史上不少优秀学者将目光投向这些话题。其中包括维柯、卡希尔、朗格、巴尔特、列维-施特劳斯、以及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学者们。“神话”和“神话学”的主题也被应用到当代社会中，罗兰·巴尔特对新神话的分析就是一例。其中的“rite”一词不仅用到了其宗教意义，还用到了更普遍的文化意义。在标题措辞中 rite 比 ritual 更受青睐，因为 rite 似乎更具体地和礼拜相关。拟像（*simulacrum*）这个概念意思有些捉摸不定：既可以指表象、幻想、幻影、幻影般的，也可以指形象、再现、图像，在分析社会行为和文化的过程中，也在双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在第二个意义使用该词的，我们找到的例子是让·鲍德里亚，他在对当代传播

进行批判时,用到了“表象、幻想、幻影、幻影般的”这个意义。(参见“Introduction” by J. Bernard and G. Withalm, vol. I, pp. 13–22)

这两卷特别关注三个基本概念——“神话 myths”、“仪式 rites”、与“形象/幻象 simulacra”——,内容涵盖艺术与仪式、性别、政治符号、文体与文学、社会符号学、符号系统的多元性(Plurality)、文化与人类学、技术与新媒体。该论文集代表了在更新这些主题并对其详细分析方面的重要贡献,把这些主题中大多数时候沦为研究对象的“他者”,和我们的现在当下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对接触到这部关于“神话 myths”,“仪式 rites”,与“形象/幻象 simulacra”的读者,我们可以说,这本书首先“讲述的是你的故事”。

《罗西-兰迪罗马会议论文集》于1994年出版,由杰夫·伯纳德亲自参与编辑,编委会还包括马西莫 A. 邦凡蒂尼、雅诺什·凯莱门、奥古斯托·庞其奥,题为《阅读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符号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该书收入马西莫 A. 邦凡蒂尼主编的“Semiosis. II senso e la fabbrica dei testi”丛书中(Naples, ESI, 1994)。苏珊·佩特里利负责与文体有关的印刷排版事宜,并且和庞其奥一起编辑了罗西-兰迪的著作目录,将其更新至1993年。

伯纳德提交给费鲁齐奥·罗西-兰迪国际会议的论文,题为《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的社会哲学和社会符号学》。单从题目已经可以看出,杰夫·伯纳德抓住罗西-兰迪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换言之,罗西-兰迪不只是一位符号学家。事实上罗西-兰迪视自己为哲学家,尤其是语言哲学家: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出版于他生命的最后一年——1985年,题为《哲学方法与符号科学》(*Metodiica filosofica e scienza dei segni*)。

伯纳德的文章是1992年罗西-兰迪会议上宣读的第一篇论文,也是那次会议论文集的开篇论文:文中,杰夫保持了自己的一贯风格,分析准确详细。论文配有大量图表,先是呈现于黑板上(因为当时还没有powerpoint),之后收录到论文集中。大量使用图表,也是他的典型风格。他喜欢将观念形象化,把他所谓罗西-兰迪的“社会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转化为图表加以呈现——其呈现相当精彩;这应该是因为他的艺术家天分吧。

和罗西-兰迪一样,伯纳德也是一个多面手:不仅是符号学家,还是建筑师、音乐家,当然,首先是个善于倾听的人。

伯纳德以图表的形式解释了作为虚假思想(false thinking)的意识形态,作为世界观的意识形态,与作为社会规划的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一张图表中,他令人钦佩地将罗西-兰迪的“同型模式”(Homology Model)形象化;在另一图表中,将罗西-兰迪的“社会再生产模式”加以呈现,这种模式在罗西-兰迪眼中揭示了一切事物的规律(the arche, the principium)。正如我们发表 *Athanor* 的罗西-兰迪特辑 *Lavoro immateriale* 的文章中所指出的,



我们和伯纳德一样，持这样一种观点：在罗西-兰迪看来，非意识形态的空间在社会现实中并不存在。无论是在一般行为领域内，还是在科学或者文学等领域中，看似“自然的”、“自发的”、“现实的”、“特定的”事物身上，都可以发现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存在。通过揭示这种存在，罗西-兰迪证明，行为与社会规划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联系，因此在社会与意识形态规划之间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关联，不管问题涉及的是阶级社会（通常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相伴）的维护和再生产，或者是官方秩序的批判与颠覆。伯纳德的论证令人信服，他认为，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在罗西-兰迪的方法中，符号学才成了一种反异化的实践（*disalienating praxis*）（参见 Petrilli and Ponzio 2003-4: 208）。

对抽象方法，“抽象事物”和“总体性”，有一种误解误用，这种错误源于误认为某种抽象事物涵盖、穷尽了总体性的所有特征，以为不使用这种手段，这些特征就会被忽视或者遗忘。这就是约翰·迪利（John Deely）所讨论的“部分代替整体”（*pars pro toto*），这种提法出现在保罗·布伊萨克编的《符号学百科全书》中，具体见书中迪利编写的“托马斯 A. 西比奥克”词条。西比奥克本人坚持自己提出的“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坚决反对这种谬误。罗西-兰迪在《符号学笔记》（“*Note di semiotica*”，该文最早于 1967 年发表于《新潮流》*Nuova Corrente* 杂志，后来又收录进 1972 年出版的著作《符号学与意识形态》（*Semiotica e ideologia*）中，也表达了与西比奥克相似的观点，他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区分索绪尔式符号学（*semiology*）和皮尔斯式符号学（*semiotics*），这种错误在所难免。

之所以选择用皮尔斯式符号学（*semiotics*），而不是索绪尔式符号论（*semiology*）来指示研究符号的一般科学，不只是因为对某一术语的偏好，尽管这种偏好确实存在，这一点约翰·迪利（2004a）已经从词源学角度详细论证过。最重要的是，作为后语言与跨语言符号系统研究的符号论（*semiology*）不能与作为符号一般科学的符号学（*semiotics*）相混淆，因为后者研究的是所有类型的符号。

罗西-兰迪、西比奥克都避免将符号学 *semiotics* 与如是理解的符号论 *semiology* 混同。因此，二人的符号研究都摆脱了符号言语中心主义（*semiological glottocentrism*）的束缚。倒是语言学在认识到自身与研究符号的一般科学之间的外在联系之前，一直作为一种以言语为中心的科学单独存在。事实上，符号学有助于语言学更好地确定其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托多罗夫就很好地注意到这一点（Todorov 1977: 24[参见 Deely 2006]）。

按罗西-兰迪的方法，符号学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理论平台，学科间的分裂主义有望在这里最终得以克服。西比奥克也在类似方向上努力，不过他批判了“桥梁”（*bridge*）这种比喻方式，并代之以“网络”（*web*）。

罗西-兰迪对人文学科之间的障碍壁垒问题进行了分析，用这种视角对语言的生产交换和物质的生产交换之间的相互关联做了理论梳理：“我的努力，旨在将两种总体性加以整合，把总体的语言生产和总体的物质生产整合进一个更大的总体性中，以期揭示这种更大的总体性中的某些结构”(Rossi-Landi 1972:288)。从1968年的《语言：作为工作和贸易》，到1975年的《语言学与经济学》，再到1985年的《哲学方法与符号科学》，到他去世后于1992年出版的《符号与非符号之间》，这一方向始终贯穿在罗西-兰迪学术生涯中，成为其研究的显著特征。

因为与奥古斯托·庞其奥为系主任的巴里大学语言实践与文本分析系的合作，杰夫·伯纳德和格洛莉娅·维塔尔姆曾多次到巴里，再加上苏珊·佩特里利组织的各种会议出版的关系，他们就来得更频繁。1999年《S-欧洲符号学研究》出版了一期特辑，题为《符号学研究在巴里》。因为杰夫·伯纳德的倡导，之前在1998年《符号学报告》，已经出过一期特辑《符号研究的符号》（参见 Petrilli and Ponzio, *Signs of Research on Signs. Semiotische Berichte*, 22.3-4）。为了完成校对，让特辑早日出版，杰夫和苏珊·佩特里利有时到深夜都还在用电子邮件交流。杰夫慷慨的付出，无尽的热情，全身心的投入，让人印象深刻。

在我系的支持下，我们在巴里又组织了一次纪念罗西-兰迪的国际会议。大会的主题《罗西-兰迪的符号学在当下的相关性》，本身就是杰夫提议的。大会论文集定名《非物质劳动》*Lavoro immateriale*，由苏珊·佩特里利编辑，作为 *Athanon* 《符号学、哲学、艺术、文学》丛书的一本特辑于2003年4月出版。（*Athanon* 始于1989年，创刊至今一直由奥古斯托·庞其奥担任主编）。

在各种大会会议上，我们荣幸多次与杰夫·伯纳德交流合作。1999年，国际符号学协会第7届世界符号学大会在德国德累斯顿召开，杰夫邀请苏珊·佩特里利一同负责《符号过程，社群，社会性》（*Semiosis, Community, Sociality*）分组会的组织工作。杰夫60岁生日，我们也专程赴维也纳表示祝贺。格洛莉娅·维塔尔姆为杰夫的生日特意组织了一次大会，并出版了由格洛莉娅本人和约瑟夫·沃尔曼斯伯格合编的大会论文集《权力的符号，符号的权力》（*Macht der Zeichen. Zeichen der Macht/Signs of Power. Power of Signs*, 2004.）。苏珊·佩特里利专门撰稿《权力的责任与责任的权力：从“符号学动物”到“伦理符号学动物”》，（约翰·迪利写了《从符号学动物到伦理符号学动物再返回》予以回应，也收在同一论文集中），奥古斯托·庞其奥为论文集撰写的文章题为《权力、和平与战争的符号学：〈赫尔辛基最终法案〉<sup>①</sup>

---

<sup>①</sup>1975年欧安会标志着欧洲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分水岭，其对于欧洲安全有着深远的影响。会议最终成果是签署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英文 *The Helsinki Final Act*。

与美国防御策略》。

公平地说，我们与杰夫·伯纳德的友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感谢那条贯穿其间的特殊纽带：对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的共同兴趣。当初我们之所以能成为朋友，是因为罗西-兰迪。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杰夫，还是因为罗西-兰迪。那是在 2005 年 12 月 13 日到 15 日，当时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举行了罗西-兰迪国际会议，会议的组织者正是杰夫·伯纳德和凯莱门。参会的有布达佩斯的意大利文化研究所、哲学研究所、语言哲学研究集团、匈牙利科学院、维也纳社会符号学研究所、国际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网。伯纳德介绍的题目是《费鲁齐奥·罗西-兰迪及罗西-兰迪网简史》。这篇介绍文章收录在此次大会的论文集中，论文集由奥古斯托·庞其奥编辑，在国际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网（IFRN）发表，网址是 <http://www.ferrucciorossilandi.com>。

在《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的社会哲学与社会符号学》（1994:69-94）一文中，伯纳德开门见山地指出：意大利哲学家费鲁齐奥·罗西-兰迪“是我所谓现代符号学‘第四次思潮’或者叫做‘社会进化思潮’的杰出代表。”（第 69 页）他专门对罗西-兰迪关于物质生产与语言生产的“同源模式”（homology model）进行了探讨。他从罗西-兰迪的“社会符号学”出发，从他的共同言语（common speech）中的建模概念开始（参见 Rossi-Landi, *Significato, comunicazione e parlare commune*, Padua, Marsalis, 1961），到《语言学与经济学》（Mouton, 1975），《哲学方法与符号科学》（1985）中发展到极致。对罗西-兰迪而言，集体社会再生产中所包含的符号生产是“分布域”（distribution sphere）的一种核心方面。（Bernard 1994:69）：

确定符号在人类行为的总体框架中不可或缺的位置，首先让罗西-兰迪的系统能够在典型的社会符号学中立足，社会符号学的可能性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充分开掘。其次它成功绕过了“理想主义”符号学中的种种陷阱，不用担心会坠入漫无边际的泛符号主义泥潭。这种辩证的定位，同时排除了索绪尔主义/结构主义中的心灵主义倾向，皮尔斯符号学中时常出现的形式主义倾向，以及生物进化模式的弊端，直接指向推进三种模式的综合。

伯纳德用简单术语描绘当前符号学趋势，根据他的表述，当今符号学分为四支：皮尔斯式符号学 semiotics（思维逻辑）；索绪尔式符号学 semiology（语言逻辑）；符号的生物进化理论（从雅各布·冯·尤克斯库尔 [Jakob von Uexkull] 到托马斯·西比奥克，生物逻辑）；最后是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符号社会进化理论（米哈伊尔·巴赫金，亚当·沙夫，格奥尔·克劳斯

[Georg Claus]等人，社会逻辑）（Bernard 1994: 75）

罗西-兰迪对乔瓦尼·瓦伊拉蒂(Giovanni Vailati)、马里奥·卡尔代罗尼(Mario Calderoni)等意大利实用主义学者加以重新诠释，对此，伯纳德赞赏有加。伯纳德发现罗西-兰迪论著中，意大利的民族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詹巴蒂斯塔·维柯，到19世纪的原型符号学家卡洛·卡塔尼奥(Carlo Cattaneo)，再到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这些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黑格尔与罗西-兰迪之间的联系纽带，尽管中间不无矛盾之处”（Bernard 1994:75）。

葛兰西关于语言问题的话语(discourse on language)，在这一点上无疑有其特殊地位，其价值仅次于巴赫金的贡献，而巴赫金则被视为马克思式的符号学(或者更准确的说，受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影响的符号学)的“奠基人”，马克思式的符号学已经成为社会符号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Bernard 1994:75)。

1999年德累斯顿会议上，杰夫·伯纳德和苏珊·佩特里利共同组织了《符号过程，社群，社会性》分组会。在分组会介绍环节，杰夫指出，“社会符号学”并不局限于将符号学方法运用在社会问题分析中，它既关心表意过程，也关注交流过程，认为二者相互补充。“社会符号学”是现代符号学的主要潮流之一，具有很大潜力，有望在21世纪获得充分发展。在这次会议上，杰夫又一次证明罗西-兰迪在这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在他看来，罗西-兰迪提供了“社会符号学迄今所能获得的最完整最精密的方法”。他补充说道，罗西-兰迪的符号学建立在一种不可或缺的人类学原则上：将整个自然转化成文化，这种转变过程的基础是劳动，而劳动需要材料、工具、工人、操作、目的、以及产品。实际上，通过操作将材料制作为产品，这个转化过程在无尽的工作循环链中进行。而且，对罗西-兰迪提出的语言与工作之间的同源性、社会符号过程概念问题、符号(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与工作、社会、意识形态、传播之间的关系问题，杰夫也做了详细论述。(Bernard and Petrilli 2003)：

符号可以通过物质(signans 能指, signatum 所指)概念加以描述，通过符号—劳动操作，社会中业已存在的某种物质(所指)得以改变，借助与之相对的物质(能指)的中介作用，统一到一种产品(signum 即符号)中，由此生出一种社会产物，即符号本身。思维(“意识形态”)与交流只是符号—劳动这枚硬币的两面，虽然密切相关却又在现象学上表现截然不同。而社会依靠大量的人工制品，其中包括语言或非语言的符号，也涵

盖物质产品，尽管有些可能微不足道。<sup>①</sup>

苏珊·佩特里利从杰夫·伯纳德的观点出发，继续推进这个理论。她自己的思考（Petrilli 1998）主要聚焦于符号过程和符号学的区别。她强调罗西-兰迪“共同符号过程”（common semiosis）概念的重要性，进而引入了“符号学动物”（semiotic animal）这一概念。其实这一表述罗西-兰迪本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就在文章中使用过，而 20 世纪 90 年代迪利也在英语语境中使用过。在人类符号学的背景中看，“共同符号过程”要求将符号过程与符号学加以甄别。这里的“符号学”概念不仅指称有关符号的一般科学，而且也涵盖了人类的具体行为。不仅指人类使用符号的能力（符号过程 semiosis），而且还包括对符号进行反思的可能性（符号学作为元符号过程 metasemiosis）。依照这种观点，可以区分出人类生物符号学与人类社会符号学：前者将人类与动物等而视之，亦即人类不过是众多生物种类、符号动物中的一种；而后者则将人类作为一种符号学动物（semiotic animal）来加以研究（这种表达可能取代亚里斯多德的“社会生物”[zoon politicon]概念）。在生物维度与社会历史维度——亦即人类生物符号学与人类社会符号学之间，存在一个决定人类符号的特性的调节因素：这里，我们指的是语言，与言语不同的语言，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建模过程的语言。

同样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看到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的一大重要贡献。正如杰夫·伯纳德所强调的，罗西-兰迪将语言视为工作，从而从理论上建构了语言工作这个概念。通过这一概念的提出，罗西-兰迪为证明语言（随后又扩展到社会再生产中所包含的所有社会现象）的建设性、建模性、创造性特征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罗西-兰迪认为，语言实际上既是一种工具，一种材料，也是一种建模装置（modeling device）。就语言是工作而言，语言与交流彼此并不等同。语言不能被简单化为交流，语言并未在交流中穷尽。究其实质而言，语言是交流的前提和基础，是交流成为可能的条件。相对于最终成为第二建模装置的言语来说，语言是第一建模过程。罗西-兰迪探讨包括了言语的可能性条件，（在早期的著述中就已经）提出了“共同言语”（common speech）这一重要概念（这一概念随后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发展成“共同符号过程”（common semiosis））。时至今日，人类社会符号学无法避免在当下具有世界交流（world communication）和总体交流(global communication) 双重特性的复杂的交流体系中展开分析。（参见 Petrilli, 1998）。按照这种研究方法，社会、社会性、社群等术语的区分变得很重要。比如说在社群问题上，就必须对“封闭社群”与“开放社群”加以区分，这

---

<sup>①</sup>见此前 Bernard 的 Insideoutside, ideology, and culture 一文。校对者在保证两段译文意思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保留两位译者各自的译文。——校对者注。

一点在查尔斯·莫里斯（莫里斯是罗西-兰迪研究得最多的学者之一）的 1948 年的名著《开放自我》中已经有过清晰的表述。

在论文《罗西-兰迪理论视野下的“交流—生产”》（参见 *Lavoro immateriale. Athanor*, 2003-4, pp.25-43），伯纳德对当下符号学的思潮做了全面呈现。该文继续对罗西-兰迪的研究进行详细阐述，梳理出了从“共同言语”，到用“符号工作”（“同源模式”）来描述符号生产，直至“共同符号过程”（common semiosis）的发展路线。

伯纳德发挥其一贯出色的综合能力，他写道（同上：25-26）：

现代符号学群落，亦即构成现代符号学的主要观点（模式，思潮），如果从遗传学的角度加以回顾，诸多大小思潮其实可以概括为四类。分类中的特性描述难免稍显粗略，却不无用处。具体而言，这四类包括我们所谓的“语言逻辑”（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格雷马斯模式，或称“结构主义”）；“思维逻辑”（洛克—皮尔斯—莫里斯—本泽模式，包括相近领域）；“生物逻辑”（或称“生命逻辑”；冯·尤克斯库尔—西比奥克模式，或称生物进化论，或生物遗传符号学）；以及“社会遗传符号学”。米哈伊尔 M. 巴赫金（特请参见 Voloshinov 1929）和费鲁齐奥·罗西-兰迪（后者更甚）都强调符号过程、符号、符号使用的社会性与历史性。之前的路德维希·诺瓦雷（1877）可以看作是这一思潮的先驱，他将“共同活动”（common activity, "sympraxis"）视为语言和意义的基础，后来的列夫 S. 维果茨基（1962, 1978）在其心理社会符号学理论中也持相同观点。但是，这“第四种思潮”（我个人的术语）的真正奠基人毫无疑问是巴赫金，巴赫金以“对话性”为基础发展出了一种强势的反索绪尔的符号理论。格奥尔·卢卡奇（例如，1963 年《审美特征》）在其著述的符号理论部分将工作和语言相关联，就已经注意到了罗西-兰迪的研究，肯定了其真知灼见。当然，也出现了其他社会经济学理论：比如阿尔弗雷德·舒茨（提出阐释社会学；参见 1974）；紧跟乔治 H. 米德脚步的“符号互动论者”；离现在更近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看，韩礼德（M. A. K. Halliday, 1978），阿尔吉达斯 J. 格雷马斯（1976）；而格奥尔·克劳斯（1973）为世人熟悉的观点是：强调人作为符号创造者和符号使用者的作用（当然，运用相关方法的学者还有很多，比如说亚当·沙夫和拉萨尔·O. 列兹尼科夫（Lazar O. Reznikov）；限于篇幅，笔者仅举以上学者为例）。

文中将巴赫金（沃洛希诺夫）和罗西-兰迪联系起来，同时还提及格奥尔·克劳斯和亚当·沙

夫，对此，我们非常赞赏。关于罗西-兰迪、克劳斯和沙夫之间的异同，我们已经在多种论著中有过讨论。（参见 Ponzio, “Semiotics and Marxism”, in Thomas A Sebeok, Jean Umiker-Sebeok 1989:387-414）。我们把罗西-兰迪的“社会再生产”“共同符号过程”概念与西比奥克的“生物圈”“总体符号过程”（global semiosis）概念结合起来使用，来对当下的“全球交流（global communication）”中的符号学秘密进行批判分析，或者，用我们更喜欢的术语，叫做“交流—生产”（以示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个阶段，交流本身也成了一种生产力）（可参见 “Being communication. For a Critique of ontology”, by A.Ponzio, in *Semiotic Studies in Bari*, a special issue of *S / European Journal for Semiotic Studies*, edited by S. Petrilli, 1999, pp. 515-528; A. 庞其奥, S. 佩特里利合作的意大利语专著 *Il sentire dellacomunicazione globale* 和 *Semioetica*, Rome, Meltemi, 2000 e 2003; 以及二人合作的英文专著《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ative Routes in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多伦多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一方是西比奥克的“生物逻辑”或称“生命逻辑”，亦即从尤克斯库尔—西比奥克模式发展而来的生物进化理论或者生物遗传符号学，另一方是罗西-兰迪的“社会学逻辑”或“社会的逻辑”（这种研究同时具有对话性、社会进化论、社会遗传符号学性质，由巴赫金—罗西-兰迪模式发展而来），伯纳德在“生物逻辑”与“社会逻辑”之间找到一种联系。对伯纳德的这种思考，我们深表赞同，并且沿着相同的路向予以发展。正如我们在合写的《语言的概念》一文（载 *Lavoro immateriale*）中指出的，罗西-兰迪关于“语言作为工作”提法和西比奥克“语言作为主要建模机制”，二者之间存在联系。

恰如我们所料，商品化的、异化的工作已经成为今日社会制度的显著特征。“语言工作”这种表述让人想起还有一种可以与之并置的可以游戏的东西，因而让人认为，正如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所描述的那样，语言工作是作为默思游戏（play of musement）的对立面存在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西比奥克借默思游戏来标明人类是符号学动物，以此来证明人类主要的建模机制或者他所谓“根本意义上的语言”。

事实上，“语言工作”和“默思游戏”概念彼此并不矛盾。罗西-兰迪曾经这样解释，工作和游戏并非并置；实际上，游戏除了要有表演工作，还需要有预先准备工作，这类工作无疑非常愉悦、特别快活。

在另外一点上，罗西-兰迪与西比奥克不谋而合：一些学者试图从交流的需要出发，来解释语言起源。对此，两人均表示反对。在罗西-兰迪和西比奥克看来，人类工作的构成、组织、分工合作之所以可能，正是借助了语言。言语和历史自然语言都有一个前提，即：存在适合人

类建模、具有句法建构和解构能力的语言，因为句法的关系，这种语言有能力创造无限的可能世界。（参见 Ponzio and Petrilli 2003-4: 218; Deely 2007）。

上文中提到，杰夫·伯纳德很欢迎一些文章在他主编的《南欧符号学研究学刊》上发表。下面，我们就摘取这些文章中的一些段落以飨读者。

如罗西-兰迪所言，人类社会通过一般社会再生产来实现自身的承续，“再生产”概念本身就说明这一过程肯定涉及再生、维护、和保持。但是，恰恰因为对人类社群“存在”（being）的坚持，社会再生产已经有了诸多不同的生产方式（这种情况是历史上形成的）。其中有碍社会再生产的，遭到排斥抛弃——因为社会关系体系不同，以及人类智力、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更合适更有利的方式占据了主导。

社会再生产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存在摆脱特定社会制度中已有的“存在—交流”（being-communication）的可能性。通过对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重新组织，这种摆脱可能实现，而重释和重组之所以可能，又是因为人类有阐释能力，有能力对“存在—交流”做出其他反应，有能力和与之相应的世界观保持距离，从而规避造成“存在—交流”现状的这个世界的种种局限并实现对其超越。交流与存在是生命的典型特征，在人类社会再生产中，可以克服将“交流”与“存在”等同，因为行为主体是“符号学动物”（*semiotic animal*），这种动物不仅具备建立交往关系的能力（而其他动物，如马克思所言，**没能适当地建立关系**），而且还具备批判评价能力、有意识、有责任感、有谋划能力，这也就意味着这个主体可以对交往关系进行规划。因此，这种符号学动物最终有能力回避存在—交流。

另一方面，交流—生产中的持续是**同一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的持续。出于求生本能，资本主义社会不断调整变化，本身尚未终结，尽管它出现在薄暮时分（黑格尔“智慧的猫头鹰”<sup>①</sup>），已经显现出进入尾声的迹象。只有对维护资本主义有用的意识形态才会将存在（在这里即交流—生产存在）与一般社会再生产中的存在—交流等同。这种等同是如此的贴切，以至社会再生产的资本主义阶段在人类看来非常自然，仿佛是唯一的选择，似乎成了人性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换言之，一旦经济发展、文化成就、科技进步按照线性发展过程达到高水平，存在—交流就被视为人类生存中必要的恒常模式。

维持交流—生产的存在是毁灭性的。同一生产周期的再生产也是毁灭性的。它毁掉了：

——机器，旧机器被新机器替代，不是因为磨损，而是源于竞争；

---

<sup>①</sup>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一样，它不是在旭日东升的时候在蓝天里翱翔，而是在薄暮降临的时候才悄然起飞。这里的猫头鹰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



- 就业机会，自动化导致失业增加；
- 市场上的产品，刺激各种消费主义，为生产周期的再生产服务；
- 可以穷尽需求的产品，通过生产新的类似的产品，让原有的产品过时；
- 不能在全球交流—生产的竞争中存活的商品和市场。

交流—生产的自我持存 (*conatus essendi*) 破坏自然环境和生物形态。它破坏经济文化体系的多样性。自我持存逻辑一味地强调发展、生产效率、竞争力，但凡与之有些矛盾或者对其无用的传统和文化遗产，都会遭到毁坏。市场逻辑作用下的同素化 (*homologation*) 过程消灭差异性，不仅让行为、需求趋同 (尽管满足需求的可能性永远不会相同)，而且让欲望和想象物也失去差别。

交流—生产的自我持存破坏可能规避现阶段生产体系局限的生产力。结果，受市场逻辑影响，为追逐市场潮流，智力、发明才能、创造能力均遭羞辱排斥。

今日生产制度中的破坏性品质在以下事实中也得到证实：作为发达的条件，它导致了欠发达区域面积更大，引起范围更广的剥削和不幸，致使一些人连生存都成问题。由于客观存在的国内空间限制，所谓的“发达”国家需要对愈演愈烈的移民潮加以控制，但这种控制常常困难重重——其难度无疑超过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其他阶段——究其根源，正是上述机制在起作用。

全球交流—生产也具有破坏性，因为它是战争的交流—生产。继续战争就意味着为正在生产的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赢得市场。战争需要得到批准，获得认可，需要师出有名，需要被视作抵御险恶“他者”所代表的与日俱增的危险的必要手段，被当作一种为自身的“认同” (*identity*) 和“差异”权益 (*difference*) 赢得尊重的方式。但实际情况是，认同和差异并未受到“他者”的威胁或破坏。悖谬的是，这种社会制度本身是破坏性的，因为它一方面鼓励、推进认同与差异，另一发明又让认同与差异变得虚幻。认同受到威胁也可以导致认同偏执，而这正是战争的交流—生产所期望的。

将市场普遍化是破坏性的。这意味着将商品的性质延伸到所有事物，延伸到各种关系。商品越是非法，越是昂贵：毒品、人体器官、儿童、子宫等等，不一而足。剥削他人劳动的原则本身就已经具有破坏性。单位小时的劳动酬劳越低，劳动创造的利润就越高；今天，得益于全球交流，发达国家不断追逐不发达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 (“待在原地别动，我们过来找你”)。剥削童工让今天的传播-生产世界蒙羞 (今天，很多孩子饱受贫穷、不幸、战争之苦。他们或流落街头，或在市场上充当童工，遭遇各种虐待，遭受压榨剥削。关于这些儿童，有

太多需要说，需要做的。)

如果认为交流—生产这种存在方式应该继续下去，那势必会危及社会再生产，因为它妨碍人类的历史社会存在，让其无法以新的社会形式重组自身，因此

——交流—生产不利于社会再生产。

人类具有发明、创造、重新规划和重新建设的能力，这些能力成了人类的特征，而交流—生产渲染交流，对这些能力不利，而人类之所以具备这些能力，是由于我们的主要建模装置语言，因此

——交流—生产不利于语言（不利于符号学）。

再者，交流—生产的再生产危及人类生存本身，也就是说，不但是作为智能存在、符号学动物、智性动物的人的存在受到威胁，即使仅仅作为有活力、能生存、能完成必要的符号过程的活物的人，其存在也失去了保障，因此

——交流—生产不利于人类生命（符号过程）。

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强化、扩展现有社会制度，亦即交流—生产模式，是对全球生物的致命威胁：臭氧层空洞，再生产周期引发的种种灾难，与战争的交流—生产相关的各种不幸，正常繁殖机制功能失调造成的一幕幕生态悲剧；核武器的恐怖摧毁力及相关实验等等，因此

——交流—生产不利于整个星球的生命的存在—交流（符号过程）。

在 *Athamor* 的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特辑 *Lavoro immateriale* 上，杰夫·伯纳德专门著文，就“交流—生产”概念展开讨论，这一点从其文章标题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文中特别提到佩特里利和庞其奥合著的《打开边界的符号学》。《打开边界的符号学》对之前提及的学者进行了批判分析，其中对皮尔斯、巴赫金、莫里斯、西比奥克、罗西-兰迪、沙夫和维多利亚·维尔比尤其关注。

伯纳德说（同上：35—36）：

该书有七章专门介绍现代符号学中影响深远的学者，其中费鲁齐奥·罗西-兰迪所占篇幅最大，这绝非巧合。按照我的理解，两位作者意图表明：现代符号学中罗西-兰迪的概念对理解当代社会的运作和结构相当重要；想要展示罗西-兰迪理论，通过“共同符号过程”，以及一般人类符号学，对（具体到物种的）人类符号生产和符号使用事宜进行了非常全面系统的阐释。与此同时，两位学者也并不否认罗西-兰迪的研究成果可以置于甚至范围更广的“总体符号学”（西比奥克术语；参见 2001）中。在这里，我想说

的是，我同意他们的这种看法，因为从更开阔的视角来看符号过程，冯·尤克斯库尔的生物符号学（实际上构成了西比奥克总体符号学的基础）可以和罗西-兰迪的社会符号学做系统的“调和”。（比如可以参见 Bernard 1995）

《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的作者们新创了“交流—生产”一词，这无疑和他们的罗西-兰迪研究背景有关，他们将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事务纳入一个颇有启发的精确公式之中。无论是罗西-兰迪，还是佩特里利和庞其奥，都对相关主流科学中“communication”的狭义理解（不幸的是符号学文献中也有部分属于此类）进行批判，前者批判是因为系统的缘故，而后者是出于本体论的考虑。

这篇文章最后一段的标题为《图表化的“交流—生产”》（第 38 页）。这一部分，伯纳德用一系列图表对“交流—生产”做了呈现，简明扼要地展示了作为罗西-兰迪社会观、社会再生产观念结果的“交流—生产”概念背后的总体趋势，重点聚焦符号、共同符号过程的中心地位和整合作用（同上：40-41）：

这一点从无足轻重的物质生产等事物的外部三角关系的加速消解上就可以看到。物质生产面对日益频繁的危机，甚至在部分领域中面临崩溃。物质性日常基础设施的再生产越来越无利可图，所有可观的利润都留给了远程信息处理技术、信息科学、仿生学，以及在它们之后可能会涌现出来的新领域。

终于，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个乌托邦，这个社会看来完全是由“非物质化”的“交流—生产”及其衍生物与后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些不尽人意的物质）构成（参见图 4c，就不解自明了）。“交流—生产”取代了这样的生产：这种推测历史的视野迄今主要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加以批判讨论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可以一直存在，不断产出更多，最终只是产生了“上层建筑”，如果[.....]，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这里我已经将问题从罗西-兰迪式的，也就是说，像他自己曾经强调过的，马克思式的社会符号学的角度加以呈现，这种视角方便更好地进行区别分析，考虑到了更全面的观点。简而言之，由于种种原因，我不认为有这种社会有存在的可能性：一个社会可以简单成“交流—生产”，以“交流—生产”为基础，把“交流—生产”作为表现形式，并在其中终结。首先，存在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社会总是一个矛盾整体，现在如此，将来也不会变。整体中不可避免会有社会自身变化的原因和载体。其次，从经验主义角度说，同时也是第

一点的鲜明例证，既然“交流—生产”只是问题的一面：事实上，既有建立在这种机制上的（只是相对）的第一世界，也存在物质生活贫乏的第三世界，而同时第三世界正在越来越多地靠拢第一世界——这不仅仅是个地理问题……所以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在结论中，伯纳德提到了我们的“伦理符号学”，认为这可能是罗西-兰迪工作的继续。（但是我们也可以加上皮尔斯、维尔比、巴赫金、莫里斯、沙夫、西比奥克，“伦理符号学”也是对这些学者所从事的研究的继续）。（同上：40—41）

谈到对事态及其后果的理论思考：如果社会符号学被视为一种基于生态学归纳出来的总体符号学的具体的、用以满足特定物种的应用，这种观点下，甚至佩特里利和庞其奥提出的伦理符号学也可能得到全面发展，到那个时候，我们将有一种更合宜的智力工具来应对那种单向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杰夫·伯纳德指明了庞其奥、佩特里利的“伦理符号学”和罗西-兰迪的“社会符号学”的关系，而实际上早在德累斯顿会议期间，在和伯纳德一起组织的分组会发言中，佩特里利就已经对这种关系提前做过说明。当时她在发言中说，伦理符号学的批判工作揭示了在全球化世界的当代社会中，已经不可能有彼此不相关的种种差异的存在，这种存在只能是一种幻觉。另一方面，整个星球的命运其实都包含在我们的所有选择中（也请参见Ponzio and Petrilli 2003）。伦理符号学必须对最初产生和倡导伦理符号学的社会制度本身进行公正的分析和讯问，不带任何偏见。伦理符号学必须从我们今天所在的历史社会位置出发，换言之，必须从当代性出发。这种方法要求对当前全球交流—生产关系体系进行严格准确的分析（参见Bernard and Petrilli, 2003）。罗西-兰迪对异化社会的批判，预先设定人有能力构想出不同世界、有能力对这些世界的建设进行或者乌托邦式的或者科学的沉思冥想。既然具有语言工作能力，有能力发挥沉思冥想的作用，人类就有资格质疑现状，有义务争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相对于被异化的现实，罗西-兰迪为之奋斗的是一种作为“他者”的现实，他并不把自己的方法限制在对现实的阐释上，尽管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甚至也是在阐释现实。相反，在人类符号过程的背景下，罗西-兰迪重视社会规划、意识形态批判，也因此将关注重点放在人类建构、解构、重构新的更好的世界的的能力之上。从这种观点看，罗西-兰迪的工作可以和笔者所谓“伦理符号学”联系起来。从理想的发展路线看，这种“伦理符号学”也涉及我们之

前提到的学者，诸如米哈伊尔·巴赫金、维多利亚·维尔比、查尔斯·莫里斯、亚当·沙夫、以及查尔斯S. 皮尔斯，尽管皮尔斯著作的阐释中存在某种认知歧视。

在《费鲁齐奥·罗西-兰迪及罗西-兰迪网站简史》（2007）中，杰夫·伯纳德首先回顾了1992年以来为纪念罗西-兰迪召开的历次会议。他将自己的陈述分为两部分：1) 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生平及其已列入二十世纪下半叶符号学“经典”的著作的简要回顾和评价。2) 国际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网（IFRN）。除开之前已经提到的会议，历次会议单上我们还要加上1995年，为纪念罗西-兰迪逝世十周年而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和帕多瓦召开的大会。“两天的研究与缅怀——纪念费鲁齐奥·罗西-兰迪逝世十周年”，1995年11月24日在博洛尼亚召开，由圣图奇（Santucci）组织召集；同年12月6日在帕多瓦举行，由伯蒂主持，罗西-兰迪的前妻，著名学者吉纳维芙·沃罕（Genevieve Vaughan）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的联合组织方是国际空间与时间历史中心（Centro Internazionale di Storiadello Spazio e del Tempo）（CISST），该中心位于帕多瓦附近的布鲁吉内（Brugine），专门建设有费鲁齐奥·罗西-兰迪档案。

与杰夫和格洛莉娅一起度过的日子始终萦绕于脑际，回忆中总是充满欢乐。那是巴里的一个冬日，虽然有些许阳光，但还是有些寒冷，杰夫坐在外语系前面的花园里，旁边是格洛莉娅，他们应邀专门过来参加一系列社会符号学会议。我们在一起高谈阔论，当聊到那些计划共同推进的研究时，我们热血沸腾，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期望。杰夫——我们会继续下去，不用怀疑。你留给我们的见解建议，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这些真知灼见必将陪伴我们继续向前，仿佛你从不曾离去。

本文原题为“*Jeff Bernard and Ferruccio Ross-Landi A Friendship Founded on Mutual Appreciation of Respective Research Perspectives*”，原刊载于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6.1-4 (2010), 67-92



（庞齐奥与佩特丽莉）

# 从工作方面探讨感知的十个论点：一种罗西-兰迪式/维特根斯坦式观点

杰夫·伯纳德著

周劲松译

本文关注的是感知（perception）。本文提出了一种复杂的理论模式来探讨作为工作的符号活动。工作（work）是费卢齐奥·罗西-兰迪（Ferruccio Rossi-Landi）的符号学思考中一个核心概念。本文表明了如何将“工作”转换为“符号工作”（sign work）以清晰阐明“感知”这一理念（不论在心理学领域之内还是之外，人们对“感知”的定义常常是模糊的）。通过运用罗西-兰迪有关“内部”（internal）和“外部”（external）符号的观点——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再生产中的关键要素——本文对所探讨对象做出了拓展。进一步地，本文参考维特根斯坦这位“潜隐不彰的符号学家”（crypto-semiotician）的著作，对二者之间的区分进行了深入分析。借助贝泽尔（Bezzel）对维特根斯坦的阐发，本文对看（looking）和看见（seeing）这一“工作”中的种种“游戏”关系做出了梳理。

## 一、为什么是罗西-兰迪式社会符号学？

意大利哲学家费卢齐奥·罗西-兰迪是我称之为现代符号学领域中“第四种”、“社会构成”以及/或者“社会进化”思潮的杰出代表。他一生致力于系统建构一种独立并具有高度原创性的符号理论，这与他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哲学思想体系相辅相成，其基本方面在他的主要著作《意识形态》（*L'ideologia*, 1981 [1978]）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罗西-兰迪的社会符号学以塑造“共同话语”（*parlare comune*）概念为出发点（1961），通过对语言工作和符号工作进行概念梳理，发展出了关于材料和语言生产——或者，专门地说，关于符号生产——的“类同模式”（*homology model*），而最终，所有这一切都被嵌入集约的社会再生产之中，也就是说，成了分配层面的一个核心方面（符号交换=交流活动）。罗西-兰迪有关这些话题的论述，在诸如《语言学与经济学》（*Linguistics and Economics*, 1975）和《哲学方法与符号思想》（*Metodica filosofica e scienza dei segni*, 1985）等书中有着精心呈现。在人类活动这一普遍框架中，他义无反顾地以符号作为有机核心，这首先使得罗西-兰迪的系统在聚合层面的社会符号学中具有一席之地——该方面的无限可能性今天只得到了初步发掘，其次，这避免了“理想式”（*idealistic*）符号学中各种内在的危险，也就是说，避免了滑入无边无际

的“泛符号论”（pan-semiotism）思维。我的看法是，他的义无反顾，使得他摆脱了索绪尔主义/结构主义的精神性倾向，摆脱了皮尔斯符号学中有时具有的形式主义倾向，并且摆脱了——就描述已经社会化了的符号系统和操作而言——生物进化方法的缺点，与此同时，他的义无反顾为针对它们的整合指明了道路。（相关综述，参看 Bernard 1991）

## 二、从工作到符号工作

对于社会，我们应该用对象之物来论说。因此，在拟定即使对心理符号学论题也能适用的社会符号学话题过程中，我是从罗西-兰迪（尤其是其 1975, 1985 著作中）的观点出发，不过在这一看法的结尾处则换成了我自己的说法；论点 3 和论点 4 会针对我自己基于罗西-兰迪式模式而有所拓展的样式给读者一个提要。在一切自我进化的社会性之初都有“工作”（work）的存在（这是一个人类学概念，与作为其历史性阐发的“劳动”[labor]相对。）“工作”需要一个必要条件：材料、工具、工人、加工、目的，以及产品（这可以被称为工作的“有机构成”[organic composition]）。“最为纯粹的”公式是这样的：通过加工来改变材料以产生出产品（也就是，工人，工具，预设意图）。这是 A 轮工作。当 B 轮工作发生，结果，通过使用 A 的产品作为材料和 B 的产品作为工具对该材料进行加工而生产出第三个产品来，就会进入 C 轮工作：生产工具的工具，对人类的界定便是如此。有了这种东西，不论一切的材料依赖性如何，“自由王国”（the realm of freedom）就出现了。于是，符号（sign）可以按照材料（=符指[signans]）和所指物（signatum）来描述，它和产品（=符征[signum]）结为一体，但却是通过类似于之前的符号工作加工而得以结为一体（而且结为一体之物保持不变）。从辩证法的意义上说，这个过程，在表型层面上，可以被看做社会给定的某实体（所指物=论点），通过材料对比（=符象）的中介作用，变成了社会结果，即符号本身（符征=综合）。那么，关键就在于区分符号生产和符号再生产。另外一个讨论领域，就是控制符号系统和操作的各种不同规则（内在的，即规定，符号使用规范，即程序），但是，在这里，我无法深入到如此复杂的问题。为了理解后边部分，首先，必须强调，符号生产的一个部分发生在个体内部（内部符号工作），另一部分发生在外部（外部符号工作）。这两种类型，尽管又一次地是类同的，却不得不根据特定的工作类型反反复复地彼此关联，即，内部化和外部化（参看 Bernard and Withalm 1987; Bernard 1994）。

## 三、社会再生产，包括符号在内的社会再生产

符号在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中起着核心作用。按照罗西-兰迪（1975:65，

1985:38) 的说法, 总体而言, 社会再生产包括材料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这一三元活动。其中, 交换表现出二重性, 即, 显见的材料交换和符号交换=交流活动, 而后者又是一种三元活动, 包括符号生产、更贴切意义上的交换以及消费。尽管这种三元关系和第一种三元关系类似, 其关键所在则是中介层面。必须注意的是, 进一步的三元活动都是共同建构性质的, 譬如, 基础的、包括符号在内的中间结构的以及上层建筑的三元活动; 或者说, 这些活动的总合表明, 社会是通过社会实践/工具性/历史而发展自身的, 或者, 如我所说: 社会实践<sub>1</sub>把自身变成了社会实践<sub>2</sub>, 从而产生出与第一个三元关系(材料/加工/产品)类同的一个总体上的三元关系。因为这个问题无法在此探讨, 我将只限于关于材料和符号生产的三元关系, 只限于隐约地指出这一事实: 罗西-兰迪, 尽管对意识形态有着广泛关注(1981[1978]), 对上面所说的这种划分——即, 内部和外部符号工作——却语焉不详。然而, 要涉及“脑力工作”(brain work), 他那种模式的逻辑必须由意识形态来完成。那么, 如果第二个三元关系(此刻明确了, 就是: 外部符号生产)是第一个三元关系的交换范畴引申而来并包含于其中的, 则第三个三元关系同样地就是第二个三元关系的交换范畴引申而来并包含于其中的。换言之, 符号交换可以分成外部和内部符号交换=总体上的意识形态交换, 后者由意识形态生产、交换和消费这种三元关系加以描述, 与其他三元关系又具有了类似性。内部符号, 或者“观点”, 因为基于材料、生命活力处理基础之上, 不得被外化, 变成外部符号, 以得到交流, 而为了在完全意义上达到那个目的, 后者便不得被内化, 被接受者变成内部符号。(表面上, 理论问题是由思想的唯我论立场提出来的; 但此问题的答案是: 当进行思考的时候, 时间点  $t_1$  上的某人  $p_1$  生产出内部符号, 把信息传递给时间点  $t_2$  的某人  $p_1$ , 从而把自己变成了  $p_1$  信息的接受者  $p_2$ 。思考是自我交流活动!)

#### 四、总体的类同模式

社会性的方面, 以加工—工具的方方面面为核心, 依赖的是无数多样的加工品; 显见意义上的加工品以及符号活动—交流活动范畴中的加工品, 语言文字符号和非语言文字符号统统在内。按照罗西-兰迪的看法(参看 1975:107), 通过工作(以及其后延续无尽的工作)从零层次(未受碰触的性质)开始, 以下十个层次——在形成四个表述层次和产品储存之间有四个辩证飞跃——发展而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整个机制:

1. 前符号性要素 (pre-significant elements)
2. 不可化约的符号性要素 (irreducibly significant elements)



3. “整件” (whole pieces)
4. 工具和句子(tools and sentences)
5. 工具的总合 (aggregates of tools)
6. 机制 (mechanisms)
7. 复杂且自足的机制 (complex and self-sufficient mechanisms)
8. 总体的机制或自动装置 (overall mechanisms or automata)
9. 不可重复的 (单一的) 生产 (unrepeatable [singular] production)
10. 全球性生产 (global production)

罗西-兰迪在“材料和语言生产之间类同性” (homology between material and linguistic production) 这个例子中揭示了不同生产领域内在的结构—生成相似性。根据论点 3, 这里我想再进一步, 拟出一个“总体的类同模式” (General homology model), 对他的各项稍作调整, 但最重要地, 把外部和内部符号工作的区分, 也就是意识形态生产, 系统地囊括进来。该模式包括三个性质类同的十层次分级 (其中, “复杂而综合的”简写为 c/a [complex and aggregated]; “属于一个生产单位的”简写为 o.p.u. [of a productive unit]) :

A) (狭义意义上的) 产品

- 1) 物质要素, 对象要素, c/a 对象要素, 工具, c/a 工具, 机械, 复杂机械, 自动装置, 原型  $M$ , 所有对象系统 o.p.u.;
- 2) 符号产品: 外部符素  $e$ , 符号, c/a 思想素, 超级符号, c/a 超级符号, 文本, 合成的文本机制, 次级符码/符号子目录, 原型  $S$ , 所有符号系统 o.p.u.;
- 3) 精神产品: 符号要素  $i$ , 思想素, c/a 思想素, 观点, c/a 观点, 思想意识要素, 复杂的思想意识机制, 意识形态  $P$ , 意识形态  $N$ , 所有意识形态系统 o.p.u.

(其中: 符素  $e$ =外部符素, 符素  $i$ =内部符素, 原型  $M$ =材料原型, 原型  $S$ =(外部) 符号性原型, 意识形态  $P$ =贬义意义上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  $N$ =中性意义上的意识形态)。

产品总合形成了材料文化, 符号产品总合形成了得以表现的文化, 精神产品总合形成了精神文化。最为普遍意义上的产品 ( $A_{gen}$ ) 包括了狭义意义上的产品 ( $A_{sp}$ )、符号产品 ( $S$ ) 和精神产品 ( $M$ ); 然而, 三者就辩证意义上来说彼此是一环扣着一环的, 所以它们的关系就会是:  $A_{gen}=d\Box(A_{sp}(S(M)))$ 。由此而来便有了符号学核心任务之一, 而其他符号学潮流却大

都未曾注意到的，那就是，对包括层级之间符码转换在内的“产品共在”（co-presence of artefacts）加以考察。<sup>i</sup>

## 五、“感知”，最为模糊的术语之一

我们的基本理论部分就谈到这里。此刻要谈到的是“感知”，无疑这并非一个符号学概念。譬如，在西比奥克（Sebeok, 1986）卷数众多的符号学百科全书中，是找不到这个条目的。这个术语的科学史关联最多的是心理学，而其中，感知理论尤其被当作核心内容。在这样一种历史样式中，经过大致的辨别和重新表述，人们可以分析出两种主要潮流来：第一种是站在分析一边的联想理论式的，倾向于经验论；第二种是站在综合一边的完型理论式的，倾向于天生论。前者通过强调人如何把感受要素合并到更大的单位来描述人如何感知（无论其是什么的某事物），后者则采用一种唯我论的观点：心理完型是在其整体性之中并且是以一种相当直接的方式获得的。对两种立场而言，都有对人类行为观察而来的证据，并且二者都仍然处在论辩之中。然而，正是这一点表明，对于一个如此丰富而模糊的讨论对象而言，二者都不过是偏颇的理论罢了。不过，有趣的是，从符号学的角度来，“阐释”（interpretation）这个术语常常也出现在种种枝蔓旁生的意义中出现。其他符号学概念，比如“含义”（sense）和“意义”（meaning），也是如此。这些术语的身份状况至今仍不清楚。采取用一个词条来做总结这样一种干脆利落的方式，可以见到如下语句：“感知，即种种感觉，通过这些感觉，在感知功能之外，对象的意义通过感觉分配得到把握”。原文如此！？或者，譬如以莱恩（Laing）、菲利普逊（Phillipson）和李（Lee）在《人际感知》（*Interpersonal Perception*, 1966）这部充满启发的书为例，按其做法，几乎所有符号学例子都心照不宣地被包括在内了，同时，也被弄得含混不清了。日常语言中“感知”的使用范围更为宽阔，当然，这种情况也让人更为恼火。事实上，有时这还包括了最为极端的话题在内，就像——譬如在德语中——*Interessen wahrnehmen*（表示“代表或捍卫利益”）。似乎很明显，一个术语首先在日常语言和特定科学社会圈子之间摇摆，其次在意义的两极之间（从极广义到极狭义）摇摆，极其需要语义学方面的以及，特别是，符号学方面的澄清。尽管语义学方面的澄清能够对“感知”目前为止在不同用法中可能或应该意味的东西做出分析和系统化，但这项耗时漫长的工作不会再这里展开，而之前根据不同符号学潮流所做的一种通盘思考至少是得到了赞许的。<sup>ii</sup>因为以上理由，我们认为在本文语境中，社会符号学观点是不可或缺的。

## 六、为什么以维特根斯坦加上贝泽尔为辅？

核心意义上，我们的符号观是罗西-兰迪式的。但因为罗西-兰迪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社会再生产中的符号工作，感知这个术语在他的著述中只如惊鸿闪现。不过，我们可以用他的相关话语作为切入点，譬如，他描述了如何辨识属于未经触及性质而在此前不为人知的对象（Rossi-Landi 1986:158），其中，他清楚表明，感知也是一个加工流程，受到社会所引申出各种规则的制约。并且，从理论角度看，要是他对这个话题有更广涉猎，凭着他对维特根斯坦的熟稔（尤其参见 Rossi-Landi 1966, 1982），是能够为可能成为他关键见证者的人产生丰富的启示的：罗西-兰迪欣赏（尤其是早期的）作为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维特根斯坦，他从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使用（以及普遍意义上的符号使用）理论中汲取甚丰，他承认维特根斯坦是一位潜隐不彰的符号学家，因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终极意义上说，与符号系统并无二致，同时，他认为维特根斯坦是关于语言异化方面的重要理论家。根据所有这一切，我断定，参考维特根斯坦，尤其是其《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1921, 1922）——该著作除了认识论和语言理论这些主要部分之外还包括了认识论（草案）在内，是十分合适的。不过，我必须补充说，我们需要的这个草案的样式，允许直接“翻译”成社会符号方面的——即，符号工作——术语。这个起过渡作用的样式已经由克里斯·贝泽尔在其名为“作为一种语言游戏的感知”（*Wahrnehmungsspiel als Sprachspiel*, 1992）的文章中提供了，这篇文章首先重建了维特根斯坦关于感知的观点，然后按照被理解为先前的、属于语言游戏（或普遍意义上的符号游戏）组成部分的“感知游戏”，对其进行了梳理。在这种关联之中，人们不得不注意到，贝泽尔的确可谓始作俑者，首先，他描绘出了维特根斯坦哲学或许最为真实的面貌（Bezzel 1988），从而沟通了“维特根斯坦 I”和“维特根斯坦 II”之间若干明显的不一致之处，其次，在这一过程中，他鲜明地凸显了维特根斯坦中的符号学核心——作为符号学家的维特根斯坦（又参 Nagal 1989）。不过，就本文所要做的事情而言，似乎已经显而易见的是，与心理学家散漫的概念不同，维特根斯坦/贝泽尔感知游戏理论所体现的维特根斯坦式感知理论，接近于有意简化了的“感知”理解所起的作用，因为维特根斯坦以不懈的观察和分析如实地——用罗西-兰迪最喜欢的比喻之一来说，即“深入骨子里地”（*pared to the bones*）——呈现了现象。

## 七、感知，确切意义上说

按照贝泽尔（1992）的重构，维特根斯坦从起初并无区别的一个视野出发，对“看见”和“看”进行分辨：“看见”——无论其如何被激活——是一种消极意识，与之相比，“看”则是聚焦于理解可能被感知或被感知之物相关部分一种行为，或者是把某物看做某物的对所

看见之物的一种积极建构，其结果是“无名概念”（nameless concept，感知之物）。然而，在这条抵达真正符号层面的廊道上，有三个主要台阶（且让我们在此称之为位置 P1、P2 和 P3），即：

P<sub>1</sub>，视野空间中对象的最初输入，或者是总体意义上感知的最初输入；

然后是 P<sub>2</sub>，即对象（无论其如何被选中，有可能是不自觉的）在形象和想象之间空白之处的印记——还不是符号，但有成为符号，换言之，是潜在的符号，或者是罗西-兰迪所谓可能通过精神性符号工作纳入内部符号的“符号残余”（sign residue）；

最后是 P<sub>3</sub>，严格意义上的符号活动印记（表达），即，符号游戏中所纳入的东西。

符号性表达 P<sub>3</sub> 是语言游戏的出发点，语言游戏是对各种感知行为的一种反作用。不过，总结起来，这个过程，维特根斯坦说，是嵌入“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之中（或者如罗西-兰迪的说法，嵌入社会实践之中）的“交互行为”（an interplay of movements）。按照贝泽尔的说法，感知现在成了他称之为“感知游戏”（perception game）的一个行为，需要进行双重分析：一方面，它在被激活的消极性（事物状态=意识状态）和伴随“无名概念”这一结果的行动本身之间来回往复，另一方面，它在 P<sub>1</sub>、P<sub>2</sub> 和 P<sub>3</sub>（我感知，我感知表达行为，我感知符号性表达）这几个点之间来回往复。“感知游戏可以被定义为包含在语言游戏中的人类行为方面的细腻结构，而且是它建构了语言游戏”（Bezzel 1992: 27）。也就是说：感知是“感知—行动”（perception-action），它被嵌入感知游戏加语言游戏这个（辩证的）总体之中，同时，它也嵌入社会实践之中：

你可以说感知游戏是一个“循环的”游戏，但并不像感知生理学中那样，是那种自由漂浮的、自主的“感知循环”意义上的……因为感知—行动无法与日常生活实践隔离开来。它依赖于整个的“生活形式”，一旦我们学会了“语言”，后者便对我们的每个感知行为实施反作用，共同影响它。在这一意义上，只有感知游戏—语言游戏这个循环是真正的循环。

（Bezzel 1992: 28）

最终，“游戏”建造出一个（可分析的）单位：

感知游戏和语言游戏，分析到最后，是不可能彼此分隔的，这是我们与世界之间绝非

静态关系的一种表达。世界—符号之间被固化了的(形而上学的)关系将是一件荒谬的事情。

(Bezzel 1992: 30)

## 八、以人类为中心型的工作三元关系

从工作方面探讨“感知游戏”首先要求再次回退到罗西-兰迪,他以材料、加工、产品这种基本三元关系对如此这般的工作所进行的简要描述已经引用如前。但梳理出“条件型的”(situational)或“人类中心型的”(anthropocentric)三元关系来描述特定工作条件下特定的工作循环,也是可能的。罗西-兰迪对这些三元关系描述如下:工作有机构成的六要素,首先,

构成了三元关系中核心方面,即工作加工中的(辩证)否定方面,的真实表述。事实上,一般性地,有一个工人,有他想要达成的一个结果,他选择材料并通过工具对之实施加工操作,并以这种方式获得产品。所以,我们可以构想出另外一种三元关系,来表现工作条件:这种三元关系由工作本身、材料与工具、产品构成。这一框架表明了必定是人类中心性的工人的视角事实上的样子。(Rossi-Landi 1985:15)

这就是由工人完成的所谓“生产工作”(productive work)三元关系。其次,还有一种从工人角度出发的变体形式,罗西-兰迪对之解释说,他的观点是

即便是六个方面的表述仍然可能简化为三条:“工人”,“加工”和“产品”。要达成这三个基本要素,把“目的”放在工人中,把“工具”与“工人”和“加工”放在一起(事实上,它是二者之间的纽带);再把“材料”和“加工”放在一起——“加工”如果不是对某物的加工,就毫无意义。显然,六个方面以及它们所化成的三个方面,可以说,代表的正是工人的视角。这是非常合乎规则的:我们每个人,作为工人,都可以说“我在为生产出特定产品而工作”……这是一种人类中心的立场,按照这一立场,一个想要工作的人,带着他头脑中的某个目的、运用手中的某个工具去工作,必须是已然存在的。(Rossi-Landi 1995: 142)

第一个三元关系可以表述成  $W_{pr}-M/I, -P$  (工人实施生产工作,材料/工具,产品),第二个可以表述成  $W_r-O_w-P$  (工人,工人的加工,产品)。这两种三元关系,当然地,也可以用于符号工作;譬如,(就如 Bernard and Withalm 1987 所阐述的)“交流活动工作者”

(communication workers)的工作活动而言，第一个三元关系代表了发送者的视角，第二个代表了接收者的视角（完整的，即双向的，交流活动中，的确是有角色交换的）。

### 九、外部的和内部的符号工作，确切意义上说

下一个中间步骤应该是从其“有机构成”（organic composition）方面来描述符号工作。就像在显见的材料工作情形中一样，它必定有至少且不多于六个不可节略的组成部分。对于外部符号工作而言，它们是：

- 1) “符号工作者”（sign worker）；他已经着手操作
- 2) “工具”（instruments），即，符码、程序、细则，以及使用和选择适当符号传递者的所有知识和方式；而且他有着特定目的，也就是，已经知道
- 3) 社会环境中符号运用的“功能”（functions），即，符号活动、交流活动以及，最终的，社会实践中的社会交换；他把自己拥有的工具运用于
- 4) “材料”（materials），即（外部）符号表征和符号所指的总合；并且，他不仅是工作，而且是进行专门的工作，即
- 5) “符号工作加工”（sign work operations）来提供产品，事实上，
- 6) “产品”（product）就是外部符号，就是之后能够得到交流的东西。

内部符号工作，或意识形态工作、“脑力工作”方面，广义地说，六个组成部分是：

- 1) 意识形态工作者（the ideology worker）（脑力工作者）；他已经着手操作
- 2) “工具”（instruments），还是符码、程序、细则，但并不全然和之前相同，加上他整个的生命活力配置；而且他有着特定目的，也就是，已经知道
- 3) 内部符号运用，或者思想的“功能”（functions），即，内部的和外部的符号活动，加上内部化和外部化，以及，最终的，交流活动（即便是自我交流活动，参看第4点结尾的应用）；他把自己拥有的工具运用于
- 4) “材料”（materials），即（内部）符号表征和符号所指的总合；并且，他不仅是工作，而且是进行专门的工作，即
- 5) “意识形态工作加工”（ideology work operations）来提供产品，事实上，
- 6) “产品”（product）就是内部符号，就是他思考所需要，最终，也是他产生和交流外

部符号所需要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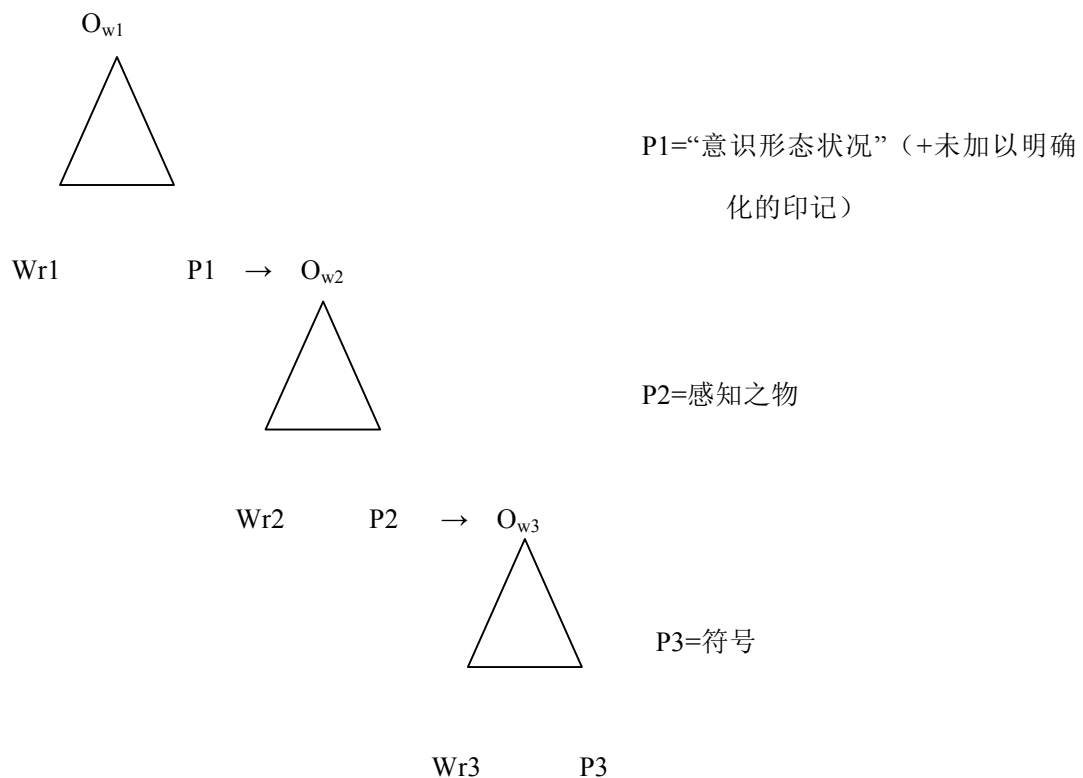
不言而喻，“意识形态”在这里必然不是按照更为晚近的贬义意义来理解，而是按照“经典的”综合的意义来理解的，如罗西-兰迪在《意识形态》一书中所做的那样，一方面，它包括了哲学、系统和直觉的世界观、行为模式、情绪与感觉，另一方面，它还包括“错误的思考”，虚伪与欺骗、谎言与蒙昧主义，“常识”、幻觉与神话等等，也就是所有形式的“虚假意识”。按照这种最为宽泛的理解，于是，“意识形态”，当然而然地，是在各种内部符号、象征、标志、指示之中被精细表达的，而它们并不一定直接与外部符号对应。很多时候，两个符号领域之间，常常还需要“翻译”（翻译工作）方可达成。

## 十、作为符号工作的感知

基于上述元素，现在，我们有可能建构作为符号工作的“感知工作”（perception work）模式，因为已经清楚了，在感知中，如维特根斯坦所观察和分析的那样，前符号性和符号性事物状况之间存在着一直的相互作用。就前符号性事物状况而言，我认为应把它们划入“符号素”（signaletic）领域，包括从初始的技术意义上的“单纯符号”（nothing-but-signals），到更为复杂的那些，直到不同级别的前符号（譬如 Bentele 1984 一书“符号演变层级模式”[strata model of signal evolution]中那些；有关的简要描述，参看 Bernard 1996:27）。就该类型工作的有机构成而言，“工作者”是感知工作者（之后真正地变成了严格意义上的符号工作者），使用“工具”，即他整个的心理—生理和认识配置，还包括文化方面规定化了的感知原则在内；他的“目的”是对特定的向外对象（由此，他处在“接收者”的位置）以及，最终，它们（最广泛意义上的）“感知”合成，做出认同加内化；他加工“材料”，即，符号，也就是将变成罗西-兰迪意义上的“符号残余”（sign residues）的符号，之后是元符号表征（proto-signantia）和元符号所指（proto-signata），以及最终的，符号；他的符号素“加工”（1, 2, 3）是要产生“产品”，即，第一个是包括（对象）初始的、未加明确的印记在内的意识状况，第二个是感知之物，或者明确化了的印记（维特根斯坦所谓的“无名概念”），第三个是它在符号游戏中所包含的东西，即，作为感知最后行为，使之成为一个符号。既然，对于这一切来说，他都是“接收者”（无疑的“积极的”接收者），面对实际上作为他的“世界”的“发送者”，那么，用于描述所发生情况的三元模式，根据本文第 8 点，就是第二种三元模式，即条件型三元关系  $Wr-O_w-P$ 。鉴于整个过程至少涉及三个阶段，我们可以通过三个三元关系来对它们进行描述，即： $Wr1-O_{w1}-P1$ ，其中  $P1$  是意识状况加最初未加明确的印记，然后是  $Wr2-O_{w2}-P2$ ，其中，

P<sub>2</sub>是感知之物，或明确化了的印记，最后是 Wr<sub>3</sub>-O<sub>w3</sub>-P<sub>3</sub>，其中，P<sub>3</sub>是符号游戏中所包括的符号，即，内部符号系统（参看图示 1）。

在这三个步骤中，第一个工作循环的“产品”（意识状态，尤其是，带有未加以明确的印记的意识状态）作为“材料”（将成为元符号表征和/或元符号所指的符号残余）进入第二个工作循环的“加工”，又一次地，第二个工作循环的“产品”（感知之物）作为“材料”（元符号表征和/或元符号所指将成为符号表征和/或符号所指，将把特征变成它们必定嵌入符号系统之中的辩证综合）进入第三个工作循环。尽管存在着一直的“来回往复”（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行动交互”，最终，在社会实践中它更大地嵌入）这一事实，这是对感知中实际发生了情形的一种清醒而本质性的描述。进一步的分析有可能表明在这种“来回往复”之中的若干细节，譬如：某些对象“受到摒弃”，已经成为符号的对象之间的区别，以及对于哪些我们无须考虑习惯化的不同程度，等等。但这已经是另一个话题了。



（图示 1 感知/符号框架）

本文原题为 “Ten theses on perception in terms of work A Rossi-Landian Wittgensteinian point of view”，原刊载于 *Semiotica*, 2009 (173) : 155-168



# 内部 / 外部，意识形态和文化<sup>1</sup>

杰夫·伯纳德著

赵禹平译

本文主要讨论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的符号学，特别是其社会符号学理论。他的理论研究采用符号学分析方法，着重强调“身体和对象的强大物质性”（Bernard, 1983, p. 176）。罗西-兰迪的分析主要依据符号学理论，这是由于他的理论建立在一个拗口的人类学原理基础上：自然在整体上向文化的转换，亦即指向社会性的自我进化。这种转换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并且必须具备资料、设备、劳动者、操作、劳动目的和产品等生产要素。材料经过无限循环劳动，转换成产品，尽管所有材料都相互依赖，但马克思 / 恩格斯主义者依然在其中发现了“自由王国”（Woolfson, 1982, p. 5,9; Rossi-Landi, 1995, p. 147）。符号可以被描述成材料（能指和所指），并通过符号操作（sign-work），共同构成产品（signum）。符号操作引起了社会存在物（所指）的转换，所指通过与之相对立的物质（能指），转换成这个社会产物，即符号本身。毫无疑问，这就是符号自身生成和符号再生产（符号使用）以不同方式运行的整体规律。部分符号（再）生产发生在个体内部，另一部分则在外部。思维（“意识形态”）和交流是（符号操作）这面金牌的正反面。而社会正是建立在大量人工制品、普通材料、符号、语言和非语言之上的。

罗西-兰迪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所谓的同型模式（homology model）：一个包括材料、语言生产，从结果上看是普遍的符号生产的10步辩证性跨越的11阶段模型。符号——符号系统和生产过程，还有最后的“公共符号过程”（Biancofiore/ Ponicio, 1987: 29; Ponicio, 1990）——在社会再生产中，扮演着一个绝对核心的角色，它构成了生产、交换、消费三元生产运动；或更应该说，它是由三元生产运动构成的。其中，交换既表现为普通的材料交换，也表现为符号交换，即交流。一切相关活动，包括“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都促使社会发展自身：在借助工具的情况下，社会实践创造历史。以此为背景，本文试图借助符号过程、或曰符号学思想及分析，论证材料性、交流性和意识形态性人工制品（或据作者所言，是狭义上的人工制品、符号物质和精神产品）三者间拗口的相互作用及多样联系，特别注重探讨内部、外部符号的复杂联系，也就是说，内、外符号（符号操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两者与社会实践必须参与其中的人造环境之间的联系。

综上所述，我们不得不依赖社会符号学最重要的学者——罗西-兰迪的著作，在其著作中，社会符号学的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尽管如此，此类社会符号学研究，最早要追溯到巴赫金的名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Volosinov, 1929; Poncio, 1986, 1988; Bianci, 1995; Bernard, 1994; Bernard and Wiltham 1987; Bernard, 1992; Rossi-Landi, 1961, 1968, 1974, 1975, 1978, 1980, 1985, 1995)。虽然罗西-兰迪在许多场合谈论过文化、及自然向文化的转型问题，但他并没有明确设想过洛特曼和莫斯科——塔尔图学派所极力推广的“文化符号学”(Bernard, 1993)，也未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文化理论，而文化理论如今在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的意义上已广泛地为人所知。因此，以一个全方位的视角考察意识形态和文化，也需要吸收其他资源。

但是，研究这些领域，还需要了解其他理论发现。谈到莫斯科—塔尔图学派，我们需要理解他们提出的“符号-文本-文化”层次结构，(实际上，并非偶然，这本书的标题是由艾默马赫尔(Eimernacher)和格日贝克(Grzybek)两位杰出专家提出的; Scheffczyk, 1986, pp. 166-168, Städtke, 1981)，也包括对其概念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缺失的批评(Rosner, 1984; Bernard, 1985, pp. 162- 163)。为了弥补这种缺憾，应当回溯英国文化研究的根源。一方面，应当回到伯明翰学派的“社会文化”范式(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及所设立的遗产; Bennett, 1996, Turner ,1996, Hepp, 1999)。另一个，是对同时期在德国，由罗尔夫·施温特(Rolf Schwendter)一手建立的类似的研究方法，即亚文化理论(Schwendter, 1971)，亚文化理论提供一个涉及文化经验差异性和内部矛盾性的背景——使文化不仅是一种“语言”，更多时候是一个承载“符号战”的领域。也就是说，必须将莫斯科—塔尔图的层次结构扩展为“‘符号—文本—文化’—总体文化”这样一种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总体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被理解为一个其内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且各具潜力的领域，而不是超语言或超符号系统，从社会学角度来理解，它是一个语境，一个大型文本(megatext<sup>+</sup><sub>-</sub>) (+和-说明它的开放性程度)或者互文文本。

但是，下述模型能够被接受，究其原因，主要是源于它的两点特征。首先，运用符号学方法，至少能解决其他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而采用其他方法，并不能充分解决内部 / 外部问题(更不用说意识形态 / 文化问题)，如认知科学(在“心理再现”中可用，但貌似并不涉及符号概念; Atmanspacher, Dalenoort, 1994) ——而符号学(任一类别)则被定义为介导性理论，它的介入有助于二元问题的解决。其次，可上升至托马斯·A·西比奥克(2001年)主张发展的“全球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它反映了自符号学创建以来的整个符号学观念。这一主张，在即将出版的苏珊·佩特里利和奥古斯托·庞奇奥《符号学无疆界》特定

版本中，才被介绍。其中，罗西-兰迪被认为是智人这个物种中与“公共符号过程”最紧密相关的人物。

## 一、普通同型模型

社会，就其操作—工具性方面而言，依赖于一个人工物质世界：一般意义下的人工物质，包括语言、及意义-交流领域的人工物质。罗西-兰迪（1974, pp. 200-204; 1975, pp. 70-120, 107; 1985, p. 47-98, 84）着重发展了他的同型模式的后 10 个阶段——从未接触的大自然的 0 阶段开始，再通过循环劳动——基于呈现了分节和人工制品的四个层次的四个辩证性跨越，最终形成社会再生产设备的：1）前表意因素（pre-significant elements），2）不可化约的表意因素（irreducibly significant elements），3）“整体”（‘whole pieces’），4）工具和句子（tools and sentences），5）工具聚合（aggregates of tools），6）机制（mechanisms），7）合成和自为（complex and self-subband），8）整体机制或自动机（overall mechanisms or automata），9）不可复制（单一）生产（un-repeatable (singular) production），10）全球生产（global production）。在“材料和语言生产之间的同型”的规范下，不同生产领域具有内在生成结构的一致性，罗西-兰迪的同型模式恰展示了这种一致性。依靠这种同型模式，我们进一步起草了一个“一般性同型模式”，其中，对罗西-兰迪同型模式中的某些项稍作调整，分别系统地阐述了外部符号操作和内部符号操作这两个项。因而，第一步，是在意释罗西-兰迪的同型模式的基础上扩大其包含范围，包括三个 10 阶段层次（缩写：c/a=合成和聚合；OPU=一个生产单位）：A）人工制品（更进一步讲）：1）物质，物体，合成物体，设备，合成设备，机器，合成机器，自动机，原型 M，一个生产单位的所有物体系统；2）符号物质：能指，符号，合成符号，超符号，合成超符号，文本，合成文本机制，亚编码 / 符号目录，原型 S，一个生产单位的所有符号系统；3）精神产品：能指，观念，合成观念，意识，合成意识，意识形态，合成意识形态范式机制，意识形态 P，意识形态 N，一个生产单位的所有意识形态（在此：符号 e=外部符号，符号 i=内部符号，原型 M=材料原型，原型 S=外部符号原型，意识形态 P=消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 N=中立意识形态）。然而，第二步，则需在莫斯科—塔图学派关于符号、文本、文化研究基础之上（见引言）来补充、扩展模型（以某种方式，也是从自然转换成文化开始，进入到更多复杂形式中）。

通过“人类学”观点，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理论性研究和同型模式之间的关系。其中，研究方法包括各种各样人类学专用方法，甚至“人类学法”，但是迄今为止，最具说服力、最系统的方法，是罗兰·波斯纳（1988 年）综合了符号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他发现，

各种各样的人类学方法可以简化为三种方法：“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制度相关），“物质人类学”（与日常用语意义下的人工制品有关），“文化人类学”（与精神产品相关），同时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社会可以被定义为（一系列）符号的使用者，文明是（一套）文本，文化便在狭义上是（一组）符码，那么这三个领域就是系统地联结在一起的，不能做单一考察。因此，符号学方法给人类学学科研究提供基本论证条件。此研究方法依赖一个假设：文化活动是基于约定性的符号过程，是表意中包括了符码、文本和符号使用者的符号活动。（Posner, 1988, p. 173）


这段引文总结了符号学如何对现有的“人类学”进行基础性补充。至于“精神产品”概念，已经被内部符号所普遍借用，是普通同型模式的人工制品三个主要类别之一。如果“精神产品”是内部符号，或“思维符号”，那么显而易见，“符号物质”就是外部符号，即（首先）是交流性符号。

普通同型模式将罗西-兰迪对人工制品生产的结构—生成性层次的封闭性分析（或他所谓的“隐形结构”），发展为关于所有人工制品的“系统和进程”分析，于我们而言，首先要明确该系统包括所有符号的“系统和进程”，其次，这些符号“系统和进程”是由内部符号操作来呈现。总之，普通同型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它在  $A_{sp}$ ,  $S_e$ （交流沟通中的外部符号），和  $S_i$ （内部符号，即更广义上的“意识”，作为一般性人工制品的子类起作用，但是也作为一般性生产层次的结果而成立——用联系的观点来讲：交流中的外部符号作为普通材料的一个分支，内部符号作为交流中外部符号的分支，因此，普通材料除去一般性人工物质的子成分后，应该是这样一种关系： $d\Sigma(A_{sp}(S_e(S_i)))$ 中，分辨出一般性人工制品（ $A_{gen}$ ）和更小观念（普通材料）人工制品（ $A_{sp}$ ，即日常人工制品；因此，在图 1 中简单地称为“人工制品”）；或者，如果用人工制品、符号物质（S）、精神产品（M）三个术语来讲，关系应当是： $A_{gen} = d\Sigma(A_{sp}(S(M)))$ 。正因为这三类人工制品总是联合出现，因而一般性同型模式同时也是阐明“人工制品共存”的模型。因此，“共存的相关性层次”（0, 1, 2）已在图 1 中表示出来。当代多数符号学家都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符号学核心任务，那就是对这里提出的“人工制品共存”进行深入研究，“人工制品共存”当然也包括在各层次之间进行的符码转换问题。重视“人工制品共存”研究，对符号的内化 / 外化而言（符号物质变成精神产品，反之亦然）尤其重要。

物质，符号和精神生产的同源性

人工制品	符号物质	精神产品	
Material substance 材料物质	Material substance 材料物质	Bio-energetic substance 生物能量物质	0
Matteremes 物质	Signemes <sub>e</sub> 外部符素	signemes <sub>i</sub> 内部符素	1
Objectemes 对象	signs(1st order)符号 (一阶)	Ideemes 思想素	2
complex + aggregated Objectemes 合成+聚合对象	complex + aggregated signs 合成+聚合符号	complex + aggregated Ideemes 合成+聚合主意	3
Tools 工具	supersigns (1st order) (= signs 2nd order)超 阶段符号(一阶)=(二阶符号)	Ideas 意识	4
complex + aggregated Tools 复杂+聚合工具	complex + aggregated Supersigns 合成、聚集超符号	complex + aggregated Ideas 合成+聚合意识	5
Machines 机器设备	texts(= 2nd order super signs= 3rd order signs)文本 (=二阶超阶段符号 = 三阶符号)	Ideologemes 意识素	6
Complex machines 合成机器	Complex text mechanisms 合成文本机制	Complex ideologematic mechanisms 合成意识形态生产机制	7
Automata 自动机	subcodes and sign inventories 子代码和符号存储	Ideologies 意识形态	8

Complex automata 合成自动机	codes, programs +代码 程序 entire sign elementics 整 体符号元素	Complex Ideologies 合成意识形态	9
Material cultures 材 料文化	Expressive Cultures 表征 性文化	Mental cultures 精神 文化	10
“culture”总体文化			11



图一：普通同型模式

目前论证的主要任务是（有关符号，特别是“文本”）阐明外部和内部符号操作的关系，即（最终在交流当中）思维（thought）和思维表述（utterance of thought）之间的关系。以其著作的独到观点而著名的马克思提出：思维以语言为外衣。这个有深刻见解的比喻暗示：在某个外在向度上，外衣与身体等同，但绝非完全一致。这个比喻说明此处提出的模型与其他模型的不同之处：在模型中，语言自主性（符号系统）或观念的实质性、普遍性预设，都通过语言来推测（首先通过符号系统中最具特征的“自然”语言，但实际上也需要通过其他符号系统）。但是，这个模式不仅和在灵长类动物思维中根深蒂固的意识哲学的古典传统相悖，且与“认知科学”的某些方法也相悖；这两者认为，思维是一种自治活动，而语言或符号系统则仅仅作为思维的车轮，起着支撑作用而已，因此是可以被忽视的。

现在来简要讨论一下第一组观点，它声称语言同源性或语言相对论，并指出单一个体往往不会发现他/她“仅仅”所处的“话语十字路口”，且受控于“结构”。但是，这些个体可以反作用于话语和结构，从而使个体和集体相互影响。毋庸置疑，在语言（和一般性符号系统）中，存在着一种整合世界的知识，并且此类“储存”、“凝结”世界的知识，总是具有决定性作用。呈现存在于世界上的全新事物是可能的，通过某种创新联合方式呈现关于世界的全新事物更是有可能的。这种情况持续发生在个体层次，首先是在思维内部、或者通过思维，进而被外化、被传达。正如罗西-兰迪在材料和语言生产的同源性模型所示，人们有能力在外部符号

域中发展“原型”；不仅如此，在内部符号（即思维）领域中也可以发展“原型”，或者从意识形态层次来讲，人具有“自我生成”能力，能够生成新观念并最终形成意识形态。这类原型，和人工制品、符号物质相联系或同型，下文将详细论述。

我们需要格外关注内部和外部符号生产的相对自主性（和相互依存性），相互独立性意味着可以完全不需要、或不需要许多句子（冗余的或主要用于交际的句子）。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单词被说出后，创建了一个冗长的“文本”，然而它表达和传达的也许只是一个“意识”，甚至什么也没有。另一方面，与其他位置相比（思维的自主性），我们也许从根本上认为，设备、技术和技术系统，无疑对我们这些生产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决定了我们个体以及集体性的行为，也决定了我们的符号性的、理智性的行为，这些都显而易见。同样需要明确的是，如果符号学领域以及认识论领域（或由认识论所定义的符号学）运用的生产理论方法被采纳，那么，外部符号所用“技术”被应用到内部符号产生时会产生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才是关键所在，反之亦然。内部符号生产和外部符号生产相互依存，这可以通过对大量经验性实例的考察而总结出来。此外，这个相互依存也证明了内部和外部符号对物质系统的反作用（反之亦然）。所有这些“系统—加工”操作在功能上紧密相连。换言之，我们作为人类个体，在工作中，会根据我们的需求和具体情况，将多种方法共同加以使用。再次强调此观点：相互依存现象，是视不同情况而定。

在讨论“意识形态”以前，先对普通同型模式作简要介绍。更确切地说，是对图 1 的构造作一个简要评述。首先，图表考虑到罗西-兰迪关于同型性和社会一般性再生产三元结构的研究，因此不需要再重复这个模型的基本原则。辩证性跨越(参看图 1 的左边弧)需要保持处于运动状态，但“分节”，人工制品的“停车场”等，就不需要再显示出来了。图表足以说明，从普通材料对象和对象系统的层次结构，到（外部）符号和符号系统的层次结构，包括各种复杂文本（超符号）、直到“一个生产单元的所有符号系统”，都基于结构性生成因素，能够有效地作用于内部符号生产。

除此之外，应当注意“一个生产单元的所有符号系统”（罗西-兰迪所用术语）和被视为超文本的“文化”（超文本的极端现象）之间存在的巧合现象。实际上，重点不止在此类文化，还包括文化（cultures）：文化 1，文化 2，文化 3……文化 n，然而“此类文化”依然需要被呈现出来；尽管只在最高一层得到展示，但比起将此层次隐性表达的罗西-兰迪，这已是一种超越。图 1 所示的是两个概念的总括：生产的同型和社会符号学角度下“模型系统”层次结构的精致版本，这个精致版本最初是由莫斯科-塔图学派提出。第一个概念显然是后者的基础，但没有结合其他任何思想；而后者在得到一定程度修改之后，形成了新概念。

另外，罗西-兰迪的术语“重组”（reognazation），也尤其需要考虑符号物质的层次结构（也在普通物质范围内）。罗西-兰迪一生都致力于语言生产问题，“重组”正是在共同符号过程（common semiosis）基础上生成的符号过程模型。这种半新的术语既适用于符号理论（sign-theoretic），又应用于文本理论（text-theoretic）。然而，它与我们所采用的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用归纳方式描述层次的术语并不相容。符号理论或文本理论是否成立，取决于科研任务和环境。然而，至关重要的是：图表所示的最高层次上，“总体文化”和“文化”引入后，形成了一个显性的文化理论（culture-theoretic）模型。运用符号学解析旨在突出文化固有的分节，可以理解成是对亚文化（subcultures[s]）理论所建立的经验性分节模型的补充（详见 Schwendter, 1971），呈现出文化研究更丰富的方法途径。

要结合同型模式与亚文化理论（而且是受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启发），有必要重新考虑罗西-兰迪的第9阶段和第10阶段。虽然“重构”在图表中已得到清晰显示，但在这里仍然要做一个说明。特别是在第9阶段上，有一个新类别——合成自动机，随着时间的推移、材料技术的发展，作用日益凸显，主导地位也在与日上升。通过这一观察，可以断定的是，这一类别是罗西-兰迪所处时代无法正确观察到的。认识合成自动机这一层次，对认识符号物质和精神产品同样有用，下一步就是要严肃地认识（或重新认识）“第二个模型系统”（因为从第一步辩证性跨越到第二步的模型系统是本质性的），但不需要考虑罗西-兰迪关于材料和语言生产的同型性模型。普通同型模式承认，从第8阶段开始，通过第9阶段时候，存在一个积累的过程，经过六个跨越过程中的最后一个辩证性的跨越，最终到达第10阶段，在低层次上已经充分发展了（同时被扬弃了）的材料文化便显现了。此类情况，在符号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同源等级也同样存在。事实是，在第9阶段上，符号物质等级中，语言作为一个**系统**出现（符码、程序和整体元素），并揭露古典语言相对主义的缺点。如果语言仅仅被作为“**系统**”（或“结构”）亦即“语言”（langue），那么语言（langage）就不需要被研究观察。因为语言（langage）更适合被视为罗西-兰迪所称的“公共话语”（common speech），它将公共语言（language）和个人话语（speech）辩证性地视为一体，并被界定为**文化**现象。它是表现性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语言（languages）是表现性文化（cultures）的组成部分。

接下来要阐述的是普通同型模式，着重阐述精神产品等级。在具体阐释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与意识形态相关的问题，即内部符号或观念物质的概念。这个模型表达的一系列概念：思想素（ideemes）、意识（ideas）、意识素（ideologemes）、意识形态，和人工制品、符号物质等级中对应的概念相似。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思想素”不完全等同于符号物质等



级中的外部符号，“意识素”不完全等同于外部超符号，意识形态同样不完全等于文本等等。反之亦然。这种相互关系，是不容忽视的复杂问题。但原则上，我们可以用社会符号学的创始人观点声称：

所有符号都是意识形态。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具有符号特征……符号特征是所有意识形态的共同点。意识本身可以通过符号的物质实体化得以表现出来，并成为真正的事实。

(Bakhtin i.e. Voloshinov 1929 after Voloshinov 1975: 56-57)

但同样真实的是，符号不能被简化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也不能被简化成符号，这是因为：

意识形态是一个合成产物，这个产物包括日常语境里通过语言[和更广泛的获取方式：符号系统;作者注]获得的全部资源。正是通过在话语 (discourse) 和反思层次上运用语词符号 (verbal signs) ，意识形态才得以产生……我们能够通过语言发现意识形态，是因为这两个实体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并不是因为他们任何意义上都彼此等同……一方面，有人坚持认为，“语言‘是’意识形态“，同时””“意识形态也‘是’语言“，另一方面，有人认为，符号生产和意识形态体系被分节后，进入它们自己内部层次的不同层面。这两种观点是不矛盾的。(Rossi-Landi, 1990, pp. 243-246)

罗西-兰迪广泛地描述了意识形态体系的层次结构 (1978/1980/1990) ，但主要是根据不同“重力”下意识形态体系经验性存在的“类型”而描述的。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非情感性) 态度，行为模式，直观的世界观；世界观经过系统化，直达哲学理念高度的世界观。同时还要考虑不同类型的“虚假思维”，例如：幻觉/自我欺骗，谎言/弄虚作假，欺骗/欺诈，最多的是(系统性的) 错误思维。但是，我们的陈述目的，是根据结构—生成方式，以罗西-兰迪的同型模式为出发点，通过展示各类意识形态的构造原则，来说明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因而，必须要采用已引证的经验类型学，并且发挥其基础性、辅助性作用。例如，在识别和分析“真、假思维”、“真、假”意识的混合形式时候，我们实际上明确区分的是“贬义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sub>P</sub>) 和“中性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sub>N</sub>) 。

很明显，“思维大厦”(或“意识”) 可以通过“友好使用”的方式，或介于友好与不友好之间的方式得以解释。他们可以由现实—充足性合成物构成，但也可能被错误地构造，例如走

廊和通道不畅，或者原地转圈，更甚则进入到迷宫之中。而虚拟的“思维大厦”实际更为复杂，例如小说或其他艺术品。至于意识形态 P 与意识形态 N，似乎也同样明显：不同的世界观，可以从真实系统的一部分，也可以同时从分散、困惑甚至是模糊的那部分形成。客观化的段落可以在受到削弱的偏见性段落下立足。直接或理性的证据，可以夹带俗套的、话语套路的伪论证等等。由于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相互渗透，识别和澄清混合物中的异物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而完成这项任务必然需要一系列合适的途径。普通同型模式，清晰地展示了意识形态内部结构这一横截面，明确了精神物质层次上的内部符号生产等级。

## 二、精神产品各阶段分析

0 阶段：在开始的时候，或者在与未来各级相连的开端，只存在“原材料”。重点是“材料物质”，促使智人基于极为漫长的进化发展后，启动思维加工或进行“脑力劳动”。这种能力取决于“生物能量物质”，它这里被理解为促成物质生产和外部符号的生产“材料物质”。在内部符号生产中，这一经过一定程度的积累和提炼的大脑物质，是整个大脑 / 心灵 (mind) 的心理——身体的物理——生物一侧物质，或承载“人类个体”的心理——身体运作的那部分材料。即使在最复杂的精神生产中，该材料仍然作为生物—能源物质必备要素。“心灵”永远不可能从“大脑”中剥离出来，因为心灵是大脑的产物。从进化意义上讲，大脑也是心灵的产物。在生物能量物质这一层次上，人们设法走出了第一步，而这第一步的质变则涉及到向建立一种内部符素 (signemes) 的量变。

阶段 1：这是“前意指项”阶段（已存在而不携带意义；德国术语以及以下要点、观点、形式规范，参见罗西-兰迪，1974, p. 200-204；英语形式，参见 1975, pp. 80-108），在这一阶段，符素<sub>i</sub>，即内部符素出现了。我们已经有意地将符素<sub>i</sub>和符素<sub>e</sub>——即外部符素加以类比（在“自然”语言、音素或独立单位中）。因此，符素<sub>i</sub>只是前意指项，它不携带意义，在术语规范上接近符素<sub>e</sub>的形式，尽管前者不仅仅是后者的“反映”。符素<sub>i</sub>，是内部感知、内部加工的结果，加工过程包括聚焦、“理解”、特点比较、异同鉴别，该结果是对想象的基本内容进行辨析的结果。然后，完成从 1 阶段到 2 阶段的过渡，这是第二次质的飞跃和转换。

阶段 2：这是“半加工输出单位”（半制备初始单位）阶段，大脑工作中把这一单位叫做“思想素” (ideemes)。某些已经是“不可化约的意指项”了，如语言生产领域中或普通材料生产领域中，存在的语素或其他单词水平以下的材料。普通材料生产以对物理材料做出长期补充性修改为特征，这一修改内容将作为下一阶段“整体”的组成部分再现。在意识形态的生产领域，思想素作为补充性修改内容，对想象力的基本内容做出补充修改，将意义分配到这

些内容上。因此，思想素肯定了意义运输单位的作用,尽管这个意义仍然是不完整的。思想素承担(或简单地说：是)意识的一部分意义。

阶段 3：这是“完全和可分离部分”阶段。根据罗西-兰迪已经提及的“重组”这一术语，即“复合和合成思想素”（目前只低于 2 阶段），这一层级是所谓的“完全和可分离部分”。这些“合成思想素”，正如在所有更高级别的条目一样，携带意义。在普通材料生产领域，罗西-兰迪称这些实体为“片段性整体”，并特别强调“片段”（组成部分）的作用，例如锤子往往被关注的是其头部或其重量，并不是锤子本身。在语言生产领域，这些“整体”是由词和句子以下的语言单位（句法，词组，成语）构成。用一个类似的方法，可以将意识生产领域中“合成思想素”，理解为最简单的“观念习惯”、或德国所指的“思维图”（Denkfiguren），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讲，是“思维图”的组成部分。从 3 阶段到 4 阶段的转换，完成了第三个质的飞跃，或第三个转换程序，这个转换在经过 2 阶段和 3 阶段的量化积累后，终于要实现了。

阶段 4：这是“工作适用装置/方法”阶段，“适用的工作设备”可以是精神物质等级所谓的“意识”——“思维图”的等价物。在普通材料生产领域中，在第 4 阶段上发现了一些简单的工具，从完全有效的角度而言，这类工具因其固有形式，被应用于简单的工作程序中。在语言生产领域，这些工具是简单而完整的句子——传送简单信息的“自治”句。另一方面，“意识”是意识形态生产领域一个简单却还没有自我完成的“思维图”或简单信息的模型化。因此，他们不是维特根斯坦认为的语言“工具”，而是句子本身。更为明显的是，当考虑到意识形态等价物时，不是“合成思想素”使我们真正意义地进行思考，而是“意识”本身的发展，尽管它依赖于前一个和初级阶段。

阶段 5：这是“合成工具”阶段，或曰工具的合成化。在意识形态生产领域，“合成工具”被称为“合成意识”，因为“合成意识”和“合成工具”可以在同一个层次上出现。在普通材料生产领域中，合成工具适用于多个使用场合，同时，多个工具适用于同一个使用场合，这两种情况都是可以的。同时，在语言生产领域，合成句子同样存在。“合成意识”是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复杂程度的累积、结合的意识（或“思维图”），它将会因为缺乏一定的内在规律性而改变此刻的境况，进行第四步跨越。只有第四步辩证跨越能够颠倒 4 阶段和 5 阶段的人工制品，在量化积累后实现转换，达到“机械”化水平。

阶段 6：这是“机制”阶段。在意识形态生产中，此阶段上的“意识素”（ideologemes）这个术语，早已经作为科学术语被广泛使用，有时甚至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机制是材料意义上的“机器”。机械就是系统地组合而成的工具，它们根据具体任务和工作能力，系统地组合而成，形成良好的组织。这个工作过程，是在结构内部预先形成的。类似——或者更确切地说，

同型——特殊类型的机器在语言生产领域中依然存在：有组织的，有明确导向的、完整的句子，如三段论、论证、最广泛的意义上的正式关系，它们可以以发出者/接收者 - /抽离具体语境的方式去交流颇为确定的东西。因此，信息存在于结构内部。它们必须结合/组织/定位任务的知识工具或“大脑工作机制”（即更复杂的可以被均匀地或在正式场合中使用的“思维图”），才能被应用到“意识素”。因此，这个系统的“思维串联”也存在于结构内部。它在演绎、归纳、推理溯因、辩证结论、图示成分过程、以及规则导向“思维习惯”、模型、模式、以及定型和相关构造中，已经预先形成了。

阶段 7：这是“合成自我补给机制”阶段。在意识形态生产领域，被称为“合成意识形态机制”。另外，累加原理也描述了这一阶段，层次越高，原理之间的密切度就越高。至于在材料生产中，这一阶段是被合成机制所占有，完成一些工作流程后，随即结束组合。在语言生产领域，“合成文本机制”，如专著、论文、演讲和书籍，都涉及多方面的、复杂的任务和联系。思想的合成意识素机制同时出现在意识形态生产的同一层次，因为思想或多或少地包含意识素，并相互关联，这也被称作“意识索性”（ideologematic）。他们建立有组织的实体，但仍要求输入和“调整”，因此没有达到第 8 阶段。这个有组织的实体，需要第五个质的跨跃和转型过程，才能够产生“自动机”（这是第 6 阶段加第 7 阶段的关键，经过量化积累以及增大纠缠密度后，也必定实现质变和转型）。

阶段 8：这是“总机制”（Gesamtmechanismen）阶段（或曰“自动”，“总机制或自动化”）。“总机制”包括意识形态生产领域中的特殊自动机——“意识形态”。这意味着意义变异通过一定的政治、历史发展，如今占据了主导地位。即贬义意义（“意识形态<sub>p</sub>”）作为意识形态不断批判的结果（而中性意义上的“意识形态<sub>N</sub>”指的是产生于启蒙时代的这一概念高尚的哲学根源，当阶段 10 开始得到讨论时，它将清晰地阐明“意识形态<sub>N</sub>”是否仍会出现在模型中）。在普通材料生产领域，“总机制”是自我调节的自动机器，正如计算机和机器人是完全有能力取代人工作一样。大致而言，从语言和外部符号体系的角度讲，这一层面包含了自足的亚符码和相应资源，在各种仪式和典礼上同样如此，在各种实践中，它们具有强大的制约和吸收能力。这样，在这一层面上，当思维的“自我调节的自动机器”，或曰综合性“思维仪式”、“自动化”不再尝试激发思维的自我生成能力以发展意识形态 N（换言之，将个体发展为“成熟文化”）时，便具有了将个体强行凝聚为“结构”的一般趋势。也就是说，意识形态 N 能够出现于第 8 层，但不一定出现。

阶段 9：在描述“合成意识形态”这个层面上，将列举的是不同的“原型”（prototypes）（或“不可重复生产”），看起来罗西-兰迪的图式似乎应当被遗弃。然而，他的模型毕竟已经适

应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考虑到一个事实，经过世纪之交，机械领域的物质进步程度，已经远远超过罗西-兰迪提出同型模式那个时代了。如今的自动机已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如计算机和信息通信联合形成了信息网络，亦即信息技术，在信息社会中，不仅仅是机器人可以在工厂工作，连植物本身也已经成为巨型机器人。此外，材料运输系统也近乎为自动化监管系统，“仿生学”和它的自动化特征，在机械领域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这样的事例，不计其数。有了这个有力的证据之后，我们必须承认，从阶段 8 开始，内部符号经过不断量化积累之后通过阶段 9，再由于一些结构性生成原因，经过最后一个辩证性跨越至阶段 10。在符号物质生产层次的阶段 9 上，语言的“结构”可以被描述为“合成自动机”，包括符号、程序和整个系统，通过使用者来“说话”，反之则不成立。同样，符号系统的“结构”一般也可以在抽象的、“自动”阶段被加以描述，尽管系统各不相同。但是，如果不“洞悉他们的计划”，所有的符号系统就会像一个半自主或称霸的一般“符号性资本”运行（联系关于“媒介的力量”的讨论）。最后，对于在精神产品层次的合成自动机而言，思维的“自我调节，自动机器”或“思维仪式”一定要被掌握，它们甚至是更为复杂的、包括如集权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sub>p</sub>”）。因为实际上，它们吸收人类生活同源性的方方面面，是对启蒙世界观的真正嘲弄。同时，另一方面，后者（“意识形态<sub>N</sub>”）可以而且必须得到发展，因为它是人的意志和目标的模型世界。

阶段 10：“（精神）文化”——这是从阶段 8 开始、尤其是阶段 9 以后，通过完成第六个辩证性跨越之后所达到的阶段，其中包括在低阶段上通过积累、相连、最终转型后取得的所有成就。在这个自然和文化辩证统一、曾存在众多完美自动机的图式中，重新思考人类个体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趣的。但是，重点在于必须保持人类最复杂的“作品”，那就是文化——一个同时包含个体和集体努力的产物。根据文化不可否认的矛盾性的存在，人类首先创造的是总体文化，而不是某类文化。因此，在普通同型模式，第六步和最后一步跨跃的结果是总体文化的呈现。出于系统、经验的原因，必须指出的是，“材料文化”是人工物品等级上，大量工作投入而产生的结果，“表现性文化”等同于符号物质，“精神文化”又和精神物质一致。然而，需要牢记的是“共存人工制品”，尤其是在阶段 10 当中的“共存人工制品”，它意味着三类文化的互相交融、共同发展（参见 Posner 在 1988 关于“三种人类学”的结论）。否则，一个有关精神文化的不为人接受的矛盾观点就会产生：他们会如何超越个体？他们可以通过交流实现超越，但这也意味着会立即发展为表现性文化，并被任意符号物质所传达。这样，传统意义上“意识形态<sub>N</sub>”的要点，作为个体的“精神文化”，再次浮现出来。因此，罗西-兰迪的“不可重复生产”或“原型”（他的阶段 9），并不会被遗弃，而是在“文化”范畴和相

关的个体（或小型群体）“文化”一极中遭到扬弃，当然，这一概念同时也涵盖集体一极。概括地说，“材料文化”包括规模一端的物质原型以及另一端的材料生产，材料生产在一个生产单元中进行。此外，“表现性文化”包括表现性原型以及一个生产单位的全部符号物质。最后，“精神文化”是基于对能够被“集体化”的“意识形态<sub>N</sub>”原型可转让特征而存在的。

阶段 11：“文化”阶段主要呈现两个特点：第一，它形成一个**语境**，这个语境经过物质、表现性和精神文化的相互关联而得以形成；第二，更重要的是，它是由对话，特别是冲突性对话所构造的大文本互文文本（文章开头已做解释）。通过借鉴普通同型模式的文化理论（culture-theoretic）知识，将由莫斯科-塔图学派提出、经由伯明翰学派的社会符号学或施温特的亚文化符号学所延伸的“符号-文本-文化”层次模型，发展为“符号-文本-文化-总体文化”模式。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模式，特别是关乎“较高的辩证性阶段”的模式（Threadgold, 1987），并不与罗西-兰迪模型相矛盾，但某些特定的或扩展的要点并不在他几十年前的研究视野内。这一模式引用罗西-兰迪模型的阶段 10，将其分为 10、11 两个阶段（新的阶段 10 也包括罗西-兰迪的阶段 9 中关于“原型”提出的宝贵见解）：关于“全球生产”，罗西-兰迪发展了一个真正全面的观点：

“全球生产”的累积生产，是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文化，一种极端的情况，即理论上的集体……人类的生产，（Rossi-Landi, 1974, p. 204）

这使新的模式初具雏形。

### 三、结语

我们应当继续说明内部、外部符号操作的内部结构，即**符号操作者**和**意识形态操作者**如何工作问题（大多数场合中称“脑力工作者”）。由于在生活世界——即社会实践中产生了一些严重后果，人们当然应该更深入地区分意识形态<sub>N</sub>和意识形态<sub>P</sub>。应该重新设定模型，作为社会再生产三环节（物品、符号、意识形态的生产、分配、消费）的补充，去阐明商品、符号、意识等的关系问题。目前，许多问题必须保持开放性（见 Bernard 的著作，即将出版）。由于某些实际原因，我们并不建议用一个框架，即“叠加模型”，对文化（Culture[s]）进行具体的符号学研究，这里简要地重新介绍相互关联的四部分（伯纳德, 1992, pp. 1645 -1647）：

A. 符号输入 1：生活中的符号实践，通过各种符号学采用的方法而被检验。但是，这些方法一定要和社会符号学兼容，才能居于 C 中的叠加模式里的核心地位。

B. (亚)文化符号学理论（此处指由 CCCS 和施温特类型意义上的）作为或者基于一种特殊的社会学，是出于为 A 级测试结果系统性定位的原因，用澳大利亚符号学研究协会文化社会学术语来描述。（反过来，也如此为其提供社会结构主义装置）。

C. 社会符号学作为一般符号学，是从社会再生产的符号中分离出来，正如罗西-兰迪和普通同型模式所言，也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为了使研究扩展为具有整体性视野，这种做法值得一试。

D. 符号输入 2：作为社会经济指标，它描述了一种运作模式，并出现于在流通领域材料生产层次上的再生产统治系统中，且和社会实践、媒介、历史的三元运动息息相关。它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释所有问题，而只是意在揭示其可能性和互相交互的特性。（值得推荐的是长波理论的更新版本，见 Mandel, 1972, 1983；另，参见 Petrilli 和 Ponzio 即将出版的关于“通信生产”的研究）。

本文原题为 Inside/outside, ideology, and culture, 原刊载于 Semiotica 148-1/4 (2004), 47-68



（杰夫·伯纳德）

## PART IV 奥古斯特·庞齐奥专辑

奥古斯特·庞齐奥（Augusto Ponzio, 1942—），意大利符号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巴里大学哲学教授，庞齐奥被认为是巴赫金与列维纳斯思想的专家，但他与罗西-兰迪的思想继承关系最为密切。他是当今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潮流中的领袖人物。一生著作有 120 部，其中的英语出版物包括：

《作为符号的人》（1990）

《西比奥克与符号生命》（2001）

《语言哲学：巴赫金论艺术与回应性》（2006）



（庞齐奥自画像）



# 奥古斯托·庞齐奥的符号学与语言哲学

苏珊·佩特里利著

王璐译

## 一、游弋于语言哲学和符号学之间

奥古斯托·庞齐奥（Augusto Ponzio）1942年2月17日出生于意大利的圣彼得罗韦尔诺蒂科。他学术生涯的多数时间都致力于符号和语言学科的研究，从他完整的参考文献中可看到他的学术著作数量之大，令人难望其项背。仅从专著上看，庞齐奥一人就出版了120余本（参见本文末庞齐奥的书目）。20世纪初，在乌尔比诺大学国际语言学和符号学中心举办的年度暑期系列会议的其中一场，任该中心长期主席的朱塞佩·派奥尼（Giuseppe Paioni）这样评价道：奥古斯托·庞齐奥的创作是前无古人的，其研究兴趣之宽广，话语体裁之灵活，其对话性研究方法之开放，可与狄德罗相比肩（与笔者的私人沟通）。派奥尼建立了该中心，同时他也是一系列历史悠久的，至关重要的，久负盛名的国际型会议的组织者，其中像翁伯托·艾柯（Umberto Eco）、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罗西-兰迪（Ferruccio Rossi-Landi）等等，许多符号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人物都是参与者。

庞齐奥在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研究的当代是标杆性的人物。“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这一表述显示了庞齐奥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解决与符号学相关的问题，追随近期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其研究方向也与时俱进地由语言学转向了生物符号学。严格说来，他的方法与一般符号学相关。尽管如此，庞齐奥在批判和基础原理的探究方面实践来源于他语言哲学作品的普通符号学。

作为符号学的批判，庞齐奥的一般符号学解决了人文学科与逻辑数学和与自然学科间表面的分离。他的符号学研究涉及不同学科，根据最好描述为跨学科性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就庞齐奥而言，“无学科性”（undisciplinarity）更为贴切。庞齐奥提出，普通符号学坚持对意义的哲学探寻，正如他对意义的探寻坚持他在导师朱塞佩·塞梅拉里（Giuseppe Semerari）的教导下最初形成的现象学方向。因此，事实上，这不仅证明了学科间互相关联，也是被理解为我们中每一个的单一主体的人的意义的的问题。这符合了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及其后继者如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和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研究。胡塞尔关于“精确科学”（exact science）和“严格科学”（rigorous science）的区分，为庞齐奥对人类意义探寻的一般性科学研究尤其是在一般符号学方面，确

定了方向。庞齐奥在研究中延续这一特定方向，形成了“伦理符号学”（ethosemiotics），“终极”（telo-）或“终极符号学”（teleosemiotics）的概念，以及新近在与笔者合作的研究中发展而来的“伦理符号学”（semioethics）。研究的一系列作品包括与笔者合著的 2003 年出版的意大利文版《符号学》（*Semioetica*），2005 年出版的《打开边界的符号学》（*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以及 2010 年在保罗·科布利（Paul Cobley）编辑的《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一书中英文版伦理符号学的条目。我们对符号学中伦理符号学的阐述是从病状学（*semeiotics/symptomatology*）的概念发展而来的。

他研读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作品，特别是与托马斯·西比奥克（Thomas Sebeok）的私交的影响，庞齐奥关注生命与交流，符号和价值的关系。在西比奥克的影响下，庞齐奥确定了起源于医学符号学或病状学的符号学。病状学把符号学即一般符号科学置于从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发展到盖伦（Galen）的传统中。这不仅仅是关于知识的起源的问题。将符号学与医学学科即症状研究学结合起来，也就意味着恢复符号学研究的伦理上的实例。换言之，鉴于符号活动与西比奥克所说的整个地球上的生命的交汇重叠，它意味着为了生命健康而复兴“病状学”（*semeiotics*），及时关注符号学科的古老使命。这些议题蕴含在庞齐奥与笔者合著的不计其数的论文中（大多为英文版）。当然也包括与笔者合著的几本书中：2001 年《托马斯·西比奥克和生命的符号》（*Thomas Sebeok and the Signs of Life*）和 2002 年《病状与生命：托马斯·西比奥克的全球符号学》（*I segni e la vita. La semiotica globale di Thomas A. Sebeok*）。无论如何，“伦理符号学”（*semioethics*）并非旨在建立专门的学科，而是作为符号学研究的一个视角和方向。庞齐奥研究符号学的伦理上的实例最初是由他 1966 年在大学教授道德哲学的课程发展而来的，此后自 1970 年担任语言哲学系的教授，1980 年任全职教授后中断该课程的开设。

庞齐奥所理解的“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是指把语言作为主体，哲学化的语言而不只是哲学对象的语言。语言学科的研究以独白式为方向并受语言学的向心力聚合力的控制时，内在于语言的哲学化的原始能力和其组合式的对话杂语很可能被畸形化，被误解，被扭曲，尽管努力的方向相反，最终与本身内涵和表意背道而驰。要是没有这种原始能力，把语言客观化或发展语言研究的哲学或语言学的学科便是无稽之谈。

正如语言哲学不能从一般符号学中分离一样，一般哲学也都不能与语言哲学中分离。而语言哲学和一般哲学都不能忽视对话杂语这一现象，否则便会招致失败。事实上，对话杂语是一种对批判意识的所有形式的哲学反思的一种由因及果，先验的条件。庞齐奥主张作为一

项职业，一个机构的哲学应该在倾听的艺术上再生。此处的倾听关注的是语言，生活中话语的哲学。对话杂语、多语制、历史、自然环境中的语言及其组成的内部语言的对话联系为语言确定了方向。在此种意义上，“语言的”(of language)在“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这一表达反映在主格上：作为一个方向，语言最终哲学化为一种语言固有的对话性的多元话语。

对话主义和内在的多语制的能力，多元话语的能力要求作为一门学科的语言哲学和其他一般的语言学学科一样，发展自己的方法论。换言之，庞齐奥的研究中，对话的多元话语作为研究语言的方法，定义语言哲学的标准产生的。因此，庞齐奥认为对话的多语制是哲学反思和科学一种由因及果的，先验的条件，不仅是针对语言的条件，也是所有形式的批判意识的条件。

## 二、批判的语言学理论，对话主义和阐释

庞齐奥是一个对话主义的理论家，这一概念是庞齐奥阅读巴赫金和皮尔斯的著作时提出的，他认为言语是对话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参与到他人的言语中。这也是符号的对话性的结果，正如他在符号的对话性质系列课程中提到的那样。2006年，保罗·布伊萨克（Paul Bouissac）委托庞齐奥在符号学研究所网站上开设相关课程，在出版商莱纳德（Leonard Sbrocchi）的鼎力相助下，与莱格斯出版社（Legas）合作的这些内容的著作也得以问世。正如庞齐奥所描述的，对话不是我们所选择的；相反，我们遭受对话的折磨，并受制于它。对话不是以开放心态对待他者的结果，不是对他者让步的结果。相反，对话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接近他者。对话与身体相连。言语是声音，内化的声音。脱离人身的对话是天方夜谈。文字自主性的错觉是个人身体自主性的错觉。对话排除了自我和他者的同质性的所有形式，忽略他们单一性的均等性即综合的所有形式。对话的关系是不对称的，不可逆转的。语言的动态现实不能从官方语言学的类别范畴上进行理解。相反，官方的语言学是从具体化的特定性的内在的对话主义中抽象出来的，确切而言，是指字词的价值、实用性和意识形态等方面。

庞齐奥指出了对语言和符号研究不足的情况。这些研究只是在平等交流逻辑上分析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而与符号生产过程中的历史社会关系相分离。在众多人文学科即哲学、符号学、语言学、语言哲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美学创造和文学中，像巴赫金一样，庞齐奥探索了这些科学互动和冲突的边界和话语的界限。

正如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所证实的和一般符号学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我们认为，逻辑、对话、意识形态是指符号生命的三重维度。这三个术语也是研究庞齐奥一本合集的题目，是

由笔者编辑的《符号学》上一个的特刊《符号学视角下的意识形态、逻辑和对话》(Ideology, Logic, and Dialogue in Semioethic Perspective) (148-1/4, 2004)。还有之前于 2002 年, 在国际符号学研究会的支持下, 在巴里大学举办的关于庞齐奥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逻辑、对话、意识形态的功能”。逻辑, 对话和世界的符号模塑都包含人类符号功能过量的能力。这种过量能力使得符号不再是必需品, 并且打开了欲望、发明创造、非功能性规划之门。鉴于此, 人类是自身的最终目的, 并崇尚人类不甘沦为手段或工具的价值。

庞齐奥已写了大量文章来解决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 辩证法和符号学间的关系。其中一些文章可在 2004 年出版的《符号学与辩证法》(Semiotica e dialettica) 中读到。从这个角度来看, 庞齐奥一个主要的编辑工作是将彼得·希思帕尼斯 (Petrus Hispanus) 所著的经典之作——《符号逻辑学》(Summule logicales) 由拉丁文翻译为意大利语, 并于 2003 年出版了双语评述版 (修订版, 2010)。

《符号学与辩证法》对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间的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各章节中包含以下观点: 1. 符号学与辩证法; 2. 关于非语言符号的逻辑矛盾; 3. 马克思关于矛盾的观点; 4. 唯心主义, 控制论与唯物主义的辩证法; 5. 数学、辩证法与社会政治经济学。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的数学手稿; 6. 辩证法与真理; 7. 知识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 8. 量子物理学语言与生产关系; 9. 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 10. 对话与辩证法; 11. 对话理性的批判; 12. 自动性的解放; 13. 逻辑与辩证法。彼得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或《符号逻辑学》。

正如庞齐奥在引言(pp. 7-7)中解释的, “辩证法”(Dialectics) 是一个由来已久涉及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哲学概念, 像逻辑、认识论、语言学科、数学、物理、生物、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学科。辩证法的概念在这些领域内被探讨。另外, 这些领域在辩证法上相互关联。辩证法与费鲁齐奥·罗西-兰迪所提的“去总体化的方法”(detotalizing method) 相关, 这一方法是对“以部分代整体”(pars pro toto) 谬论的批判, 是对以部分换整体的错误的批判, 对把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整体看作是互相孤立, 自给自足的部分的批判 (Rossi-Landi 1968)。罗西-兰迪也称这个方法为辩证的, 并将其应用到符号学研究中。在他未出版的, 计划收集其整个研究过程的一系列论文的著作中, 其中一本的书名为《辩证法的分析》(Dall'analisi alla dialettica)。

符号和符号学的一般科学被包含在独立于话语概念本身的辩证法, 独立于辩证法是否被看作是话语的直接对象的辩证法。仅是因为符号学的范围涵盖不同的, 上述所有的学科领域。随着西比奥克“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 观点的提出, 符号学的研究视野自皮尔斯和

莫里斯后，变得更加开阔，由此进一步证明所有基于“以部分代整体”（pars pro toto）谬误上的一般符号学的方法的局限性（Sebeok 1991, 2001, 2003; Ponzio and Petrilli 2002a, b）。但符号学的辩证特点不仅关注学科和其研究对象的相互作用，这些研究对象都联系在交织于生物圈或统治地球的整个生态系统中的符号学网络。辩证法也关注形成符号本身的各种联系，根据皮尔斯、莫里斯和西比奥克界定的符号学传统中所描述的那样：符号存在于对象-符号-解释项的三元关系中，这种关系组成了由在一个解释项到另一个解释项的无限循环的延期中，存活于与同类的其他细胞的关系中的一种细胞。

皮尔斯描述了对话的符号和解释项的关系。事实上，关系的另一方面在某物作为符号的过程或情境，即符号活动的对话性上，是显而易见的。“辩证法”（dialectics）一词来源于“对话”（dialogue），同时，虽然在思想史上，辩证法就以不同的含义被使用，但自柏拉图（Plato）时代始辩证法就与对话紧密联系以来。

西班牙的彼得（Petrus Hispanus）（1205c-1277）认为辩证法为所有方法的原则开辟了前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研究和实践的各个学科中，辩证法必须居于首位（Tractatus Summule logicales I, 1）。彼得开始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显示了“辩证法”（dialectics）一词由“对话”（dialogue）起源的过程。

巴赫金关于对话和他性的哲学在“真正社会主义”（Real Socialism）的社会思潮中幸存下来。自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后期以来，最终在全球获得了认可(参见 Bachtin e il suo Circolo 2014; Ponzio 1980, 2015)。在他们的语言和非语词的符号研究中，除了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专著外，巴赫金和同派研究者也为符号学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点(参见 Bachtin e il suo Circolo 2014; Bakhtin 1963, 1968; Medvedev 1928; Volosinov 1928, 1929)。巴赫金描述了他称之为的虚假辩证法，其中，综合体的产生甚至先于论题及其反题的详尽阐述。因此，论题和对反题是一开始就由综合体确定，作为生硬化对话的结果，这就导致了独白式话语。必然以对话结束的辩证法的问题在巴赫金的反省中出现。辩证理性的批判是一种对话理性的批判(Ponzio 2003)。

一般而言，对符号学和辩证法关系的反思有必要考虑运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Engels）创立的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辩证法概念。对符号的反思能让辩证法的概念免于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犯下解释错误。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亚当·沙夫（Adam Schaff）作品的误解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但此处指的其关于语义、逻辑、知识理论和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著作。正如在辩证矛盾和非矛盾原则的并置一样，沙夫为在这个领域中最常见的误解所做的批判，为其奠定基础(参见 Ponzio 2004: 7-9)。

庞齐奥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计划始于他 1970 年的作品（扩展版 2005），《语言与社会关系》（Linguaggio and relazioni sociali）。在他 1973 年的专著《语言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Produzione linguistica and ideologia sociale）中，（1992 年发行法文评论版和扩充版，接着 2012 年在巴西出版），他很快对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语言分析方法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该研究的一些方面随后在 1991 年的《语言哲学 2》（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2）一书中得到发展。由于乔姆斯基在世界学术界的广泛影响，1973 年庞齐奥的批判态度是语言学科领域的主导趋势。庞齐奥的主要主张是乔姆斯基误把一种特定语言即英语的运用认为在一般语言上是必要普遍的（庞齐奥声称他的例句通常无法翻译成其他语言）。此外，根据庞齐奥的观点，乔姆斯基混淆了分析的不同层次，把被分析对象的描述层次误认为是分析模型的构建层次。庞齐奥的批判态度符合塞巴斯蒂安（Sebastian K. Shaumjan）的研究和他二阶段的生成语法理论，其中关于遗传型和显性两个层次上表述得相当准确，而与他所描述的乔姆斯基单阶段的语言理论形成对比。但在乔姆斯基的作品中，最令人奇怪的是他从不提出问题：为什么形成多种语言？为什么会出现巴别塔？如果原因是存在的话，正如他坚持认为的那样，所有语言中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普遍语法。

在庞齐奥看来，乔姆斯基所说的“语言创造力”（linguistic creativity）实际上指的是一种特征为规则的应用、规范、不受说话人控制的程序的情境。这样的情境不仅涉及语言的语音、句法和语义层面，也包括意识形态层面。作为语言学家的乔姆斯基很少分析意识形态问题。相反，作为美国政治批判家的乔姆斯基以一种完全脱离于语言学专业性方式解决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庞齐奥说，这两个乔姆斯基从不说话。

随着对“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表现”（performance）的分类，像是康德、胡塞尔、皮尔斯、梅洛-庞蒂这些作家从未存在过一样，乔姆斯基再次从术语和其机制的反面这一传统问题，即意识和经验的对立、行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身体和心理的对立、内部和外部的对立、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立。在其早期 1961 年的专著《意义，沟通和共同交谈》（Significato, comunicazione and parlare comune）中，乔姆斯基参考了康德、罗西-兰迪的观点，制定了“一般演讲的方法”（methodics of common speech），在 1968 年的专著《作为工作和贸易的语言》（Language as Work and Trade）（英语版，1983），将其发展为“语言工作的方法论”（methodics of linguistic work），随后演变为术语“一般符号活动的方法论”（methodics of common semiosis）。庞齐奥对乔姆斯基批判的中心范畴是由罗西-兰迪 1968 年的专著发展而来的“语言工作”（linguistic work）。罗西-兰迪联系不同的人文学科，政治经济和语言学，提出了“语言工作”的概念，要专门确立符号生产和人造品生产的类似关

系。庞齐奥延续罗西-兰迪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并开始关注主体和社会，自然环境间的辩证关系，关注语言生产过程的结果中，作为工作的语言和作为工作产物的不同种语言。

为达到功能性的目的，一个语言学理论必须摆脱描述性的、分类型的语言分析方法的限制，要能阐明问题，并且是至关重要的。还需要解释与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相关的语言生产的社会过程。通过运用巴赫金，沃洛希诺夫（Voloshinov），马克思，沙夫，罗西-兰迪的分类，其中包括“作为工作的语言”（language as work）和“作为历史、社会和意识形态现实的语言”（language as historico-socio-ideological reality），庞齐奥批评了将“语言使用”（linguistic use）化约为“行为”（behavior）或“活动”（activity）的倾向，证实了人类对语言和语言环境上创造性的（诱导性的）、批判性的干预潜能。

特别是关于罗西-兰迪的作品，庞齐奥讨论“语言工作”（linguistic work）、“语言价值”（linguistic value）、“语言市场”（linguistic market）、“语言资本”（linguistic capital）等概念。罗西-兰迪建立了物质生产与语言生产、语言学和经济学间的联系（“语言学和经济学”是他 1975 年开创性专著的书名），从而得出了“语言工作”（linguistic work）的概念。当时，他的这一观点看起来是奇谈怪论，或至少可以说仅仅是比喻性质。罗西-兰迪所指的“语言工作”（linguistic work）就是现代意义上的“非物质工作”（immaterial work），它是一个有效的资源和利益来源。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当时，“非物质性资源”（immaterial resources）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不像今天那样明显，因此符号、语言和交流的作用也不如现在显著，罗西-兰迪证明了“语言生产”（linguistic production）和“物质生产”（material production）间的同构关系。由于科学研究的进展，特别应用于电子设备的人工智能的进步，物质生产和语言生产在经过长期以来被错误地相互分离后，直至近期才以“体力劳动”（manual work）和“脑力劳动”（intellectual work）的形式被证明是统一的。关于罗西-兰迪的研究，庞齐奥不仅发表大量论文，还著有两本完整的专著：1988 年的《罗西-兰迪与语言哲学》（Ferruccio Rossi-Landi and la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2008 年的《重读罗西-兰迪，语言工作和全球市场》（Linguaggio, lavoro and mercato globale. Rileggendo Rossi-Landi）。

在 2003 年的专著《语言和语言》（Il linguaggio and le lingue）和 2004 年的《普通语言学、文学写作与翻译》（Linguistica generale, scrittura letteraria and traduzione）中，庞齐奥大致回归到语言能力和知识的发展问题上，即乔姆斯基在 1985 年所归结的“柏拉图的问题”（Plato's problem）。“柏拉图的问题”这一表达是指一定数量的有限元素如何产生在数量和质量上无限的知识。意识形态的问题不仅严格地与语言理论相联系，也同逻辑和知识理论密不可分。根据庞齐奥的描述，与乔姆斯基经验和能力的二元论截然相反，继康德之后，现代

概念的经验被描述为包括诱导型推理过程的解释性操作（Charles S. Peirce）。通过这样的操作，主体经常会使得大体上呈现分散离乱、零碎部分状态的数据日渐完善，组织有序并且互相联系。与终端输入的局限性相比，被视为解释的经验是富有创新的，更有意义的。因此，语言经历与语言能力融合，语言能力不再需要天生的补充物，即一种婴儿与生俱来的自然的设备。

在语言习得和推论性-诱导性语言运用的联系的基础上，其中，诱导和无尽的语言学习的关系是相互支持的一种：语言学习运用于诱导的过程中，而诱导的过程反过来通过语言学习得以加强。事实上，推论过程必然是建立在先辈们解释性的语言工作的基础上。他们也流传下这些语言材料和形成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语言的工具。

而对于超越二元对立的语言能力和经验，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二元论的语言学理论，庞齐奥借鉴了皮尔斯及其符号学理论。通过对乔姆斯基深层结构概念的批判，庞齐奥提出“解释语言学理论”（interpretive linguistic theory）。从这个角度看，不同层次的理论，前件、派生、深层结构和表面结构这一系列的理论都不再适用。就与对它进行解释的另一句话（作为皮尔斯所说的解释项）的关系而言，相对于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的“解释语言学理论”（interpretive linguistic theory）可以解释为理解一句话或一般语言符号的能力。所有的话语都以其解释项为特征，由其解释项生产、识别和发展而来。根据这种方法，话语的解释项并非是一个深层结构，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确认话语或任何一个语言符号的解释项只有实现了它表达和解释的条件才是被表达的。

关于解释项，要区分“识别解释项”（identification interpretant）与“应答性理解的解释项”（responsive understanding interpretant）。前者的功能在于在语音或图形构造、语义内容、形态句法结构上的层次上识别出符号，后者则集中在符号的实用性上。“解释项符号”（interpretant signs）和“被解释符号”（interpreted signs）关系的特征是对话主义，积极参与和他性，这些术语也是庞齐奥研究方法中特别重要的一方面。这种符号解释的层次与话语的意识形态水平密切相关。这些问题都在庞齐奥 1990 年《作为符号的人》（Man as a Sign）和 1993 年《符号、对话和意识形态》（Signs, Dialogue and Ideology）的著作中得以明确阐述。

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意大利开始的从所谓的解码符号学到解释符号学的转变，庞齐奥在相关方面的研究也延续这一变化（cf. his pioneer book *La semiotica in Italia*, 1976）。由“解释符号学”（interpretation semiotics）所提出的符号模型是不同文本所得出的相关对话结论即理论知识（Peirce）、文学理论（Bakhtin）、价值论（Morris）的异质品。关于这些结论，



庞齐奥对符号学和意识形态 (Rossi-Landi, Schaff) 关系的研究引起了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对于符号和社会价值关系的瞩目。查尔斯·莫里斯已在研究这种关系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 1964 年出版的《意谓与意义》(Signification and Significance) 一书中提出了符号与价值的关系理论。与认知符号学、描述符号学和意识形态上中立的符号学的观点相反,当下符号学的主要趋势旨在为人类及人类符号的全球侦察恢复符号活动的分类系统。

基于解释符号学的基础上的皮尔斯和莫里斯的符号模式,是一动态模式,它根植于无限的符号过程或从一个解释项符号到另一个的开放的演绎链的概念中。成立的逻辑不是平等交流逻辑,而是在形成符号网络的解释项的关系中无沟通、过量和他性的逻辑。在具有自己的符号物质性的被解释符号上,解释项符号会表达出更多意义。由于其符号的物质性,被解释符号将抵制任何一种单一的解释,或庞齐奥所称的“解释路径”(interpretive route)。换言之,被解释符号的意义不会由任意单一的解释项符号或者解释路径详尽分析。在解释符号学的框架下,符号往往是符号情境中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境中,符号活动的各个组成部分——符号工具(能指)、意义(所指)、指称物、解释者、解释项和规范符号系统的编码——被认为是复杂链接的符号活动过程中互不相同,紧密相关的各个方面。

逻辑推理,符号活动的对话维度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必然要求一个符号说明的分析,要求充分的分析必须从认识到这种现象的符号特征开始。符号的不同功能应该得到分析。然而,对符号的描述若局限于功能将不足以解释推理过程和对话,意识形态中的创新、创意和创造,即符号生命可预见非功能的宽广余地。

### 三、对“三分式”、“辩证法”和“自动性”的重新阐释

与吉尔·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和费里克斯·伽塔里 (Felix Guattari) (1976) 提出的根茎图式相对比,尽管他们对二分逻辑的批判仍然是一分为二的,庞齐奥提出了三分的自动性,“第三性”(Peirce)的自动性,对他者开放的自动性,关爱的自动性,创意性诱导的自动性。在这些问题上特别有趣之处在于庞齐奥 1989 年的专著《哲学家和乌龟》(Il filosofo e la tartaruga), 以下将呈现其中的一些方面。

精神分析、结构语言学(包括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以语言学为模型的人文学科(结构人类学等)、数学信息理论都倾向于遵循二元逻辑,也就是说,一对一关系的封闭逻辑。二元逻辑不仅规定主导的意识形态,因此也规定着服从于意识形态的社会现实。主导的意识形态被描述为术语“自动机”,这种“自动机”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保护的能力,旨在规范和再生产其他依赖于前者并对其加以支持的自动性。

社会变革的条件是要实现扩展，开放的整体性，而这一整体性实现的条件是根据对话主义和他性的逻辑，包括形成现在再生产循环的封闭的整体性在内，由一对一关系组成的整体需要被去总体化。

今天，符号学的范围超越了索绪尔式（Saussurean）/叶尔姆斯列夫式（Hjelmslevian）/格雷马斯式（Greimasian）的研究方法和皮尔斯做法的对立，一对被认为是分别汇聚二元论和三元论的对立关系。但是，据庞齐奥观察，中心问题并非是在二元论和三元论之间进行二选一，而是在一元论和多元论间的选择（Ponzio and Petrilli 2002a: 263-4; Ponzio 2007: 34-5）。换句话说，索绪尔矩阵的符号学提出的符号模型的局限不是由二元论决定的，而是由二元论在能指和所指平等交流逻辑的概念中，在复杂的符号生命降低为编码和消息所形成的二分法范式中找到依据这一事实决定的。

这一重要的对立关系存在于一个符号模型之间。对于一个复杂的符号活动过程而言，如皮尔斯提出的那样，这一符号模型往往过于简化。根据该模型，某个事物就成了一个符号，并且模型对这个符号过程的不同方面都是有所裨益的。后者的有效性不是由一个空泛的三元的形式得出的，而是取决于构成皮尔斯的三元论的特定的内容，也就是形成三元论的各个类别，他的符号类型，还取决于他的符号模型的动态特性。这个模型指出符号基于一个解释项到另一个解释项的循环。这些类别包括“第一性”（firstness），“第二性”（secondness）和“第三性”（thirdness），三个一组为“再现体”（representamen），“解释项”（interpretant）和“对象”（object），“归约性”（symbolicity），“指示性”（indexicality）和“像似性”（iconicity）。所有这些因素支持了符号活动的一种理解，在这一活动过程中，他性和对话主义是决定性的。

与皮尔斯和巴赫金对符号的理解相一致，庞齐奥还将符号和意指过程置于对话关系的背景中。作为一个符号网络中解释路径的一部分，意义是明确界定的，并与其他解释路径的对话相联，易于发生持续的变化和扩展。意义的这种原始的主题化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些概念，如意指的不稳定性、多声、内部多语制、对话主义、符号的物质性、表意他性和符号的自足性，这种符号甚至拒绝生产它的主体的解释意愿（Petrilli 2010: 137-58）。这种对话关系在多种层次上得以发展，包括符号与解释项的关系，在论证中前提与结论的关系，形成一个单一解释路径的语言与非语言解释项的关系，或形成不同解释路径的解释项的关系。

被称为“解释符号学”（interpretation semiotics）的皮尔斯与莫里斯的符号模式是在一个动态的符号过程，它基于无限符号活动的逻辑和一个解释项到另一个解释项的无限循环上。与基于平等交流逻辑的符号模型相反，该模型是由在形成符号网络的解释项的关系中的无交流，过量和他性的逻辑所决定。解释项在被解释物上表意丰富，被解释物反之则具有符号的

持续性，这种持续性能抵制任何一个“解释路径”，一种单一的解释，并永远不会在这一解释或路径中得到详尽讨论和分析。（Ponzio 1990: 17-32）。在解释符号学的框架下，符号往往是符号情境中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境中，符号活动的各个组成部分——符号工具(能指)、意义(所指)、指称物、解释者、解释项和规范符号系统的编码——被认为是复杂，链接的符号过程中紧密相关的各个方面。

皮尔斯的逻辑是对话性的、多元的，尽管其优点不在于三分式本身。黑格尔的辩证法从符号生命的组合式对话主义中抽象出三段论，从而产生了非直线型的，独白式的辩证法。巴赫金在其 1970-1971 年的笔记中分析了黑格尔独白式辩证法的形成过程，显示了它从对话式符号活动的真实文本中起源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于从对话中去除声音（声音的分离），消除了任何个人或情感的语调，从而将现场的语言和对话关系抽象为概念和判断，因此单一的抽象的意识形式形成了辩证法。皮尔斯本人表明立场，反对黑格尔分析的系统框架，以及将辩证法理解为一种对结论忧心忡忡的搜寻，并认为辩证法朝着综合的单向而不是开放、矛盾的方向发展（on the relation between dialogue and dialectic in Peirce and Bakhtin, see Ponzio 1986, 2006）。

在解释符号学的框架下，特别参考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和皮尔斯符号学的相关研究后，庞齐奥分析了解释和构建过程的记忆。特别是，他专注于连续性的问题，以及连续性和记忆之间的关系。他与皮尔斯一样，开始关注知觉的意指物质性，它“不能随意被去除，甚至也不能从记忆中抹去”（CP 4.541）。尽管如此，一旦并永远被固定和定义后的实体本身并不能使知觉的抵制成为一个事实，因为知觉是一个符号，是一个解释项的解释，反过来又成了一个符号，接着又成为另一个解释项的解释。在知觉和记忆中，赋予本身的就是赋予自身一个解释，而非对一个主体的解释，相反，主体是由外部的解释过程所赋予的，而是对一个符号本身，嵌于解释和解释项链的主体的解释。记忆可以被理解为连续的解释和解释项的关系链，这种关系构成了一个开放的主体的叙事，即对不同的解释路径进行接连不断的再阐释的开放性。

认识到在解释项和解释之间保持距离的需要，与一个局外人（这里指的是精神分析家）相联得出的对话的外位化关系的需要，是基于在分析实践中的解释。通过将重构的“事实”（facts）和“失忆”（loss of memory）转变为符号，即解释与解释项的关系，皮尔斯的符号学使解释摆脱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仍可追溯到的实证主义的残余。从这个角度看，解构与建构的分析工作不能与对话的解释和解释项的关系分离，而这对关系是由两个尽可能异质且无关的符号扮演的，发生在阻碍彼此互利的他性抵消的不对称的关系中，而不是发生由解释和

解释项的平等交流逻辑规定的关系中。

在《建构分析》（Konstruktionen in der Analyse）中，弗洛伊德在意义延伸上区分了“解释”（interpretation）和“建构”（construction）：解释是指单个元素如突发奇想，或一个失误或不恰当的运用；而建构则是详细分析一整片被分析者所遗忘的故事。但是，就重建而言，弗洛伊德提出了建构的概念，同考古学家和语文学家的工作相似。但根据庞齐奥所言，分析的构建不应在恢复的意义上提出，不是返回到无论是一个建筑物或一个文本的先前的状况上。相反，构建意味着建立对话的他性关系是解释的条件。在解释中，解释与解释项的关系不会自我呈现在复制、意译、实译上，而会出现在批判性阅读，创新的阐述和回应性的理解中（Ponzio 1990: 48-50）。

思维符号关系被不断分解为解释的解释符号对象与解释性符号或解释先前符号的解释项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他者，外部世界抑或是不会降级为与先前经验的逻辑关系的推理过程都是开放的。在这种情况下，在构成自我身份的他性与自我之外他者的他性的双重意义中，记忆与他性互相联系。换句话说，他者不仅是在生物和传记上自我之外的他者，区别于自我的他者，也是构成身份的他者，其他人，自我中的他者。因此记忆不仅是重新构建已生成的文本的问题，不仅是已体验过的经历的问题，也是创作、构成新文本、进行全新体验的问题。分析的解释可能要归功于他性关系的构建，他性关系阻断了意义的单一性，解构了自我的契约身份。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性关系对克里斯蒂娃（1983）所理解的“激情符号”是开放的。

对于主体性与其符号问题的一个关键且辩证的方法，证明了为了身份和在他性和外位性上恢复意义的目标而不惜牺牲他性。继巴赫金之后，庞齐奥将“去总体化方法”（detotalizing method）理论化，规避身份的限制，虚假但具体的总体中的零零碎碎（例如本体论、政治、平等交流、个人、社会、国家、民族、西方世界、欧洲、东方、语言、真理、知识、平等、正义、自由、有限责任、需求）。他批判了总体性的封闭性，将去总体的情况理论化，即在完整的、去总体化的符号网络中，存在着在对话层面上相互作用的，彼此连接的更小个体。当今社会再生产体系由身份的逻辑所规定，这意味着它是建立在种族隔离，甚至是他者消亡的基础上。这一体系是基于具体的抽象物，包括“个人”（Individual）为了身份被迫牺牲他性这一具体的抽象物。对该体系批判的前提是他性的观点，绝对他性，二元对立逻辑的一对一关系中不仅存在着的相对他性。身份批判的前提是对他者的认可，也就是对他者不能被忽略或消除这一事实的认可。

“外在性”（outsideness），“外位化”（extralocalization），“外位性”（exotopy）（见 Bakhtin），绝对他性（见 Levinas），“不及物性”（intransivity）（见 Barthes）的情况，最好地描述了

确然的人从封闭的身份限制中解脱出来。这种情况在文学话语里是显而易见的外位化、距离、他性的程度构成了文学价值的程度，并成为不同文学体裁的特征。这并不意味着赞同“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这一理论，列维纳斯将这一理论描述为虚假的和道德的。因为它把艺术置于现实之外，并使得艺术家们免于承担全部的责任。绝对他性的自由包括绝对责任、无阻碍回应的状况，和无托词的责任。

在1919年的早期论文《艺术和责任》（Art and Answerability）中，巴赫金就坚决主张艺术与生活、艺术与他性、艺术和契约或官方角色中无限责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Bakhtin 1990: 1-3）。在这一框架下，主体被理解为复数、零散、对话性、绝对差异性和无限责任，同先建的独白式的意义一样，它与传统哲学的整体主体相对立，与在连贯的单一的意义的关系概念相对立。与单一观点、权威声音、契约文字的稳定性的保证、静态系统和规范的盲目责任相反，庞齐奥也描述了确然的人在对他的责任、对话主义、倾听和他性等方面的能力。主体涉及在开放空间的“大时代”（great time）（Bakhtin）中的他者。自由不能回避与他者的关系，面对他者时的脆弱性，对他者的责任。确然的人应毫无借口地对他者承担起责任（参见 Levinas 1972: 98）。

关于主体性的自动性的比喻主要是基于机械的消极意义上的考虑。它显然赞同矛盾的概念，如一方面是必然性和自发性，另一方面是关于外部约束的偶然性和自主权。庞齐奥在辩证法的术语中展开对这类矛盾的论述，并提出了似乎是另一悖论的观点：自动性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人的行动变得自主。因为它结合了编程的、自发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自然和人造等诸多因素，自动性是人的主体性的特点而非机器的特性。作为自主决定的自动性不受外部条件的影响。自动性通往无意识：轻率，健忘和口误的自动性，梦想，欲望和激情的自动性。

看似分离的自动性事实上是辩证地彼此相关的。我们把一般用来分析人及人的行为的较大的类别进行分解或“去总体化”（detotalize）时，这种相关性则更加明显。这些大类别包括个人主体、社会、文化、阶级、语言和言语。仔细观察后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类别建立在一系列的在不断变化的关系体系中的自动性之上，因此从特定角度看，看似有序的自动性实际上是从他人或他物那里产生的自我驱动和自发性（Barthes 1978; Rossi-Landi 1972）。庞齐奥探究了构建开放的、能对外部刺激进行反应，反应后并能进行修改和重组并能区分拟态自动机和总体的异质性的自动性的可能性。他把人类自动性这一有建设性意义的解释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和他的正面阐释联系起来。葛兰西分析了自由和自动性的关系，声称自动性不容于专制，而不会与自由发生冲突。自动性是一个团体的自由，与个人主义的专断意

志相矛盾。如果这种专制被广义化，它便不再是专制，而是向“自动性”（automatism）方向的转变，变为一种新的理性。自动性是剥去任何投机性的光环外衣后的理性（Gramsci 1932-1933）。

把自动机视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的实体这一方法的局限性在皮尔斯的三分法（偶然性）的三元类别，关爱（在他者的关系中的爱）和与其解释理论和最负盛名的符号三元，指示符号、像似符号、规约符号相关的必要性上清晰地显现出来。事实上，自动机是面向较大自动的实体的关系，面向其未控制的机制和程序。作为符号的现实情况，调节自动性的解释实践不仅由必然性（指示符号）、偶尔性（规约符号）、解释重复和预测的演绎和归纳的推理实践所调控，同样也要受随意联系的自动性、相似性和类比性（像似符号），解释意指过程中创意和不可预测性的诱导型的推理的调控。

#### 四、文学写作与语言、交流和社会项目的批判

庞齐奥的许多著作致力于文学创作，最终通过文学的角度来更好地理解语言。庞齐奥把文学观主题化为一般方法论的原则。文学写作不仅被主题化为运用符号科学中的模型和类别的研究对象，而且它也为这些模型和类别的详细阐述提供了方向。表述中“文学的”（Of literature），“文学的角度”（the point of view of literature）不仅意味着把特有的模式和类别运用于文学文本的研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指向“过量”（excess）、“他性”（otherness）、“对话主义”（dialogism）、“间接语”（indirect word）、“题外话”（digression）这些现象，作为符号分析的一般类别，这些现象是文学语言的特征。正如列维纳斯和巴赫金所说的那样，文学写作是为全面实现“外位化”（extralocalization）所立的优秀标杆，以“绝对差异性”（absolute otherness）和“对话主义”（dialogism）的逻辑为导向，而非独白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身份。时间和空间不属于生产积累的顺序，而要诉诸于离散、题外话、耗费和对话杂语中。

以其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研究为代表，例如专著《哲学界与乌龟》，庞齐奥再次阐述了“他性”（otherness）、“间断性”（discontinuity）、“自由裁定”（discretion）、“激情”（passion）、“耗费”（expenditure）、“浪费”（waste）、“超科学”（transcience）、“漂移”（drift）、“转变”（shift）、“间歇”（ephemera）这些概念，所有这些概念都用于揭示脱离平等交流逻辑的一场运动。“伟大艺术作品的永恒”（Eternity of great artworks）与“激情的微不足道”（vanity of the passions）的差异正是他质疑的。激情的渺小，即过量逻辑使得艺术变得伟大；所有的叙事，所有以激情为特征的漂移运动中的项目均属于艺术的领域；叙事性的伦理在激情的微

不足道中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叙事性的伦理是激情的伦理。如果艺术品，项目就是内容和行动意义；如果激情是形式，那么伟大艺术作品的渺小便能证明他性，计算的过量和耗费意义上的经济消费的道德。正如作为理性哲学家和强烈情感的专家的康德所声称的那样，不同于即兴、不加思考的情感，激情为实现其目标需要时间和反省。

艺术品证明了能指对平等交流逻辑的抵抗力，这是基于浅薄的个人利益上的身份逻辑。人类学家告诉我们，社会不会只存在于生存层面上：社会再生产总会包含过量的逻辑。列维纳斯在艺术作品的意义上，指出了“作品”（oeuvre）这种现象（巴赫金在这个问题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差异性的基础上才会实现艺术价值，并超越身份、时代和整体的限制而面向他者。外位化、外在性、外位性、过量逻辑是实现艺术价值的条件。

在这个方面，“热情”（passion）这一词指的是过量逻辑；因此庞齐奥将其引入到批判的平等交流逻辑，资产阶级经济、积累逻辑、功能、效率和生产力。受激情影响的主体是一个被动的主体。这一主体被那些观点理解为是消极的，与此相反，那些观点赞扬权威，自主性、活动、意识这些价值观。但确然的人类主体，“主体”（subjectum）的组成是被动的，它遵从“服从于...、依赖于...、对...感兴趣、朝向...”的模式。换句话说，像我们所描述的被动主体，其特征是面向他人，倾听他人和理解他人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超越被负面地理解为无法控制自己，对自己负责，不论在此意义上的任何意图实现自我目标这一主体的“被动主体”（passive subject），存在着另一种“服从于...”（subject to....）的模态。在这种情况下，被动主体不是由意图、意志力，规划能力和控制力来衡量的，相反，它意味着面向他者的机会和可能性，他性和对话主义的能力，过量和倾听。因此，这一意义上的被动性与社会和语言异化的状况无关，与被动服从于外部限制和持无条件接受态度的绝对主体无关。与此相反，根据这一描述，被动性指的是超越封闭身份和个人利益限制的能力；它与概念化为一个可无限查询，有创造力批判力的总体的主体相联系。

顺着这个方向发展话语，庞齐奥介绍了“间歇性”（ephemeron）这一概念，以表示与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占主导的生产力逻辑相对立的确然人的模态。维多利亚·韦尔比（Victoria Welby）将一个与主体性分析中的他者的关系中形成的开放的主体理论化，相对于“标识”（Ident）这一概念，她还引入了自我的“间歇性”这一表达。如我们所描述的，间歇性无法解释和控制积累和消费逻辑，生产和功能逻辑，因此可暗指非异化的自我。间歇性可解释创造力、差异性、自由、确然的人。

间歇性暗指主体性的绝对他性，亦即对社会项目和主导的思想不起作用的权利；在固定的角色、协议、程序的身份下，在与话语顺序相关的承诺下，和官方秩序下，可以成为他者

的权利；间歇是有时间患病、衰老、死亡的权利，有时间建立友情和爱情的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及资产阶级制度价值观的背景下，间歇代表过量和损失；就历史、积累、教化的时间而言，它是必不可少的不连续性、碎片、题外话，在数学意义上的离散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分散是随着共同经历，时间对抗时间一段时期，一段历史的时期。分散的，间断的时间是独立和他性的时间：我自己的时间，不同于你的时间，因此不能以你的时间累积，不可或缺的间断的时间。这种分散是一个间断、一个断裂，是他性和对官方公共秩序抵制的载体。分散也可以在自由裁断的意义上被理解为储备、保密性、私密性。间歇也是分散时间的载体，他人理解的我的时间、他性时间、大相径庭的时间的载体。间歇表示其他人的他性和差异性的状况。

与语言学科的方法一起，庞齐奥提出旨在让科学、教育和社会文化价值遵从于市场等价交换的逻辑和利益的社会项目的批判。当今消费者社会是由生产交换消费周期的狂热节奏调控。而矛盾的是，生产环节持续进行的条件是不连续地、过量地、间歇地生产，庞齐奥将其描述为“驯化”（addomesticated）间歇的状态。与之相反，为克服异化和维护确然的人的正常生活，创造力，差异性，自由，非异化的自我，不同类型的“间歇”（ephemera）对于基于累积和平等交流逻辑的状态是必不可少的。真正的间歇能够扰乱那种逻辑并难以驾驭这样的逻辑。这样看来，间歇表示有节奏的经济的主体，欲望，紊乱，最终走向死亡的使命，所有这些都抵制由特定社会秩序建立的生产力逻辑，效率和功能。

“间歇”这一概念与他性相联系，与在由身份和自身利益逻辑规定的角色和协议中，在话语秩序中可以成为他者的权利相联系。间歇代表在由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价值观统治的社会再生产体系中的过量和损失；就历史，累积，教化的时期而言，间歇是不可或缺的不连续的，分散的，题外的，自行决定的状况。

与他对身份的批判一脉相承，庞齐奥强调，忽视符号活动过程的非功能性方面，就等同于忽视符号的他性。功能性的符号活动是身份的符号活动过程。对身份有作用的，在不同于其他，立足差异，将符号降为信号状态的符号意义上差异的符号的活动过程。但符号活动也指在他性逻辑控制的延展和回归上的差异。他性和非功能性的逻辑是符号的一部分，使得符号活动免于被降为基于经济意义上的回报和收益逻辑的双向过程。相反的是，符号活动是一个对他者不可逆转的过程；符号和符号活动的任务是他性。因此，受规定的符号活动超越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平等交流的逻辑，并在过量逻辑上无对照物，无回报的消耗上表达出特定的符号性。如此描述的符号性不能被化约为由信号控制的符号过程的状态。否则，符号解释将不仅仅涉及解码和认同的过程。与此相反，识别非功能能力的符号特殊性和他性意味着



将符号置于从一个符号解释项到另一个无限延展的符号链上。这样开放的逻辑，确切地说是直径逻辑认为符号和符号关系是由创意逻辑，或具体而言，是为回应理解的直径逻辑确定了方向。

当今全球化世界的通讯是通讯生产，是对控制社会再生产的意识形态反应后而进行的交流。全球化时代的通讯不仅是扩展到整个地球的世界通讯，而且它还容纳了世界，呈现为世界上无可厚非的一个功能。在此背景下，“世界”被理解为时空的自体，个人和集体的身份，存在物，接受极端战争观点的政治的现实主义。

与庞齐奥对身份逻辑的批判和沿袭列维纳斯和他的现象学的分析一致，他把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各种联系进行主题化，即世界、叙事、历史、时间、身份、主体、自由、工作、目的性的捐赠意义、个性、差异-相同、利益、福利、本体论、真理、力量、理性、权力、商品工作、生产效率、政治和战争的各种联系。此种联系一直被资本主义利用并被其扰乱，时常发生冲突，甚至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程度更甚。为一己之私利用他人的世界，为捍卫身份的权利和自我利益，为了身份不惜牺牲异他性的世界，甚至认同战争合理性的政治有利于保障人类存在及身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和平不过是片刻的安宁，稍作缓歇是为了更好地整装再战，就像在夜晚和空闲时间，休息有助于更好地回归工作，更好地为日常必需品打拚奋斗，对这样的世界，庞齐奥探究了建立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但都有着相同的物质和世俗秩序的各种关系的可能性。

对确然的人的追踪在本体的时空之外。它属于人际关系不能被化约为身份的范畴，弱化为预定义的主体和对象间的关系，或贬为交换、平等、功能、效率、自我利益间关系的一个维度。庞齐奥在超越存在和列维纳斯称之为“存在之外”（*otherwise than being*）的维度上探索回应的可能性。与“别样的存在”（*being otherwise*）相反，“存在以外”（*otherwise than being*）这一表达指的是本体论和世界本身的外部。与世界意义不同的意义维度上，这是一个对世界的世俗超越的问题。与同一性的人文主义不同，在他性逻辑，异他性的和存在之外的人文主义的基础上，人文主义的另一种形式是可能存在的。

庞齐奥把列维纳斯发展的“存在之外”（*otherwise than being*）的概念与巴赫金的对话概念联系起来。对话不应被理解为形式上的对话，即不同交谈者在一个地方相遇后进行观点的交流。也不该被理解为在统一体中可代替的辩证的矛盾。相反，此处的对话应理解为对他性的解释，形体间的存在，与他者的参与合作，是指单一差异关系而非是同一的关系。庞齐奥形成了他对当今全球化的通讯生产系统的批判，同时一方面解释了列维纳斯存在之外的存在主义维度，另一方面也分析了巴赫金大时代的外位化维度。

## 五、总体符号学，“去总体化”方法和伦理符号学的视角

从目前为止所阐述的内容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庞齐奥符号学研究的一项重点是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和符号与生命、符号学科与生命学科、符号学与生物学的关系的主题化。近年来，在西比奥克开创性的努力付出和他的总体符号学的见解的贡献下，生物符号学已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庞齐奥尤为感兴趣的是西比奥克对地球上的符号活动与生命的相关性和模塑概念的解释。他以对话主义和形体间的存在于“符号活动的”（semiosic）和“符号的”（semiotic）层面上发展了西比奥克的相关理论，同时也回顾了巴赫金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对生物学的兴趣。事实上，总体符号学研究的对象或生命符号学是生物符号学的范畴，庞齐奥将其分析为一个去总体化的总体。

尽管在对话主义和对生物符号学至关重要的模塑概念上很容易就将不同的术语联系起来，皮尔斯、巴赫金和西比奥克都围绕符号开辟了不同的研究路径。庞齐奥则不可避免地将研究视线转至雅各布·冯·尤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的生物符号学的“功能性循环”（functional cycle）和对话与交流的关系。从生物符号学角度理解的对话主义与相联性、相关性、形体间存在的概念重叠，并预测了他性关系。

根据尤克斯库爾的观点，非人类生物与环境界的关系是稳定的，关注的是整个物种，相比之下，人类与环境界的关系发生变化，并且关注的是单个个体，其中有利有弊。由于“符形学”（syntactics）是人类内在的，特别是模塑模型，相对于特定历史的社会背景，人显然能够进行构造，解构和重构基于有限元素基础上无限多的世界和世界观，这是一种人区别于动物的能力。因为符形学，人类能够探究环境界。正如人类能建造自己的世界，他也能使其濒临灭亡，毁灭它，甚至发展到危及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的地步。对符号的反省能力是人类特有的，以负责任的能力为基础。这些议题把对符号的反省转移到伦理符号学的方向上，从我2010年的著作《总体视角下符号学的岔路口：符号学与责任》（Sign Crossroads in Global Perspective. Semioethics and Responsibility）的标题中可见一斑。

生命学科的一个共同的兴趣点连接着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视角和巴赫金的对话主义。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和巴赫金的对话主义都能在生物学中找到基础。就像是巴赫金撰写了一篇当代的生机论的文章，但为求可信度署上生物学家卡纳耶夫·伊凡（Ivan I. Kanaev）的名字。无论如何，暂且不谈著作权的问题，庞齐奥坚持认为通过阅读巴赫金和西比奥克的相关研究，对话主义可以延伸到超出人类符号学的领域，并且与模塑一起被主题化为生物圈中所有相对的交流过程。这与西比奥克符号学的皮尔斯矩阵并不矛盾，因为对话的概念同样也

在皮尔斯的思想体系的整体架构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

西比奥克对当前符号学在全球的地位或“符号学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相比更为崇高的“科学”（science）和“理论”（theory）这两个术语，他更喜欢发展自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符号学说”（doctrine of signs）这一表达。约翰·洛克认为，一门学说，是一系列大体形成一个知识领域的原则和观点，随后，包括在这一传统表述上伯克利（Berkeley）接着是皮尔斯就代替了他的观点。庞齐奥继续采用西比奥克的方法和范式进一步跨越到伦理的范畴中。换句话说，生物符号学投影到哲学伦理学的领域，反之亦然。这在《当代符号学：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一个对话的回应》（Semiotics Today. From Global Semiotics to Semioethics, a Dialogic Response）（2007）一书中也清晰地阐明。此书由马塞尔·达内西（Marcel Danesi）作序，保罗·科布利作引言。正如达内西所说，该书的关键问题在于生物符号学是否能在抽象的智力层面上用来统一身体和心灵，是否能想向拥有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显示他们是如何通过符号活动紧密相连的。就保罗·科布利本人的观点而言，他在引言中指出一个符号意识不仅对于理解当今世界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它对地球的未来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都需要我们反思现今符号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与基因工程、神经生物学、药物研究等领域的生物医学发现相联系的伦理问题在伦理符号学中能找到统一且关键的观点，在伦理符号学中，它们是承认符号与人类符号活动中的价值不可规避的关系的符号研究的对象。但甚至在伦理符号学主题化的阶段之前，庞齐奥在另一本合著的意大利语专著《全球通讯感知》（Il sentire della comunicazione globale），2000参见 Petrilli, ed., 2014）中指出，伦理问题是导致产生了那些相同问题特征的两个总体中一部分，一个总体是生物符号学领域；另一个是全球通讯，这样的表达描述了当今社会再生产系统。伦理符号学贯穿其重要且基础的哲学方向，为充分解决焦点问题引入这种双重的语境化。

总体符号学提供的语境有利于在伦理符号学探索的中心上更好地理解问题。这里所指的不仅是语境的范围与数量方面，也包括质量方面。关于最后一点，“语境”（contextualization）是指关键的重构。总体符号学为伦理符号学提供一种基础性的和关键的方法。除了现象学和本体论顺序的双重语境之外，如果伦理符号学的相关问题要得到充分解决，其他类型的语境也是必要的。此处所指的是社会经济秩序的语境，具体而言是当今全球通讯生产的世界。

今天伦理符号学的任务是要从伦理的角度证实不同语境间的关系。今天，符号学与总体符号学或生命符号学都要承担起谴责不适宜全球发展的行为和任何威胁地球固有生物的生命责任。笔者在现今符号学研究中形容为“伦理符号学的机会”（semioethic turn）（参见

Petrilli 2010, 2012) 是对西比奥克总体符号学在符号与价值的关系, 把人看作是符号动物的责任问题这个特殊兴趣的发展。

## 六、哲学见解和政治视角

正如庞齐奥在《不人道的人类》(Umano troppo disumano) (Athamor 2007 年 8 月) 一书中所见的那样, 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和其全球通讯生产体系中的“破坏性角色”(Walter Benjamin) 已经扩展到了全球范围。毁灭与身份逻辑和对它的热衷相联系, 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身份, 即使是战争的代价, 需要归属于一个社区或与他人进行联合, 愿意捍卫和传播自己的“生活方式”(lifestyle), “主体性的崛起”(rise of subjectivity) 及对其需求的夸张, 技术进步、工作改良、商品增多、生产效率的提高, 主张在“失业的工人社会”(society of workers without work, 参见 Hannah Arendt) 的时期, 除却其他因素, 只以工作为依据将社会分解为社区。无论是对单个个体或集体身份如一个社会共同体, 历史语言或某种形式的文化表达, 在被认为与他人的孤立中, 在与主导的意识形态趋势一致的组合的冲突关系背景下, 身份不仅是虚假的, 而且还十分危险, 极具破坏性。

当今哲学的主流趋势, 当代的哲学理念, 现实的哲学都认可“理性的, 政治的”(rational and political) 动物般逆来顺受地适应并适应和屈从于残酷的现实法则, 甚至可以同意极端的战争。这种方向是我们这个时代典型的同样是破坏性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宽容的人文主义”(tolerant humanism) 面具的伪装下, 他者的差异性、他人, 被设想为“孤独主体”(lone subject, 参见 Levinas) 的线性时间本身的流逝所隐含的差异性, 同步的他性, 历史的他性, 存在的他性, 总体化意识的他性, 这些他性一直都遭到否认。“同一性的人文主义”(humanism of identity) 只会被“他性人文主义”(humanism of otherness) 所抵消, 后者是包括他者“人权”(human rights) 的人文主义的一种形式。他性人文主义蕴涵着一种倾听的态度, 是为他者花费的时间。他性人文主义明白现在从工作中分出的可用的时间是给他者, 自我的他者, 他者的他性的时间。如此设想的时间便构成了我们“真正的社会财富”(real social wealth), 正如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中所提的那样。

庞齐奥的作品中对马克思的引用比比皆是, 准确而言, 如恩岑斯贝格尔(Enzensberger) 所述, 就是声称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个马克思。笔者尤其想指出, 正是庞齐奥把马克思的数学手稿由德语翻译成意大利语。虽然他有生之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相关研究, 他曾在人生的最后两年呕心沥血地研究这些手稿, 以期在马克思之后的数学研究进程中证实形成的解决方案和解释。

对符号和价值的重视就是重视符号活动的伦理、实用和关键的方面，继而是关注符号学的主题性和投射性的方面。所谓的巴里-莱切学派建议在这个方向上研究符号学。这个学派是以庞齐奥为首的，并受到庞齐奥新颖独创的学术作品中的启发，被他致力于旨在解决生活质量问题相关的科学研究的坚定决心所激励。《符号学未来的论文研究》（*Tesi per il futuro anteriore della semiotica*）（2006）界定了我们研究项目的方向，即符号学的未来是今时今日的当前世界。这种说法在作者的2014年《符号学和伦理符号学》（*Sign Studies and Semioethics*）一书中进一步深化。

“符号学”（*semiotics*）这一术语不仅是一般符号科学的名称，它还指人类为了对符号进行反省并采取相应行动而使用符号的特异性倾向。强调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没有哪个时期比当下这个时代更应该对未来负有责任，更有能力使未来的可能性置于危急之中。当今世界是对关乎整个地球所有符号生命和有生命的符号的命运进行决策的时间和空间。

从地缘政治的观点来看，当今世界的格局是身份的对立关系最终是战争的结果。正如庞齐奥在合著《战争世界》（*Mondo di Guerra*）（Athamor, 2005）向我们提醒的那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国家、社区、国家联盟不是战争的结果。所有的世界秩序都是战争裁定的。和平是为了战争的和平，战后的和平，是通过战争建立的和平。战争建立边界，接着以边界为名，不断再扩边界。维护和平就是通过战争来维护世界秩序。由此看来，维护和平是维持战争。

庞齐奥认为有效和平的方向不同于习以为常的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战争的人文精神；不同于战争的和平和有和平感的和平；简而言之，真正的和平不同于以和平为特征的世界，这世界正如它本来的样子：遍野墓地的和平景象。

沟通的前提是对他者，对交谈者的主动态度。书面或口头的一句话传递给了他者，传递给了他者的他性，这句话就处于面对面关系的语境中，因此不具代表性的也不能被主题化。倾听他者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因为它们与世界、世界本来的样子、存在、工作的世界，支持战争观的工作-商品的时期相关。与只会造成“无穷无尽的战争”（*infinite war*）的“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相反，倾听是真正的预防性和平的条件。

通过他在语言哲学、符号学和语言学上的研究，庞齐奥形成了用于他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持续讨论至关重要的方法论工具。符号和语言理论与他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批判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研究与罗西-兰迪和亚当·沙夫密切相关，实际上，他已有大量的专题研究分析他们的理论。为了更好地，科学严谨地理解全球化的社会，反思当下的社会政治问题只能从符号学科所从事的符号和语言研究中获益。

庞齐奥在他题材广泛的著作中展开了身份的批评。基于身份逻辑的所有组合形成某种社区，在这个社区中、种族、性别、民族、社会与他人建立了相互对立的关系即白人与黑人，男人与女人，丈夫与妻子，社区成员和外来成员，同胞与外国人，教授与学生……正如所有的这些总体，这些组合的形成是通过认可组成它的，牺牲他性的不同元素。正如他在 1995 年《通讯，迁移，战争》（*La differenza non indifferente. Comunicazione, migrazione, guerra*）（new edition 2002）证明的那样，差异取消了，使得统一形成与其他组合和社区建立对立关系的组合。这种对立关系是维护一个社区相对其他社区特有的差异的必要条件。

作为一个名词，“军服”（uniform）这个词是军事语言的一部分，类似于名词“将军”（general）和“官员”（official）。这三个词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一个社区、一个流派中的统一性的一般价值相联系，并服从于那个社区的官方话语。因为它们是基于差异和对立，所有类型，所有的身份被装进一套统一的军服里；这涉及到招募、对冲突的预计和武力的召唤。基于身份的差异，是组合的特征的差异涉及消除与单一性，同一，非对立差异相连的其他类型的差异。单一独特的差异性，基于他性逻辑的差异性，外在的身份，外界流派，自成一格，非互换性差异都是同一的差异，非对立的差异。以同一的差异为导向的他性类型是非相对的他性即绝对的他性。这特别是对单一个体的他性，而不是相对另外一个的他性，不是皮尔斯置于第二性的“相对他性”（relative otherness），而是皮尔斯置于第一性和新生性的“绝对他性”（absolute otherness）；这是处于不能被替代、互相同化的单一体关系中的他性。

紧随列维纳斯和他 2009 年在《倾听他者》（*L'Ecoute de l'autre*）中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分析，庞齐奥回归到列维纳斯主题化为面到面关系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也就是一种单一体间的关系、单个对单个的关系、独特对独特的关系。面对面的关系拒绝排斥他者和暴力的所有形式。这种关系的先决条件是交流和再现的所有形式，他者的对象化和提出的所有形式。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不可逆转的。在这种关系中，自我在绝对意义上对他者负有责任即无借口地负责（Bakhtin），没有逃避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惠及他者，及对他者的回应。

这种异他性关系是话语或言说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一个字里，我们可能会察觉另一个字的存在，这使得这个字在进行内部对话。自己所说的一个字尽管以它可能知道或不知道的方式，往往却指的是另一个字的意思，一个在绝对他性，他者中的字。字词偶然同义并不是它本身自觉为之。如上所述，这个字是对话式的因为它与其他字不可避免地牵连到一起，对话不是我们所选择的；相反，我们遭受对话的折磨，并受制于它。

庞齐奥在语句研究中表现出的其他问题包括语句与沉默的关系，语句和倾听的关系。庞齐奥探讨倾听和他所说的“缄默”（taciturnity）的艺术。最重要的是，他概述了相对于“沉默

的语言学” (linguistics of silence) 他所谓的“无言的语言学” (linguistics of taciturnity), 其中“沉默” (silence) 指没有倾听, 缺乏对他人语言的热情, 同时也指出了当今全球化世界中交流的特征: “沉默的语言学” (linguistics of silence) 和“沟通的沉默” (silence of communication)。自由且不带偏见的倾听意味着字间的邂逅, 但这个字不是一个人拥有、打断、占据、回溯或传递的字, 其意义可用意大利语理解为: “信守诺言”(mantenere la parola), “缺字”(mancare di parola), “说话”(prendere la parola), “回到他的话”(rimangiarsi la parola), “把握意义”(afferrare il senso); 如庞齐奥所描述的, 倾听意味着将字从被迫适应身份而存在的共同场域即沉默之地中解放出来。文学语言中的字在最大程度上实践了他性关系和倾听的做法。文学写作将字从身份逻辑和自身利益, 继而从有借口的责任的局限中释放出来。

他性问题与外来性(怪异 *étrangété*) 问题是分不开的。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者的问题就变成了外国人, 陌生人, 外星人的问题, 关系到他者语言的问题, 因此同样也是翻译的问题。在这个方面, 庞齐奥与布朗肖(Blanchot)、巴塔耶(Bataille)、巴尔特、德勒兹、德里达(Derrida)、克里斯蒂娃与这些作者都进行了交流。他这个特殊的研究思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陌生和外来性的状况, 这种状况不仅与一门外语而且重要的是与自己所谓的“母语”(mother-tongue) 相关。外来性作为确然的人的条件出现。它同样也是共存, 共有的生活, 共同生活形式的条件。此处的共同生活总体而言不同于目前存在的社区的所有形式, 它建立在自身利益的基础上, 其中, 每个单一个体只有在产生有益成果, 有职业谋生, 为社区服务的条件下才会被纳入考虑范围。相反, 植根于外来性, 关于外来人的(extracommunitarian) 共同生活被描述为一个额外的, 空前的, 闻所未闻的社区, 在这个社区里, 他者是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

作为一个临时的结论和综述, 保罗·科布利在 2010 年《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中深刻地分析了庞齐奥, 我仅以该书的条目为这篇简短的介绍作结:

奥古斯托·庞齐奥生于 1942 年, 系巴里大学的符号学家。庞齐奥是一位著名的理论家, 特别是在对话, 异他性, 主体性和全球通讯领域。他因与沙夫、列维纳斯、巴尔特、克里斯蒂娃、巴赫金、西比奥克和罗西-兰迪的合作, 友谊及相关人物的分析著作而闻名。他也有关于皮尔斯、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马克思和西班牙的彼得的著作。他曾与包括朱莉娅·庞齐奥(Julia Ponzio)、科西莫·卡普托(Cosimo Caputo)、马西莫(Massimo Bonfantini)、尤其是与苏珊·佩特里利(Susan Petrilli) 等众多学者进行合作研究。

尽管他在众多兴趣领域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可以说，他思想的核心在于一个单一的概念：不是作为自主的，而是作为一种持续的需求的对话。这是一个对话的概念，在不断超越折中的自由观念即谈判和妥协的观念上，对话概念实际上是反对这样的实施方案，在对话中认可强迫和需求而不是自我识别的善意。这种对话的框架当然是由巴赫金提出的；正如庞齐奥和佩特里利简洁地表述所言：

巴赫金认为对话不是我们决定采取主动性举措的结果，它是强加于人，而人为其所困。对话不是向他者开放的结果，而是不可能将其封闭的无奈之举。（Ponzio and Petrilli 1998: 28）[符号研究的标志，可访问网页 [www.augustoponzio.com](http://www.augustoponzio.com)]

但在庞齐奥之后，要是认为对话仅仅是巴赫金和列维纳斯的精妙阐释便大错特错。正如庞齐奥所说的，对话不应该被看作纯粹为自我肯定而服务：

相反，如列维纳斯提出的，对话是不可能逃离他者的被动见证；它被动见证了一个无法避开他者的事实，见证了除了被要求对他者负责为他者考虑的主体采取的主动性，同他者牵涉到一起的状态。在对话证明了他性（他者的或自我的）关系的意义上，“我”（I）是组成式结构式的对话。（Ponzio 2006c: 11）[被质疑的我：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和西方理性批判，可访问网页 [www.augustoponzio.com](http://www.augustoponzio.com)]

对庞齐奥而言，对话提供了一个尤其是在全球通讯时期下解决交流和本体关系的关键性的工具。

在吹捧资本主义包容性中，世界已陷入显而易见的资本主义自身的排斥逻辑中。这一点，在全球通讯中清晰可见。资本主义所压制的并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是他作品中所表现的对话的强制性。受西比奥克的启发，尽管在他形成的“传播生产”（communication-production）中认为应对全球传播事关紧要的利益摆在重要的地位并且它已潜在地破坏着地球，庞齐奥在总体视角下观察并非固定于人类符号学的符号活动。就理论而言，庞齐奥认为坚持符号活动扩展到更大领域是有必要的。主要受《符号的自我》（Semiotica dell'io）（Sebeok et al. 2001）中西比奥克对符号自我的分析的启发，庞齐奥没有停止纯粹的社会观察。相反，他在研究中深入地分析在对话被重复阻挠的沟通过程中所有物种的全部行为的符号过程。虽然全球通讯



的暴君统治和其在“通讯生产”（communication-production）的孵化是庞齐奥的研究缘由，他也从非语言交流的否定中确定了对话的一般性压制。

庞齐奥对“身份”（Identity, 参见 Ponzio 2006c）类别的批判揭示了“对自我的关爱”（care of the self）事实上只能产生于对话的“对他者的关爱”（care of others），其中“他者”（others）必须意味着符号域的整体。在这个意义上，庞齐奥就不得不勾勒出未来伦理符号学的轮廓。(PC)

基于此，对庞齐奥的传记文献的顺序进行排列的考虑是有道理的。自1980年以来，他是语言哲学和普通语言学系的全职教授，自1980年起任意大利巴里阿尔多莫罗大学的名誉教授，在那里，他将其毕生所学传授于莘莘学子。庞齐奥从事教学活动，研究和写作的时间超过50年，并继续他的博士研讨会和阶段性的出国讲学。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语言哲学，普通语言学，符号学，文学理论。他从1966年开始讲授理论和道德哲学，1970年教授语言哲学，1995年至1997年教授符号学，1997至2001年讲授文本符号学，1995年至1998年讲授通讯原理，1998年除了坚持语言哲学的讲授外，另外还开设了大众媒体的普通语言学和符号学这些课程。

他于1981年在巴里阿尔多莫罗大学外国文学和语言系创立了语言哲学研究所，1999年之前为研究所所长。1999年，他创办的语言学实践和文本分析系，2005年前担任系主任。并于1988年引进了一个博士项目“语言理论与符号学科”并至2012年以前担任该项目的主持人。

他于1990年与海法大学克劳德·甘德尔曼（Claude Gandelman）创办了最初的年刊《艺术、文学、符号学、哲学》（*Athantor, Arte, Letteratura, Semiotica, Filosofia*），随后自2014年起作为系列丛书出版。“熔炉”（*Athantor*）是一个阿拉伯词，它让炼金术士在实验室里将混和的所有元素冶炼成金。除了意大利的出版商如米兰的邦皮亚尼（*Bompiani*），佛罗伦萨的“新意大利”（*La Nuova Italia*）、巴里 - 罗马的拉泰尔扎（*Laterza*）、米兰的拟态（*Mimesis*）合作之外，庞齐奥还出版了多种语言的著作，合作的出版商还有柏林的德古意特（*Mouton De Gruyter*），阿姆斯特丹的约翰·本杰明（*John Benjamins*）、巴黎的哈尔马丹（*l'Harmattan*）、马德里的（*Catedra and Corazon*）、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视野（*Nueva Vision*）、加拿大的巴尔扎克出版商（*Editions Balzac*）、萨格勒布的克尼加（*Skolska Kniga*）、渥太华的莱格斯（*Legas*）、伦敦的偶像图书（*Icon Books*），巴西圣保罗的文本（*Contexto*）、

巴西彼得罗波利斯的 (Voze) 、巴西圣卡洛的若昂出版商 (João Editores) 。作为翻译家和编者, 他为把列维纳斯、巴赫金、亚当·沙夫、罗西-兰迪的思想传播到意大利和国外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第一部关于上述思想家的专著分别是: 1967 年对列维纳斯分析的《人际关系》(La relazione interpersonale), 1974 年《亚当·沙夫研究的人, 语言和知识》(Persona umana, linguaggio and conoscenza in Adam Schaff), 1980 年《巴赫金, 俄罗斯符号学的起源》(Michail Bachtin. Alle origini della semiotica sovietica), 1988 年《罗西-兰迪和语言哲学》(Ferruccio Rossi-Landi and la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每本著作一经出版后均会再出增订版。

此外, 庞齐奥也推动了巴赫金和巴赫金一派的大量研究作品的意大利语的翻译工作。其中包括瓦伦丁·沃洛希诺夫, 帕维尔·梅德韦杰夫 (Pavel N. Medvedev) 以及生物学家伊凡。他也推动了意大利的马克思研究, 于 1975 年出版了意大利版的马克思的数学手稿 (扩大修订版 2005) 。

此外, 庞齐奥为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在意大利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除了在我所在系部的赞助支持下, 西比奥克多次访问巴里大学与师生见面交流的工作以外, 庞齐奥还发行了几本西比奥克专著的意文翻译版, 并与本人合作撰写了两本研究西比奥克思想的专著, 其中有 2001 年的《西比奥克与生命符号》(Sebeok and the Signs of Life); 2002 年的《符号与生命: 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I segni and la vita. La semiotica globale di Thomas Sebeok); 第三本是 2004 年与笔者, 马塞尔·达内西合著的《总体符号学, 符号中的身体: 走近西比奥克》(Semiotica globale. Il corpo nel segno: introduzione a Thomas Sebeok)。此外, 庞齐奥于 2001 年与西比奥克, 笔者合著了《自我的符号学》。

对于其他意大利学者, 庞齐奥特别关注他的导师、哲学家朱塞佩·塞莫拉里 (Giuseppe Semerari) 的著作, 以及哲学家、符号学家罗西-兰迪和哲学家数学家乔凡尼·瓦伊拉蒂 (Giovanni Vailati), 皮亚诺 (Giuseppe Peano) 的学生。自 1988 年第一本关于罗西-兰迪的专著《罗西-兰迪与语言哲学》之后, 庞齐奥与邦皮亚尼和马尔西利奥 (Marsilio) 已再版了罗西-兰迪的作品, 约翰·本杰明出版了英文作品集《符号与非符号之间》(Between Signs and Non-signs), 并且在 2008 年出版了他关于罗西-兰迪的第二本专著《语言、工作和全球市场: 重读罗西-兰迪》。

作为对话词符号学特点及其与意识形态关系——并最终表现为符号、价值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 尤其关于罗西-兰迪和他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研究的一部分, 庞齐奥在与国际罗西-兰迪网站和国际符号学研究协会的合作下, 于 2002 年 11 月 14 到 16 日在巴里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举办了致力于探讨罗西-兰迪符号学当今价值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此次学术讨论会

的一系列成果于 2004 年作为《熔炉》系列丛书的一卷出版，标题为《非物质劳动》（Lavoro immateriale），来自国内外的发言人为之贡献良多。自罗西-兰迪于 1985 年过世后，庞齐奥就不断地推广他的研究，再版其著作，建立了作为国际符号学研究协会和罗西-兰迪网站一部分的上述的罗西-兰迪网络，此外，还做了大量的与之相关的公共讲座，组织了多场探讨罗西-兰迪的会议和探讨会。

罗西-兰迪与邦皮亚尼于 1978 年出版了作为艾柯主编的系列丛书《现场符号学》（Il campo semiotico）中的《符号学和意识形态》（Semiotica e ideologia），在庞齐奥的推动下发行了第五版（2012），最近庞齐奥于 2012 年 4 月在撒丁岛的卡利亚里大学开设了关于罗西-兰迪的系列课程。课程涉及的主要议题包括：1. 符号与意识形态的关系；2. 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系统关系中的社会再生产；3. 社会规划与全球通讯；4. 语言学与经济学的关系；5. 对通讯生产的批判；6. 罗西-兰迪的语言、模塑和沟通。

2005 年 12 月 13 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庞齐奥被匈牙利符号学协会授予荣誉证书，推举“奥古斯托·庞齐奥博士教授”为荣誉会员，特别表彰他在纪念，延续已逝的罗西-兰迪的社会符号学活动上取得的重大成就。该证书由秘书长盖佐·巴拉兹（Géza Balázs）和协会主席维尔莫什·福格特（Vilmos Voigt）签署。

近年来，庞齐奥的几本翻译著作和葡萄牙语原著在出版商瓦迪米尔（Valdemir Miotello）的积极支持下都已出版，该出版商是巴赫金的推崇者，巴西圣保罗卡洛斯大学的教授。2010 年 10 月和 11 月，庞齐奥应邀开设关于巴赫金及该派别的系列课程。之后在 2012 年 3 月在圣保罗卡洛斯大学，位于坎皮纳斯的坎皮纳斯州立大学，位于阿拉拉夸拉的圣保罗州立大学也开设这一课程。在巴西同事的要求下，课程集中于巴赫金和其派别，他的语言哲学，符号学、语言学、伦理学和美学理念，特别是关于意义、价值、责任和艺术话语的问题。这些课程是围绕以下大致的标题组织进行的：“关于巴赫金构建新世界的研究：共同生活”；“巴赫金和其派别分析人文学科和对话科学的新方法的作品”。所提到的讨论主题包括（译自葡萄牙语）：1. 引文、意译、戏仿、解释和翻译中自我的他者的文字；2. 文学的话语体裁和社会学科；3. 乔姆斯基的语言学、政治经济与社会意识形态；4. 人文学科和文学写作中他者的文字；5. 符号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科中他者的文字：巴赫金、维果茨基（Vygotsky）、洛特曼（Lotman）、普罗普（Propp）、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福柯.....；6. 文学写作和倾听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坡（Poe）、阿尔托（Artaud）、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帕索里尼（Pasolini）、列维纳斯（Lévinas）、德里达.....；7. 全球通讯语言的伦理符号学；8. 回应他者的伦理：巴赫金、布伯（Buber）、列维纳斯；9. 道德责任与政治责任；10. 构

建新世界同时性语言中的对话与复调：共同生活；11. 言语创作的美学；12.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3. 马克思主与语言哲学；14. 文学与美学的问题；15. 弗洛伊德主义；16. 负责任行为的哲学；17.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流行文化；18. 言说的结构；19. 模塑与写作；20. 怪诞的身体和社会秩序的批判。

在英国伦敦城市大学的保罗·科布利主编的邀请下，庞齐奥的作品《被质疑的我：伊曼纽尔·列维纳斯与西方理性批判》（*The I Questioned: Emmanuel Levinas and the critique of Occidental reason*）作为《主体问题》（*Subject Matters*）（vol. 3, 1, 2006）特刊的卷首发表。该卷以书的篇幅包含了庞齐奥关于列维纳斯的研究，大量学者写的一系列关于对庞齐奥所分析的列维纳斯的观点进行讨论的论文紧随其后。这本文集包括以下内容：亚当·扎卡里·牛顿（Adam Zachary Newton）的《我的自我的双重解答》（*The I's double-answer*）；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B. Smith）的《理性与本土他律的批判》（*A critique of reason and autochthonous heteronomy*）；罗伯特·贝尔纳斯科尼（Robert Bernasconi）的《身份的倒戈》（*The defection of identity*）；格雷厄姆·沃德（Graham Ward）的《自我放空和类比的问题》（*Kenosis and the problem of "analogy"*）；罗杰·布格拉耶夫（Roger Burggraeve）的《从自我到他者再回归自我，列维纳斯重新定义的主体》（*From the self to the other and back to the self – otherwise. Levinas' redefinition of the subject*）；贝蒂娜·贝尔戈（Bettina Bergo）的《身份：逻辑与文化的对抗，基于魁北克的一些言论》（*Identity: logic vs. culture, some remarks on Québec*）；威廉·保罗·西蒙斯（William Paul Simmons）的《具体的抽象体和“人的权利”》（*Concrete abstractions and the "Rights of Man"*）；最后，安妮特·艾若诺威克斯（Annette Aronowicz）的《列维纳斯与政治》（*Levinas and politics*）。整个合集由保罗·科布利作序。

我们可看出庞齐奥的作品是从伦理符号学的角度解决逻辑，意识形态和对话主义的问题，意在突出他研究主题性，投射性的方向，笔者在国际符号学协会的支持下推动并组织了“逻辑、对话主义和意识形态”（*Logica, dialogica, ideologica*）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于2002年2月13日至16日在巴里大学举办，旨在庆祝庞齐奥的60大寿。该讨论会的研究结果于2003年发表在笔者和凯利法托（P. Calefato）编辑的《逻辑，对话，意识形态，功能和过量之间的符号》（*Logica, dialogica, ideologica. I segni fra funzionalità ed eccedenza*）（*Mimesis, Milan*）上。与讨论会相关的是，同时参会者的贡献远远超越了会议本身，另一家国际编辑企业也为了庞齐奥于2004年出版了题为《伦理符号学视角下的意识形态，逻辑和对话》（*Ideology, Logic, and Dialogue in Semioethic Perspective*）（148-1 / 4, edited by myself）的《符号学》特刊。此卷呈现了众多学者的贡献：卡塞尔大学的温弗里德·诺斯（Winfried Noth）；

维也纳大学的杰夫·伯纳德（Jeff Bernard）和格洛里亚·维萨尔姆（Gloria Withalm）；圣保罗大学的露西亚·圣埃利亚-布拉加（Lucia Santaella-Braga）；瑞典隆德大学的戈兰·桑尼逊（Goran Sonnesson）；宾州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文森特·卡拉皮埃托（Vincent Colapietro）；德克萨斯圣托马斯大学的约翰·迪利（John Deely）；瓦伦西亚大学的朱利亚·科拉伊奇（Giulia Colaizzi）；蒙特维的亚大学的丽莎·比哈尔（Lisa Block de Behar）；苏黎世大学的克里斯汀·永贝里（Christine Ljungberg）；勃艮第大学的尼古拉斯·博内（Nicolas Bonnet）；多伦多大学的马塞尔·达内西。这项倡议最先是西比奥克策划并至 2001 年离世前担任主编。

由笔者 2007 年编辑的双语卷和《倾听艺术的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 as the Art of Listening*）中是一本关于庞齐奥科学研究的论文集，同时多位学者也为之作出了贡献，包括保罗·科布利，朱塞佩·米宁尼（Giuseppe Mininni），文森特·卡拉皮埃托，埃罗·塔拉斯蒂（Eero Tarasti），马塞尔·达内西，卡莱维·库尔（Kalevi Kull），弗洛伊德·梅里尔（Floyd Merrell），温弗里德·诺斯，露西亚·圣埃利亚，科西莫·卡普托，约翰·迪利，弗兰克·尼塞尔（Frank Nuessel），克劳德·甘德尔曼，拉蒙·阿尔瓦拉多（Ramon Alvarado），霍斯特·鲁斯罗夫（Horst Ruthrof）。2008 年由笔者再次主编的另一意大利文集也相继发表。

2010 年，保罗·科布利撰写了关于庞齐奥研究条目的《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书中他恰当地强调了对话，他性，沟通和人际关系这些庞齐奥研究中的重要话题。

为庆祝庞齐奥 70 大寿（2012）的另一本由笔者主编的题为《写作、声音、事业》（*Writing, Voice, Undertaking*）的著作于 2013 年出版，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八十位学者贡献的作品。通过阅读庞齐奥的作品，作者们从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利益着手，解决与沟通，阐释，翻译，批判相关的主题和方法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作为符号学批判的后者在它们的符号共同利益中结合了历史，文学，哲学，社会学以及经济政治的批判。与此同时，符号学批判也是对包括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在内的伪科学专长，偏见和意识形态分离的所有形式的批判。

作为对研究兴趣和名称语言总结的一种方式，即使这种方式是暂时和零碎的，下文是庞齐奥的研究领域，主题和至今其创作过程中他所关注的作家的一个综合列表。他的作品本身就是构成一个个研究路途中的里程碑的不同文字，不同声音和名称之间发生对话的结果。

**领域：**哲学、符号学、语言学、经济学、逻辑学、艺术、文学、文化人类学、心理语言学、精神分析学、建筑学、艺术话语——音乐、戏剧、电影、绘画、设计、漫画和连环画。

**主题：**涵义、意义、指称物、解释项、言语和非言语符号，人际关系、对话、辩证法、责任、非功能性、单一性、人本主义、他性、人类法则、通讯生产、政治经济的批判、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微分学、句法、语义学、语用学、隐喻、翻译、语言起源。

**作者和作家：**阿里斯托法内斯（Aristofane）、阿尔托、巴赫金、贝内（Bene）、本杰明、巴尔特、巴塔耶、布朗肖、博尔赫斯（Borges）、乔姆斯基、德勒兹、德里达、福斯科洛（Foscolo）、福柯、弗洛伊德、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莱奥帕尔迪（Leopardi）、列维纳斯、曼恩（Mann）、曼佐尼（Manzoni）、尼采（Nietzsche）、马克思、莫里斯、奥威尔（Orwell）、帕索里尼、皮尔斯、彼得·希思帕尼斯、柏拉图、坡、罗西-兰迪、沙夫、西比奥克、塞梅拉里、斯特恩（Sterne）、萨斯（Szasz）、斯威沃（Svevo）、瓦伊拉蒂、韦尔迪廖内（Verdiglione）、维特根斯坦。

在一篇题为“侧记”的简短传记文献说明（参见：[www.augustoponzio.com](http://www.augustoponzio.com)）中，庞齐奥解释了他的理论兴趣，特别提到上文概述中的作者，在以下方面特别是巴赫金和其派别里的列维纳斯，马克思，沙夫和罗西-兰迪：“尽管他们之间也存在分歧，我已经研究了这些作者的共同之处：不论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也不管分析的方向是什么，人类个体的生命在他/她具体的单一性中都不能从无理由的对他人命运的参与中被分割出去。

本文原题为“*Semiotics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Augusto Ponzio*”，原刊载于 *International Handbook for Semiotics*, edited and Apologia, pp. 1-29, by Peter P. Trifonas, Chapter 32, pp. 691-717. Dordrecht, Springer, 2015.

## 对等价交换符号学的批判

奥古斯托·庞齐奥著

周劲松译

## 一、符码符号学批判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

索绪尔框架的符号学，不只是以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等价交换来看待符号，而且，如巴赫金所认为的，在一切语言现象中唯有语言生活的两极得到了考虑，同时，它更期望以语言学为范式，让所有符号现象均得其所哉：所谓两极，即单一系统（语言[langue]）以及单个使用者对如此系统的个体实现（言语[parole]）。这导致产生出以表意形式和所表达内容之间的等价交换作为基础的一种静态的符号认识，而二者反过来又是以我们自身社会中的等价交换模式作为基础的。索绪尔的符号模式（它表现了关于“完美对应”这种平等主义观，其建构之于系统而言仿佛出现在一种均衡状态之中一般）以经济科学价值模式为基础建构而出，并特别参考了瓦尔拉斯（Walras）和帕累托（Pareto）所阐述的边际经济学说，这并不是偶然的。

符号研究和经济交换的方法合一，是由索绪尔在 1916 年实现的。作为其方法论模式，他运用到来自“趋向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最新著作”的诸多概念。“趋向于科学”（which tend to be scientific）这个说法大体指向门格尔（Menger）、杰文斯（Jevons）、瓦尔拉斯和帕累托所倡导的“边际革命”（Marginalistic Revolution），它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施穆勒（Schmoller）所倡导的德国历史学派不同，是以获取科学地位为追求目标的。首先，洛桑学派（瓦尔拉斯和帕累托）所采用的“静态视角”（pointe de vue statique）对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理论有着深刻影响。在索绪尔心目中，“价值”这个概念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并在语言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发挥着核心作用，因为二者都是价值的科学。历时与共时之间的区别也是两个学科之间关系所产生的结果。早在 1883 年，门格尔在《方法论探究》（*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中就对经济学的理论和历史进行了区分，而洛桑学派对同一区分做出了肯定。遵循这一研究路径，帕累托对经济学中的静态视角和动态视角进行了区分。前者与特定经济稳定状态有关，后者是对经济现象随之而来的平衡和发展的考察。与洛桑学派经济平衡理论类似的手法，在索绪尔的《教程》（*Cours*）中可以找到。

以洛桑学派的价值理论为范型，索绪尔把语言学的价值简化为交换价值。符号的价值是其在符号系统中的位置赋予的，正如商品的价值在“纯经济学”（瓦尔拉斯）中是由它与市场上其他商品的关系决定的。索绪尔对语言生产只字未提，正如洛桑学派对经济生产未曾提及；洛桑学派在其“纯粹性”（purity）中研究市场，从而清空历史视角。如罗西-兰迪所说，“索绪尔……似乎没有关于语言工作的理论，对于任何关于语言价值的理论而言最切实可行的基础”（1975a: 139）。之所以如此，在于这一事实：索绪尔忽略了古典经济学派（斯密[Smith]、

李嘉图[Ricardo])和马克思所阐述的劳动—价值理论;因此,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被简化成集合,个体行为的平均,言语。作为产品和作为“外部浓缩”(external constriction)的社会性要素这个概念,揭示了个体偏好清晰的意识形态倾向。

边际主义认识论的痕迹在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的结构人类学中也有显现,其中,文字性语言研究中所使用的范畴被用在了关于非文字交流、尤其是异族通婚交换的研究方面。这既是因为索绪尔结构主义人类学的间接存在,又是因为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和基于纽曼(Neumann)和摩根斯泰恩(Morgenstern)边际理论的经济科学之间,确立有明确的关联关系。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分析索绪尔的诸多理论,因为这必然包括对为人们所认定的索绪尔和最近从对其学生所做课堂笔记的直接分析中所显现的索绪尔进行一种比较研究(参看Godel 1957)。我们想做的,则是坚定这一看法:对符号学理论产生过、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的索绪尔符号模式,显示出受到洛桑学派边际理论影响的迹象。所以,将之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进行比较,似乎是适宜的,而且从某些方面看,在关于符号和符号价值的讨论中,这种比较是无可避免的(参看Rossi-Landi 1968; 1975a; Ponizo 1978; 1980)。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把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从政治经济领域“传递”(transferring)到符号学领域的问题。这样一种设想,也许难逃幼稚之嫌,因为它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显得似乎是一个界定十分明确的体系,而忽视了围绕马克思著作所累积起来的种种后继阐释,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当下的讨论。

在其政治经济批判中,马克思旨在破解“商品语言”(Marx: *Das Kapital*, I)。他把商品看作信息,试图探寻和阐释其整个运作过程。通过在交流和社会结构语境中对商品进行分析,我们能够克服拜物教观;拜物教观念把商品视为纯粹是既定的、自然的,把商品之间关系解释为物与物之间关系,而非特定社会结构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的去魅,尤其是对商品的分析,是作为符号分析出现的,是与关于作为信息的商品这种思考不可分割的:商品不只在交换层面,而且在生产和消费层面得到了研究(参看Rossi-Landi 1968: 116; Rossi-Landi 1975a: 133-137)。商品之所以为商品,而不仅仅是产品的原因,在于它能够作为信息而发挥作用。如果我们剥夺商品的信息特征,从市场上抽离符号交流特征,那么,我们既没有了商品,也没有了市场。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是一个方面,而符号的生产和消费则是另一方面。商品之为商品,不是在产品被生产和在其使用价值中被消费之时,而是在其被生产和作为交换价值,即当作为信息而被消费之时。所有这一切使得经济学变成了符号学的一个分支。



按照这种观点，经济学符号学肇始于马克思主义分析之中，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能够引领符号学进入一个尚未得到探索的研究领域。结果是，尽管经济学突入了符号学之中，符号学却并未被看成是一门帝国主义式的、无所不包的科学，它汲取了来自政治经济领域的诸多启迪与见解。在对各种社会符号的符号学分析中，正如在马克思主义的商品分析那样，问题的关键是从符号交换和符号市场层面、到交流和表意这种社会性工作的潜在诸层面这一过渡。据此，符号结构有如人类关系结构。换言之，我们必须在符号学中取得马克思在其关于商品和资本的分析中所达成的认识：要让社会关系得到凸显，以取代简单的物与被贬低为物的个体之间的关系。

## 二、超越等价交换：皮尔斯、巴赫金、罗西-兰迪

基于等价交换模式的符号学观念，导致信息被看作一种已经以明确方式给定的东西，一种不作任何变动地从发送者传递到接收者的某种东西。接收者将自身限制在对信息的单纯解码之中，没有任何积极理解中那种创造性的干预活动。所以，接收者并非积极投身符号过程，其作用仅仅是按照定好的规则对信息进行解读。此外，这种符号观和视接收者碰巧吻合其自身意识的那种主体观念有关。该主体完全意识到自身，对自身而言他是在场的，而就其作为意识的他自身而言，该主体对距离、自主性或异他性毫无觉察。符号只包括主体有意识地选择放在它之中的东西，因此我们不可能读进去任何超过意图意义已经确立的东西。

皮尔斯的符号模式战胜了这种基于符码概念和等价交换理论的符号观，而这种模式显然和索绪尔的理论没有直接关联。在巴赫金和罗西-兰迪那里，更进一步地表现出对索绪尔式符号学的超越。如果说在皮尔斯那里，我们发现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倾向，那么，在巴赫金和罗西-兰迪那里，我们便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明确坚持。

按照皮尔斯的看法，符号在整个符号活动语境中和与解释项的关系中，按照巴赫金的看法，符号在对话语境这一符号能够生存的唯一语境中，两种看法结合，在符号身份这一核心位置便呈现出异他性。按照皮尔斯的观点，符号及其对象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符号及其解释项之间的关系来中介沟通。没有解释项便没有符号。这意味着，作为解释项的符号远非某种辅助或从属之物，而是实际上构成了被解释的符号。换言之，意义并不在符号之中，而是在符号与符号之间；这些符号却并不属于一个封闭而确定的体系、一套规则（语言），而是在解释过程中彼此遭遇，而解释则是重新表述和阐发性重组，它越是不限于简单重复、逐字翻译或同义替换，就越强大、越具响应度。如此看来，解释被证实是冒险性的，因为诉诸单一的、预先确立的规则无法为之提供担保，而规则，渐次地，不会容许开放性解释。对

皮尔斯来说，意义就是解释项。

对于一个符号而言，其解释项指向另一个解释项，该解释项作为符号而发挥作用，并转而指向另一个解释项，在一个开放的延宕链条上如此递推。不存在固定的点，不存在确定不变的解释项。符号的身份要求符号的位移，这意味着每次当它得到解释，它就变成了另一个：实际上，用作解释项的是另一个符号。这一过程影响到对主体的认识，主体，如皮尔斯所说，本身就是一个符号。所以，在从一个解释项到另一个解释项这个持续的延宕游戏中，主体不断地被位移，被转换成另一个。主体不是先于符号并由此而对其施加影响，而是对符号进行预设，它通过自身成为另一个其之前符号的符号—解释项而得到明确和辨识。关于自我的意识无非符号—对象（a sign-object）与符号—主体（a sign-subject）或者元符号（a meta-sign）之间的关系而已，或者更简单地说，无非是符号及其解释项之间的关系而已。主体的对话性由此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在巴赫金那里找到了一种类似的观点，不仅因为他的观点涉及对包括内部话语在内的语词对话性的肯定，而且他对把语言看作抽象系统、把语言生活简单化为语言和言语两极进行了明确的批判（在以沃洛辛洛夫[Vološinov]的名义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中，也以及此后以本名出版的著述中，都可以见到这种批判）。

至于和罗西-兰迪有关的方面，他的符号观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基础之上的，我们可以通过参照他的论文《关于唯物主义符号学宣言的若干想法》（*Ideas for a Manifesto of Materialistic Semiotics*）这篇论文的如下核心论点，对他的符号观做出总结。

- (i) 符号学深入到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研究。实际上，社会再生产也必然是所有符号系统的再生产。即使在没有物质意义上的工作被实施的那些社会生活部分或方面，符号工作——语言工作是其一个亚种——仍然持续地被消耗——无论是否被意识到（没有意识到，而非意识到，是通常的情形）。但是，对符号系统感兴趣的研究者一般都认为社会再生产没什么重要的，反之亦然。于是，存在着了解关于社会再生产的一切，却……肯定地，对符号系统的再生产缺乏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个极端的例子，是阿尔都塞[Althusser]那种全然非符号的、因而是前符号的方法）。也存在着把符号系统当作某种独立于社会再生产之外的东西的符号学家，他们从未想过，符号系统要存在，就必然还需要有其他社会操作的进行。
- (ii) 在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所再生产出的符号系统既是语言文字、又是非语言文字的东

西。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任何就其自身做出的文字性语言思考都是不充分的。作为关于文字性符号系统的科学的语言学，作为关于任何符号系统的一般科学的符号学，二者的区别是尤为明显的。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符号因素的正确研究，只可能是一种完全属于符号学性质的方法，任何单纯的语言学性质的方法都办不到。萨丕尔和沃尔夫（Sapir and Whorf）所主张的所谓“语言相对性”（linguistic relativity）理论的内部弱点，证明用语言学性质的知识工具去应对广泛的社会，是不够的。相反，所需要的，乃是符号学性质的工具。

(iii) 社会再生产中所进行的一切同时也是符号操作。田野里生产玉米，流水线上生产汽车，同时也是符号生产。这么说的意思是，几乎算是同义反复地，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免不了地是人类水平上的符号。动物也使用符号；但是，当按照关于动物行为和自然背景的一般生态文献来衡量，关于玉米或汽车生产是人类性质的这种说法似乎与之并不相关。所以，存在着关于物质生产的符号学（a semiotics of material production）。与物质生产相伴随、甚至是在物质生产范畴中展开的诸种符号操作，本身就是符号学宏大事业中一个博大的章节。

(iv) 然而，符号学方法在用于非物质的生产之际，即，诸如法律体系、宗教和道德规范、艺术和诗歌、哲学和意识形态等等上层建筑的生产，似乎其力量焕发最为充分。换言之，即便是上层建筑层面，单纯的语言学性质的方法也是不够的。而彼时，乃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一种持续的相互作用状况下共同发展。

(v) 考虑到上述种种困难——仍然存在于两条线之间的困难比我公开提及的多得多——我想要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引入符号系统这个“第三项”（third item）。如果我们把前一种称为生产模式，把后一种称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话，这或许需要更为审慎。从二分法过渡到三分法在这里是有裨益的。葛兰西（Gramsci）所界定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可能是最适合符号系统研究的位置，无论是文字的还是非文字的。这是共识（consensus）产生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地带。那么，符号学工作就有可能获得一种去魅的能力。但这并不是说它不应该向着其他地带延伸。

### 三、关于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十个核心论点

沿着皮尔斯、巴赫金和罗西-兰迪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我相信，可以在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建立一种互补性和相互支撑的关系，关于符号的这一理论，是基于我在本书前一章中已经提前交待过的下列核心论点的，我这里将它们提出，以之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 1) 符号活动要存在，我们必须有用作符号材料的一个实体，一个物质性东西，无论它是自然之物还是人工之物。
- 2) 只有在历史—社会维度中，一个实体才会变成符号材料；在这一意义上，即便所谓的自然符号也是社会性的。
- 3) 符号活动预设符号实体是整合在符号实体所构成的系统中的。一个孤立的实体无法传递任何意义：它指向众多（至少两个）符号所构成的系统，每次当它出现，它就进入与之的纵聚合关系。
- 4) 作为一个实体，符号在物理意义上是物质性的；作为一个符号，在其作为历史—社会产品这一意义上，它是物质性的。正是通过其历史—社会的物质性，一个符号才会如此这般；正是这种物质性，在一个实体作为符号——从符号学的观点——被思考、被研究之时，吸引着我们的兴趣。
- 5) 任何实体都能成为符号材料，都能具有不确定数量的意义。所有符号材料都能够拥有若干意义，不仅是在连续性方面（历时），而且是在同时代性方面（共时）；根据这一观点，可以确立“符号”（sign）和“信号”（signal）之间的不同，因为信号确立的是符号材料与意义之间的某种一对一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把信号功能看作符号功能的最低层次。
- 6) 符号的意义是开放类的符号材料，可以是彼此的符号，它们处在一种相互解释的关系之中。“意义”这个概念和“这什么意思”这个问题，预设要求符号能够对其意义被发问的那个符号做出解释。解释项符号与被解释那个符号绝非处于等价交换关系之中：它们毋宁说是通过不可化约的异他性而相互关联。
- 7) 意义必须与指称物区分开来，指称物本身也是符号活动的一个基本要素。把意义等同于指称物，无论它在将意义简化为指称物或者把指称物简化为意义这种形式中能否实现，都是错误的。按照莫里斯（Morris）的观点，我们把指称物分为指代项（designatum）和指示项（denotatum），前者在符号活动中一直在场，后者只有在指代项以符号认为其存在的方式而存在之时才在场。

按照符号活动的不同情形，一个特定实体可以用作具有特定意义的某类型的符号材料，并因此而让自身处在与同类其他符号材料的相互解释关系之中；要不然它可能用作解释项。

- 8) 辩证地说，符号并非一个单一的表意要素，它并非一个孤立的语词。它甚至也不是一个“符号”系统中具有特定价值的一个“棋子”，与该系统中的其他要素处在一种机

械“对立”的关系中。说符号和整个信息吻合，文字符号情形中和整个言谈吻合，也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说法。实际上，信息处在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而正因为如此，它只是符号活动诸要素之一。除了发送者和接收者，在信息外部我们还有解释项、指称物、语境、评价参数，这一切在信息中都作为业已得到暗示和理解而被给出。所有这些要素都是符号活动的组成部分。**辩证地讲，符号和符号活动并无不同：**它与整个符号情形相互吻合。仅仅是在与特定符号系统、解释者，或者与充当起解释项者的关系中，或者在与其可能从属的语言、使用域、文类（文学的、日常的、民俗的，……）的关系中，符号是无法得到实现的；仅仅是在与符号之外的现实的关系中，或者，如奥格登和瑞恰兹（Ogden and Richards）所主张的，在其与“指涉关系”和“指代项”等等所构成的“三角”关系中，符号也是无法得到实现的。符号就是所有这些关系；它包括所有明确表达出来的东西，也包括所有暗示出来的东西，为其意义做出贡献的东西。

一旦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而不再将其简化成一个单一要素或者将其拆解成各个不同组件，那么，很难说出符号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符号并非一个东西，而是一种过程，一种关系之间的相互交织，社会关系总是包孕其中，即便我们处理的是自然符号，因为，唯有在社会语境中它才能作为符号而存在。对符号综合的、一体的意识，是与具体交流语境、社会相互作用分不开的，是与它和具有特定价值观、意识形态导向等等的具体情形之间的关联关系分不开的。

- 9) 意识形态并不是在符号材料之外存在，而是像符号一样，也有着社会性特征。正如其是由符号所构成的，社会性方面在其整体上也是由意识形态所构成的。意识形态和符号系统并非各自代表一个分隔的层级，一个自在的领域，社会组织就被反映于其中罢了。符号和意识形态一道，积极干预一切形式的社会关系，从“基础”到“上层建筑”，没有意识形态符号（巴赫金）或者符号—意识形态材料，整个社会再生产都会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意味着，意识形态符号并非消极地反映社会不平等和矛盾，而是处于各种不平等和辖制形式中的社会组织的建构性部分。
- 10) 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必须在这一意义上来理解：就历史—辩证唯物主义而言，符号研究就并非处于次要地位，并非扩大后者“运用”领域的一个简单机会。相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言，符号研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是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基础性的组成部分。

#### 四、符号与矛盾

说矛盾只存在于思想和语言之中而不是现实之中，只有通过这三个用词的本质性解释方有可能，而如此以来，这三个用词便作为剥离了任何确定性功能的抽象东西而出现。

“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对立没有看到这一事实：作为另一个的思想，思想就像有形之物一般，是真实的、物质性的（如列宁所认为的那样，它存在于特定自我的意识之外）。异他的语词、异他思想的表达，有着我必须去适应的、属于其自身的物质性，无论我打算对其作出解释还是校正。

此外，特定自我的思想并非一块独石，始终一致，也并非有着特定内容的自身的产物。“思想”之中有着差异、矛盾；有我并未决定拥有的、逃避我的控制的、我本人无法自主创造出来的“思想”。我们神经的某些层面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因此，它们有着物质性的一致性和阻抗性。无意识也是由语言—意识形态材料、历史和社会材料所构成的。“神经方面的矛盾”既不是逻辑—形式性矛盾，也不是“内部的”、“隐私的”矛盾，可以理想性地通过对神经本身进行干预、通过简单地用“真实观点”替代“虚假观点”使之消失。矛盾是物质性的、辩证的，有着精确的历史—社会规定性，无论它们是在无意识的语言中、在梦的语言中，还是在我们警醒的生活语言中得到表达（参看 Ponzio 1978）。

“矛盾只存在于语言中，而非现实中”，这一论断中将“语言”和“现实”相对并置的做法，并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语言也是现实，它也是物质性的，是客观性的存在之物，是真实生活的组成部分，而“现实”反之也是由语言所构成的，同时也是文字的以及非文字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46）所深刻认识到的，社会现实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语言整个系列，从关于人与人之间物质关系的语言，从关于商品的语言，到关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等的语言，不一而足。“矛盾须在语言中去找，而不是在事实和事物中去找”：符号学正是在若干世纪里除了事实和事物之外什么都没有看到的地方，发现了语言的存在。从这种观点看，符号学工作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是相统一的。实际上，后者主要致力于破解“商品语言”，把商品当作信息加以研究，从而克服了拜物教的现实观，在拜物教的现实观中，商品被看作自然性材料，货物之间的关系对人类是以一种物与物之间的虚幻形式出现的，而不是人与人之间某种特定社会关系的形式（参看 Rossi-Landi 1968; 1972; 1975a）。马克思对资本的生产手段所做分析，凸显了社会交流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似乎一个人都没有，似乎我们对付的只是事物和事物之间纯粹又简单的关系：资本、商品都是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其“表层结构”及其“深层结构”讲着经济交流语言。

不管怎么说，对于抽象地将“语言”和“现实”相对并置这种做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

意志意识形态》（*Die Deutsche Ideologie*）中大加挞伐，在这部著作中，他们揭示出，青年黑格尔派自身所提出的这个问题，从思想领域过渡到现实，由此而从语言过渡到真实生活，为何是一个虚假问题，这个问题“只针对哲学意识存在，本身并不能理解它明显与生活隔绝的性质和渊源”（同上书）。如果哲学家们给自己分配任务，肩负从思想世界、从句子的世界下降到真实世界这样一个“使命”，这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们执着于两个“界域”相互独立这种幻象。根据费尔巴哈（Feuerbach 1843）的看法，譬如，“语词停止之时，只有在那时，生命方才开始，只有在那时，存在的秘密方才揭示出其自身”。与之类似地，斯特纳（Stirner）认为自己的过人之处是发现了一个词——“唯一”（*Der Einzige*）——即便只是一个词，它却具有引领从语言和思想领域，从“语词”和“句子”领域，到真实生活的能力。

对符号物质性的充分承认，要求超越各种形式的符号物象化、符号拜物教；并且关系到对真正矛盾的考察，亦即并非单独与独白式的、因而是抽象的意识相关，以一种虚幻的、“形式性的”方式存在的那些矛盾。符号物质性、辩证法和对话思想都是概念，因此，彼此之间有所呼应。符号的辩证法将其基础根植于对话、以及异他性关系之中，相对于“自我”的“他者”的反抗之中。这也暗示出：意义并不是一劳永逸地以静态的单声部这种方式呈现出来，同时，交流活动被看作一个开放的过程，并不存在诉诸自主地、外在于交流过程，为独立存在的意义的可能性提供担保。

本文原为庞齐奥著作《作为符号的人》（*Man as a Sign*）的第二章第一节（174-184页），原题为“*For an Equal Exchange Semiotics*”，原书为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0年出版，由 Susan Petrilli 英译，为《符号学诸进路》（*Approaches to Semiotics*）丛书之一。

# 关于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笔记

奥古斯托·庞齐奥著

周劲松译

## 一、关注符号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意味着什么

按照“研究符号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建构”，甚至“马克思主义之于符号学的运用”等等方式来梳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太大意义。这样的梳理不仅在明确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领域和对象方面没有意义，而且有着错误看待问题本身的危险。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是抽象的东西，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很难作为“决定要素”（determinant），尤其是当其沦为标签、以仿佛方向标或方向箭头来使用的时候，指示的是一条已经预先确定了的线路，所以剩下来要做的一切，就是选定道路，出发，实际上，一切需要的无非是一种意志行为而已。而且，似乎马克思本人就曾笑言：“我唯一能够说的，就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参看 Enzensberger 1977: 456）

此外，这个问题似乎放错了位置，因为关系中的两个用词——而尤其是其中之一，“马克思主义”——是被当作彼此独立存在的要素而呈现出来的，由此，它们便是由于武断的决定和个人动机而被放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建构”因而似乎成了一个纯粹的选择性的问题，纯粹基于所宣称的原则基础之上来加以探讨的某种无谓之物。

正因其武断和无谓，从符号学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引入通常都会激起人们的戒备心态，他们呼吁分清“科学”（符号学）和“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要求自己捍卫“科学研究的纯粹性”，使其免受“意识形态”和“政治”要素的败坏。在这一切中，符号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被认定是与某种与之分隔的、“其外的”（external）东西之间的关系，因此，符号学只有在它得到完全发展和梳理，才会与意识形态发生邂逅。这意味着，事实上，当决定符号学研究的方法论、范畴、甚至对象的时候，前理论性的和意识形态性的选择是不被考虑在内的（参看 Ponzio 1978b）。区别恰在于：在科学研究领域中，就其与意识形态关系而言，有把牌放在桌面上玩的人和不把牌放在桌面上玩的人，而这一区别又是基于这样一种极无意义的差异：一些人——如常常说到的那样，主张的是纯粹而简单的意识形态结盟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另一些人则反对把符号科学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之上这一虚假前提，因为他们相信（如米勒[Millet]就不赞成 N.Ja. 马尔[Marr]被收入《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这本杂志中的一篇文章曾有过的说法),科学的工作“不能把自身置于任何旗帜之下”(参看巴吉奥尼[Baggioni]的文章,文见 Marcellesi et alii 1978: 238)。

符号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应该在这一意义上来理解:符号研究根本不是什么附属于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东 西,能够拓宽后者“适用”(application)领域的一个单纯的机会,而应该说,它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合理化过程中的一个建构性的方面,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关键基础中不可能被撇开的一种研究。

正如我们已经在前一章的 2.5.1 小节中看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系统”(open system):也就是说,这个“系统”,并不是推论哲学意义上的,尤其不是黑格尔主义意义上的,所以,并不是基于单一原则之上的一种演绎性机体;在那样一种意义上,即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自身也会认为,这样的“系统”对于他们理论建构是不合格的。而应该说,它之所以是一个系统,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它是由以如此一种方式而相互关联的一群要素构成,而对其中任何一个的修正,都不可能在不对其他做出修正的情况下发生。之所以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因为它是一个科学的系统,如此这般地,它遵从科学规律,不断得到验证和暴露在论辩中。参照社会现实和人类知识的发展,这个系统进行发展并纳入新的要素,从而带来对旧的要素的变革和更新。在极端情形下,这样一种变革可能是全然性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特别的理论性的—意识形态性的系统,不会继续在其结果不再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这个意义上存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同所有科学系统一样必须要承担的风险,而这不应该阻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每个组成部分直到最后程度的验证(参看 Schaff:1978a)。

在这一彻底考察与验证的过程中,符号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占据着首先的重要地位。且让我们看看之所以如此的主要理由。

a) 初步的理由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中找到。实际上,后者关注的核心在于解码“商品语言”(language of commodities)(Marx, *The Capital*, I),在于解释作为信息的此类商品发挥作用的整个过程。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通过分析交流的社会结构,征服了把商品作为自然之物这种拜物教视野,同时,商品之间的关系,人们以为是物与物之间关系这种非真实形式,而不像现实中那样,是真实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因为如此这般,马克思主义批判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学的分析,是与有关作为信息的物品这种思考不可分割的,它的研究不仅仅体现在交换层面上,同时,也体现在生产和消费层面(参看 Rossi-Landi 1973, 1975a)。

b) 另一个理由关系到不同意识形态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以及“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概念在这种关联关系中的使用。意识形态研究与符号系统研究不可分割,

与在这些系统之间确立起来的暗含意义和等级划分的诸多关系不可分割。另一方面，上层建筑这个概念，不是用来界定文字性语言以及其他社会语言的——尽管作为一个范畴，它仿佛是自动就被界定了的，是先于对这些不同语言的研究的，并因而只是拿它来针对它们运用而已——要求准确地通过对符号系统的研究阐明它与“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之间的关系，正是符号系统形成了从物质基础到最高层次意识形态的社会方面（参看 Vološinov 1929: chp.11）。

c) 此外，显然，作为一种知识理论，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必然要承担起对文字语言研究和一般性符号研究所包含内容进行分析这一任务（参看 Schaff:1969）。每一种对于认知过程的分析必然是对符号过程的分析，没有这种东西，知识直截了当的是不可能的。

d) 最后，考察与交流相关诸问题的必要性，研究信息和符号系统的必要性，就体现在当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作为社会规划方案运作的时候，当其力图让有组织工人运动的特定目标赢得赞同的时候。面对有关信息、政治宣传、大众交流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无法避免深入符号学领域中（参看 Klaus 1971）。与简单化了地、机械地看待阶级斗争和语言、和“意识形态性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不同，阶级斗争并不属于“语言之外的社会现实”（extralinguistic social reality），继而被想以为然地“反映”（reflected）在“意识形态性的—语言的范围”（ideological-linguistic sphere）之中。相反，阶级斗争完全是在符号、首先是语言符号的地界发生，无论被动做出决定这个结果是否属于某个特定阶级，也无论它是否以组织化和规划方案的形式出现（参看 Ponzio 1970: 145-65）。

如果，反过来，把符号学当作起点，需要把方向导往马克思主义，那么要注意以下几点：

a) 我们首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对于符号学作为一门解释和批判学科的建构是有贡献的，它从信息交换这个表面层次，延伸到对符号生产的历史—社会结构的分析（参看 Ponzio 1973）。

b) 社会符号生产的过程和生产意识形态的过程一样。在这一意义上，有关人类社会所用符号的一种解释和批判理论必然同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符号理论摒弃意识形态中性论这种虚伪主张，对它在所有人类行为中辨识到的社会程式持有一种鲜明立场，它是符号行为。由于其总体化的观点，它意识到人类行为程式是处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中的，并因此意识到对这些程式的历史—社会阐述，符号学给予自己的定位是文化符码批判以及打造取而代之的程式（参看 Rossi-Landi 1979 以及 Solimini 1974）。

c) 作为对社会现象“自然性”（naturalness）和“自发性”（spontaneity）的批判，符号学

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中找到了工具和视角，使得它能够——正是在看上去是关于“自然”、“自发”、“无谓”、“隐私”行为的方面——辨识出确切程式、规则和社会安排的存在，对于这些东西，行为主体甚至从未有所怀疑；因此，正是在看上去除了有意的、自愿的交流活动之外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它能够发现种种形式的无意识、意识缺乏、错误意识。

d) 马克思的这个说法（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German Ideology*]）：“语言是真实的、实际的意识，后者也对其他人存在，因此它也是之于我的唯一存在者，语言，如同意识只出自需要，出自在与他人的关系必要性”，这里可以通过符号学加以发展，符号学反对把符号简化为单纯的交流方式，把交流本身简化为信息过程、意义传递、欣慰和信息的交换。和所谓交流符号学所主张的相反，符号的存在，并不单单在于这样的时候：以一种知晓的、自愿的方式，带着确切意图，去问询某人、表达某事。即便个人化的某人、某事的构成和决定、要交流的个人经验构成、意识的构成、对决定行为的认识、有意识的交流得以发生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特定关系的存在，所有这些，没有符号的参与、没有符号社会性的有组织运作，是无法想象的。只将其当作符号来思考，不去考虑其背后的规约性、自觉性和意识性，意味着不仅是用了一种简单化了的方式去解释符号，而且是把意义和意识操作考虑得太理想化了，给予了它们自主和先于符号材料的存在，而事实上正相反，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综合汇集的，如马克思所说，它们是“被感染的”（infected）。社会交流并不简单地是插在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过程，它也是以其作为发送者和接收者这种存在作为基础的过程，不仅涉及信息的实际交换，而且涉及其作为个体主体的区别（进一步的讨论，可参看 2.5.1 和 2.8.4）。

e) 我们一定不要低估这一事实：索绪尔那种符号模式对于符号学理论产生了并且继续产生着重要影响，显示出洛桑学派（瓦尔拉斯[Walras]，帕内托[Pareto]）边际主义理论影响的痕迹。所以，与政治经济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抵触是相关的，而且当讨论符号概念和符号价值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意味着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把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从政治经济“运用”、“传输”到符号学领域，从而不顾当下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讨论和不断累积的对马克思文本的阐释（这些阐释对界定后者的界限做出了贡献，使之更为精确，同时，这些阐释也为指明未来发展脉络做出了贡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所能做的，就是给符号学指出尚未完成的一项任务：正如在马克思主义商品分析中那样，在社会符号过程研究中，必须从建构完成时向着建构进行时出发，从交换价值和“符号市场”（sign market）的附带现象结构向着交流和表意社会劳动的潜在结构出发。通过这种方式，之前似乎单单由符号之间关系构成的符号价值，在被重新导向社会和符号劳动，导向对以其为目的的此种劳动的组织过程中，被证明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换言之，这件事关系到特定社会中

兴旺发达的符号系统的结构分析中如何展开,关系到马克思在对商品和资本的分析中所获得的东西:正是在看似只有物物关系和人人关系的地方彰显出社会关系(又参,如2.4.7)。

## 二、十个论点

验证和增强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需要不断面对自然和社会科学。这些科学的发展肯定无法与粗俗唯物主义、与沦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彼此兼容;另一方面,这种发展对于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对于作为一个开放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起着补充作用。

就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而言,同样是如此,这里,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符号学,而是要检测符号学理论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承受马克思主义批判,反之亦然,是要检测面对符号科学各种发展,马克思主义系统的弹性达到何种程度。

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符号学之间相互补充、相互支撑这种关系,靠的是基于以下论点的一种符号理论。

1) 符号活动要存在,我们就必然要有一个主体,一个作为符号材料的有形对象,无论它是自然主体还是艺术产品。

2) 只有在历史—社会方面,主体才会变成符号材料;在这一意义上,即使所谓的自然符号也是社会性的。

3) 符号活动预设了这一前提:符号主体是被整合在符号主体系统之中的。孤立的主体无法传递任何意义:它指向众多(至少两个)符号所构成的系统,它的每次出现都与这些符号有着纵聚合关系。

4) 作为主体,在有形这一意义上符号是物质的;作为符号,在其作为历史—社会产品这一意义上,它是物质的。正是通过其历史—社会的物质性,符号才变得如此这般;正是这种物质性,才让主体被作为符号——即,从符号学角度——来思考和研究之时变得饶有兴味。既属于有形的现实,又属于历史—社会现实,这一事实使得符号成为某种全然客观的东西。就意义而言,符号物质性——于此人们只是在有形这一意义上来理解——将自身表现为一种意义载体,一种传输和传播意义的工具;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社会现实来理解的符号的物质性,即从符号学的视角来思考,则它不再仅仅作为意义流播的载体和手段而行动,而是不可分割地与意义相互关联。

5) 无论如何,任何主体都能够变成符号物质并具有无法确定数量的意义。所有符号物质都能够,不仅在连续性上(历史性),而且在同时的方面(共时性),拥有若干意义;从这一角度看,“符号”之所以不同于“信号”,原因在于,信号所建立的是符号物质与意义之间

的一种一对一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把信号功能看做最低层次的符号功能。

6) 符号的意义是可能作为彼此的符号而行动的符号物质集合 (the class of sign materials), 它们的关系是彼此之间有着相互替代性。“意义”这个概念, 与“它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所设定的各个符号之间, 具有互换性关系。

7) 意义必须与指涉对象区分开来, 指涉对象本身也是符号活动的一个基本元素。无论是属于把意义简化为指涉对象这种形式, 还是把指涉对象简化为意义这种形式, 把意义等同于指涉对象始终是错误的。

我们建议更为细腻地对指涉对象这个问题加以考察, 因为这个概念在决定符号学的理论基础方面常常引出误解来。另外一个理由是, 有了这样一个概念, 唯物主义直接就受到质疑, 因为常常, 无论对指涉对象的符号学属性是否否认还是肯定, 都是以庸俗唯物主义、“低级唯物主义”(low materialism) 对指涉对象所做出的阐释作为起点。

指称物功能的展开, 可以通过“事物”、有形的对象, 或者通过任一思想、情绪或者愿望, 通过想象的、虚幻的、虚拟的对象, 又或者通过整个情景——即通过符号用于其中的情景语境来完成。此外, 符号的指称物可以是一个单个对象, 譬如在“这是我的狗”这样的表达中; 但也可以是在其普遍化的方面的一个对象, 某个类别, 譬如在“狗是四足动物”这样的表达中。

通过使用莫里斯 (Morris) 的术语, 我们可以把指涉对象分为“指示项”(denotatum) 和“指代项”(designatum) 这两个概念。莫里斯的解释项 (interpretant) 对应于索绪尔的所指 (signifié), 对应于奥登 (Ogden) 与理查兹 (Richards) 的指称 (reference), 因而能够在后者所提出的语义三角中有个顶点的位置。另一方面, 莫里斯的模式包括了在这样一个三角的右边的指称物分裂成指代项和指示项。莫里斯 (1938) 用“指代项”表示符号所指涉的东西。该对象, 有着这些属性, 有着按照其被符号所指涉的方式来看甚至不可能真正存在的这些性质。反过来, 当按照其被指涉的方式来看我们指涉的东西的确存在, 所说的对象则是用“指示项”来表示的。在这一意义上, 可以说, 如果一个符号总是指涉某物并因此总是有一个指代项, 该指代项于是就是符号活动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但它并不总是有一个“指示项”。运用这种术语方式, 我们能够在与符号指涉模式的关系中对指示项的存在这一概念进行相对化处理, 譬如, 在希腊神话中有半人半马兽 (centaur), 它们在动物学中并不存在, 因此根据符号活动的语境, “半人半马兽”这个符号就可能有或没有“指示项”。同样, 在《奥德赛》(Odyssey) 中, “尤利西斯”(Ulysses) 有一个对应的“指示项”, 但从历史传记学的角度来说, 绝对没有对应的“指代项”。所以, 在单一的意图性语境中, 譬如一部小说或者一则寓言, 某些表达是有“指示项”的, 而其他一些则是没有“指示项”的, 即便它们, 就观察意义上的存

在概念而言，都被认为没有“指示项”。譬如，在《木偶奇遇记》（*Pinocchio*）中，“巴洛奇之地”（*The Country of the Balocchi*）有“指示项”，因为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与故事中的情节相对应的东西；而“奇迹之地”（*The field of Wonders*）有“指代项”却没有“指示项”，因为它只是带有欺骗故事中角色这一目的的杜撰而已（又参 1.2）。

任何情况下，符号指涉的东西都具有符号的性质。符号所指涉的经验部分都是有组织的、分节的领域的构成部分，它们通过特定人类社会所采用的符码系统，被建构到不同的情景中，建构成有所区别并个体化了的对象。它作为指称物而存在，是因为有符号的存在，符号通过把它插入其中的系统作为中介，以它出现其中的符号—情景语境作为基础，表达出指向它的意义来。符号的指称物及其意义并不具有从第一、到第二这种机械的因果性关系，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指称物是符号活动的组成部分，是进程之中的、以及其他之前已被认识到的符号活动方方面面的组成部分；意义同样如此，如果不是作为这根特定的社会之轴的组成部分，意义将不会存在。

8) 根据符号活动不同情境，某主体可以作为有着特定意义的一个集合的符号物质而起作用，因此把自身置于与同一集合的其他符号物质的相互替代性关系之中；否则它能够用作指称物。手拿一支铅笔，我可以说“这就是‘铅笔’这个词的意思”。这种情形下，物是用作了符号。或者，我可以说“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支铅笔”：这里，物是用作了指涉对象。只要某物用作指涉对象，那么它就无法用作符号物质。用于代表某意义的东西，无法同时用作指涉对象，身为指涉对象的东西，无法同时用作符号物质和属于同类意义的其他符号物质。组成部分的交换肯定是可能的，但那样一来符号情景就是另外一种了。

9) 如果我们用意识形态指实践方向、符号在具体符号情景中所采取的操作意图性，以及（即便是相当弱地，即便是与符号活动的文本语境分开来考虑意识形态之时）与之相伴随的东西，我们可以坚持认为，所有符号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意识形态并不在符号物质之外存在，并且像符号一样，它具有社会的性质。正是因其由符号构成，完全性上的社会也是由意识形态构成的。并非意识形态和符号系统每个都代表社会组织就反映在其中的一个独立的阶层、属于自身名义的范畴。符号和意识形态积极地共同参与到所有形式的社会关系之中，从“基础”到“上层建筑”。同时，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符号（巴赫金[Bakhtin]），没有符号—意识形态物质，那么整个社会再生产将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意味着意识形态符号并非仅仅是消极反映社会不公和矛盾，而是各种形式的“不公与辖制”（巴兰迪尔[Balandier]）中社会组织的建构性的部分。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资产阶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取得了一种阶级内涵，这或强或弱地与阶级利益中被决定的信息和符号系统所起的作用有关。这

有赖于在不同符号—意识形态领域之间逐渐被建构起来的层级关系。作为阶级矛盾的一种积极性表现（而非其简单的再现），意识形态符号本身是矛盾性的，它是含混的、多声部的，而且，社会矛盾越大，符号出现于其中的符号意识形态系统对社会组织合生产力的发展越具有决定性，它就越是如此。与再生产本身相关，统治阶级迫使自身赋予符号一种单义的、确定的而且“严肃的”性质。但符号并非单一阶级的产物；它们是整个社会的产物，而且社会矛盾使得它们爆发出多声部、含混、双重意义。

10) 至于特定社会交流领域中的各种研究——我们可以称之为索绪尔式符号学（*semiology*），以在这一意义上将皮尔斯式符号学与之区别开来——符号学不仅将自己表现为一种纯理论性的科学，一种决定符号研究中诸范畴和方法以及奠定理论基础的一种一般性理论，而且它就各种符号论的分支属性而言具有一种总体化的功能。此外，既然符号学考察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符号生产系统中各种不同的符号系统，辨识的是总体的社会再生产框架中不同交流程式之间的纽带，那么，符号学代表的是最具解释性和批判性的符号论分析。

即便抽象和泛化的程度能够被合理地当作决定具体东西所必要的程序，这些要点的每一个都存在着过于程式化的局限，因此要求更为仔细的论说。但总体地，不管怎么说，对于符号学中所从事的工作来说，它们都给予了我们有关某个主张的观点，在符号学的工作中，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并不是在简单的“运用”这一意义上体现出来，而是在力求对其自身做出透彻考察和验证这一研究形式中体现出来。人们觉得，在这一点上，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堪称我们文化史和政治史的一个激进的组成部分（即便我们没有注意到它），它是朝向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的一种存在，而且它是，轮到它的时候，从此种研究中接受了各种修订和对立要素的一种存在。

本文中所论及的另一个缺点来自这一事实：符号学作为一门人类科学、一种社会科学，显得过于独特。因为符号学和符号被呈现的方式，出自自然源头并被解释成符号的有形事件——线索、踪迹和征象——因为它们预设了文化语境、解释和表意的社会劳动而没有被舍弃，但属于基因符码、属于刺激等等的特定自然交流活动形式，譬如动物的那种，则当然地被舍弃了。对这种排斥至少应该做出解释，尤其是，既然符号研究以如此方式发展，以至于包括了，譬如，名为“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之下的那个部分。如果真如恩格斯可能会认为的那样，唯物主义必须针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改变自己的形式，那么，马克思主义不会忽视“符号学的最低门槛”（*lowest threshold of semiotics*）（Eco 1975: 33），即符号表意活动的大部分的自然性方面，正如在总体上它不会忽视自然科学一样（参看 2.12.3）。无论如何，有

符号学肯定是一门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科学、一门社会科学这一事实，就可能证明，这里对于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关系进行思考的方式是合理的。

本文原为庞齐奥著作《作为符号的人》（*Man as a Sign*）的第二章第二节（185-196页），原题为“*Note on Semiotics and Marxism*”，原书为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0年出版，由 Susan Petrilli 英译，为《符号学诸进路》（*Approaches to Semiotics*）丛书之一。



# 讨论

## 符号伦理学、意志论、反人本论

保罗·科布利著

方小莉译

人们所期望的东西，仅在很少的场合才能如愿以偿；人们所抱定的目的，大部分是彼此冲突和矛盾，或者有的引其本身的实质而根本就办不到，有的因缺乏实现的手段而不能达到。这样，许许多多各别意向和各别行动间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不自觉地行动的自然界中所盛行的状态完全相似的状态。<sup>①</sup>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伦理”作为道德系统的观念，是自 17 世纪早期发展起来的。该观念有一个基本的矛盾，它既意指行为程式，同时又指产生、遵守和再生产这个程式的意志（will）或行动主体性（agency）。对于后者，伦理涉及“含有某种意志的”（willed）这一涵义来源于古希腊的思想理念，关涉特性（character）与个人（personal）。近来，解构主义开始质疑伦理这一概念，但同时也尝试创立新的伦理规则，呼吁一种向他者开放的伦理观。即使是在这层意义上，开放的观念本身也暗示一种自发的活动或意愿，借此以实现对话。伦理观念作为一种话语现象在当代西方社会的构成中清晰可见，它与意志明确有关联。伦理程式被重复构建为话语性的，常常作为体制空间的一种成文法。伦理遭遇什么挑战，或是根据什么来调整也同样是话语性的。的确，很多与伦理的有效性（或无效性）相关的问题都源于相信伦理的话语性假定，特别是处在一个多元文化主义盛行和容忍他者的时代。在过去 30 年，盛行着一种十分有影响的观念，认为人类生活的很多决定性因素都是由话语建构，特别有关主体性的认识。例如，卡尔文·舒拉格（Calvin O. Schrag）提出的交往实践（communicative praxis）假设，是讨论交流与行为相关性的重要逻辑论证，说明了诸如伦理这样含有某种意志且被程式化的观念体

---

<sup>①</sup> 以上译文参考：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张仲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年：第 37-38 页。

系，必然是通过话语来运行的。

然而，也有其他有关“话语想象”（discursive imagination）的材料表明人类事务和对人类事务变化的影响是由话语的变化决定的。1967年，理查·罗蒂（Richard Rorty）的论文集开创了社会思潮中的语言学转向。虽然该文集鲜被引用，但这一转向在知识界却影响巨大。更为重要或是说可能更含糊不定的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他们的符号哲学的基本原理来源于索绪尔，虽常被批判，却少有遭到完全拒绝。西方的人文科学对这一点进行了详细描述和广泛传播。自20世纪50年代起这一点在法语学术界几乎被自然化为一种常识，在英语学术界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得到普遍认可。然而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这两种话语观点都不仅过了其保质期，而且它们从根本上就有缺陷。前者暴露了它的非历史主义性以及对知识的自足论（complacent theory of knowledge）的推行。这一理论过于强调知识的语言性与逻辑性，忽略了知识是人为加工的这一基础。后一种观点正在被忽略。索绪尔符号观在人文学科长期占统治地位，现已被更为激进的符号观取代。在这一过程中，这种观念让人误以为结构主义者与后结构主义者的符号理论在西方得到广泛传播，控制了西方的思想界。为了更好的了解伦理与其它形式的人类行为为何不断被错误地认为是起源于话语层面的意志驱动，本文有必要简要回顾皮尔斯符号学如何取代了索绪尔符号学。

## 一、索绪尔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

与索绪尔符号学不同，皮尔斯符号学研究所有的符号。从历史来看，皮尔斯符号学先于索绪尔符号学。该术语本身来自希腊词根“义素”（seme）。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首先使用了该术语，并力图归类宇宙中所有不同类型的符号。因此皮尔斯符号学从根本上构成了符号研究的主要传统，这个传统始于古代的符号学家和医生，如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Cos, 460-377 BCE）和发展了症状学的盖伦（Galen of Pergamon, 129-c.200）。然而，特别是在欧洲，索绪尔符号学的巨大成功以及不断上升的研究热使公众和学术界在20世纪后半叶开始关注更广泛的符号学研究。索绪尔符号学当然是受到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德·索绪尔的启发，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预言，如果遵循他的原理，有望发展一门研究各种符号的一般科学。20世纪后半叶，索绪尔得到了一些符号学家的响应。这些符号学家局限于研究有限范围内的文化制品，这些文化制品更容易以更宽泛的语言学原理来予以说明。20世纪60到80年代期间，索绪尔符号学伴随着（英语）文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的潮流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流行，在英语学术界得到繁荣发展。

索绪尔符号学不仅假设人生是由话语建构的，它也同时支持努力实施“传播实践”

(communicative praxis)。巴尔特的意识形态批评体系产生于 1957 年，开始系统分析和驳斥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产物。这一体系伴随着他被多次翻译的《神话学》孕育而生。巴尔特意识形态批判系统化的部分，源于索绪尔将语言符号分为两部分：a)一种心里的语音形式，再现了对心外的声音的感觉印象；外加 b)一个概念，抽象地表述世界现象，如“住宅”、“白色”、“看”等等。索绪尔分别将他们称作能指 (signifiant)与所指 (signifie)，并强调连接能指与所指的首要原则是任意性。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于 1959 年翻译成英文。他的能指 (significant)、所指 (signifie)、与符号 (signe)相应地翻译为英文的能指 (signifier)、所指 (signified) 和符号 (sign)。第一项给母语为英语的人的印象是，能指承担所有的指意功能，也就是说，索绪尔完全想要避免使用符号 (sign) 这一表述。同时所指似乎是指涉所有表意的对象。很快，索绪尔关于符号的心理概念就失去了原来的定义，各种符号学阐释不受约束地将各种不同风俗的文化产物都看作能指与所指关系的体现。巴尔特风靡一时的早期作品《符号学原理》于 1967 年翻译成英语，又加剧了该种事态的发展。为了让索绪尔符号学能够超越语言符号学的限制，巴尔特实现了对索绪尔观念的嫁接，提出能指也可以被某个具体物质转换，能指的实质总是物质性的（如声音、对象、图象）。巴尔特毫不犹豫地阐发了他提出不同于索绪尔理论的原因：这样可以使所有符号问题，包括那些混合体系 (mixed systems) 中的符号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索绪尔符号学坚持认为索绪尔语言学原理不仅可以用于那些语言模式占统治地位的符号系统，也可以用于解释非语言模式。毕竟所有被解释的符号系统都是源自人类。

索绪尔式符号学因此在人文学科兴盛起来，特别是与“话语研究”一起兴盛于语言学这样业已建立的学科。奇怪的是，索绪尔符号学原理常常被冠以皮尔斯式符号学 (semiotics) 之名。这主要是因为 1969 年国际符号学协会成立，整合了索绪尔派符号学家的人类中心说与皮尔斯传统。索绪尔符号学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认为人类行为的领域是话语和人类符号，变化可能通过意志在话语上实现。皮尔斯式符号学源于皮尔斯及符号学的大传统 (major tradition)，可以追述到经院哲学乃至古代医学，它论证了与索绪尔符号学非常不同的观点。语言符号是一种仅由人类使用的符号，我们对它非常有限的研究，仅是广义符号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特有的语言现象只是宇宙中的符号活动，普遍的符号行为的一个方面。可以这样说，语言与所有活体细胞间 (living cell) 互动产生的一系列符号相比显得非常渺小。此外，什么是“活体”这个问题很关键：很多大传统的符号学家，受到西比奥克 (Sebeok) 的影响，认为符号活动是“生命的属性”，因此将符号置于整体符号学的视域中。西比奥克在他的老师查尔斯·莫里斯 (Charles Morris) 的著作、和皮尔斯理论的基础上，在动物符号学

(zoosemiotics) 的领域中开创了非人类的符号活动研究。动物符号学后来被发展更完善的生命符号学 (biosemiotics) 取代。生命符号学认为不仅需要一种关于人类交流的符号学, 除了需要动物符号学、植物符号学 (phytosemiotics), 真菌符号学, 还需要有 35 亿年历史的细菌细胞之内或之间的原核交流网 (即微生物符号学 [microsemiotics] 和细胞符号学 [cytosemiotics])。当代的符号学家认为, 虽然她/他是聪明的符号使用者, 但却不仅仅是话语实体。事实上, 人类是符号的集合, 体内设定了非语言信息传递符码。(内符号过程 [endosemiosis]——神经符码, 基因符码, 和代谢符码等)。

一方面是由于学界对皮尔斯和大传统的兴趣日增,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索绪尔在严肃从事符号研究的学术圈外影响日衰, 皮尔斯式符号学最终取代了索绪尔符号学。皮尔斯式符号学完全不是去政治化的符号研究, 也未从公认的话语政治维度中撤退。皮尔斯符号学带来了与很多政治问题关联的重大范式转移, 特别是本文讨论的意志问题, 意志论和伦理。当代的皮尔斯符号学坦率表明, 从话语层面对变化的介入等同于蚊子叮大象。然而, 虽然西方知识界的语言本位主义符号学的影响试图粉饰这个事实, 但皮尔斯符号学确实提供了一个机会去重构人类事务在这个星球上的地位, 它将人类完全视作符号活动这个大环境中的符号实体。就其本身而言, 它矫正了意志论冲动, 也让符号伦理学免于陷入语言的牢笼。虽然如此, 正如下面将要讨论的, 早期的符号伦理学有其潜在的意志论缺陷, 仍然需要反人本论来完善。

## 二、意志论的难题

如果继续谈论, 引用《约翰福音》的开场语是很适合的: “太初有言……” 尽管当代的 (皮尔斯) 符号学避免狭隘的语言中心主义, 但是约翰的宣告依然保持其政治权威是有其原因的。写于主后 70 年, 《约翰福音》不同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 它被认为是福音的言语行为。《约翰福音》不像是一个见证者对耶稣一生的描述, 倒像是出自牧师的手笔。即使是在当下, 它在反对左翼政治运动中的托洛茨基主义 (Trotskyite) 方面依然发挥着作用, 并引起共鸣。在 1923 年的著作《文学与革命》(*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中, 托洛茨基严厉批评了俄国形式主义 (引申开来, 就是批判了整个形式主义) 所宣扬的“纯艺术”论, 认为这种观点与唯物主义辩证法表明的人类符号活动的实用主义观点是完全相悖的。他写到:

形式主义学派在解决艺术问题时, 代表了一种失败的理想主义。形式主义者显示出了一种快速催熟的宗教性。他们是圣·约翰的信徒。他们相信“太初有言”。但是我们

相信，“太初有行”。言词只是跟随行动之后，是行动的语音影子。

托洛茨基尽力指出艺术交流长期只能通过阶级利益来运行。在这个过程中，他预言虽然奴隶主阶级的艺术占统治地位长达几千年，但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取代它不过几百年，而无产阶级艺术可能几十年就能完成这个过程。然而实现这一过程关键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先锋。一场意志论运动促成了先锋派 1917 年 11 月的胜利。

意志论与先锋主义，甚至是在列宁之前，已经成为一个令马克思主义头痛的问题。事实上，它们也涉及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政治争论。在列宁主义模式下，先锋派是即将到来的革命的必要因素。它不仅促使革命理论产生，后来也与托洛茨基一起，形成了一种意志论动力，推动革命理论的实现。另一方面，先锋主义被认为是由无产阶级生成的。然而先锋主义又让人想起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权威主义式地强迫推进革命条件。与其哲学观点相似，政治上的意志论是因意志行为而出现，从而推动了先锋派。极端的意志论有时被认为是损坏真正的政治斗争的有机根基的一种冲动。

### 三、符号伦理学与行动主体性

在这里论及先锋主义和意志论是因为，任何政治动力总是包含某种程度的意志论。在后马克思主义环境下，意志论的范围(extent)将取决于它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这个困境显然是新生的符号伦理学要面对的。接下来要讨论的主要是基于几位重要的符号学家对(一种)符号伦理学的不同提案，包括佩特里利(Petrilli)、庞齐奥(Ponzio)和迪利(Deely)。他们共同或是各自都有效地继承和发展了托马斯·西比奥克有关这方面的学说。他们研究的起点是人类是唯一的符号学动物(semiotic animal)；虽然所有的生命体都与符号活动紧密相关，但只有人类能够自我意识到她/他使用的符号。伦理符号学的关键就在于人类的自我意识在符号活动环境中对其它生命体构成了一种绝对的强制力(人类的自我意识在符号活动环境中促使其它生命体也不得不加入符号活动)，因此人类不仅要关照自身，也有义务关照所有的生命体。对这一意识状态的初步讨论与符号伦理学，意志论和反人本论问题密切相关，这将在下文继续讨论。然而，现在值得注意的是迪利论证到，第一个将人类视作符号学动物的学者，是 1897 年德国数学家费利克斯·豪斯多夫(Felix Hausdorff)，其笔名为保罗·门格尔(Paul Mongre)。迪利提出：该名称及其附着的概念意义取代了将人类称作思想之物(res cogitans)的现代观念。就其本身而言，人类与其说是笛卡尔所认为的思想者，更不如说人类是这样的一种存在，他能意识到符号不同于构成个体的任何一种特定物质(包括符号载体的物质结

构)，也比它们要高级，符号能够更有效地将个人与他的周遭世界区别开来。他补充道：

将人类定义为动物中唯一的符号学动物，即是说人类是唯一能够意识到符号存在的动物（不同于他们的实践认识和使用），并能够在不可避免的动物实在世界（realism of animals），以及人类的经验增长，特别是人的理解力的增长中相应地形成一种符号在其中起根本作用的符号学意识。由于在文化中符号处处可见，我们将自己放置于符号通往自然的各条道路上，包括哪些人类从未涉足的领域。

在这个表述中有三点很重要：需要考虑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亲缘关系（这种观念通常与进化生物学关系最紧密）；人类与其他所有的生命形式一样是符号使用者，包括那些人类尚未遇到的生命形式；因此，人类不是在现代范式中被思想的力量定义，而是由他所处的整个符号活动网来定义，包括内符号过程（endosemiosis）；同时重要的是，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生命形式不共享的属性，即人类区别于其他生命形式的属性是人类能够意识到符号的存在和使用。

显然，符号学动物的概念与索绪尔符号学对人类中心说的认知密切相关。特别是对迪利来说，符号学动物的概念标志着人类不仅拥有能力的事实，“在客观现实中区分各种事物，也可以进一步在事物内部探索它们自己，”关键是皮尔斯符号学对实在者（ens reale）的恢复。然而，人类的符号意识同样也——

使人类为了人类的生存从元符号学的立场在人类对各种符号活动的依靠方面做出必要调整。各种符号活动将人类这种动物在符号层与各种生命形式和符号活动联系起来，由此，整个生物圈和自然环境通过符号活动构成一个统一系统。

我们在这段引文的“调整”概念中可以看到符号伦理学的根源，似乎不可避免的是，也能看到意志论，即人类意志的符号行为。

#### 四、描绘他者

符号伦理学起源于庞齐奥和佩特里利，也因他们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他们与迪利一起在20世纪90年代，重构了“符号学动物”这个概念，该观念本是由豪斯多夫（Hausdorf）最早提出。对符号伦理学更本土的影响来自西比奥克的整体符号学，特别是他提到的“单一系统”

(one system)论，迪利也提到了。在“符号活动的演化”中，西比奥克引用了洛夫洛克(Lovelock)的“盖亚论说”(Gaia thesis):

所有的生命体，从最小的范围到最大的范围，包括那些存在千万年的物种，形成一个单一共生的被称为盖亚的生态主体。沿着这个思路，要是调节生物圈的观念盛行，实际上就意味着所有信息发出者/信息源和信息终端/阐释者会被视作一个巨大的符号网的参与者。

由此看来，所谓的自我关怀实际上要从关怀他者开始。而这个他者必须是指整个符号域(semiosphere)。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佩特里利和庞奇奥的符号伦理学不仅仅是描绘了人类有限的责任，而是描绘了一个无限大的责任，要对整个星球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生命负责，因为人类无法从这个生态系统中脱离出来。此外，他们的符号伦理学的核心是将他性(otherness, 差异性)理论化。对他们——勒维纳斯(Levinas)、巴赫金(Bakhtin)而言，关键是皮尔斯认为:

他性(差异性)是符号固有的，同时又是符号具有超越自身能力的前提。符号，或更准确地说，指意路径(signifying routes)是在符号活动或是符号域的大网络中因符号间的各种关系而产生。它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张力中显现出来；它产生于符号的特定结构和符号的不断位移，转化和延异至他者。这个他者既迫近符号、又外在于符号，既超越、又受制于符号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他者——即过剩或过量(surplus or excess)，能够防止符号自我封闭，从而使其获得开放性及其创造新一代的潜力。符号整体的开放性或去整体性(detotalization)是质疑和批判的前提，也是可能评价心智或是符号活动运行的的前提，无论好坏。

因此他性完全内在于符号。这就意味着人类意志至少是个调节性的中介，被迫与周围环境妥协。然而佩特里利和庞奇奥却坚持认为“整个星球的命运，最终是由于人类的选择和行为”。而且，他们还冒险进一步引入了意志论的相关观点，这一观点似乎与符号层面上的责任基础相矛盾，其弦外之音，似乎在暗示符号伦理学提出了一种人本主义的新形式。

尽管佩特里利和庞奇奥指出他们的符号伦理学包含了列维纳斯式的“他者性人文主义”(humanism of alterity)，符号伦理学，出于下面将要揭示的原因，需要尽可能地说明它对于

先锋主义与意志论的立场和态度。目前佩特里利和庞奇奥从某种程度上消解人类中心说和传统的人本主义。但是列维纳斯的提法——他者性人本主义可能是不成功的，尽管佩特里利和庞奇奥想要避免重申人类独白式的身份（humanity's [monologic] identity）。同样的，对他者的强调，特别是信奉他者，需要更大程度地消除意志论因素，比佩特里利和庞奇奥目前所实现的更甚。对此，我们可以在当今地缘政治背景下提出与之相关的充分理由。

## 五、人类符号活动(Anthroposemiosis)中的人本主义

我在另外一篇论文中讨论过社会符号学领域有关人类符号活动多样化的分析，其特点是试图解释构成符号各种关系的理据性（motivation）。参考克雷斯（Kress）的一篇重要文章，社会符号学被描述成为尽力解开符号使用者，其环境、历史以及用来制造符号的物质材料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需要说明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不透明的，理据性在其原初状态下无法对观察者显现。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很容易推断人本主义与符号的必然相关性，这样就曲解了行动主体产生符号的特性和局限性，误将理据性当作纯意志论。这一点完全显现在自由主义的对话概念中，庞奇奥和佩特里利分别或是共同在研究该概念。对话概念有助于论证与他人的联系和交流是选择、意向或他人的个体行为的结果。从通常意义上讲，对很多人，对话保有先锋主义的色彩，因为它涉及某人去接触、联系另一个人。用社会符号学的术语来说，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理据性关系应该服从于意向行为。

法语世界一些坚决反人本论的思想家的研究从另一方面来说，虽然有很多缺陷，却为符号伦理学提供了一些有益的例子。这些思想家强烈抵制占统治地位的萨特人本主义以及欧洲战后，或后抵制时期变化了的优先思想，特别是跟意志论相关的。他们与人本主义词汇的渐渐渗透作斗争。举一个例子，阿尔都塞（Althusser）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人本主义趋势，甚至是在其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最终，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彻底地与那些将历史和政治建立在人的本质之上的理论脱离了关系。自1845年起，马克思开始研究新的概念，包括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最终决定因素（经济的）以及社会构成的其它层面的具体决定因素。对阿尔都塞来说，这不仅仅只是一个细枝末节的发现，而是马克思的科学发现。阿尔都塞对马克思这一改变的必要性进行了清楚地论述：

因此，严格意义上，说到理论，可以也必须提马克思的理论反人本论（theoretical anti-humanism），在该理论中可以看到人类世界本身（肯定性的，positive）知识的绝对（否定性的，negative）前提以及实际的转化。除非把人类的哲学（理论的）神话化为灰



烬，否则不可能认识人（原文如此）。因此，任何诉诸于马克思去恢复一种理论人类学或人本主义在理论上都不过是灰烬。但是，实际上，这种尝试却可能塑起一座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丰碑，压制真实的历史，威胁将历史引入死胡同。

这个论断，在符号伦理学的语境下尤为贴切。这必然是一个严重警告，即使是其出版已超过 40 年。确实，现如今阿尔都塞的劝告更加得到重视也许是有理由的。要确定的是，阿尔都塞的确暗示人本主义无论是作为观念还是在意识形态中都有其作用。但是他直截了当地说明了符号伦理学所属的那一类理论工作可能需要绝对的反人本论。

可以说，阿尔都塞呼吁反人本论与西比奥克在其作品中对人本主义的回避是相连的，该种思想弥漫在当前的伦理符号学中。<sup>①</sup>西比奥克追溯其知识，符号学渊源到皮尔斯、洛克，最后到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他不认为孔狄亚克（Condillac）和其他启蒙主义思想家的人本主义思想推进了他的研究。事实上，他所关心的内向符号活动（endosemiosis）和广义上无限大的符号活动网络，将很多人本主义的谬论从其思想中开除出去。理论上讲，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活动微不足道。西比奥克呼吁考虑人体（内的交流活动）：

人体由 25 万亿细胞构成，是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的 2000 倍。他呼吁进一步思考这些细胞之间通过不同形态的符号传递不同的信息，从而直接或间接地相互联系起来。这种如此密集的交流活动令人吃惊。只有极小的部分是我们知道的，更别说理解了。内部信息包括一个躯体组合，每一个全面的控制栅（如免疫系统）和整个综合的控制系统，特别是大脑。

在人体内发现的交流仅仅是扩展了地球上最早，最持久的生命体——细菌的那种交流。毫无疑问，人类间的交流，特别是“传播-生产”（communication-production）的形成，利益的获取正如佩特里利和庞其奥所认定的那样，在全球的交往中是必须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这个星球获得了决定性的地位，却也潜在地成为了这个星球的灾难。然而有理论的地方，就需要坚持庞其奥和佩特里利尝试提出的符号活动的美妙前景，也需要维持符号伦理学反人本论的观点。

## 六、坚持反人本论

---

<sup>①</sup> 参见 Paul Cobley “交际的手段”（To be means to communicate）一文，*Subject Matters*，第 29 至 46 页。

坚持理论的反人本论并非易事。阿尔都塞的追随者们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果。近来最值得庆贺的尝试是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的课题。他的《伦理学》(*Ethics*)概括了他的基本立场,尽管包含了人类行为和行动主体性,但是反对人本主义和意志论。巴迪欧对人本主义的拒绝在新形势下围绕新的坐标展开,他将新坐标命名为“事件”(the event)和事件要求的坚持(fidelity),这种坚持也是人在被事件攫住(抓住)时需要做到的。巴迪欧可能给出了最简明的概要:

即将发生的某事干扰了常态,这就是一个事件发生了。那些正确调查事件的结果并对这个干扰保持耐性的人将会服从他们通过这个事件得出的真理。这个真理将现存知识转化为普世性的,每个人都能理解的。

巴迪欧将事件置于很多领域:在明确的政治发展领域;在陷入爱情的行为中;在文化实践领域。同样,这些领域也各自都需要坚持:持久地致力于某种政治概念;对一段感情恪守承诺(即使是朋友都说该段感情已经失控);坚守某种艺术观念和实践[巴迪欧以海顿(Hayden)为例,认为他是一个革命的创新者]。

应该注意的是巴迪欧的研究有很多问题。实际上,从以上简短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巴迪欧的工作几乎包含了神学的维度,回到圣保罗,回到他的信念,特别是他的信仰转换。然而,他的事件观念等同于是坚持尝试重铸其他政治领域中的意志论。不明确的是,坚持,对某事件的坚持不懈取代了意志的角色,也反转了意志对环境施加影响的关系。这一反转,或它的对立面,应该是符号学家们所熟悉的,特别是西比奥克在很多场合讨论过类似的反转。在一篇经典的怀疑主义论文:《于终点处寻找本该在源头处寻找的事物》(“Looking in the destination for what should have been sought in the source”)中,西比奥克提出科学家们在某些方面“要警惕欺骗,尤其是要当心自我欺骗”。贯穿西比奥克作品的实例是聪明的汉斯,20世纪早期“欺骗了”观察者的那匹聪明的马。西比奥克和罗森塔尔(Rosenthal)关于聪明的汉斯的论文集教育我们欺骗不仅仅是无意的,而常常是有意的,被欺骗者与欺骗者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共谋的。他们往往从一开始就愿意被骗,不管他们是否相信其真假。英国的魔术师,达伦·布朗(Derren Brown)就是掌握这一逻辑的大师,他在电视上表演魔术花招,冷读术(cold reading)即是近来的案例。该案例显示他总是取得成功仅仅是因为参与者乐于被欺骗。

西比奥克有关有意或自愿欺骗的观察与巴迪欧尝试反转意志对环境的关系是类似的。换一种方式讲,从终点(destination)来看,源头(source)对结果要付责任,尽管所有眼睛常

常都只看到后者（终点）。同样，事件创造了坚持，坚持似乎被看作不过是意志论行为。因此意志必须被揭开，在欺骗发生的地方，意志必须被揭露。即使是在巴迪欧不确定的伦理学中，很明显事件与坚持之间也产生了欺骗。巴迪欧引用了海德格尔（Heidegger）的例子。据他判断，海德格尔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误将纳粹主义当作革命，因此深受幻象所害。同样地，近来遭遇家庭变故，失去家人的那些人最容易受到灵媒和巫师的影响，正如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那样。这些个体极其愿意参与（共谋）；他们的意志让他们失去了能够看到源头的的能力，更无法透彻考虑了。

因此不用吃惊的是在政治事业中必然有意志，尽管它并不总是用明显的怀疑主义的术语来表达。任何试图通过意志来直接达成其目标的政治事业都倾向于乌托邦，意志论，悲哀的是也很可能走向失望。符号伦理学建立在反人本论的原理之上，应该尽力阻止这类事情发生。当然符号伦理学也伴随着一些庞其奥和佩特里利的谨慎论述。然而符号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和用于讨论它的词汇尚有争议。这场争论的关键是有关生命的定义。

## 七、生命的符号与例外状态

在“例外状态”理论中，阿甘本（Agamben）指出现代政治形势是由一个深刻的矛盾引起。在巴黎公社的戒严状态（state of siege）时期，传统的法律被搁置。但至少自那时候起，人类就在生物与法律间的不确定领域建立起了现代国家。这个领域大部分隐藏在视野之外，让人们无法正确评估公法（public law），政治事实（political fact）与生命（life）之间的差异。毫无疑问，例外状态在公共竞技场被用于那些需要采用非常手段来处理特殊政治事件。然而阿甘本主张作为现代国家的基础，特例已经构成了其存在本身（very being）。

在符号伦理学中，法律范围和生存范围之间的差别似乎有相当大的重要性。对此差异，佩特里利和庞其奥早已有论述。他们讨论了人类生存的方方面面是如何被合并到交流-生产网络中。如他们所示，全球传播（global communication），明显是阿甘本所认为的例外状态长期存在的结果。全球通信因对以下的各个方面造成了重大影响从而改变了人类经历：

对发展、福利（well-being）、和消费主义，或是不发达、贫困、不可能的生存（impossible survival）的影响；对常态或是异常；融合或是边缘化的影响；对就业或是失业；能够胜任工作的劳动力的迁移（这是迁移出境[emigration]的特点）或是迁移（migration）的特点，这些移民可能会遭遇冷淡；对合法商品的交换与买卖或是非法商品的交易，无论是毒品、非常规武器或是人体器官。

尽管有以上指示性的清单，但是在生存领域需要注意更细微的差别。阿甘本也给出了解释。

在他 1998 年的著作《神圣的人》中，阿甘本调查了主权国家（sovereignty）这个概念。显然，主权国家必然能够宣告其例外状态。参考施密特（Schmitt）的古典政治学，阿甘本追溯了体现在例外实体中的主权概念。这个实体，神圣的人，是源自古典时期罗马法律对人的等级分类：有主权的人（或有最高统治权的）能够宣称一种例外状态，同时既在法律内又在法律外。在阿甘本看来，神圣的人的生命，赤裸的生命（bare life），显然被包含在司法秩序里的，因为它可以是法律的主体。但是它同时也可以被这个秩序排除出去，因为它可能被杀死。这个悖论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希腊人在构想城邦的概念时，没有依据一个单独的术语来表述“生命”。阿甘本注意到，对希腊人来说，有两个术语在起作用：生命（bios）指对个体或群体适宜的生活形式或方式；生命（zoe）则表达了所有生命体（动物，人类或上帝）都活着这个简单的事实。阿甘本进一步注意到简单的生命（zoe）在古典时期的世界被排除在城邦之外。福柯在他零星的生物政治学的讨论中提到，简单生命在进入现代后开始进入国家权力机制和决策。

差异及其结果对于符号伦理学似乎至关重要。佩特里利和庞其奥的分析清晰地认识到资本主义通过交流-生产对生命（生存方式 bios）而无所不在的控制会对生存状况（well-being）产生恶劣的影响。除此之外，他们也明确关注赤裸生命或是生命(zoe):人体器官无疑是赤裸生命的组成部分牵涉到生物权力斗争。此外，佩特里利和庞其奥在评论需要普遍关心地球(星球)和生态系统时，也间接提到生命(zoe):显然，国家总是试图将两种不同意义的生命(zoe, bios)混为一谈。然而，在分析国家不断试图将生命纳入同一个范畴时，需要将不同内涵的生命(bios, zoe)间的差异置于重要地位。国家对生命(bios)的监管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与人在群体中的政治存在相联系的，其中生活被自动简化为希腊人追求的良善生活(good life)。就其本身而论，生命(生存方式 bios)似乎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它要维系生命，在一定程度上它要显得能够最好为群体服务。然而，最佳的服务于人类的某种生存方式(bios)可能是完全是以生命(zoe)为基础。这一构想通过佩特里利和庞其奥讨论人类命运的各个方面而更为使人信服，因为它阐明了上文中迪利的引文中提到的差异。引文中提到，人类的生存状态完全取决于动物和植物生存的符号域。反之，国家将两种意义的生命合并从而吞噬了生命。符号伦理学将坚持其差异视作是可以引起人们关注人类中心主义困境的重要方式。生态讨论领域尽管尚未受到符号学提供的整体理解(global understanding)方式的影响，但

他们已经在讨论人类中心主义和生物中心主义对环境看法的差异。令人吃惊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与意志有密切的关系，它将人类视作地球上的主导者；而伦理符号学将人类置于与他共同生存的群体的符号域中（当然也包括与之相邻的生物圈），因此必须对不受限制的意志保持戒心。

## 八、符号伦理学去向何处？

有人也许会问，如果缺少了意志，那么符号伦理学可以做什么，它应该将自己置于什么位置，因为意志被假定为是政治的原动力。由于前面对意志论的疑虑，符号伦理学可能会局限于扮演一个足不出户的游行者的角色（*armchair marcher*），虽被不公正和后期资本内在的职权滥用所激怒，却受困于其理论界限而无法采取行动。不容置疑，这将会导致一个相当令人沮丧的结论。无论如何，如果让符号学扮演社会和生态支持者的角色只是为了简单地表明行动正在进行，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不公正和不公平是，以及生态失衡和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冲击等诸多问题，显然的回应是对他人采取宽容政策，根据环境实行多元文化主义和促进地方意志论。这种意识形态规则在最近 10 年已然成为了西方社会民主政府的组成要素。当然同样的政府也发动战争，剥削第三世界的劳工，比起长期的环境立法，更青睐燃料生产，因此对他们持怀疑的态度是明智的。

那么符号伦理学的工作应该在三个方面实施。第一个明显是在符号学。也就是说，在学术领域的符号学实践得到了那些被当代符号学的核心发展所俘获的符号学家们的支持和推进，比如在生命符号学，当然也包括符号伦理学领域。如果符号学作为一个领域可以推进学术的发展并能够促使更大的学术界感觉到它的存在，那么符号伦理学的规则必将最终渗透到当前把符号学仅仅当作解构广告的方法的那些领域（按照罗兰·巴尔特 1957 年的模式）。除此之外，学界的有些部分将不得不向科学妥协，就像是符号学已经做的，特别是通过自然符号学。这将意味着更大范围的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化研究领域将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可能，他们曾将科学作为男权主义的，机械论的，以及意识形态的等开除出局，这种做法可能适用于 19 世纪的思想模式，但在 21 世纪的语境下则相当不适当了。

当下在那些将自然和文化符号学相结合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这些发展。例如，在《生物整体》（*The Whole Creature*）中，温迪·惠勒（Wendy Wheeler）大量运用（从巴迪欧的观念来看）生命符号学的理论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不切实际的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也批判了与之相关的自由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从另一个略有不同的角度来看，西比奥克的学说源自一位令人敬畏的人物，他完全不是左翼事业的同情

者，然而却被科学的和整体的原则俘获，他对它们的坚持为符号学提供了思考的模板并制定了过多的研究计划，承诺拉近与符号伦理学的关系。与之相反，庞其奥和佩特里利更加同情左翼事业，但他们也坚持符号伦理学的整体观：有时候面对左翼教条的要求，他们某种程度上对意志论和先锋主义产生疑问，也会犯些过失，被部分左派的人认为是罪孽，比如他们认真研究生物学。

对于很多人来说，符号学因其对整体观的坚守而可能被轻蔑地认为是不关心政治的。当然，如此宣称等同于说符号学在政治上倾向保守。对那些持如此观点的人来说，符号学看来是没有规划的，它只能通过断断续续地尝试巴尔特所说的神话拆解（不考虑他早期的著作），才能够被吸纳。更准确地说，可能让符号学的批评家们深感遗憾的是符号学不是意志论的。对费尔巴哈论纲的第 11 条，马克思是这样回应的：哲学家们仅是用不同方式来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当然，马克思并不是建议能够通过直接的个人意志论来实现，例如对人友好或循环利用个人废弃物。人类作为一个集群，将不得不自己决定做这类的事情。马克思（或恩格斯）也不曾设想在交往实践中人们都能够正确表达。同样，佩特里利指出：

符号伦理学没有提出有特殊目标和实践的计 划，也没有或多或少真诚或虚伪的可遵循的十诫和规则。从这一点来看，符号伦理学与成规（stereotypes），准则（norms）以及意识形态（ideology）不同（庞其奥 1992,1993,1998）。符号伦理学提出批判成规、准则和意识形态，以及不同的价值形式，例如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在他的各类著作中所描述的（Morris 1948,1956,1964）。因此符号伦理学预先假定了人类的批判能力。它的特殊使命是让符号网络在看似不存在的地方显现，因此无法逃避其联系和影响，网络的分离、界限和距离只是符号的相对不在场。这种不在场可以保障责任在有限的意义下被理解，因此意识呈现出一种良好的意识形式，良心则呈现出一种清白的良心。

那么符号学中的符号伦理学是用理论实践来推动生命中心的人类责任。

符号伦理学必须要贯彻实行的第二个方面是公共领域，也与符号学相关。术语“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显然是挪用了哈贝马斯（Habermas）在其开创性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中的提法。尽管对这一自由主义概念有很多不同的批判，包括哈贝马斯的论文本身也批判公共领域话语外强中干（clay-footedness），但是话语比它表面看起来要重要得多（比如在 18 世纪欧洲的咖啡屋里）。

脱离家庭和商业的考虑，公众话语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在纯粹意义上是政治的，是理性话语，它不是简单地由资本积累决定，也不只是资本积累的附带现象。也就是在此处，符号伦理学尤其需要通过符号学让自己的在场被感知，不单是要介入话语层面而且要作为范式转移。也就是它需要用一种有说服力的方式，避免落入流行的陷阱，而要让自己成为新的认识事物的普遍方式的一部分。生命符号学可能在环境因素中扮演一个相对明确、直接的角色。比如霍夫梅耶（Hoffmeyer）符号学视野下的生物工程草案对农业有潜在的革命性的影响。但一般而言，符号伦理学可以在公共领域的两个主要区域得到发展。第一是关于复杂性。它在公共权限范围内获得一个立足点，例证了科学实际上如何解决 21 世纪的现实问题。第二是有关西方处在后现代主义下的一种感觉。这里后现代主义不是表面的一套明显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坐标，对它的评论是由 20 世纪 90 年代的学术出版现象引起的。相反，它是现代后的一种观世之道（理解方式），在其中，哲学中的语言中心主义者（glottocentrist）和笛卡尔坐标以及社会思想已经被经院哲学家学说中预想的符号学意识所压倒。实际上，符号伦理学可以在一个对符号能够有敏锐认识的时代涌现出来，这种认识面对的主要威胁不是拒绝看到符号的作用，而是不能识别人类符号之外的符号活动。

最后，作为以上所说的直接结果，符号伦理学需要在学界和社群关系的框架内发展。正如普遍意义上的符号伦理学，这最初看来好像是暗示了有意志论的意义，因为它假定这种把符号学与学生相关联起来的主动性中含有一定程度的意志。然而，那将会把学院/社群关系建立在视高等教育情况而定的工具主义观点之上。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与迪利描述的现代后时代不同）拒绝宏大叙述，在后现代主义下，也明确看到西方体系中对权威的尊重也日渐衰退，这为重铸高等教育的各种关系提供了契机。虽然它引进了好诉讼的消费心理，但对权威尊重的衰退也将一些专业学者拽出了他们的象牙塔，促使他们开展对话，鼓励他们思想应用于真实的生活。看来生命（bios）的相关需求提供了一个重新引入另一个意义上的生命（zoe）的机会。因此为了国家的目的，将两者（bios, zoe）合并成为一个对象，在人类与整个符号域的关系中关照人类的良善生活。简言之，用一种自觉、低调的方式来说，符号伦理学在对话中被迫起到了提升初期意识的作用。

毫无疑问，想要说服人类群体放弃追求与其良善生活相关的核心价值将会是徒劳的。意志论符号伦理学必然会落入此陷阱。这将会冒险重现自然与文化之分，在这一区分下，人类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回到自然，离开文化所提供的少量的一些舒适条件。如我们所见，符号伦理学不是这样的。西比奥克不断强调，将自然与文化割裂的观点是荒谬的，因为前者仅只是后者的一个小部分。反之，符号伦理学与库尔等讨论的“林地”（wooded meadow）有相似处；

那是一个生命多样性得到保护而不受人类活动威胁的地方。与荒野(wildness)不同（在那里，耕种和人类管理几乎完全缺席），与乡下也不同（在那里自然是被人类人为地保护着），爱沙尼亚的林地很小的程度上是被管理的，但此处主要包括本土的（也就是说不是从外引进的）物种。

由此，管理、先锋主义、意志论与意志，在符号伦理学中只占据非常次要的地位。在过去，它们已经被证实给人类和整个符号域的其他部分间的关系造成困扰，而不是提供解决方法。换一种方法说，为了现在的目的，转化葛兰西的观点，符号伦理学要求用一种对智力更透彻的悲观主义认识，来取代对意志评价过高的乐观主义。这种态度的另一种称呼，就是理论上的反人本论。

**注：**

对此更为精致的表述样式，请参看 Bernard (2004, 出版中)。

1995年9月26-28日，在葡萄牙波尔图，举行了由国际符号学会主办、诺尔玛·塔斯卡(Norma Tasca)和波尔图天主教大学葡萄牙符号学协会主持的“艺术与科学中的感知与自我意识”

(Perception and self-consciousness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国际论坛。论坛收到的论文本计划出版，最后却未实现。本文正是在当时提交论坛的那篇论文基础上写成。

本文原题为“Semiotics, Voluntarism, and Anti-Humanism”，原刊载于 New Formations,2007(62):44-60

**作者简介：**

保罗·科布利(Paul Cobley)，国际符号学会主席，英国 Middlesex 大学符号学教授，《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杂志主编，《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主编。



## 参考书目

- Agamben, G. (1998). *Homo sacer*, Daniel Heller-Roazen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Agamben, G.(2005). *State of Exception*, Keith Attell (trans), Chicago and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Allen, B. (2007). "Tuning back the linguistic turn in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in *Thesis Eleven*, 89, 1: 6-22.
- Alston, W. (1962). "Philosophical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linguistics", in *Journal of Philosophy* LIX, 709–20.
- Althusser, Louis and Balibar, Etienne.(1970). *Reading Capital*, London: New Left Books.
- Althusser, Louis. (1977). *For Marx*, London: New Left Books.
- Anscombe, G. (1953). "Note o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Wittgenstein's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in *Mind* LXI I, 521–2.
- Atmanspacher, Harald, and Dalenoort, Gerhard J. (eds.) (1994). *Inside Versus Outside. Endo- and Exo-Concepts of Observation and Knowledge in Physics, Philosophy, and Cognitive Sciences* (=Springer Series in Synergetics). Berlin: Springer.
- Bachtin, Michail M.; Kanaev, Ivan I.; Medvedev, Pavel, N.; Vološinov, Valentin N. (1995). *Bachtin e le sue maschere. Il percorso bachtiniano fino a Problemi dell'opera di Dostoevskij*, ed. by A. Ponzio, P. Jachia & M. de Michiel, Bari, Dedalo.
- Badiou, Alain. (2001). *Ethics: An Essay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Evil*, Peter Hallward (trans), London: Verso.
- Bakhtin, Mikhail e il suo circolo. (2014). *Opere 1919-1930*, ed., trans., comment and Introduction, pp. vii-xxviii, by Augusto Ponzio, bilingual Russian/Italian edition, in collab. with Luciano Ponzio for the translation, Milan: Bompiani.
- \_\_\_\_\_. (1963). *Problemy poetiki Dostoevskogo*, Mosca, Sovetskij pisatel', 2nd enlarged edition of Bakhtin 1929; Eng. trans. by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ed. by C. Emerson, Intro. by W. C. Booth,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 \_\_\_\_\_. (1970-71). From Notes Made in 1970-71. In M. M. Bakhtin, *Speech Genres & Other Late Essay*, ed. by C. Emerson and M. Holquist, Eng. trans. by V. W. McGee. Austi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6, 132-58.
- \_\_\_\_\_.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Eng. trans. by C. Emerson and M. Holquist, ed. by M. Holquist. Austi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_\_\_\_\_. (1986). *Speech Genres & Other Late Essays*, ed. Carly Emerson with Michael Holquist, translated by Vern W. McGee. Austi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_\_\_\_\_. (1990). *Art and Answerability. Early Philosophical Essays by M. M. Bakhtin*, ed. by M. Holquist and V. Liapunov, Eng. trans. and notes by V. Liapunov, suppl. trans. by K. Brostrom. Austi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_\_\_\_\_. (1996-2012). *Sobranie sočinenij* [Collected Writings], 7 vols. Mosca, Russkie slovari.
- \_\_\_\_\_. (2008). *In dialogo. Conversazioni del 1973 con Viktor Duvakin*, It. trans. from the Russian by Rosa Stella Cassotti, ed. by A. Ponzio, Naples: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 Balandier, Georges. (1974). *Anthropo-logiqu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It. trans. and intro. by Maria Solimini, Società e dissenso, Bari: Dedalo, 1971.
- Baldwin, Jon. (2004). 'Beyond bodies, culture and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Alain Badiou', in *Subject Matters* 1, 2: 1-20.
- Barbieri, Marcelo. (2007)(ed.). *Introduction to Biosemiotics: The New Biological Synthesis*, New York: Springer.
- Barthes, R. (1964). *Essais critiqu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 \_\_\_\_\_. (1967). *Elements of Semiology*, Annette Lavers and Colin Smith (trans), London: Cape.
- \_\_\_\_\_. (1973). *Mythologies*, Annette Lavers (trans), London: Paladin,
- \_\_\_\_\_. (1978). *Leçon*. Paris: Seuil.
- Bennett, Tony. (1996). "Out in the open: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Cultural Studies", in *Cultural Studies* 10 (1), 133–153.
- Bentele, Günter (1984). "Zeichen und Entwicklung" in *Vorüberlegungen zu einer genetischen Semiotik*, Tübingen: Narr.
- Bergmann, G. (1964) *Logic and Realit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Bernard, Jeff. (1983). "Diskussionsbericht" in *Didaktische Umsetzung der Zeichentheorie. Akten des 4. Symposiums der Österreichischen Gesellschaft für Semiotik, Linz 1981 (=Angewandte Semiotik 2)*, Jeff Bernard (ed.), 160–185. Vienna and Baden b.W.: ÖGS.
- \_\_\_\_\_. (1985). [Rev.] *Sign, System, and Function*, Jerzy Pelc, Thomas A. Sebeok, Edward Stan- kiewicz, and Thomas G. Winner (eds.). *Semiotische Berichte* 9 (1/2), 138–163.
- \_\_\_\_\_. (1991a). "Das Forschungsprojekt 'Zeichentheorie und Zeichenpraxis' der Österreichischen Gesellschaft für Semiotik. Vorbemerkungen, Ziele, Inhalte. *S-European Journal for Semiotic Studies* 3 (1, 2), 325–366 [special issue *Dialectics, Semiotics, Materialism. In Memoriam Ferruccio Rossi-Landi*, Jeff Bernard, Janos Kelemen, and Gloria Withalm (eds.)].
- \_\_\_\_\_. (1991b). *Die Sozialphilosophie und Sozio-Semiotik Rossi-Landis. In Philosophie und Semiotik. Sektionsakten*

– Zweiter Kongreß der Österreichischen Gesellschaft für Philosophie - Universität Wien, März 1990, L. Nagl et al. (eds.), 17–39. Vienna: ÖGS/ISSS.

\_\_\_\_\_. (1992). “Semiotics as a theory of (sub)culture(s) and its material core”, in *Signs of Humanity/L'omme et ses signes*. Proceedings of the IV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IASS/Actes du IVe Congrès Mondial de l'AIS. Barcelona/Perpignan, 1989, vol. 3 (=Approaches to Semiotics 107), Michel Balat and Janice Deledalle-Rhodes (eds.); Gérard Deledalle (gen. ed.), 1635–1648.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_\_\_\_\_. (1993). “Kultursemiotik im Überblick”, in *Semiotische Berichte* 17 (3, 4), 229–258.

\_\_\_\_\_. (1994a). *Internal and external sign work*. Lectur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IASS–AIS, Berkeley, June 12–18, 1994.

\_\_\_\_\_. (1994b). “The social philosophy and socio-semiotics of Ferruccio Rossi-Landi”, in *Reading su Ferruccio Rossi-Landi. Semiosi come pratica sociale (=Semiosis 2)*, Jeff Bernard, Massimo A. Bonfantini, János Kelemen, and Augusto Ponzio (eds.), 69–94. Naples: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_\_\_\_\_. (1996). *Über dialektische Zusammenhänge der Natur*. Zeitschrift für Semiotik 18 (1), 23–30.

\_\_\_\_\_. (2004). *Inside/outside, ideology and culture*. Special issue, *Semiotica* 148 (1/4), 47–68.

\_\_\_\_\_. (forthcoming). *Semiotic Sublation of Linguistic Relativism (=S-Labor)*. Vienna: OGS/ISSS.

Bernard, Jeff and Susan Petrilli. (2003). “Semiosis, Community, Sociality – An Overview,” World Congress, CD–ROM, 2003, in *Proceedings of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emiotic Studies IASS/AISS*.

Bernard, Jeff and Withalm, Gloria. (1986a). “Ferruccio Rossi-Landis dialektisch-materialistische Zeichentheorie. Einordnung —Überblick—Diagrammatik”, in *eschichte und Geschichtsschreibung der Semiotik. Fallstudien. Akten der 8. Arbeitstagung des Münsteraner Arbeitskreises für Semiotik, Münster 2.–3.10.1985 (=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 und der Semiotik 2)*, Klaus D. Dutz and Peter Schmitter (eds.), 329–366. Münster: MAKS Publikationen.

\_\_\_\_\_. (1986b). “Materie Dialektik Arbeit/Gesellschaft Geschichte Vermittlung. Ortende Bemerkungen zu Rossi-Landis sozio-prozessualer Zeichentheorie”, in *Die Zeichen der Historie. Beiträge zu einer semiologi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Materialien zur Historischen Sozialwissenschaft 5)*, Georg Schmid (ed.), 173–202. Vienna and Cologne: Böhlau.

\_\_\_\_\_. (1987). “Work/Sign/Communication” in *Degrés. Revue de synthèse à orientation sémiologique* 51, automne, c–c16 [special issue *Signes et pratiques sociales/Signs and Social Practice*, Jeff Bernard (guest ed.)].

- Bernard, Jeff; Massimo A. Bonfantini; Kelemen, János; Ponzio, Augusto (1994).(eds.)*Reading su Ferruccio Rossi-Landi*, Naples: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 Bezzel, Chris (1988). *Wittgenstein zur Einführung*. Hamburg: Edition SOAK im Junius Verlag.
- \_\_\_\_\_. (1992). Wahrnehmungsspiel als Sprachspiel. Eine Skizze zu Wittgenstein. In *Semiotische Berichte* 16 (1–2), 5–34.
- Bianchi, Cinzia. (1995). *Su Ferruccio Rossi-Landi* (= semiosis SU 2). Naples: Edizione Scientifica Italiana.
- Biancofiore, Angela and Ponzio, Augusto. (1987). Il metodo omologico: Rossi-Landi e Gramsci. *Il Protagora* 27 (11–12), 25–47 [special issue *Per Ferruccio Rossi-Landi*, a cura di Susan Petrilli].
- Bobbio, N. (1968). "Sulla Nozione di 'società civile'." *De homine* 24-25: 19-36. Dhoquo, G. 1971. *Pour l'histoire*. Paris: hthropos.
- Bonfantini, Massimo. (1978). "Semiotica dell'interpretazione contro semiotica ideologica", in *Strutture semiotiche e strutture ideologiche*, Quaderni del Circolo Semiologico Siciliano, 8-10, pp. 35-47.
- Caputo, Cosimo; Ponzio, Augusto and Susan Petrilli (2006). *Tesi per il futuro anteriore della semiotica. Il programma di ricerca della Scuola di Bari-Lecce*. Milan: Mimesis.
- Carnap, Rudolf. (1968). [1934]. *The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 Vienna & New York: Springer.
- \_\_\_\_\_. (1998). [1928]. *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 Hamburg: Meiner.
- Chomsky, Noam. (1967). Recent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innate ideas. in *Syntheses* 17. 2–11.
- \_\_\_\_\_. (1968). *Language and mind*. New York: Harcourt.
- Cobley, Paul and Randviir, Anti. (forthcoming)(ed.). 'What is sociosemiotics?' in *Sociosemiotica*, Special issue of *Semiotica*.
- Colletti, Lucio. (1979). *Tra marxismo e no*, Bari: Laterza.
- Cornforth, Maurice. (1965). *Marxism and Linguistic Philosoph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Danesi, Marcel; Ponzio, Augusto and Petrilli, Susan (2004). *Semiotica globale. Il corpo nel segno: introduzione a Thomas Sebeok*. Bari: Graphis.
- Deely, John.(1994). *New Beginnings: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and Postmodern Though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_\_\_\_\_.(2001).*The Four Ages of Understanding. The First Postmodern Survey of Philosoph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_\_\_\_\_.(2005).*Augustine and Poincaré: The Protosemiotic Development*, Sofia: New Bulgarian University Press.
- Deely, John, Susan Petrilli & Augusto Ponzio. (2005). *The semiotic animal*. Toronto: Legas.

- Deleuze, Gilles and Guattari, Felix (1976). *Rhizome*. Paris: Minuit.
- Dilthey, W. (1927). *Gesammelte Schriften*, VII. Band, Leipzig and Berlin: Teubner.
- Dobb, M. (1937).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Some Essays in Economic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hoquoi, G (1971). *Pour l'histoire*. Paris: Anthropos.
- Donini, A. (1964). *Lineamenti di storia delle religioni*. Rome: Editori Riuniti.
- \_\_\_\_\_. (1966). *Duden-Lexikon* (=rororo lexikon 9). Mannheim: Rowohlt.
- Eco, Umberto. (1975). *Trattato di semiotica*.
- \_\_\_\_\_. (1987). "Whatever Lola Wants. Rilettura di una rilettura" (on F. Rossi-Landi 1961, II ed. 1979).in *Per Ferruccio Rossi-Landi. Il Protagora* 11/12, XXVII, ed. and intro., pp. 7–9, by S. Petrilli. Now in Ponzio 2012, pp. 215-232.
- Eimermacher, Karl and Grzybek, Peter (eds.) (1991). "Zeichen — Text — Kultur", in *Studien zu den sprach- und kultursemiotischen*, Arbeiten von Vjach. Vs. Ivanov und V. N. Toporov (=Bochum Publications in *Evolutionary Cultural Semiotics* 8). Bochum: Brockmeyer.
- Engels, Friedrich. (1962). [1878]. *AntiDühring*. In K. Marx & F. Engels, *Werke*, vol. 20, 32–135. Berlin: Karl Dietz Verlag.
- Enzensberger, Hans Magnus. (1977). *Colloqui con Marx e Engels*. trans. by A. Casalegno, Torino: Einaudi.
- Festinger, Leon.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New York: Harper.
- Freud, Sigmund (1937). Konstruktionen in der Analyse. *Int. Z. Psychoanal*, 23 (4): 459-69. Eng. Trans. Construction in Analysis. In S. Freud,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trans. from German under the general editorship of James Strachey, in collab. with Anna Freud, Alix Strachey and Alan Tyson, Vol. 1-24, edited by James Strachey. London: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1900, Vol. XXIII, 1937-1939.
- G. Klaus. (1950). *Public Opinion and Propaganda*, New York.
- \_\_\_\_\_. (1975): *Sprache in der Politik*, Heidelberg.
- \_\_\_\_\_. (1977). *Die Sprache der Politik*, Berlin.
- Goodwin, Brian. (1994). *How the Leopard Changed its Spots: The Evolution of Complexity*, London: Phoenix.
- Gramsci, A. (1975). *Quaderni & l carcere*.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Istituto Gramsci directed by V. Geriatana, in 4 vols. Turin: Einaudi.
- Habermas, Jurgen.(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 Bourgeois Society*, trans. by Thomas Burger and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and MA: MIT Press.
- Hepp, Andreas. (1983). *Die langen Wellen im Kapitalismus. Eine marxistische Erklärung*. Frankfurt/M.: ISP. [2nd ed. 1987.]
- \_\_\_\_\_. (1999). *Cultural Studies und Medienanalyse. Eine Einführung* (=WV studium 184). Opladen and Wiesbaden: Wistdeutscher Verlag.
- Hintikka, J. (1958). "On Wittgenstein's Solipsism", in *Mind* LXVI I, 88–91.
- Hoffmeyer, J. (2001). S/E = 1: "asemiotic understanding of bioengineering", in *Sign System Studies* 29, 1, (2001): 277- 290.
- Hutten, E. (1953) "Semantics", in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V (15), 229–35.
- Ivanov, Vyaceslav V. *et alii*. (1977). *Mikhail Bakhtin. Semiotica, teoria della letteratura e marxismo*, ed. by Augusto Ponzio, Bari: Dedalo.
- Jacob F. (1970). *La logique du vivant*, Paris.
- Keyt, D. (1963) "Wittgenstein's notion of the object", in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XI I, 3–15.
- Klaus, Georg. (1964). "Die Macht des Wortes", Berlin: Veb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2nd ed. 1969. trans. ed. and intro. by Arianna De Luca, *Il potere della parola. Raffigurazione e teoria pragmatica del discorso*, Bari: Graphis.
- \_\_\_\_\_. (1969). *Die Macht des Wortes*, Berlin: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 Kress, Gunther. (1993). "Against arbitrariness: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the sign as a foundational issue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Discourse and Society*, 4, 2: 169-191.
- Kristeva, Julia (1977). *Polylogu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 \_\_\_\_\_. (1983). *Histoires d'amour*. Edition Denoël.
- Kull, Kalevi et al, (eds). "When culture supports biodiversity: the case of the wooded meadow", in *A. Roepstorff et al, Imagining Nature: Practices of Cosmology and Identity*,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 Laing, Ronald D., Phillipson, H., and Lee, A. R. (1966).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 London: Tavistock.
- Laswell, D. (1957):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Language*, ed. R. N. Anshen, New York.
- Laughlin, Robert. (2005). *A Different Universe: Reinventing Physics from the Bottom Down*, New York: Basic Books.
- Levinas, Emmanuel (1972). *Humanisme de l'autre homme*. Montpellier: Fata Morgana. Eng. trans. by N. Poller.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
- Lewin, Roger. (1993). *Complexity*, New York: Macmillan, 1993.

- Lukacs, G. (1923),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Stlldien iber mamistische Dialektik*. Berlin: Malik.  
English transl. by R. Livingtone. London: Merlin, 1971,
- Mark, K. (1953). *Grundnsse der Kritik derpolitischen bkonomie (1857-1858)*. Berlin: Dietz. English transl. by M, Nicolaus. Wa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3,
- Malcolm, N. (1953)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 Berlin: Dietz Verlag.  
\_\_\_\_\_. (1958) *Ludwig Wittgenstein: A Memoi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x, K.  
\_\_\_\_\_. (1965) *Capital*, vol. I,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_\_\_\_\_.(1973).*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ough Draft)*,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andel, Ernest. (1972). *Der Spätkapitalismus. Versuch einer marxistischen Erklärung*. Frankfurt/M.: Suhrkamp.
- Marcellesi, Jean-Baptiste et alii. (1978). *Linguaggio e classi sociali. Marxismo e stalinismo*, intro. by Augusto Ponzio, Bari: Dedalo.
-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 (1845-46). *Die Deutsche Ideologie*. trans. by F. Codino, Roma: Editori Riuniti, 1958.  
\_\_\_\_\_. (1968) *The German Ideolog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Marx, Karl. (1867). *Das Kapital*. Trans. by D. Cantimori, R. Panzieri, M.L. Boggieri, Roma: Editori Riuniti.  
\_\_\_\_\_. (1906–1909). [1867]. *Capital*, 3 vols. Chicago: Charles H. Kerr.  
\_\_\_\_\_. (1968). *Mathematical manuscripts*, Moscow: Nauka.  
\_\_\_\_\_. (1978). *Thesen über Feuerbach*. In K. Marx & F. Engels, *Werke*, vol. 3, pp. 533-535, Berlin: Karl Dietz Verlag.
- Medvedev, Pavel N. (1928). *Formal'nyi metod v Literaturovedeni*, Leningrad: Priboj; trans. by R. Bruzzese, *Il metodo formale nella scienza della letteratura*, ed. by A. Ponzio, Bari: Dedalo, 1977; new It. trans. and Russian original in Bachtin e il suo circolo 2014, pp. 599-1051; Eng. trans. by A. J. Weherle, *The Formal Method in Literary Scholarship*,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_\_\_\_\_. (Bakhtin Circle). (1928). *Formal'nyi metod v Literaturovedenii*, Leningrado: Priboj; Eng. trans. *The Formal Method in Literary Scholarship: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Poetics*, by A. J. Wehrl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It. trans. by Rita Bruzzese, *Il metodo formale nella scienza della letteratura. Introduzione critica alla poetica sociologica*, ed. by Augusto Ponzio, Bari: Dedalo, 1978; French trans. *Le méthode formelle en littérature*, éd. critique de Bénédicte Vauthier et Roger Comtet, Toulouse: Presses Universitaire di Miral, 2007.

- \_\_\_\_\_. (1928). *Formal'nyj metod v literaturovedenii*.
- Mongré, Paul. (1897). *Sant' Ilario, Gedanken aus der Landschaft Zarathustras*, Leipzig: Naumann.
- Morris, Charles. (1964). *Signification and Significa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_\_\_\_\_. (1938).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I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ineamenti di una teoria dei segni*, It. trans., comment, ed. by F. Rossi-Landi, new. ed. with intro., “*La biosemiotica di Morris*”, pp. 9–52, by S. Petrilli, Lecce, Manni, 1999; 2nd new edition, “*Presentazione: Charles Morris e Ferruccio Rossi-Landi*”, pp. 7–8, by A. Ponzio, “*Introduzione: Segno e simbolo nella biosemiotica di Morris*”, pp. 9–32, by S. Petrilli, Lecce: Pensa Multimedia 2009.
- \_\_\_\_\_. (1948). *The Open Self*. New York: Prentice-Hall; *L'io aperto. Semiotica del soggetto e delle sue metamorfosi*, It. trans. & Intro., “Charles Morris e la scienza dell'uomo. Conoscenza, libertà, responsabilità,” pp. vii–xxvi, by S. Petrilli, Bari: Graphis, 2002.
- \_\_\_\_\_. (1964). *Signification and Significance.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of Signs and Valu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Significazione e significatività. Studio sui rapporti tra segni e valori*, It. trans., ed. & intro. pp. v–xxxv, by S. Petrilli, Bari: Graphis, 2000.
- \_\_\_\_\_. (1988). *Segni e valori. Significazione e significatività e altri scritti di semiotica, etica ed estetica*, selected texts, ed., It. trans., & intro., pp. 5–28, by S. Petrilli, Bari: Adriatica.
- Nagl, Ludwig (1989). Rez. ‘Bezzel, Chris: Wittgenstein zur Einführung.’ *Zeitschrift für Didaktik der Philosophie* 11 (2), 127–128.
- Napoleoni, C. (1963) *Il pensiero economico del novecento*, Turin: Einaudi.
- Peirce, Charles S. (1931–1958).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s. I-VI, ed. by C. Hartshorne and P. Weiss, 1931-1935, Vols. VII-VIII, ed. by A. W. Burks, 1958.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trilli, Susan. (1986). “On the materiality of signs”, in *Semiotica* 62(3/4). 223–245.
- \_\_\_\_\_. (1992). “Translation, semiotics, and ideology”, in *Traduction, Terminologie, Rédaction* 1.233–264.
- \_\_\_\_\_. (1996). “Linguistic production, ideology and otherness: Augusto Ponzio’s contribu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Semiotica* 112(3/4). 263–287.
- \_\_\_\_\_. (2003). “Bodies and signs: For a typology of sign materiality”, in *Logica, dialogica, ideologica. I segni tra funzionalità ed eccedenza* [Logic, dialogic, ideologic. signs between functionality and excess], 181–199. Milan: Mimesis.



- \_\_\_\_\_. (2003-2004). "Autore, ideologia e riproduzione sociale," *Lavoro immateriale. Athanor. Semiotica, Filosofia, Arte, Letteratura*, XIV, 7, 2003–2004, pp. 63–69, ed. Susan Petrilli.
- \_\_\_\_\_. (2003-2004). "Corpi e segni. Per una tipologia della materialità semiosica," in *Lavoro immateriale. Athanor. Semiotica, Filosofia, Arte, Letteratura*, XIV, 7, 2003–2004, pp. 151–166, ed. Susan Petrilli.
- \_\_\_\_\_. (2004a). "The Responsibility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Responsibility: From the 'Semiotic' to the 'Semioethic' Animal," in Gloria Withalm & Josef Wallmannsberger (Hg./Eds.), in *Macht der Zeichen, Zeichen der Macht / Signs of Power, Power of Signs. Essays in Honor of Jeff Bernard*, INST, Wien 2004, pp. 103–119.
- \_\_\_\_\_. (2004b). Semioethics, subjectivity, and communication: For the humanism of otherness. Special issue, in *Semiotica* 148(1/4). 69–92.
- \_\_\_\_\_. (2005). 'Crossing out boundaries with global communication; the problem of the subject', in *Subject Matters* 2, 2: pp43-44.
- \_\_\_\_\_. (2005). "Structure and structuralism, semiotic approaches to Semiotics", in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 linguistics*, 2nd edn. Oxford: Elsevier.
- \_\_\_\_\_. (2007a). *Roland Barthes, Il discorso amoroso. Seminario a l'Ecole pratiques des hautes études 1974-1976*, seguito da *Frammenti di un discorso amoroso* (in editi), Introduction by Eric Marty, Presentation and edited by Claude Coste, Introduction to the Italian edition, translation from the French and edited by Augusto Ponzio, Milan: Mimesis.
- \_\_\_\_\_. (2007b). "Interpretive trajectories in translation semiotics", in Special issue of *Semiotica*, 163(1/4). 311–345.
- \_\_\_\_\_. (2009). *Sign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Reading the Works of Victoria Welby and the Signific Movement*, Foreword by Paul Copley, xvii–x [= Semiotics,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2, Editor: Paul Copley], Boston,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_\_\_\_\_. (2010). *Sign Crossroads in Global Perspective. Semioethics and Responsibility*.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_\_\_\_\_. (2011a). *Express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Language*.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_\_\_\_\_. (2011b). *Parlando con maestri di segni* (Speaking with masters of the sign), Lecce, Pensa: Multimedia.
- \_\_\_\_\_. (2012a). *Express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language*. New York: Transaction.
- \_\_\_\_\_. (2012b). *Semantics an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Adam Schaff*.
- \_\_\_\_\_. (2012c). *Express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Language*, Pref. by Vincent Colapietro, New Brunswick &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_\_\_\_\_.(2012d). *Un mondo di segni.L'aver senso e il significare qualcosa* (A world of signs. To have sense and to signify something), Bari: Laterza.
- \_\_\_\_\_.(2012e). *Altrove e altrimenti. Altrove e altrimenti.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critica letteraria e teoria della traduzione in, con e a partire da Bakhtin* (Elsewhere and otherwis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ranslation theory in, with and from Bakhtin), Milan, Mimesis, 2012; *Em outro lugar e de outro modo. Filosofia da linguagem, crítica literária e teoria da tradução em, em torno e a partir de Bakhtin*, Portuguese trans. by Valdemir Miotello et alii, São Carlos, Pedro&João Editores, 2013.
- \_\_\_\_\_.(2012f). Entries: “British Cultural Theory”, “Gramsci, Antonio”, “Ideology Theory”, “Marxism”, in *Encyclopedia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ed. by Marcel Danesi,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_\_\_\_\_. (2013). *The Self as a Sign, the World, and the Other*.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_\_\_\_\_. (2014a). *Sign Studies and Semioethics*. De Gruyter: Mouton Berlin.
- \_\_\_\_\_.(2014b). *Riflessioni sulla teoria dei segni e del linguaggio* (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of signs and language), Milan: Mimesis.
- \_\_\_\_\_.(2014c). *Semioetica e comunicazione globale*, Milan: Mimesis.
- \_\_\_\_\_. (2015). *Victoria Welby and the Science of Signs*.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_\_\_\_\_. (2015b). *Nella vita dei segni. Percorsi della semiotica* (In the life of signs. Itineraries in semiotics), Milano: Mimesis.
- \_\_\_\_\_. (2016a). *The Global World and Its Manifold Faces*. Zurich: Peter Lang.
- \_\_\_\_\_.(2016b). *Lineamenti di semiotica e di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Perugia: Guerra.
- \_\_\_\_\_. (1987) (ed.). *Per Ferruccio Rossi-Landi*, monographic issue of the journal *Il Protagora*,11/12, XXVII, ed. and intro. pp. 7–9, by S. Petrilli.
- \_\_\_\_\_. (1992)(ed.). *Social Practice, Semio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Ma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Morris and Rossi-Landi*. *Semiotic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emiotic Studies* 88, 1/2, 1992. Special Issue, ed. and Introduction, pp. 1–36, S. Petrilli.
- \_\_\_\_\_. (2003) (ed.). *Logica, dialogica, ideologica. I segni tra funzionalità ed eccedenza*, edited with P. Calefato, & introduction, “Semiosi, infunzionalità, semiotica. Introduzione” pp. 11–17, Milan: Mimesis.
- \_\_\_\_\_. (2003-2004) (ed.). *Lavoro immateriale. Athanor. Semiotica, Filosofia, Arte, Letteratura* XIV, ns. 7, Rome: Meltemi.
- \_\_\_\_\_. (2004) (ed.) *Ideology, Logic, and Dialogue in Semioethic Perspective*. *Semiotica.Journal of the*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emiotic Studies*, 148–1/4, 2004. Special Issue, Guest Editor Susan Petrilli, Introduction, pp. 1–9.
- \_\_\_\_\_. (2004) (ed.). *Lavoro immateriale. Athanor*. Milan: Mimesis.
- \_\_\_\_\_. (2007) (ed.) *La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come arte dell'ascolto. Sulla ricerca scientifica di Augusto Ponzio /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s the art of listening. On Augusto Ponzio's scientific research*, edited & Foreword, "Overture", pp. 9–11, by S. Petrilli, Bari: Edizioni dal Sud.
- \_\_\_\_\_. (2007) (e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s the Art of Listening*, Bari: Edizioni dal Sud.
- \_\_\_\_\_. (2007a) (ed.). *La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come arte dell'ascolto. Sulla ricerca scientifica di Augusto Ponzio /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s the art of listening. On Augusto Ponzio's scientific research*. Bari: Edizioni dal Sud.
- \_\_\_\_\_. (2008) (ed.). *Tutt'altro. Infunzionalità ed eccedenza come prerogative dell'umano*, Milan: Mimesis.
- \_\_\_\_\_. (2013) (ed.) ( *Writing, Voice, Undertaking*, ed. Susan Petrilli. Ottawa: Legas.
- \_\_\_\_\_. (2014a) (ed.). *Semioetica e comunicazione globale*, Milan: Mimesis.
- \_\_\_\_\_. (2014b). *Sign Studies and Semioethics.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and Values*, Boston,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Petrilli, Susan and Augusto Ponzio. (2001). *Thomas Sebeok and the signs of life*. Cambridge: Icon.
- \_\_\_\_\_. (2003). "Modeling, Dialogue and Globality: Biosemiotics and Semiotics of Self," *Sign Systems Studies* 31.1, Special Issue ed. by Peeter Torop, Mihhail Lotman, Kalevi Kull, Tartu: Tartu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3-2004). "The Concept of Language. Ferruccio Rossi-Landi and Thomas A. Sebeok," *Lavoro immateriale. Athanor. Semiotica, Filosofia, Arte, Letteratura*, XIV ns. 7, 2003-2004, pp. 207–222, ed. Susan Petrilli.
- \_\_\_\_\_. (2005). *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ive Routes in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8). *Lineamenti di semiotica e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Bari: Graphis; new enlarged edition, Perugia: Guerra, 2016.
- \_\_\_\_\_. (2010). "Semioethics,"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ed. Paul Cobley, London: Routledge. Chinese translation in *Signs & Media*, 5, Sept. 2012.
- \_\_\_\_\_. (2013). "Modelling, Dialogism and the Functional Cycle: Biosemiotic and Philosophical Insights," in *Sign Systems Studies* 41(1/2).
- Piro, Sergio. (1967). *Il linguaggio schizofrenico*, Milan: Feltrinelli.

- \_\_\_\_\_. (1971). *Le tecniche della liberazione*, Milan: Feltrinelli.
- \_\_\_\_\_. (1993). *Antropologia trasformativa*, Milan: Angeli.
- Pole, D. (1958). *The Later Philosophy of Wittgenstein*, London: Athlone Press.
- Ponzio, Augusto. (1967). *La relazione interpersonale*, Preface by Antonio Corsano, Giuseppe Semerari and Cesare Vasoli, Bari: Adriatica Editrice.
- \_\_\_\_\_. (1970). *Linguaggio and relazioni sociali*, Bari: Adriatica Editrice.
- \_\_\_\_\_. (1973). *Produzione linguistica and ideologia sociale*, Bari: De Donato. Translations: *Produccion linguistica and ideologia social*, Madrid, Corazon Editor, 1974; *Jezicna proizvodnja i drustvena ideologija*, Zagabria, Skolska knjiga, 1978; *Production linguistique et idéologie sociale* (revised and enlarged with respect to the original edition): cf. *infra*, n. 28.
- \_\_\_\_\_. (1974a).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and prassi sociale*, Lecce: Milella.
- \_\_\_\_\_. (1974b). *Gramática transformacional and ideologia política*, Nueva Vision: Buenos Aires.
- \_\_\_\_\_. (1974c). *Persona umana, linguaggio and conoscenza in Adam Schaff*, Bari: Dedalo.
- \_\_\_\_\_. (1975). *Dialettica and verità. Scienza and materialismo storico-dialettico*, Bari: Dedalo.
- \_\_\_\_\_. (1976). *La semiotica in Italia. Fondamenti teorici*, Bari: Dedalo.
- \_\_\_\_\_. (1977a). *Michail Bachtin. Semiotica, teoria della letteratura e marxismo* (Mikhail Bakhtin. Semiotics, literary theory and Marxism), Bari: Dedalo.
- \_\_\_\_\_. (1978a). *Marxismo scienza e problema dell'uomo*, Verona: Bertani.
- \_\_\_\_\_. (1978b). "Presupposti ideologici della teoria saussuriana e della teoria chomskyiana del linguaggio", paper held at the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Semiotici, on the "Presupposti ideologici delle ricerche linguistiche", University of Calabria.
- \_\_\_\_\_. (1978c). "La materia linguistico-ideologica dell'inconscio", in *Psicanalisi e classi sociali*, Roma: Editori Riuniti.
- \_\_\_\_\_. (1980). *Michail Bachtin: Alle origini della semiotica sovietica* [Mikhail Bakhtin: At the origins of Soviet semiotics]. Bari: Dedalo.
- \_\_\_\_\_. (1980). *Scuola and plurilinguismo* (in collab. with Giuseppe Mininni), Bari: Dedalo.
- \_\_\_\_\_. (1981). *Segni and contraddizioni. Fra Marx and Bachtin*, Verona: Bertani.
- \_\_\_\_\_. (1982). *Spostamenti, Percorsi and discorsi sul segno*, Bari: Adriatica Editrice.
- \_\_\_\_\_. (1983a). *Fra linguaggio and letteratura*, Bari: Adriatica Editrice.

- \_\_\_\_\_. (1983b). *Lo spreco dei significanti. L'eros, la morte, la scrittura* (in collab. with Maria Grazia Tundo and Eugenia Paulicelli), Bari: Adriatica Editrice.
- \_\_\_\_\_. (1983c). *Soggetto and alterità. Da Lévinas a Lévinas* (II enlarged edition of Ponzio 1967), Bari: Adriatica Editrice.
- \_\_\_\_\_. (1984). "Notes on semiotics and Marxism," in *Recherches Semiotiques* 3-4.
- \_\_\_\_\_. (1985a).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Bari, Adriatica Editrice.
- \_\_\_\_\_. (1985b). *Per parlare dei segni. Talking About Signs* (bilingual text, Eng. trans. by Susan Petrilli; in collab. with Massimo Bonfantini and Giuseppe Mininni), Bari: Adriatica Editrice.
- \_\_\_\_\_. (1986a). *Dialogo sui dialoghi* (in collab. with Massimo Bonfantini), Ravenna: Longo.
- \_\_\_\_\_. (1986b). *Interpretazione and scrittura. Scienza dei segni ed eccedenza letteraria*, Bertani, Verona.
- \_\_\_\_\_. (1986c). "On Rossi-Landi's approach to language and sign", in *International Semiotic Spectrum* 5: 3.
- \_\_\_\_\_. (1988). *Rossi-Landi e la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Rossi-Landi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ari: Adriatica.
- \_\_\_\_\_. (1989a). *Il filosofo and la tartaruga. Scritti 1983-1989*, ed. by Angela Biancofiore, Ravenna: Longo.
- \_\_\_\_\_. (1989b). *Soggetto and alterità. Da Lévinas a Lévinas*. Includes an interview with Levinas (III reviewed and enlarged edition of Ponzio 1967), Bari: Adriatica Editrice.
- \_\_\_\_\_. (1989c). "Semiotics and Marxism". in T. Sebeok & J. Umiker-Sebeok (eds.), *The Semiotic Web 1988*, pp. 387–416,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_\_\_\_\_. (1990a). *Man as a Sign*, introd. Eng. trans. and ed. by Susan Petrilli,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_\_\_\_\_. (1990b). "Methodics of common speech in Rossi-Landi", in *Man as a Sign: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pproaches to Semiotics 89), by Augusto Ponzio, trans. And ed. by Susan Petrilli, 121–150.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_\_\_\_\_. (1991a). *Dialogo and narrazione*, Lecce: Milella.
- \_\_\_\_\_. (1991b).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2. Segni valori ideologie*, Bari: Adriatica Editrice,.
- \_\_\_\_\_. (1992a). *Production linguistique et idéologie sociale*, Candiag (Canada), Editions Balzac.
- \_\_\_\_\_. (1992b). *Tra semiotica and letteratura. Introduzione a Michail Bachtin*, Milan: Bompiani.
- \_\_\_\_\_. (1993a). *Il dialogo della menzogna* (in collab. with Massimo Bonfantini, Rome: Stampa alternativa.
- \_\_\_\_\_. (1993b). *La ricerca semiotica*, in collab. with Omar Calabrese and Susan Petrilli, Bologna, Esculapio.
- \_\_\_\_\_. (1993c). *Signs, Dialogue and Ideology*, selection of essays ed. by Susan Petrilli,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_\_\_\_\_. (1994a). *Fondamenti di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in collab. with Patrizia Calefato and Susan Petrilli), Rome-Bari: Laterza.
- \_\_\_\_\_. (1994b). *Scrittura, dialogo and alterità. Tra Bachtin and Lévinas*,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 \_\_\_\_\_. (1995a). *El juego del comunicar. Entre literatura y filosofía*, ed. by Mercedes Arriaga Flórez, Valencia: Episteme.
- \_\_\_\_\_. (1995b). *I ricordi, la memoria, l'oblio. Foto-grafie senza soggetto* (in collab. with Gabriella Pranzo), Bari: Edizioni dal Sud.
- \_\_\_\_\_. (1995c). *I segni dell'altro. Eccedenza letteraria and prossimità*, Naples: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 \_\_\_\_\_. (1995d). *La differenza non indifferente. Comunicazione, migrazione, guerra*, Milan: Mimesis.
- \_\_\_\_\_. (1995e). *Responsabilità and alterità in Emmanuel Lévinas*, Milan: Jaca Book.
- \_\_\_\_\_. (1995f). *Segni per parlare dei segni. Signs to talk about signs*, Eng. trans. by Susan Petrilli, Bari: Adriatica Editrice.
- \_\_\_\_\_. (1995g). *Sujet et altérité. Sur Emmanuel Lévinas*, Paris, L'Harmattan, 1995, 160 pp.
- \_\_\_\_\_. (1995h). *Responsabilità e alterità in Emmanuel Lévinas* [Responsibility and otherness in Emmanuel Levinas]. Milan: Jaca Book. 166 S. Petrilli and A. Ponzio
- \_\_\_\_\_. (1995i). *El juego del comunicar. Entre literatura y filosofía*, M. Arriaga (trans.). Valencia: Episteme.
- \_\_\_\_\_. (1995j). *Sujet et altérité. Sur Emmanuel Lévinas*. Paris: L'Harmattan.
- \_\_\_\_\_. (1996a). *Comunicazione, comunità, informazione. Comunicazione mondializzata and nuove tecnologie* (in collab. with M. Bonfantini, P. Calefato, C. Caputo, P. Mazzotta, S. Petrilli, M. Refice), Lecce: Manni Editore.
- \_\_\_\_\_. (1996b). *I tre dialoghi della menzogna and della verità* (in collab. with Massimo Bonfantini and Susan Petrilli), Naples,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 \_\_\_\_\_. (1997a). *Che cos'è la letteratura? Otto questioni dialogando with Carlo Alberto Augieri*, Lecce: Milella.
- \_\_\_\_\_. (1997b). *Elogio dell'infunzionale. Critica dell'ideologia della produttività*, Rome: Castelvecchi.
- \_\_\_\_\_. (1997c). *La rivoluzione bachtiniana*, Bari: Levante; *La revolución bajtiniana. El pensamiento de Bajtín y la ideología contemporánea*, Madrid: Catedra, 1998; Brazilian trans. by Valdemir Miotello et al., São Paul: Editora Contesto, 2008, new edition, 2012.
- \_\_\_\_\_. (1997d). *La rivoluzione bachtiniana. Il pensiero di Bachtin and l'ideologia contemporanea*, Bari: Levante Editori.
- \_\_\_\_\_. (1997f). *Metodologia della formazione linguistica*, Rome-Bari: Laterza.

- \_\_\_\_\_. (1997g). *Semiotica della musica. Introduzione to linguaggio musicale* (in collab. with Michele Lomuto), Bari: Graphis.
- \_\_\_\_\_. (1998a). *Basi. Significare, inventare, dialogare* (in collab. with Massimo Bonfantini, Cosimo Caputo, Susan Petrilli, Thomas Sebeok), Lecce: Piero Manni.
- \_\_\_\_\_. (1998b). *La coda dell'occhio. Letture del linguaggio letterario*, Bari: Graphis.
- \_\_\_\_\_. (1998c). *La revolución bajtiniana. El pensamiento de Bakhtin y la ideología contemporánea*, Madrid: Catedra.
- \_\_\_\_\_. (1998d). *Signs of Research on Signs* (in collab. with Susan Petrilli), fascicolo speciale di "Semiotische Berichte," 22/ 3,4 (Vienna) .
- \_\_\_\_\_. (1999a). *Fondamenti di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in collab. with Patrizia Calefato and Susan Petrilli), Rome-Bari: Laterza, II edizione.
- \_\_\_\_\_. (1999b). *Fuori campo. I segni del corpo tra rappresentazione ed eccedenza* (in collab. with Susan Petrilli), Milan: Mimesis.
- \_\_\_\_\_. (1999c). *La comunicazione [Communication]*. Bari: Graphis.
- \_\_\_\_\_. (2000a). *Il sentire nella comunicazione globale* (in collab. with Susan Petrilli), Rome: Meltemi.
- \_\_\_\_\_. (2000b).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rt and Answerability in Mikhail Bakhtin* (in collab. with Susan Petrilli), Ottawa: Legas.
- \_\_\_\_\_. (2000c). *Semiotica dell'io* (in collab. with Thomas Sebeok and Susan Petrilli), Rome: Meltemi.
- \_\_\_\_\_. (2001a). Entries: "Accent," "Alterity," "Bakhtin," "Barthes," "Dialogue," "Kristeva," "Levinas," "Marx," "Peter of Spain," "Rossi-Landi," "Russian Formalism," "Schaff," "Vailati," "Voloshinov", in *Semiotics and Linguistics*, ed. Paul Cobley, London, Routledge; new ed. 2010.
- \_\_\_\_\_. (2001b). *Enunciazione and testo letterario nell'insegnamento dell'italiano come LS*, Perugia: Edizioni Guerra.
- \_\_\_\_\_. (2001c). *I segni and la vita la semiotica globale di Thomas Sebeok* (in collab. with Susan Petrilli) Milan: Spirali.
- \_\_\_\_\_. (2001d). *Thomas Sebeok and the Signs of Life* (in collab. with Ponzio), Cambridge: Icon Books UK, Totem Books USA.
- \_\_\_\_\_. (2002a). *Il linguaggio and le lingue. Introduzione alla linguistica generale*, Bari: Graphis.
- \_\_\_\_\_. (2002b). *Individuo umano, linguaggio and globalizzazione nella filosofia di Adam Schaff*. Includes an interview with Adam Schaff, Milan: Mimesis.
- \_\_\_\_\_. (2002c). *La differenza non indifferente. Comunicazione, migrazione, guerra*, Milan, Mimesis, 2002, new ed. (v. sopra, n. 35).

- \_\_\_\_\_. (2003a). *I segni tra globalità and infinità. Per la critica della comunicazione globale*. Bari: Cacucci.
- \_\_\_\_\_. (2003b). *Il linguaggio and le lingue*. Bari: Graphis.
- \_\_\_\_\_. (2003c). *Semioetica* (in collab. with Susan Petrilli), Rome: Meltemi.
- \_\_\_\_\_. (2003d). *Tra semiotica and letteratura. Introduzione a Michail Bachtin* (new ed. revised and enlarge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Milan: Bompiani.
- \_\_\_\_\_. (2003e). *Views in Literary Semiotics* (in collab. with Susan Petrilli), Ottawa: Legas.
- \_\_\_\_\_. (2003f). *I segni tra globalità e infinità: Per la critica della comunicazione globale*[Signs between globality and infinity: For a critiqu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Bari: Cacucci.
- \_\_\_\_\_. (2004a). "Ideology", in *Semiotik/Semiotics*, eds. R. Posner, K. Robering, T. A. Sebeok, Vol. 4,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 \_\_\_\_\_. (2004b). *Elogio dell'infunzionale* (new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Milan: Mimesis,
- \_\_\_\_\_. (2004c). *Linguistica generale, scrittura letteraria and traduzione*, Perugia, Guerra.
- \_\_\_\_\_. (2004d). *Semiotica globale. Il corpo nel segno: introduzione a Thomas Sebeok* (in collab. with Marcell Danesi and Susan Petrilli), Bari: Graphis.
- \_\_\_\_\_. (2004f). *Semiotica e dialettica* [Semiotics and dialectics], Bari: Edizioni dal Sud.
- \_\_\_\_\_. (2004g) "Semiotics of Power, Peace and War: The *Helsinki Final Act* and USA Defence Strategy," in Gloria Withalm & Josef Wallmannsberger (Hg./Eds.), *Macht der Zeichen, Zeichen der Macht. / Signs of Power, Power of Signs*. Essays in Honor of Jeff Bernard, INST, Wien 2004.
- \_\_\_\_\_. (2005a). *La raffigurazione letteraria* (in collab. with Susan Petrilli), Milan: Mimesis.
- \_\_\_\_\_. (2005b). *Reasoning with Emmanuel Lévinas* (in collab. with Susan Petrilli and Julia Ponzio). Ottawa: Legas.
- \_\_\_\_\_. (2005c). *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ive Routes in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 (in collab. with Susan Petrilli),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5d). *Testo come ipertesto and traduzione letteraria*, Rimini: Guaraldi.
- \_\_\_\_\_. (2005e). *The Semiotic Animal* (in collab. with Susan Petrilli and John Deely), Toronto, Legas, 2005, 244 pp.
- \_\_\_\_\_. (ed.) (2005f). *Mondo di Guerra. Athanor*. Milan: Mimesis.
- \_\_\_\_\_. (2006a). *The Dialogic Nature of Sign*, Ottawa: Legas.
- \_\_\_\_\_. (2006b). *Dialoghi semiotici* (in collab. with Massimo Bonfantini and Susan Petrilli), Naples: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 \_\_\_\_\_. (2006c). *La cifrematica and l'ascolto*, Bari: Graphis.
- \_\_\_\_\_. (2006d). *La comunicazione*, nuova edizione, Bari: Graphis.



- \_\_\_\_\_. (2006e). *Linguaggio and relazioni sociali*, Bari: Graphis, 2006, new ed. with new introduction (v. sopra n. 2).
- \_\_\_\_\_. (2006f). *Produzione linguistica and ideologia sociale*, Bari: Graphis ; 2006, new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v. sopra n. 3).
- \_\_\_\_\_. (2006g). *Tesi per il futuro anteriore della semiotica. Il programma di ricerca della Scuola di Bari-Lecce*, in collab. with Cosimo Caputo and Susan Petrilli), Milan: Mimesis,.
- \_\_\_\_\_. (2006h). *The dialogue nature of the sign*, trans. from It. by Susan Petrilli, Toronto: Legas.
- \_\_\_\_\_. (2006i). *The I Questioned: Emmanuel Lévinas and the Critique of Occidental Reason. Subject Matters*. Special issue, 3, no. 1: 1–42 [This issue includes contributions commenting Ponzio’s essay by A. Z Newton, M. B. Smith, R. Bernasconi, G. Ward, R. Burggraeve, B. Bergo, W. P. Simmons, A. Aronowicz, 43–127.]
- \_\_\_\_\_. (2007-8). *Umano troppo disumano. Athanor*, Milan: Mimesis.
- \_\_\_\_\_. (2007a). *A mente. Processi cognitivi and formazione linguistica*, Perugia: Guerra Edizioni.
- \_\_\_\_\_. (2007b). *Fundamentos da Filosofia da linguagem* (in collab. with Patrizia Calefato and Susan Petrilli), trans. in portoghese del n. 54, trans. and F. Alve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onzio for the Brazilian edition, pp.9-68, Vozes, Petrópolis (Brazil).
- \_\_\_\_\_. (2007c). *Fuori luogo: L’esorbitante nella riproduzione dell’identico*. Rome: Meltemi.
- \_\_\_\_\_. (2007d). *Linguistica generale, scrittura letteraria and traduzione*, Perugia: Guerra. new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 \_\_\_\_\_. (2007e). *Semiotics Today. From Global Semiotics to Semioethics, a Dialogic Response* (with Susan Petrilli), New York, Ottawa, Toronto: Legas.
- \_\_\_\_\_. (2008a). *A revolução bakhtiniana*, San Paolo (Brazil): Contexto.
- \_\_\_\_\_. (2008b). *Il linguaggio and le lingue*, new ed. Bari: Graphis.
- \_\_\_\_\_. (2008c). *La cifrematica and l’ascolto*, second ed. Bari: Graphis.
- \_\_\_\_\_. (2008d). *La dissidenza cifrematica*, Milan: Spirali.
- \_\_\_\_\_. (2008e). *Lineamenti di semiotica and di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with Susan Petrilli, Bari: Graphis.
- \_\_\_\_\_. (2008f). *Linguaggio, lavoro and mercato globale. Rileggendo Rossi-Landi* Milan: Mimesis.
- \_\_\_\_\_. (2008g). *Qohélet, Versione in idioma salentino (sampietrano)*, ed. by Cosimo Caputo, Lecce: Milella.
- \_\_\_\_\_. (2008h). *Tra Bachtin and Lévinas. Scrittura, dialogo, alterità*, Bari: Palomar.
- \_\_\_\_\_. (2008i). *Tre sguardi su Auguste Dupin* (with M.A. Bonfantini and B. Brunetti), Bari: Graphis.
- \_\_\_\_\_. (2009a). *Da dove verso dove. La parola altra nella comunicazione globale*, Perugia: Edizioni Guerra.

- \_\_\_\_\_. (2009b). *Emmanuel Levinas, Globalisation, and Preventive Peace*, Ottawa: Legas.
- \_\_\_\_\_. (2009c). *Freud, l'analisi, la scrittura*, in collab. with Massimo Bonfantini, Bruno Brunetti, Bari: Graphis.
- \_\_\_\_\_. (2009d). *L'Ecoute de l'autre*. Paris: l'Harmattan.
- \_\_\_\_\_. (2010a). *Dialogo sui dialoghi*, with Massimo Bonfantini, Naples: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 \_\_\_\_\_. (2010b). *Encontres de palavras. O outro no discurso*, San Carlo (Brazil): Pedro and João Editores.
- \_\_\_\_\_. (2010c). *Enunciazione and testo letterario nell'insegnamento dell'italiano come LS*, Perugia: Edizioni Guerra, 2010. New ed. (v. n. 59) with introd.
- \_\_\_\_\_. (2010d). *Il linguaggio and le lingue*, new ed. Bari: Graphis.
- \_\_\_\_\_. (2010e). *Procurando uma palavra outra*, San Carlo (Brazil): Pedro and João Editores.
- \_\_\_\_\_. (2010f). *Rencontres de paroles*, Paris: Alain Baudry & Cie.
- \_\_\_\_\_. (2010g). *Roland Barthes. La visione ottusa*, in collab. with Julia Ponzio, Giuseppe Mininni, Susan Petrilli, Maria Solimini, Milan: Mimesis.
- \_\_\_\_\_. (2011a). *Interferenze. Pier Paolo Pasolini, Carmelo Bene and dintorni* (in collab. with Susan Petrilli and Luciano Ponzio), Milan: Mimesis.
- \_\_\_\_\_. (2011b). *La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Bari: Edizioni Laterza.
- \_\_\_\_\_. (2011c). *Parole e nomi. Jalons di un percorso di ricerca*. In A. Ponzio (ed.), *Incontri di parole*, Milano: Mimesis, series "Athanos. Semiotica, Filosofia, Letteratura".
- \_\_\_\_\_. (2011d). *Thomas Sebeok and os Signos de Vida*, with Susan Petrilli, San Carlo (Brazil): Pedro and João Editores.
- \_\_\_\_\_. (2012a). *Dialogando sobre diálogo na perspectiva bakhtiniana*, San Carlo (Brazil): Pedro and João Editores.
- \_\_\_\_\_. (2012b). *In altre parole*, Milan: Mimesis.
- \_\_\_\_\_. (2012c). *Linguística Chomskyana and ideologia social*, Curitiba Editora Ufpr (Univesidad Federal do Paraná, Brazil).
- \_\_\_\_\_. (2012d). *Tempo, corpo, scrittura*, in collab. with Filippo Silvestri, Susan Petrilli and Julia Ponzio, Lecce: Pensa Multimedia.
- \_\_\_\_\_. (2012e). *Ferruccio Rossi-Landi e la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Lecce: Pensa Multimedia.
- \_\_\_\_\_. (2012f). "Adorno, Theodor", "Althusser, Louis", "Benjamin, Walter", "Frankfurt School", "Marcuse, Herbert", Eng. trans. by S. Petrilli, in *Encyclopedia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ed. by Marcel Danesi,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_\_\_\_\_. (2013). *Fuori luogo. L'esorbitante nella riproduzione dell'identico*, Milano: Mimesis.

- \_\_\_\_\_. (2014). (ed.) “Michail Bachtin e il suo circolo”, in *Opere 1919-1930*, bilingual text, Russian / Italian,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comment by A. Ponzio, Bompiani, “Il pensiero occidentale”.
- \_\_\_\_\_. (2015). *Tra semiotica e letteratura. Introduzione a Michail Bachtin*. (in *Il campo semiotico*, directed by Umberto Eco). Milan: Bompiani.
- Ponzio, Augusto; Calefato, Patrizia; Petrilli, Susan. (1994). *Fondamenti di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Roma-Bari: Laterza; 2a ed. 1999; Portuguese trans., *Fundamentos de filosofia da linguagem*, intro. by Augusto Ponzio, trans. by portoghese di Ephraim F. Alves, Petrópolis, RJ (Brazile), Editora Vozes. [Enlarged ed. for the Portuguese translation].
- Ponzio, Augusto & Susan Petrilli. (eds.). (1998). *Signs of research on signs*. Special issue, *semiotische Berichte* 22(3/4).
- \_\_\_\_\_. (1998). “Signs of Research on Signs”, in Special issue of “*Semiotische Berichte*”, 22/ 3,4, (Vienna) 1998.
- \_\_\_\_\_. (2000a). *Il sentire della comunicazione globale* [Feeling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Rome: Meltemi.
- \_\_\_\_\_. (2000b).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rt and Answerability in Mikhail Bakhtin*, New York, Ottawa, Toronto: Legas.
- \_\_\_\_\_. (2000c). *Il sentire della comunicazione globale*. Rome: Meltemi.
- \_\_\_\_\_. (2001a). *Sebeok and the Signs of Life*, Cambridge: Icon Books.
- \_\_\_\_\_. (2001b). *Thomas Sebeok and the signs of life*. Cambridge: Icon Books. Ponzio, Augusto & Susan Petrilli. 2002. *I segni e la vita: La semiotica globale di Thomas A. Sebeok* [Signs and life: Thomas A. Sebeok’s global semiotics]. Milan: Spirali.
- \_\_\_\_\_. (2002a). “Sign Vehicles for Semiotic Travels: Two New Handbooks,” in *Semiotica* 141 (1/4), 203–350.
- \_\_\_\_\_. (2002b). *I segni e la vita. La semiotica globale di Thomas A. Sebeok*, Milan: Spirali.
- \_\_\_\_\_. (2003). *Semioetica* [Semioethics]. Rome: Meltemi.
- \_\_\_\_\_. (2005a). *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ive routes in the opennetwork of signs*.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6). “Translation as listening and encounter with the other in mig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processes today”, in Special issue, *Traduction, Terminologie, Rédaction* 19(2). 191–224.
- \_\_\_\_\_. (2007a). *Semiotics Today. From Global Semiotics to Semioethics, a Dialogic Response*. Ottawa: Legas.
- \_\_\_\_\_. (2008). *Lineamenti di semiotica e di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Bari: Graphis.
- \_\_\_\_\_. (2009). “Adam Schaff: From semantics to political semiotics”, in *Acta Semiotica Fennica* 34. 1334–1360.
- \_\_\_\_\_. (2010). “Semioethics,” in P. Copley,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150–162, London: Routledge.
- Ponzio, Augusto, Susan Petrilli & Julia Ponzio. (2005b). *Reasoning with Emmanuel Lévinas*. Ottawa: Legas.

- \_\_\_\_\_. (1999). *Fondamenti di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Foundations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 2nd edn. Rome & Bari: Laterza.
- Posner, Roland. (1988). "Semiotics vs. anthropology: Alternatives in the explication of 'culture'", in *Semiotics of Culture*, Henri Broms and Rebecca Kaufmann (eds.), 151–184. Helsinki: Arator.
- Rokeach M. (1960). *The Open and Closed Mind*, New York.
- Rorty, Richard. (1967)(ed.). *The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with Two Retrospective Essay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osner, Katarzyna. (1984). "On some difficulties involved in Lotman's concept of the semiotics of culture", in *Sign, System, and Function*, Paper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Polish- American Semiotics Colloquia, Jerzy Pelc et al. (eds.), 341–353.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 Rossi, M. (1970). *Da Hegel a Marx*. Rllan: Feltrinelli. New edition in 4 vols. 1970, 1970, 1974, 1975.
- Rossi-Landi, Ferruccio.(1961). *Significato comunicazione e parlare comune*,(2nd ed. 1979, new ed. curated by A. Ponzio, Venice: Marsilio,1998.)
- \_\_\_\_\_.(1966). "Per un uso marxiano di Wittgenstein", in *Nuovi Argomenti* 1 (1), 187–230.
- \_\_\_\_\_.(1968). *Il linguaggio come lavoro e come mercato*. Milan: Bompiani. New editions by A. Ponzio, 1992, 2003. Eng. trans. *Language as Work and Trade*, by M. Adams et al. South Hadley, MA: Bergin and Garvey, 1983.
- \_\_\_\_\_.(1971). "Editoriale: Le nostre forze e la Rivoluzione cinese," pp. 5-12; "Premessa" to Testi di revisionisti sovietici. *Ideologie*. Per lo studio della Rivoluzione cinese, pp. 345-350; "Sul contributo di Mao alla dialettica," 519-540. *Ideologie*. Per lo studiodella Rivoluzione cinese, vol. 4, 13/14.
- \_\_\_\_\_.(1972a) *Sprache als Arbeit und als Markt*, 2nd edition, Munich: Carl Hanser Verlag.
- \_\_\_\_\_.(1972b). *Semiotica e ideologia. Applicazioni della teorie del linguaggio come lavoro e come mercato. Indagini sulla alienazione linguistica* (=Uomo e Societa). Milan: Bompiani.
- \_\_\_\_\_.(1973a). *Ideologies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 (= Approaches to Semiotics, Paperback Series, 4), The Hague: Mouton; *Ideologias de la relatividad linguistica*, Spanish trans. by J. A. Vasco, Buenos Aires, Nueva Visión, 1974.
- \_\_\_\_\_.(1973b). *Il linguaggio come lavoro e come mercato*, 2nd. ed. (1st. ed. 1968), Milano: Bompiani.
- \_\_\_\_\_.(1974). *José Martí. Anthology of texts and criticism*, intro. & ed. by C. Vitier, It. ed. by F. Rossi-Landi, trans. by E. Clementelli & L. Acerbi, in collab. with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Ideologie*, with a "Premessa" by the Direction. Rome: Edizioni di Ideologic.

- \_\_\_\_\_.(1974). *Sprache als Arbeit und als Markt*. Munich: Hanser [new German trans. of Rossi- Landi 1968; the first 1972 trans. withdrawn by the author].
- \_\_\_\_\_.(1975a). *Linguistics and Economics* (=Janua Linguarum, Series Maior 81). The Hague: Mouton. [2nd ed. 1977] [First publ. in: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vol. XII: Linguistics and Adjacent Arts and Sciences. The Hague: Mouton, 1974, Part 8: 1787–2017].
- \_\_\_\_\_.(1975b). "Signs about a Master of Signs", A review article of Charles Morris, *Writings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Signs* (= Approaches to Semiotics, 16), ed. by T.A. Sebeok. The Hague: Mouton, 1971. *Semiotica* XIII, 2: 155-197. Now in Rossi-Landi 1992, Ch. 2. (Revised and enlarged Italian ed. in 1975c).
- \_\_\_\_\_.(1975c). *Charles Morris e la semiotica novecentesca* (= Semiotica e pratica sociale, 1), Milan: Feltrinelli.
- \_\_\_\_\_.(1976). "Ideen zum Studium sprachlicher Entfremdung", in *Soziolinguistik*, ed. by A. Schaff, 171-198. Vienna: Europa Verlag.
- \_\_\_\_\_.(1978). *Ideologia* (=Enciclopedia filosofica ISEDI 11). Milan: ISEDI Istituto Editoriale Internazionale. [Enlarged version: Milan: Mondadori 1980; Engl. trans. by Roger Griffin, *Marxism and Ideolo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 \_\_\_\_\_.(1979a). *Semiotica e Ideologia*, 2nd. revised ed. (1st ed. 1972), Milano: Bompiani.
- \_\_\_\_\_.(1979b). "Towards a theory of sign residues", in *Versus* 23, 15–32.
- \_\_\_\_\_.(1981a). [1978]. *L'ideologia*, 2nd ed. Milan: ISEDI.
- \_\_\_\_\_.(1981b). "Wittgenstein, old and new", in *Ars semeiotica* 4 (1), 29–51.
- \_\_\_\_\_.(1985a). *Metodica filosofica e scienza dei segni*, Milan: Bompiani.
- \_\_\_\_\_.(1985b). *Metodica filosofica e scienza dei segni. Nuovi saggi sul linguaggio e l'ideologia* (=Il campo semiotico). Milan: Bompiani.
- \_\_\_\_\_.(1992). *Between Signs and Non-Signs* (=Critical Theory 10), ed. with an intro. by Susan Petrilli.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_\_\_\_\_.(1995). "Work, sign, and some uses of language", in *Zeichen/Manipulation. Akten des 5. Symposiums der Österreichischen Gesellschaft für Semiotik, Klagenfurt, 15.–16.12.1984* (=Angewandte Semiotik 6), Jeff Bernard (ed.), 141–159. Vienna: ÖGS.
- \_\_\_\_\_. (1992). *Between Signs and Non-signs*, ed. and intro. by S. Petrilli,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Ryle, G. (1931–2) "Systematically misleading expressions", in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XXX, 139–71.

- \_\_\_\_\_. (1937–8). “Categori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XXXVIII, 189–206.
- \_\_\_\_\_. (1951). “Ludwig Wittgenstein”, in *Analysis* XII, 1–9.
- \_\_\_\_\_. (1953). “Ordinary language”,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LXI I, 167–86.
- \_\_\_\_\_. (1961) “Use, usage and meaning”, in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ume XXXV, 223–30.
- \_\_\_\_\_. (1962). “The theory of meaning”, in M. Black (ed.)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 Sartre, Jean-Paul. (1960).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Paris: Gallimard.
- Saussure, Ferdinand de. (1983)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Roy Harris (trans), London: Duckworth.
- Schaff, Adam. (1946). *Pojęcie i słowo* [Concept and Word]. Książka: Leopoli.
- \_\_\_\_\_. (1947). *Wstęp do teorii marksizmu*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Marxism]. Warsaw: PWN.
- \_\_\_\_\_. (1949). *Narodziny i rozwój filozofii marksistowskiej* [The rise and growth of Marxist philosophy]. Warsaw: Książka i Wiedza.
- \_\_\_\_\_. (1951). *Z zagadnień marksistowskiej teorii prawdy* [Problems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truth]. Warsaw: Książka i Wiedza. *Semantics an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Adam Schaff*.
- \_\_\_\_\_. (1955). *Obiektywny charakter praw historii* [The objective nature of the laws of history]. Warsaw: Książka i Wiedza.
- \_\_\_\_\_. (1961a). *Filosofia człowieka* [Philosophy of man]. Warsaw: Książka i Wiedza.
- \_\_\_\_\_. (1961b). *Marx oder Sartre?* [Marx or Sartre?]. Berlin: Rowolt.
- \_\_\_\_\_. (1962) [1960]. *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 London: Pergamon Press.
- \_\_\_\_\_. (1964). *Jezyk a poznanie* [Language and cognition]. Warsaw: PWN.
- \_\_\_\_\_. (1965). *Marxismus und das menschliche Individuum* [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 Vienna: Europaverlag.
- \_\_\_\_\_. (1967). *Szkice z filozofii jezyka*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Warsaw: Książka i Wiedza.
- \_\_\_\_\_. (1969a). “Sulla necessità di una linguistica marxista”, in A. Schaff,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Roma: Editori Riuniti, pp. 9-28.
- \_\_\_\_\_. (1969b).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 Scarponi, I. trans., Rome: Editori Riuniti.
- \_\_\_\_\_. (1970). *History and Truth*, Oxford: Pergamon Press.
- \_\_\_\_\_. (1974). *Strukturalismus und marxismus* [Marxism and structuralism]. Vienna: Europaverlag.
- \_\_\_\_\_. (1975a). *Marxismo e umanesimo: Per un'analisi semantica delle “tesi su Feuerbach” di K. Marx*. [Marxism

- and humanism: For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Theses on Feuerbach” by K. Marx], A. Ponzio (ed. & trans.). Bari: Dedalo.
- \_\_\_\_\_. (1975b). *Umanismus, Sprachphilosophie, Erkenntnistheorie des Marxismus* [Humanism,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theory of knowledge], Vienna: Europaverlag.
- \_\_\_\_\_. (1977a). *Entfremdung als soziales Phänomen* [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Vienna: Europaverlag.
- \_\_\_\_\_. (1977b). *Teoria della conoscenza, logica e semantica*, trans. by Maria Sinatra, intro. by Augusto Ponzio, Bari: Dedalo.
- \_\_\_\_\_. (1978a). *Che cosa significa essere marxista. Saggi filosofici, 2*, Bari: Dedalo.
- \_\_\_\_\_. (1978b). *Teoria dell'individuo umano, del linguaggio e della conoscenza. Tre domande ad Adam Schaff*, ed. by Augusto Ponzio, in A. Ponzio.
- \_\_\_\_\_. (1982). *Die kommunistische Bewegung am Scheideweg* [The Communist movement at the crossroads], Vienna: Europa Verlag.
- \_\_\_\_\_. (1988). *Perspektiven des modernen Sozialismus* [Perspectives of modern socialism], Vienna: Europa Verlag.
- \_\_\_\_\_. (1992). *Ökumenischer Humanismus* [Ecumenical humanism]. Salzburg: Otto Müller Verlag.
- \_\_\_\_\_. (1993). *Mi siglo veinte* [My twentieth century: Letters to myself]. Madrid: Editorial Sistema.
- \_\_\_\_\_. (1994). *Umanesimo ecumenico*, A. Ponzio (trans.). Bari: Adriatica.
- \_\_\_\_\_. (1995a). *Notatnik kloptnika* [Notes by a man with problems]. Warsaw: BGW.
- \_\_\_\_\_. (1995b). *Il mio ventesimo secolo* [My twentieth century], A. Ponzio (ed.). Bari: Adriatica.
- \_\_\_\_\_. (1997). *Medytacje* [Meditations], Warsaw; *Meditaciones sobre el socialismo*, Madrid: Siglo Veintiuno.
- \_\_\_\_\_. (1998). *Meditaciones sobre el socialismo*. Madrid: Siglo Veintiuno.
- \_\_\_\_\_. (1999). *Structurelle Arbeitslosigkeit—das soziale Grundproblem unserer Epoche*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_\_\_\_\_. (2000). “Disoccupazione strutturale: Il problema sociale di base della nostra epoca”, in A. Ponzio (ed.), *Millepiani*, 33–48. Milan: Mimesis.
- \_\_\_\_\_. (2001a). *Ksiazka dla mojej zony: Autobiografia problemowa*. Warsaw: Wydawn.
- \_\_\_\_\_. (2001b). *Meditazioni*, L. de Stasio (trans.). Bari: Edizioni dal Sud.
- Schaff, Adam; Sève, Luciene. (1971-1972). “On the 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 of Marx’s Thesen über Feuerbach,” in *L’homme et la société* 19–20, 22, 24–26.
- \_\_\_\_\_. (1975) *Marxismo e umanesimo: il dibattito svoltosi in L’Hommé et la société sulla VI glossa di Marx su Feuerbach*, ed. by A. Ponzio, Bari, Dedalo.

- Scheffczyk, Adam. (1986). Culture. i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Semiotics* (=Approaches to Semiotics 73), Thomas A. Sebeok (gen. ed.), Tome 1, 163–168.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Schrag, Calvin. (2001). *Communicative Praxis and the Space of Subjectivity*,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 Schwendter, Rolf. (1971). *Theorie der Subkultur*. Cologne and Berlin: Kiepenheuer & Witsch.
- Sebeok, Thomas A. (2001). *Global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83). 'The Notion of Zoosemiotics', reprinted in *Frontiers in Semiotics*, John Deely et al (ed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86a). *I Think I Am a Verb*, New York: Plenum Press; trad. it. e introd. di S. Petrilli, *Penso di essere un verbo*, Sellerio: Palermo.
- \_\_\_\_\_. (1986b) (ed.).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Semiotics* (= Approaches to Semiotics 73), 3 vols. Berlin/New York/Amsterdam: Mouton de Gruyter.
- \_\_\_\_\_. (1991). *A Sign is Just a Sig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94). *Signs. An Introduction to Semiotics*.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98). *Come comunicano gli animali che non parlano*, ed. & intro. by S. Petrilli, Bari: Edizioni dal Sud.
- \_\_\_\_\_. (2001a). *Global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1b).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and Linguistics*, ed. By Paul Cobley, London, Routledge.
- Sebeok, Thomas A. and Rosenthal, Robert A. (1981) (eds), *The Clever Hans Phenomenon: Communication with Horses, Whales, Apes, and People*, New York: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 Sebeok, Thomas A. and Umiker-Sebeok, Jean (1992)(eds), *Biosemitotic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Sebeok, Thomas A., Susan Petrilli and Augusto Ponzio (2001). *Semiotica dell'io*. Rome: Meltemi.
- Soh-Rethel, A. (1970). *GeistEge und korperliche Arbeit*. Frankfurt: Suhrkamp, 2<sup>nd</sup>ed. 1972. 1971. *Waren und Denkfom, Aufsätze*. Frankfurt-on-Main: Suhrkamp. (See also Sohn-Rethel, 1972. 'Mental and Manual Labour in Manrism." In P. Walton 252 BETVC'EEN SIGNS AND NON-SIGNS and S. Hall, *Situating Marx*. Wuman Gontext Books; and Sohri-Rethel, 1973.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in *RadicalPhilosophy* 6, Winter 1973).



- Solimini, Maria. (1974). *Scienza della cultura e logica di classe*, Bari: Dedalo.
- \_\_\_\_\_. (1979). "Struttura e sovrastruttura: Lévi-Strauss, Sebag, Godelier", intro. to Lucien Sebag, in *Mitologia e realtà sociale*, Bari: Dedalo, pp. 5-30.
- \_\_\_\_\_. (1981). *La materia culturale*. Miti, riti, scambi, maschere, Bari: Adriatica.
- Sraffa, P. (1960). *The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ädtke, Klaus. (1981). Kunst als Sprache — Juri Lotmans Beitrag zu einer Semiotik der Kultur. In *Kunst als Sprache. Untersuchungen zum Zeichencharakter von Literatur und Kunst*, Juri M. Lotman (ed.), 403–432. Leipzig: Reclam.
- Stalin, J. (1951). *Marxism and linguistic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Stashower, Daniel A. (2000). *The Teller of Tales: The Life of Arthur Conan Doyle*, Harmondsworth: Penguin.
- Sweezy, P. (1940).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Taylor, Paul. (2002). *Respect for Nature: 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and Mikael Stenmark,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Policy-Making*, Aldershot: Ashgate.
- Thomson, G. (1949). *The Prehistoric Aegeans* (= Studies in Ancient Greek Society, vol. 1).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_\_\_\_\_. (1955). *The First Philosophers* (= Studies in Ancient Greek Society, vol. 2).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Threadgold, Terry. (1987). Rossi-Landi's higher dialectical level. Some observations on linguistic alienation, relativity and ideology. *Il Protagora* 27 (11–12), 81–98 [special issue *Per Ferruccio Rossi-Landi*, a cura di Susan Petrilli].
- Tran Duc, T. (1973). *Recherches sur l'origine du langage et de la conscience*.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 Trotsky, Leon. (1992). *Art and Revolution: Writings on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Cul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Pathfinder.
- Turner, Graeme. (1996).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Vaughan, Genevieve. (1997). *For-Giving. A Feminist Criticism of Exchange*, Austin, Plainview/Anomaly Press.
- \_\_\_\_\_. (2004). "The Exemplar and the Gift," in *Semiotica* 148(1/4): 95–118.
- \_\_\_\_\_. (2007). (ed.). *Women and the Gift Economy: A Radically Different Worldview is Possible*, Toronto: Inanna.
- \_\_\_\_\_. (2013). "Mother sense and the image schema of the gift," pp. 57-78. On and Beyond Significs: Centennial Issue for Victoria Lady Welby (1837–1912), in *Semiotica* 2013, 196, 1-4. Special Issue: Guest editors

- Frank Nuessel, Vincent Colapietro, & Susan Petrilli, Introduction by F. Nuessel & V. Colapietro, pp. 1-12.
- \_\_\_\_\_. (2015). *The Gift in the Heart of Language. The Maternal Source of Meaning*, Milan: Mimesis International.
- Villain-Gandossi, C., Bochmann, K., Metzeltin, M. & Shäffner, C. (1990). *The concept of Europe in the process of the CSCE*. Tübingen: Gunter Narr.
- Vitello, V (1963) *Il pensiero economico moderno*, Rome: Editori Riuniti.
- Voloshinov, Valentin N. (Bakhtin Circle). (1927). *Frejdzim*,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Freudianism: A Marxian Critique*, Eng. trans. London: Seminar Press, 1973; *Freudianism. A Critical Sketch*, Eng. trans. by I. R. Titunik, ed. by I. R. Titunik with N. H. Brus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Freudismo. Studio critico* (Freudism. A Critical Sketch), It. trans., Bari, Dedalo, 1977; new It. trans. by L. Ponzio, *Freud e il freudismo. Studio critico*, Milan: Mimesis, 2005.
- \_\_\_\_\_. (1927). *Frejdzim. Kriticeskij očerk*,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It. trans. by L. Ponzio, *Freud e il freudismo*, ed. by A. Ponzio, Milan: Mimesis; It. trans. and Russian original in *Bachtin e il suo circolo* 2014, pp. 355- 597.
- \_\_\_\_\_. [Mikhail M. Bakhtin] (1929). *Marksizm i filosofija jazyka*. Lenin- grad: Academia [English trans.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 Matejka and I. R. Titunik (eds.), New York and London: Seminar Press, 1973; German trans. *Marx- ismus und Sprachphilosophie. Grundlegende Probleme der soziologischen Methode in der Sprachwissenschaft* (=Ullstein Buch 3121), Samuel M. Weber (ed.). Frankfurt/M., Berlin and Vienna: Ullstein, 1975].
- \_\_\_\_\_. (Bakhtin Circle). (1929). *Marksizm i filosofija jazyka*. Moscow-Leningrad: Priboj. 2nd ed. 1930;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ng. trans. L. Matejka and I. R. Titunik.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New edition, 1986;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ng. trans. L. Matejka and I. R. Titunik, London, Seminar Press, 1973; an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Le marxisme et la philosophie du langage*, French trans. in a bilingual ed. by Patrick Sériot & Inna Tylkowski, Ageeva, Limoges: Lambert-Lucas.
- \_\_\_\_\_. (Bakhtin Circle). (1980). *Il linguaggio come pratica sociale (1926-1930)*, Bari: Dedalo; new It. trans. by L. Ponzio, *Linguaggio e scrittura*, Rome: Meltemi, 2003.
- \_\_\_\_\_. (Bakhtin Circle). (2009). *Per una filosofia dell'atto responsabile*, It. trans. L. Ponzio, ed. A. Ponzio, Lecce: Pensa Multimedia.
- \_\_\_\_\_. (Bakhtin Circle). (2010). *Parola propria e parola altrui nella sintassi dell'enunciazione*, ed. by A. Ponzio,

Lecce: Pensa Multimedia.

- Weiler, G. (1958). "On Fritz Mauthner's critique of language", in *Mind* LXVI I, 80–7.
- Weinberg, J. (1936). *An Examination of Logical Positiv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Wells, R. (1962). What has linguistics done for philosophy? in *Journal of Philosophy* LIX, 697–708.
- \_\_\_\_\_. (1973).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in *New Left Review* 82:3-16,
- Wheeler, Wendy. (2006). *The Whole Creature: Complexity, Biosemiotics and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Wisdom, J. (1952). 'Ludwig Wittgenstein, 1934–1937' *Mind* LXI, 258–60. Wittgenstein, L. (1958)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lackwell.
- \_\_\_\_\_. (1961a). *Notebooks 1914–16*, Oxford: Blackwell.
- \_\_\_\_\_. (1961b).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Williams, R. (1973).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in *New Left Review* 82:3-16.
- Wittgenstein, Ludwig (1921). *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 *Annalen der Naturphilosophie* 14, 185–262.
- \_\_\_\_\_. (1922).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London: Routledge and Paul.
- Woolfson, Charles. (1982). *The Labour Theory of Culture. A Re-examination of Engels's Theory of Human Origi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Wright, G. H. von (1958). 'Ludwig Wittgenstein, a biographical sketch', in N. Malcolm (ed.) *Ludwig Wittgenstein: A Memoi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immermann H.D.. (1969). *Die Politische Rede. Der Sprachgebrauch Bonner Politiker*, Stuttgart: D.Faulscit and G. Kuhn (1974): *Die Sprache des Arbeiters im Klassen-kampf*. Berlin (DDR); L. Lbwenthal and N. Gutterman (1970): *Prophets of Deceit*. Palo Alto; Stemberger, Storz, and Suskind (1968): *Aus dem Wörterbuch der Unmenschen*, Hamburg; H.D. Zimmennann (1972): *Der Allgemeine Barzel. Zumpolitischen Sprachgebrauch*, In *Sprache and Gesellschaft*, A. Rucktaschel (ed.). Munchen.

## Websites

<http://www.ferrucciorossilandi.com>.

<http://semioticon.com/pool/augusto-ponzio/>

<http://www.123people.ch/s/augusto+ponzio>

<http://www.semioticon.com/people/ponzio.htm>

<http://www.semioticon.com/semiotix5/03-SemioticProfile-AugustoPonzio.htm>

<http://www.susanpetrilli.com/>

附：本书英文目录

**Introduction**

Susan Petrilli: The European School of Marxist-Semiotics

**Adam Schaff**

Susan Petrilli & Augusto Ponzio: "Semantics an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Adam Schaff"

Adam Schaff: General Semantics: A Marxist Philosopher's View,

Adam Schaff: The Pragmatic Function of Stereotypes"

**Ferruccio Rossi-Landi**

Susan Petrilli, "Communication, Mass Media, and Critique of Ideology"

Ferruccio Rossi-Landi: "Towards a Marxian Use of Wittgenstein" Ferruccio Rossi-Landi: Sign Systems & Social  
Reproduction

Ferruccio Rossi-Landi: Sign Systems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Jeff Bernard**

Susan Petrilli, & Augusto Ponzio, "Jeff Bernard and Ferruccio Rossi-Landi, A Friendship Founded on Mutual  
Appreciation of Respective Research Perspectives"

Jeff Bernard, "Ten Thesis on Perception in Terms of Work: A Rossi-Landian/Witgensteinian Point of View

Jeff Bernard, "Inside/Outside, Ideology and Culture"

**Augusto Ponzio**

Susan Petrilli, "Semiotics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Augusto Ponzio"

Augusto Ponzio, "Notes on a Semiotic Marxism"

Augusto Ponzio, "For a Critique of Equal Exchange Semiotics"

**Discussion**

Paul Cobley, "Semioethics, Voluntarism, and Anti-Humanism"

---